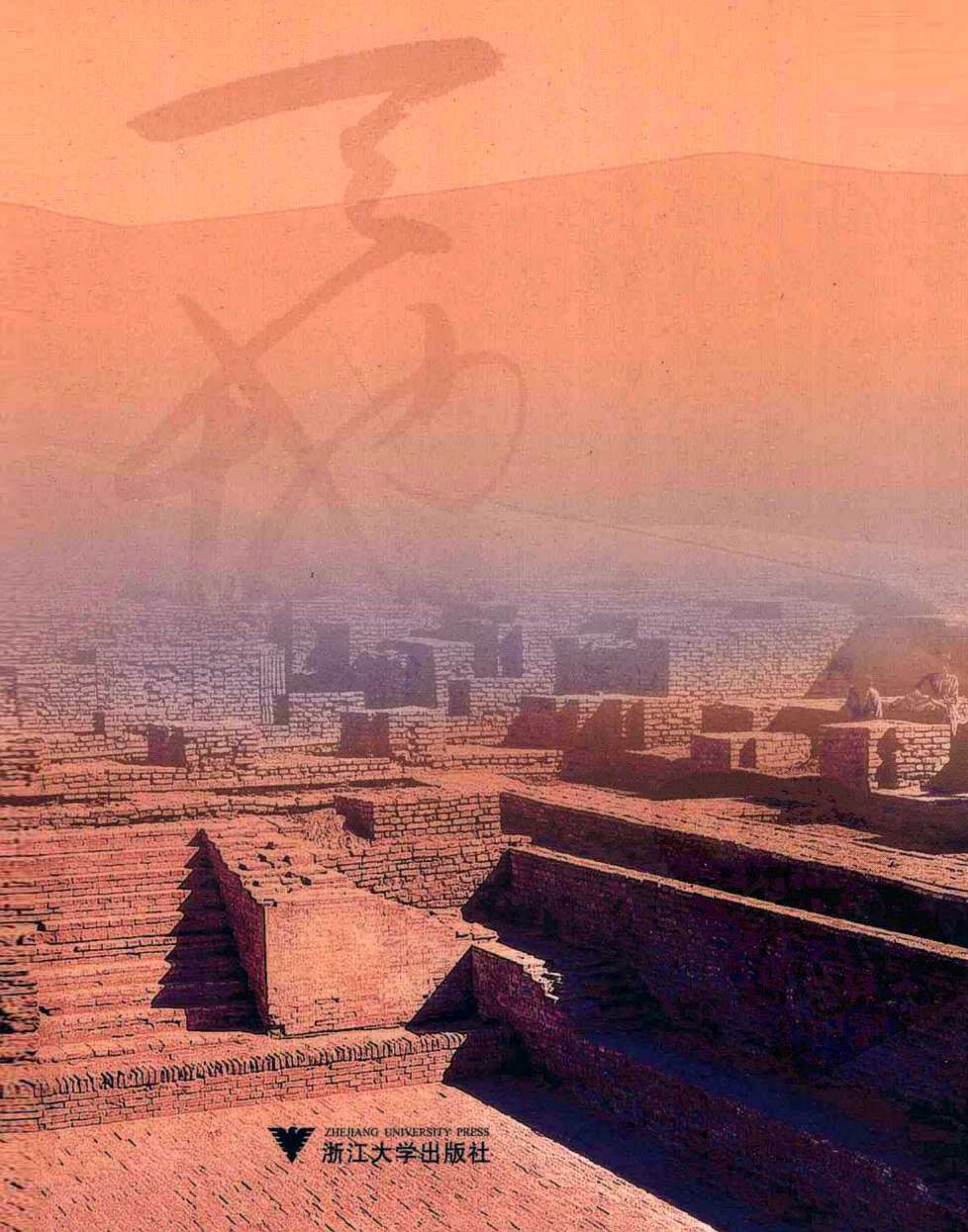
In Search of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追寻文明的起源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刘耀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18世纪以来，欧洲人总喜欢谈论一件事，即东方需要“追赶”西方。很显然，这只是在物质意义上而言。一场谈话需要双方参与。或许，西方也需要追赶东方。西方仍然需要从东方学习如何培育自己的精神空间，学习如何在一个愈益有限的世界接受对自己的欲念和空间的限制。

——迈克尔·伍德

上架建议：世界史



ISBN 978-7-308-09285-2



定价：3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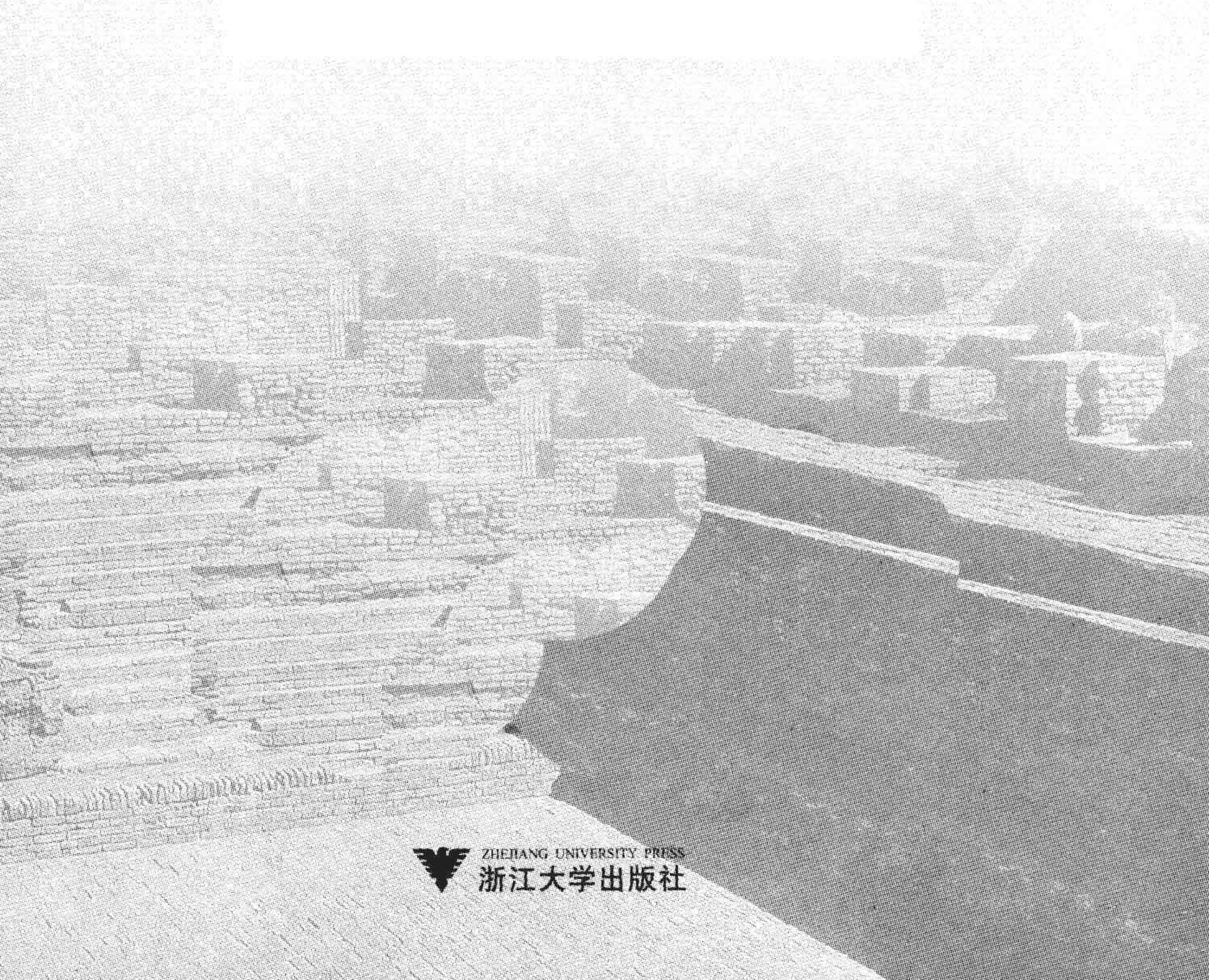
网址：www.qzgpress.

In Search of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追寻文明的起源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刘耀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文明的起源／(英）伍德著；刘耀辉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

书名原文：In Search of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ISBN 978-7-308-09285-2

Ⅰ. ①追… Ⅱ. ①伍…②刘… Ⅲ. ①世界史：古代史：文化史 Ⅳ.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479 号

追寻文明的起源

[英] 伍德 著　刘耀辉 译

责任编辑　叶　敏

文字编辑　周红聪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 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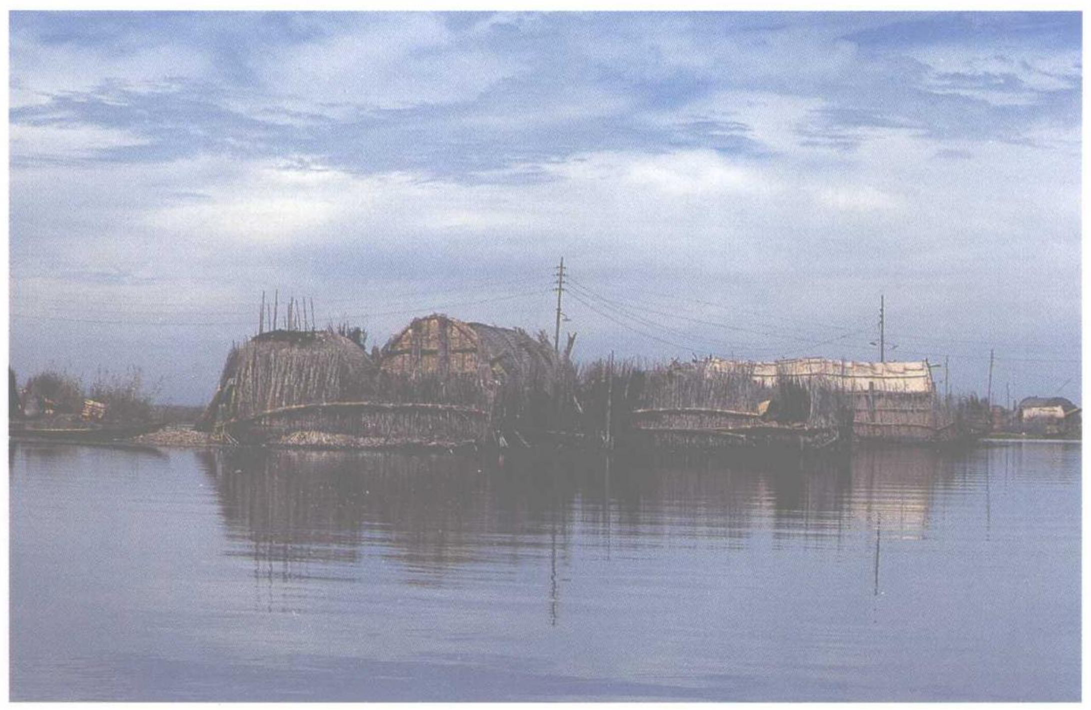
字　　数　174千

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285-2

定　　价　34.00元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伊甸园？在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沼泽地，是一个由小岛组成的世界，这里的芦苇住宅几千年来毫无变化，一直延续到晚近。这里是古代巴比伦和圣经神话所说的创世之地。





上图：乌尔的“皇室生活标准”——敬献给国王的财富。镶嵌在木材上的天青石雕刻，大约公元前2700年。

下图：伊拉克传统的多样性——雅兹迪派（Ye Zidis）源自中世纪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观念的混合。摩尼教的多元主义是他们信仰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首先要与撒旦和解。

右图：萨迈拉盘旋上升的尖塔——或许是早期伊斯兰教对巴别塔的一种呼应，建于8世纪，高164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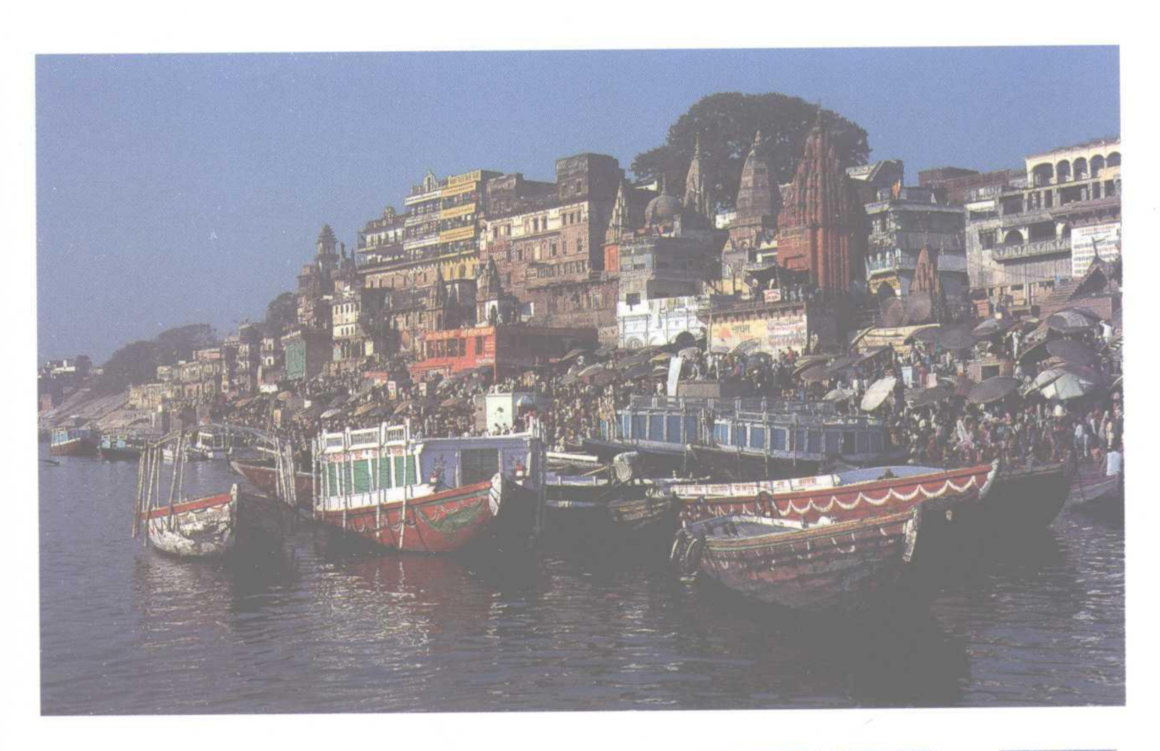






上图：印度传统的根源——摩亨佐一达罗“神圣的”浴场，巴基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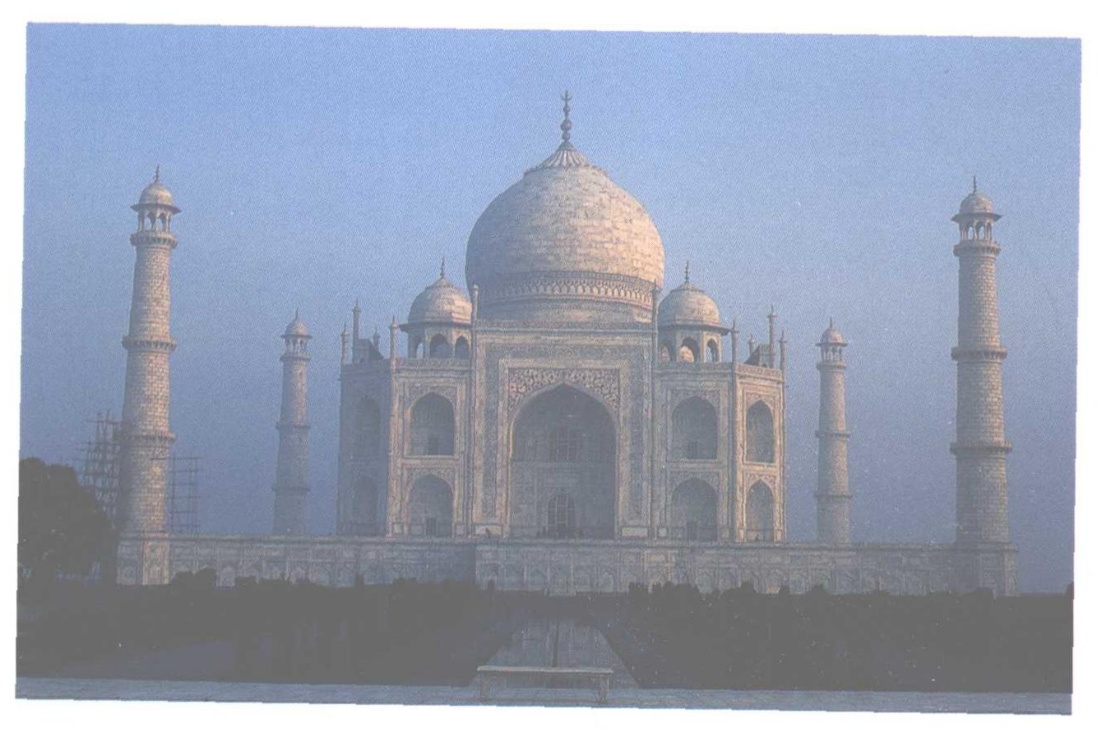
下图：恒河与朱木拿河交汇处的大壶节。这一节日开始于12世纪，不过这个地点的神圣性可以回溯到远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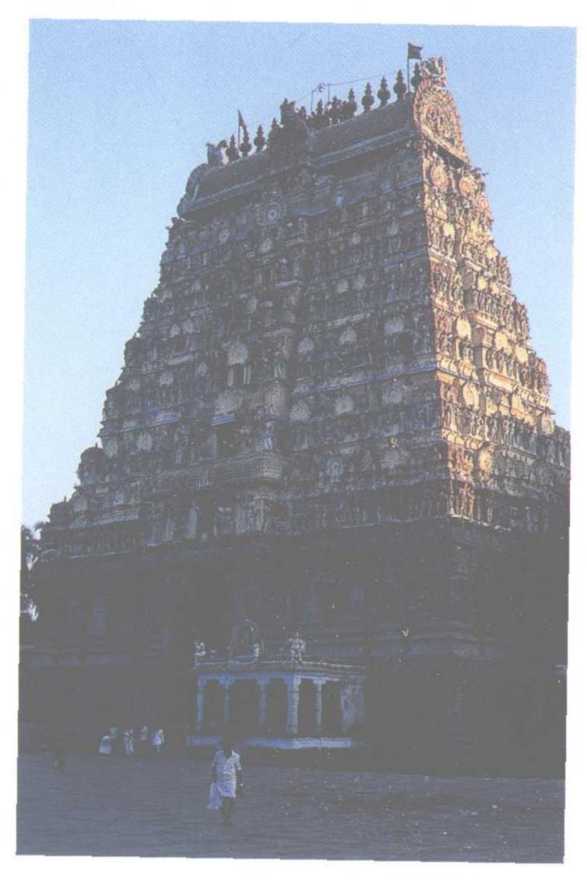




上图：贝拿勒斯恒河河畔。“世界上有很多神圣的地方，可是，又有哪个地方可以媲美迦尸（即贝拿勒斯）的一粒微尘呢？”

下图：葡萄牙耶稣会士与穆斯林圣哲在阿克巴面前辩论。“他的宫廷成为不同地区探究者的家园，成为各教派的聚会场所。”（阿布·法兹勒 Abul Faz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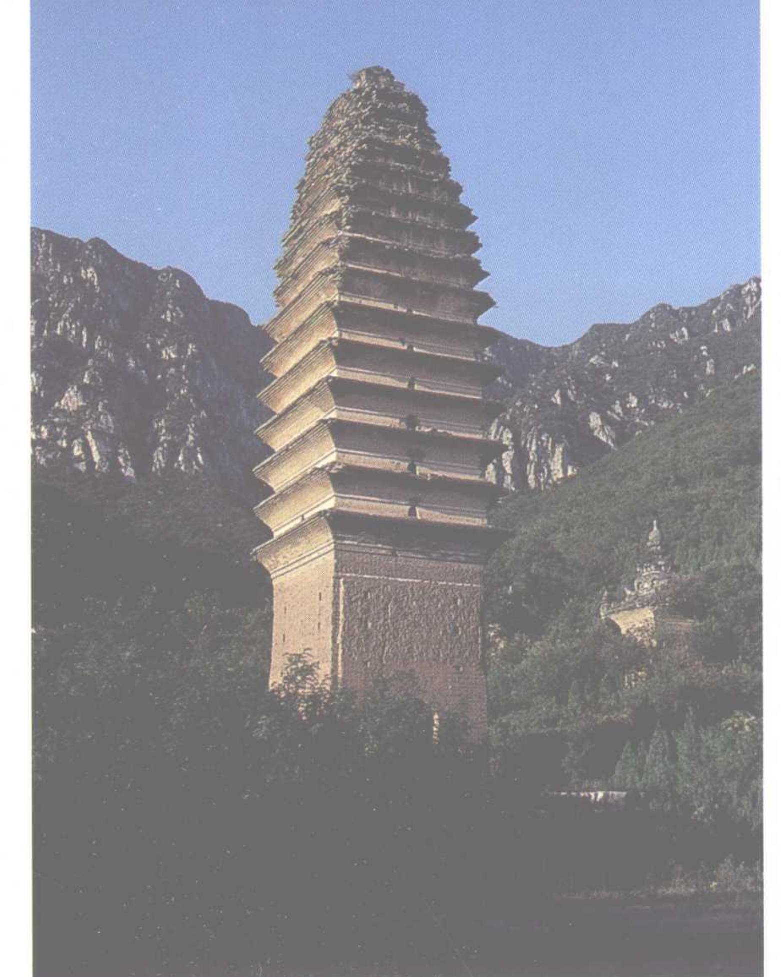
上图：莫卧儿文明——阿格拉的泰姬陵，一座17世纪的皇家陵墓，位于朱木拿河转弯处的大花园。

下图：南印度传统——通往吉登伯勒姆舞蹈之神湿婆大神庙的入口，泰米尔纳德邦。

右1图：嵩山法王庙，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公元71年）。

右2图：敦煌视觉艺术（8世纪），3世纪到13世纪装饰的数千洞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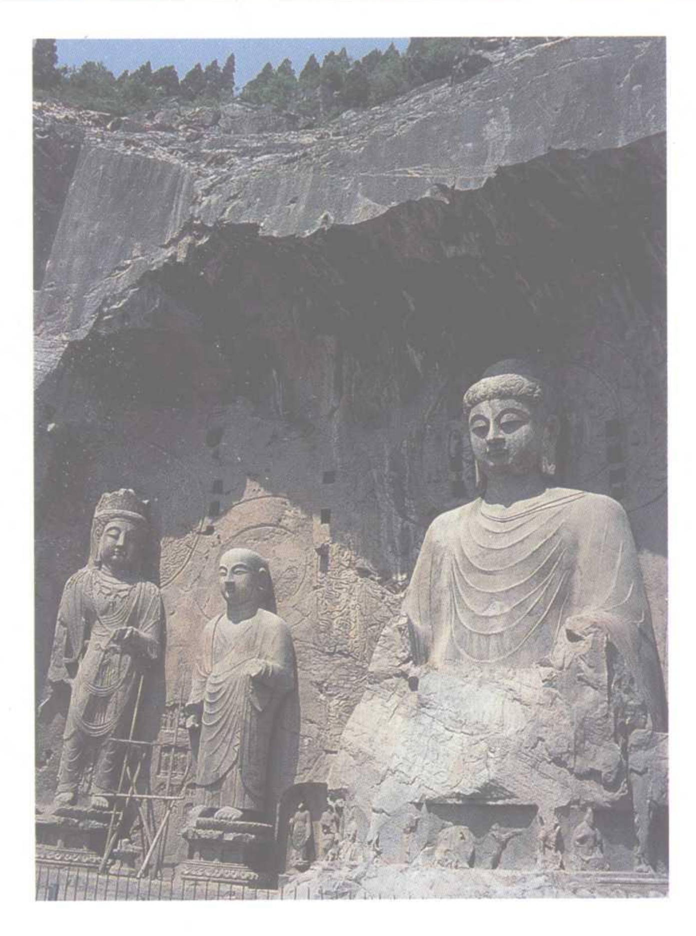
右下图：古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汇集了公元500—900年间大量的佛教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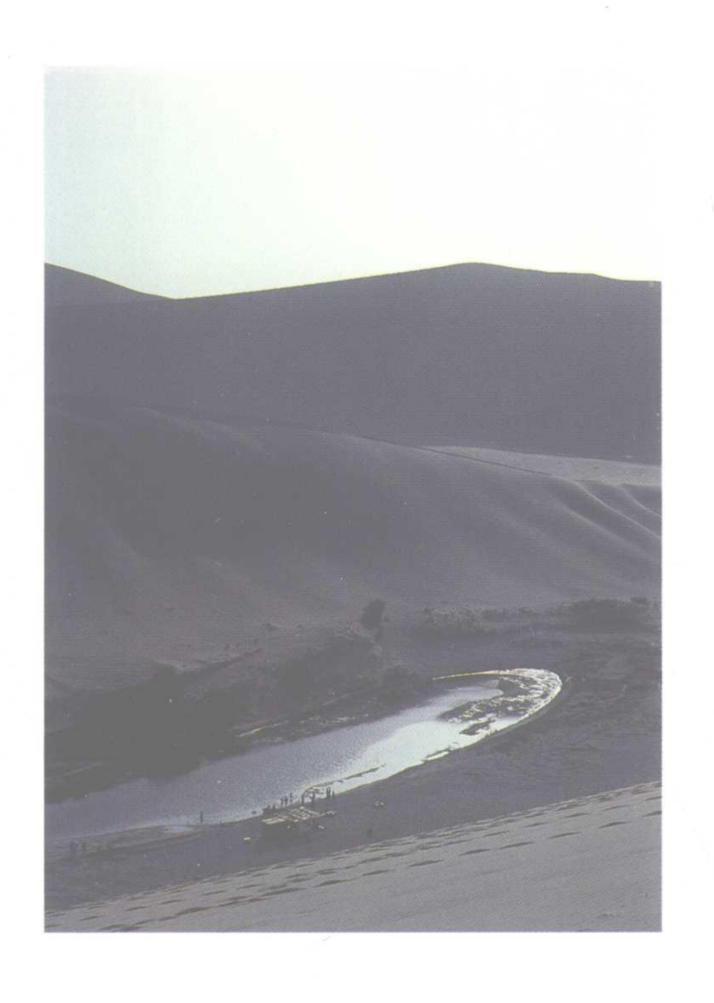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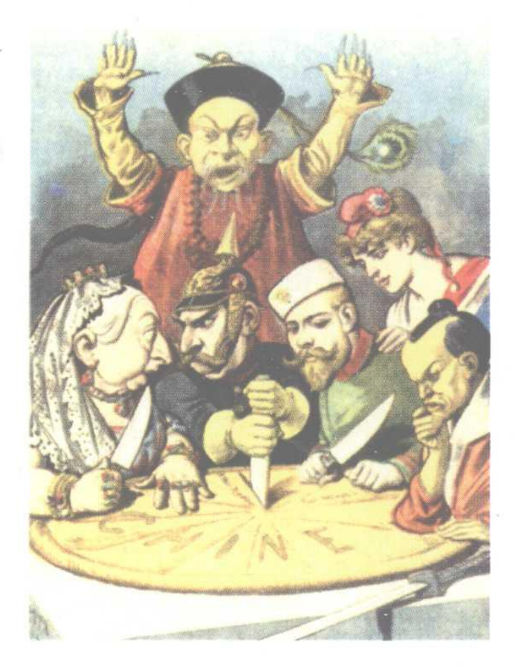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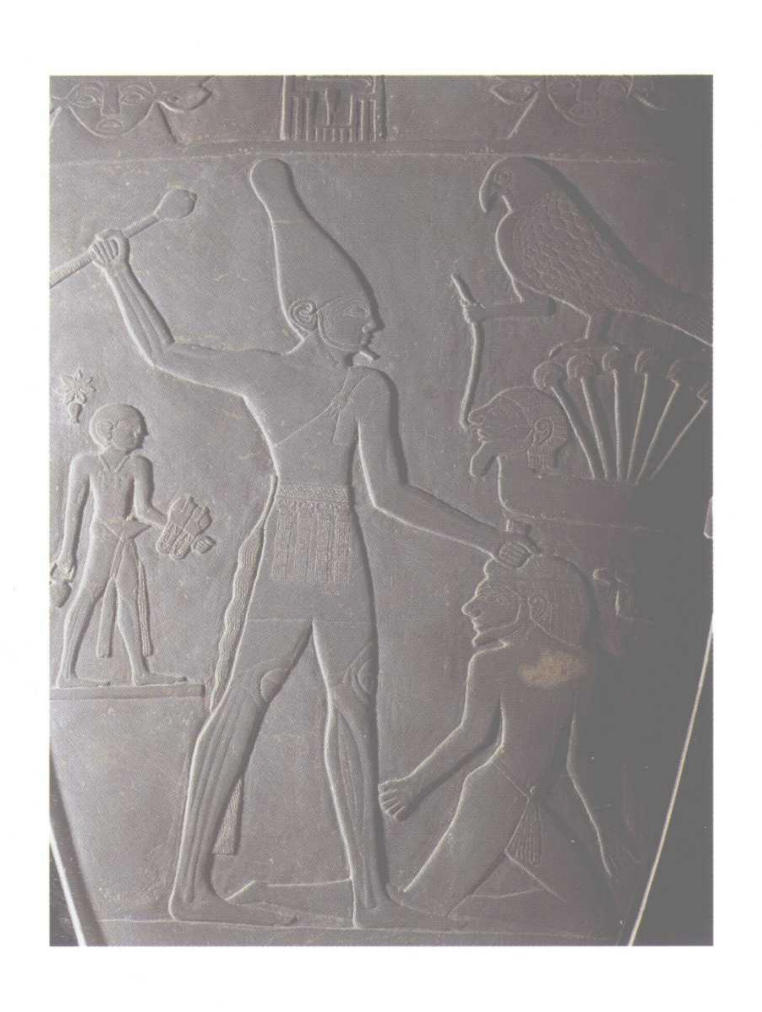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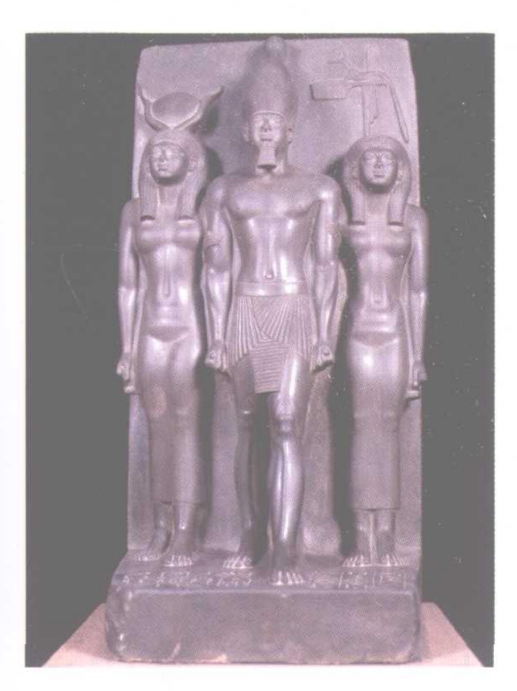


上图：丝绸之路风貌。月亮湖位于敦煌之外浩瀚的沙海之中。

下图：欧洲伙伴瓜分中国蛋糕——一幅1898年的法国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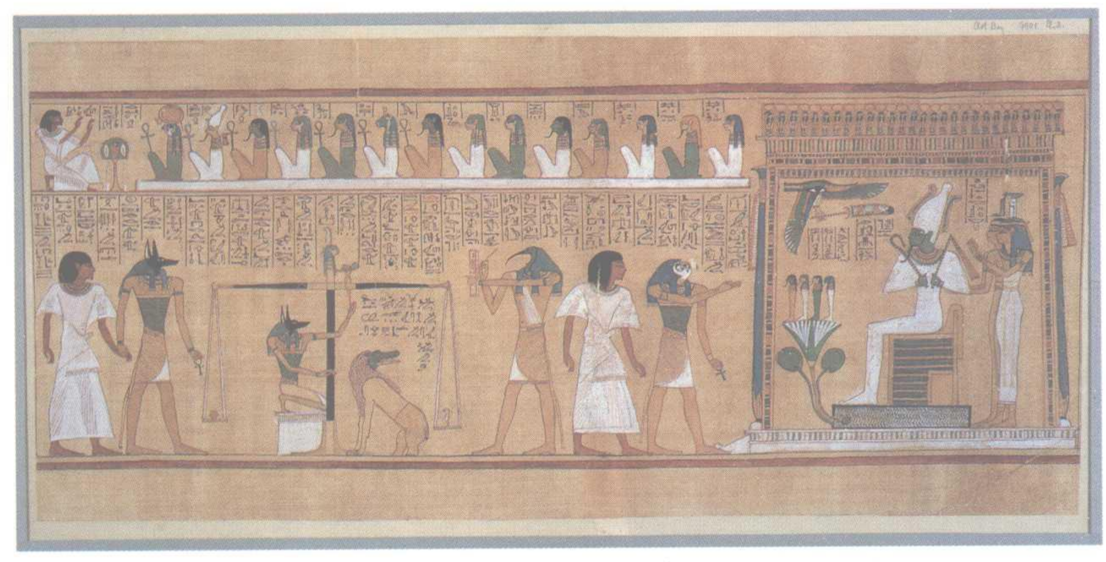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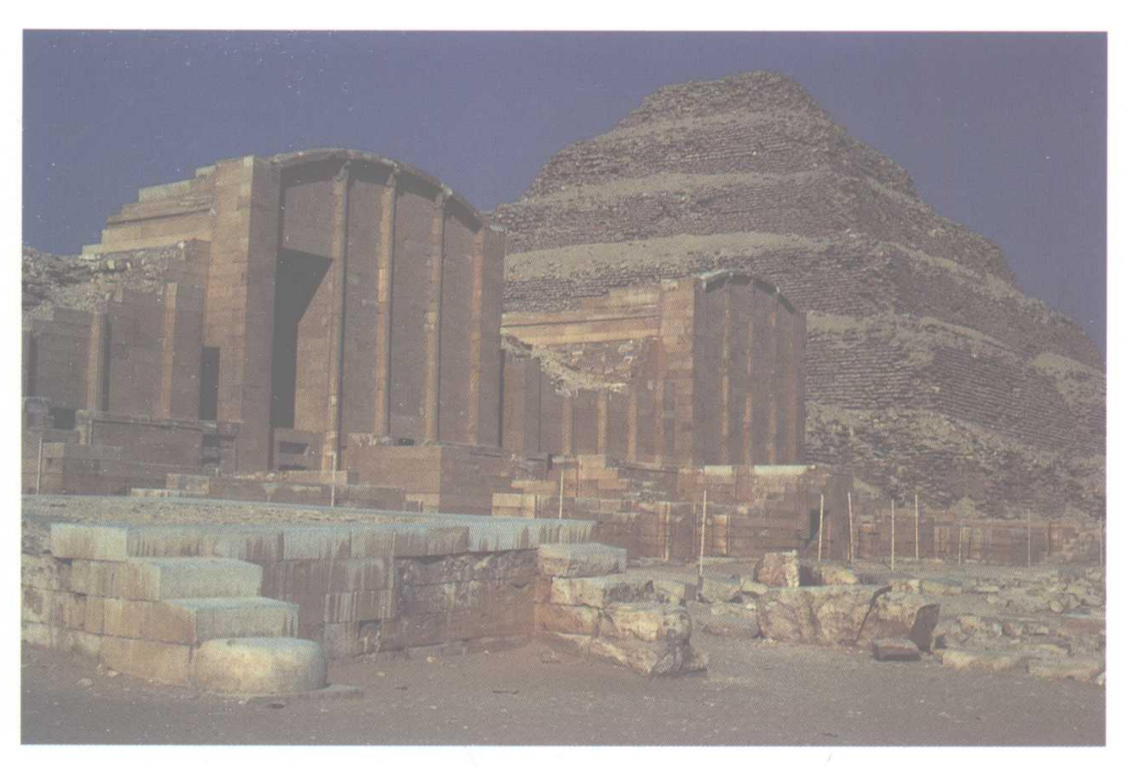
上图：纳尔迈调色板（大约公元前3100年）。头戴白色王冠的上埃及国王纳尔迈击杀尼罗河三角洲的统治者瓦什（Wash），后者的象征是人格化的一束莎草，纳尔迈的保护神——鹰神荷鲁斯停留在莎草丛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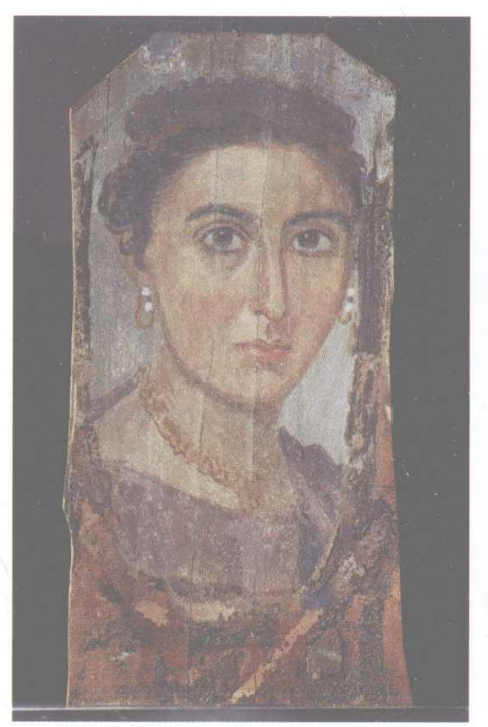
下图：门卡拉国王（即米塞里诺斯）位于女神哈托尔与人格化的胡诺姆之间，大约公元前2500年。旧王国灿烂的艺术传统一直延续到希腊统治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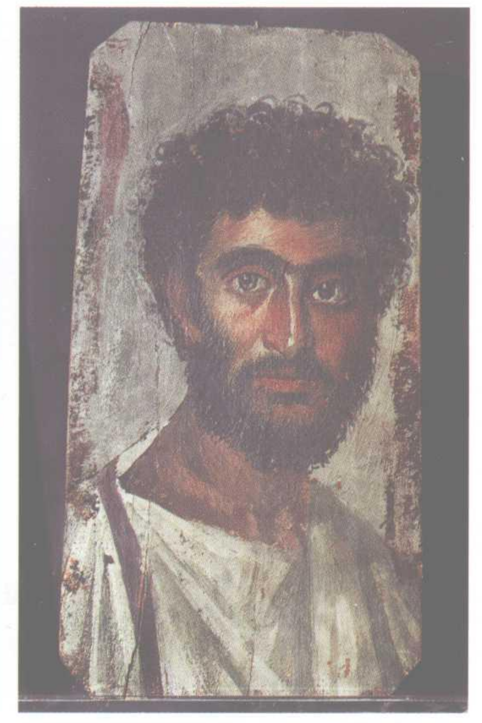


上图：底比斯风貌——粉红色的绝壁是尼罗河河谷狭长的绿色地带的边界。在阿斯旺大坝修建之前，这里是一种特有的平衡的环境，它是文明的基础。

下图：为灵魂称重，来自《亡灵书》。埃及一些基本的宗教信念，如末日审判的观念，后来很可能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上图：沙卡拉。狂欢节庭院，石砌“帐篷神殿”是为地方神准备的，后面是阶梯式宙斯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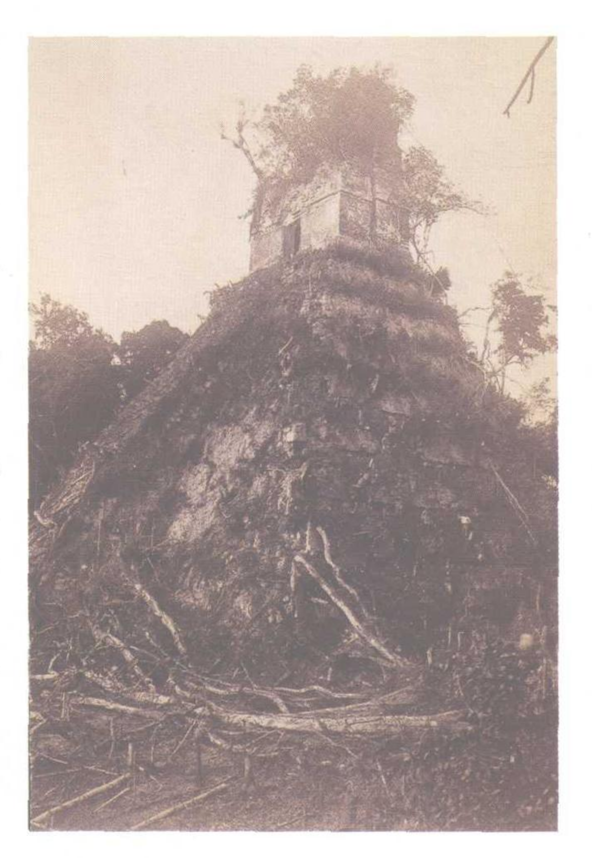
下图：法尤姆的棺木肖像画，2世纪。埃及基督教徒奥利金写道：“瞧瞧，你们是如何从大地上单纯的人形发展过来的”，“需要明了的是，你们每个人都有可塑性”。

上图：蒂卡尔玛雅遗址，现在依然为丛林所部分掩盖。图片摄于1882年，体现了早期考古学家的视角。

下图："它泛起波纹，它低声私语，在苍穹之下显得空旷无比"（《波波尔·乌》）。阿蒂特兰湖位于危地马拉，是四大圣湖之一，它们依旧标志着基切玛雅世界的四角。

右上图：秘鲁的马丘比丘——一座王宫兼陵园，15世纪40年代由帕查库提·印加建造，16世纪西班牙征服之后就被遗弃了。

右下图：科潘中心广场的球场，洪都拉斯，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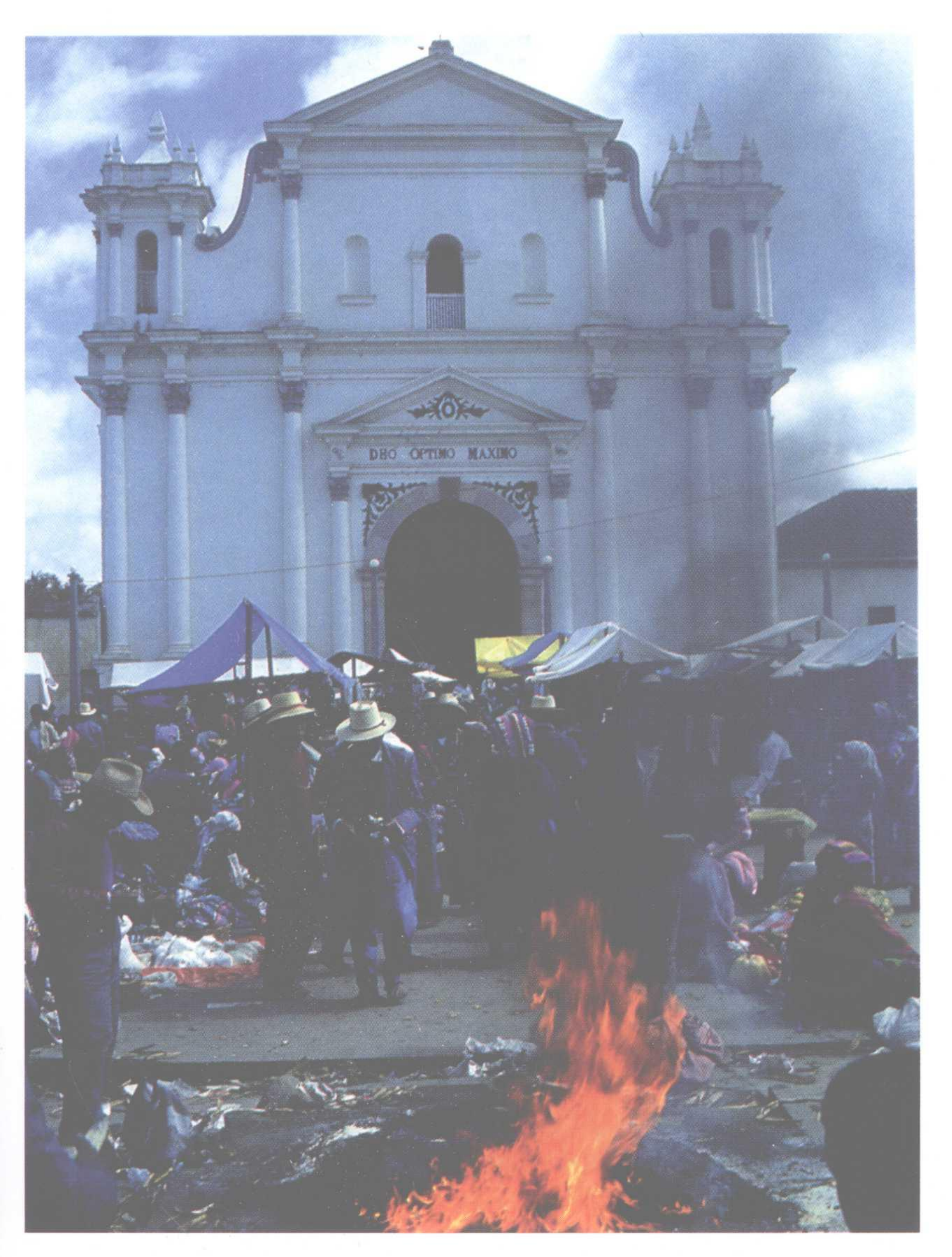






上图：科潘“十八兔”王，731 年 8 月 20 日。

下图：阿兹特克圣书中的羽蛇神插图。墨西哥对西班牙征服的文字记载，是我们全面了解新世界衰落的重要文献。



古代玛雅的“八猴节”，莫莫斯特南戈，危地马拉。即便在21世纪，日期保管者仍然会在“圣殿城”周围焚香烛，举行仪式。正如拉斯·卡拉萨斯在1542年所写的：“自发现美洲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如此非凡，除非亲眼所见，否则没人会相信。”



西方的传统——基督教创世者——上帝站在他的造物之外为世界立法。一神论概念是欧洲特有的，正如湿婆的舞蹈是印度特有的那样。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伊拉克：文明的摇篮 5

第二章 印度：精神帝国 42

第三章 中国：天命观 80

第四章 埃及：文明的积淀 109

第五章 中美洲：时间枷锁 140

第六章 西方：蛮族之地 165

参考文献 189

图片使用说明 196

致谢 197

译后记 201

索引 203

前言

在11世纪，如果你是一位交际广泛、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或商人，那么，你很有可能见证古代世界处于鼎盛时期的所有文明。如果你来自西欧，那么你还需要懂得阿拉伯语，因为这是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地区之间船员相互交流的通用语言。如果你说阿拉伯语，并且非常幸运，沿途未碰到海盗、海难以及疾病，那么，就可以跋涉千山万水，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一直抵达黄河。你可以沿着已有商道进行交易：在阿拉伯海与阿拉伯人做生意，在经过印度洋去印度尼西亚时与泰米尔人打交道。然后就是与中国商贾进行贸易，这些商贾的活动遍及从肯尼亚蒙巴萨到日本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是一次精彩的旅行。你可以访问拜占庭、开罗、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巴格达、朱罗王朝时期的南印度、柬埔寨以及宋朝时的中国。这些文明在青铜时代就出现了，它们的宗教、哲学、科学和技术已经发展了长达4000年之久。这个时期，它们在艺术、科学和人文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最高成就。你可以参观金碧辉煌的宫廷、宏伟壮观的教堂、清真寺和寺庙，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建筑瑰宝。如果存在一个人们最想去旅行的历史时刻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当之无愧。

500年之后，形势发生了改变。在波斯、明朝时的中国以及莫卧儿王朝时的印度，这些古代文明的后继者们依然存在。但是，到了16世纪，历史的轴心发生了变化，其重心不再是亚洲心脏地区。正如我们现在所见，通向印度的海路的开通，以及新大陆的发现，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与此同时，这个观念很可

能会遭到远在北京宫廷的中国官员的嘲笑。毕竟他们的船只已经探索了非洲海岸、绕到了好望角，并且抵达了澳大利亚。庞大的舰队和巨大的船只配备了尾舵、罗盘和火药，还有种植新鲜蔬菜的菜园，这些让哥伦布、麦哲伦以及瓦斯科·达·伽马的小船相形见绌。但是，历史并没有站在中国人那一边。16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被懂得新技术的欧洲冒险家颠覆。随之而来的，就是欧洲人对美洲大陆及其自然资源的侵夺，同时还有土著居民事实上的灭绝。这是欧洲人统治世界的开始，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欧洲统治时代末期。在殖民时代，许多传统文明和社会遭到破坏，20 世纪，清朝土崩瓦解，波斯最后一个传统穆斯林文明也随之毁灭。到 20 世纪末，在所有这些古典文化之中，或许只有泰米尔文明以一种可以识别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现在，在全球化和现代主义面前，我们似乎已经毫无退路。19 世纪和 20 世纪反对现代性的斗争，其中最典型的是玛雅起义、伊朗革命以及印度教复兴，在今天看来毫无胜算，自由市场和电视文化的浪潮正以霸权形式席卷全球，冲击着已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古老文明。

这条轨迹就是本书的背景，从我写作此书以来，这条轨迹变得越来越清晰明了。本书由一系列纪录片文稿扩充而成，旨在描绘我们如何孕育出最初 5000 年的文明。它描述早期各大文明及其后续发展，从 5000 年前“新月沃土”发生的革命开始，这个时期，人类开始在城市居住。在本书中，我将关注伊拉克、埃及、印度、中国和中美洲独立发展出来的城市文明：这些文明塑造了我们现在的面貌——我们的思维模式、宗教信仰以及我们组织人类社会的范式，并且依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这些纪录片涉及在上述文明中的长途旅行。我们会在中国北方麦地环绕的泥砖村落停留，会在印度大壶节（Kumbh Mela）无数朝圣者的帐篷歇脚，会在伊拉克南部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s）的茅屋露宿。这

些旅行和经历会提供新的图景，让人们回想起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相对重要性。比如，我们会来到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古老聚居区，10世纪时，中国在工业、科学和印刷术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可以去印度南部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的大寺庙，去聆听泰米尔的奥都瓦们[1]在盛大节日时刻向无数具有鉴赏力的听众颂唱6世纪圣歌；我们也可以在“八猴节”（Eight Monkey）来到危地马拉高原的莫莫斯特南戈（Momostenago），这个时候，玛雅萨满教正在为新入教者举行仪式，这些人将会守护他们基督纪元之前的历法：这些经历以书籍无法做到的方式让历史变得异常生动鲜活。当然，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很显然，与西方历史一样，中国历史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海湾战争前夕去探访巴格达很有益处，也让人兴奋。同样，在10世纪，巴格达是一个多元文化异常兴盛的城市。现今，那个伟大时代留存下来的遗产寥寥无几。在与巴格达以及流亡的伊拉克学者和朋友的交谈中，人们不断提醒我，那个时代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依然流行于阿拉伯教育文化中，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与西方不同而已。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文明，也需要向其他文明学习很多东西。

本书一直在使用“文明”一词。当西方政客谈论“文明世界”，当他们用它来指称西方自由民主文化时，文明这个概念是一个有问题的术语，包含了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从物质意义上来使用文明一词。对他们来说，文明完全意味着“城市生活”。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文明的兴起”或“早期文明”。我们会发现，世界早期文明的道德和精神特征是多元化的。不过，从物质意义而言，事实上它们具有一些普遍的共同点：城市、青铜技术、文字、用来举行仪式的宏伟建筑、神庙、不朽的艺术、等级制度和阶级划分，所有这些都得到某种法律的认可，并且受到有组织的军事力

量的保护。就伊拉克、埃及、印度、中国、中美洲以及秘鲁这6种主要文明而言，只有秘鲁文明没有发展出这些特征，尤其明显的是，早期秘鲁人没有文字。不过，秘鲁文明不属于本书讨论范围。然而，这些共同的物质因素掩盖了许多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明究竟是什么，有组织的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包括道德的、智力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是什么。比较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在选择所要讨论的文明时，依据的是大规模城市生活的独立兴起。因此，我排除了一些同样迷人的文化，比如日本、柬埔寨、克里特或西非，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文化并不是最主要的。现在，对我们来说，文明的独立起源这个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观察早期文明的起源以及长期而连续的影响时，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相关性的事物，以及那些仅仅属于西方特质的事物。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千年的开始，正好可以反思我们生活时代变化的速度所引发的重大历史问题。毫无疑问，就像热带雨林被毁一样，这里所讨论的文明和民族的历史与特性也正处于毁灭进程中。21世纪的一场巨大战争就是，当现代主义向过去传承下来的事物发起蓄谋已久的大规模攻势时，这些传统文明是否能够幸存下来。如果不能，我们或许就是看到本书所描绘的许多事物的最后一代人。

注释

[1] oduvars，泰米尔语，指印度南部的一种宗教歌人，通常为男性，隶属于印度教神庙。奥都瓦一般都接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并虔诚地信奉印度教。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编辑所加。下同。

第一章　伊拉克：文明的摇篮

1849年冬，年轻的英国人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率领一小队人马从巴格达南下，进入伊拉克南部平原。这个国家曾经是举世闻名的古代迦勒底（或巴比伦王国），现在成为沙漠和沼泽地，贝都因或半游牧部落居住在这里。事实证明，在土耳其人对伊拉克的长期统治时期，这些部落桀骜不驯。洛夫特斯首先来到遍布棕榈树的幼发拉底河河岸。在这里，在风吹日晒、日益消蚀的泥砖城市，犹太人、曼底安派（Mandaean）以及穆斯林社区紧紧相连，他们今天依然保存了巴比伦尼亚的一些古老民俗。洛夫特斯略带惊恐地进入穆斯林什叶派的一些圣城，他们那些奇怪的、令人生畏的仪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他们昏暗、魅力非凡和壮观的圣殿以及古老的丧葬仪式，可以回溯到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时期。他认为伊拉克聂斯托利派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s）团体可以回溯到基督教早期，他们的信仰和礼拜形式与地中海世界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遥相呼应。随处可见的痕迹体现了明显的连续性。事实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论宗教，都宣称自己起源于亚伯拉罕的故土。19世纪受过教育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对自己文化的起源非常着迷，这种文化现在已经君临天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根基肯定存在于这片土地，甚至早于希腊的古典遗产。正如洛夫特斯所写："自孩提时代起，我们受到的教导就是，要把这里视为人类的摇篮"。这里有亚当

的伊甸园、巴别塔、诺亚方舟和大洪水。依据《创世记》，人们在这里——“在示拿地（the Land of Shinar)”——用泥砖建造了第一批城市，很显然，这让人想起伊拉克南部苏美尔这一古老名称。《创世记》作者还命名了其他一些城市：巴别、亚甲以及以力（Erech)。

南部平原腹地大部分地区现在布满沼泽，只有在干旱季节，人们才可以乘小船抵达这一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带。这里居住着神秘的马丹人（Madan）和沼泽阿拉伯人，他们在人造小岛上过着半陆地半水上生活，在涂有沥青的小船上捕鱼和编织芦苇床垫。在他们的引导下，洛夫特斯横渡“海岸为盐覆盖的死亡之海”。他留意到，古代定居区遗留下来的土丘到处可见。他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抵达这里的欧洲人。18 世纪 50 年代，德国人卡斯滕·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就与沼泽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19 世纪 20 年代，J. 贝利·弗雷泽（J.Baillie Fraser）考察过南部平原的一些遗址。不过，洛夫特斯现在想通过挖掘来验证古老的传说。他的目标是“迦勒底最壮观、最重要的土丘”，即当地阿拉伯人所说的瓦尔卡（Warka)。

洛夫特斯后来写道：“迦勒底这些伟大的建筑在平原和沼泽之中时隐时现，它们傲然而立、气势恢弘；在晨雾笼罩下，它们拔地而起，形状奇异迷人，显得异常高大，甚至在纯净空气中翩翩起舞，让人有如临仙境之感。我一眼见到时，就意识到，这是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难忘的时刻。”

在经历如火骄阳以及“席卷沙尘的龙卷风”的洗礼之后，洛夫特斯终于来到瓦尔卡土丘。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他发现一道 6 英里长、50 英尺高的环形城墙，尽管深陷沙丘之中，不过依然挺立：中心地区是泥砖建造、腐蚀严重的巨型金字塔，它们是该城市诸神神庙的平台。洛夫特斯后来写道：“在我所见过的所有被遗弃的景观中，瓦尔

卡的景观堪称无与伦比。”

洛夫特斯发现了古城乌鲁克，即《创世记》中的以力。在阿拉伯人的“瓦尔卡”，当地游牧民族保存了它的古老名字，尽管这座城市已经废弃上千年之久。在一些地方，该遗址深达100多英尺，每一层都有人类居住的遗迹。洛夫特斯发现，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之前，早就有人在这里居住了几千年，此后，希腊人、帕提亚人、萨珊波斯人纷纷在这里建立家园，他们的陶器、硬币、陪葬物以及文字说明了一切。人类最早的文字出现在伊拉克南部，尽管洛夫特斯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可以想像，文字最早是在乌鲁克被创造出来的。

洛夫特斯在勘察废墟时写道：“一想到它过去的历史及其起源——它冉冉升起以及迅速衰亡，我就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此后150年以来，我们依然在探究这些问题，并且以更加强烈的紧迫感来这么做，想方设法去了解人类开始城市生活的原因。洛夫特斯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城市，在消亡之前，这一庞大复杂、生机勃勃的社会持续了几千年之久。不管好坏，这一革命时期改变了地球的历史，而围绕这个时期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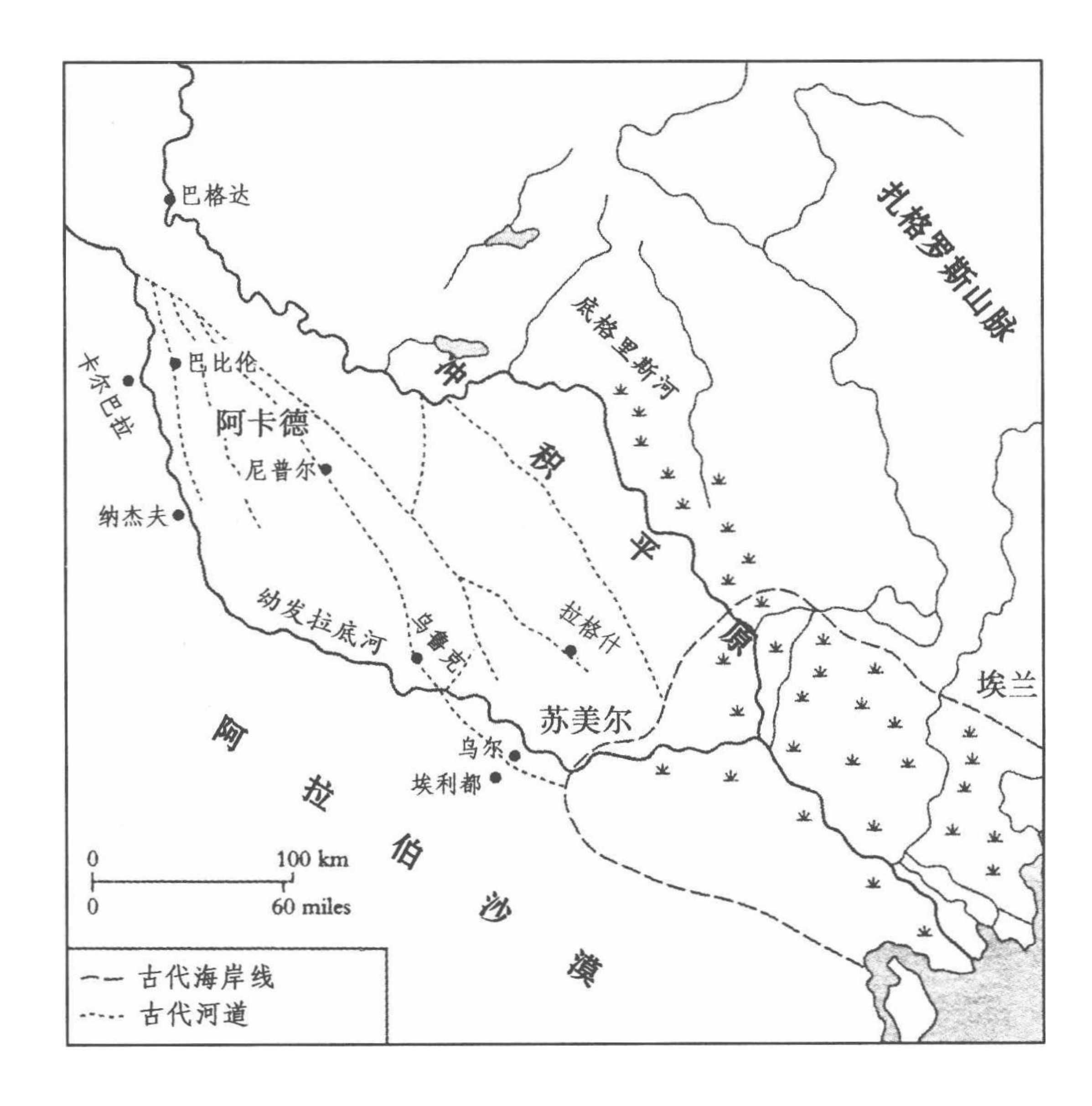
文明的开始

苏美尔人所说的“这块土地”是平坦的冲积平原，长300英里，不过宽度从来没有超过150英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经南部平原，冲积平原就是由这两条河流的淤泥创造。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希腊名字的意思就是“河间地”。底格里斯河发源于亚美尼亚山区，与幼发拉底河相比，它更宽阔、水流更急、更难预测，在洪水季节也更危险。即便在过去几百年，它也好几次冲毁堤坝，对巴格达造

成巨大破坏。幼发拉底河要小一些，也温柔一些，绝大多数早期城市就是在它的下游建造起来的。在150代人的时间里，这两条河流是伊拉克南部伟大成就的基础：这两条褐色大动脉携带赋予生命的淤泥，在炎炎夏日流经太阳炙烤的暗褐色平原。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对大规模人口居住在城市而言，灌溉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没有庞大的合作工程，这种灌溉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这块平原缺乏其他自然资源：缺少石头、没有木材和珍贵的金属。除了芦苇和棕榈树，剩下的建材只有泥砖。这里的人们对使用泥砖非常在行，他们设计了圆屋顶和拱门，并且创造出世界上一些最巨大、最令人难忘的砖造建筑。

苏美尔人在伊拉克南部平原创造出人为地貌，发明了维系城市文明所必需的精细灌溉系统，这也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这种攻击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没有天然屏障，美索不达米亚始终遭受邻邦的威胁，尤其来自东部的威胁：首先是埃兰人（Elamites），稍后是波斯人，这些是来自扎格罗斯山脉另一侧的古代敌人。扎格罗斯山脉在伊拉克东侧，是气候严酷的高原，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和印度河。山区人口对抗平原人口，游牧民族反对农业定居民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两种冲突。

西部和南部是沙漠民族，苏美尔人总喜欢称他们是“不知城市为何物的民族”，这些民族也时不时骚扰和洗劫富饶的城市。这就是伊拉克历史上的恒等式。今天，这一出古老戏剧依然在电视上上演。或许沙漠游牧民族不再是一股需要加以考虑的力量，但是，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们依然在同来自波斯的古老劲敌进行战斗，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则在与巴格达暴君交战之后，退回到了他们的山林之中。



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代河道。苏美尔从尼普尔向南延伸到海边以及乌尔和埃利都。一些古代城市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不过现在都废弃了。

在这种地形和气候下，我们可以察觉到塑造这一地区之历史的长期模式。在明显的连续性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出起起落落的文明。毫无疑问，这种地形和气候是文明兴起的决定性因素。古代世界四大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黄河，它们都兴起于北半球气候温暖的地区，兴起于大约北纬 30 度的狭长地带。尽管它们各具特色，不过，就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言，它们又有许多相似的前提条件和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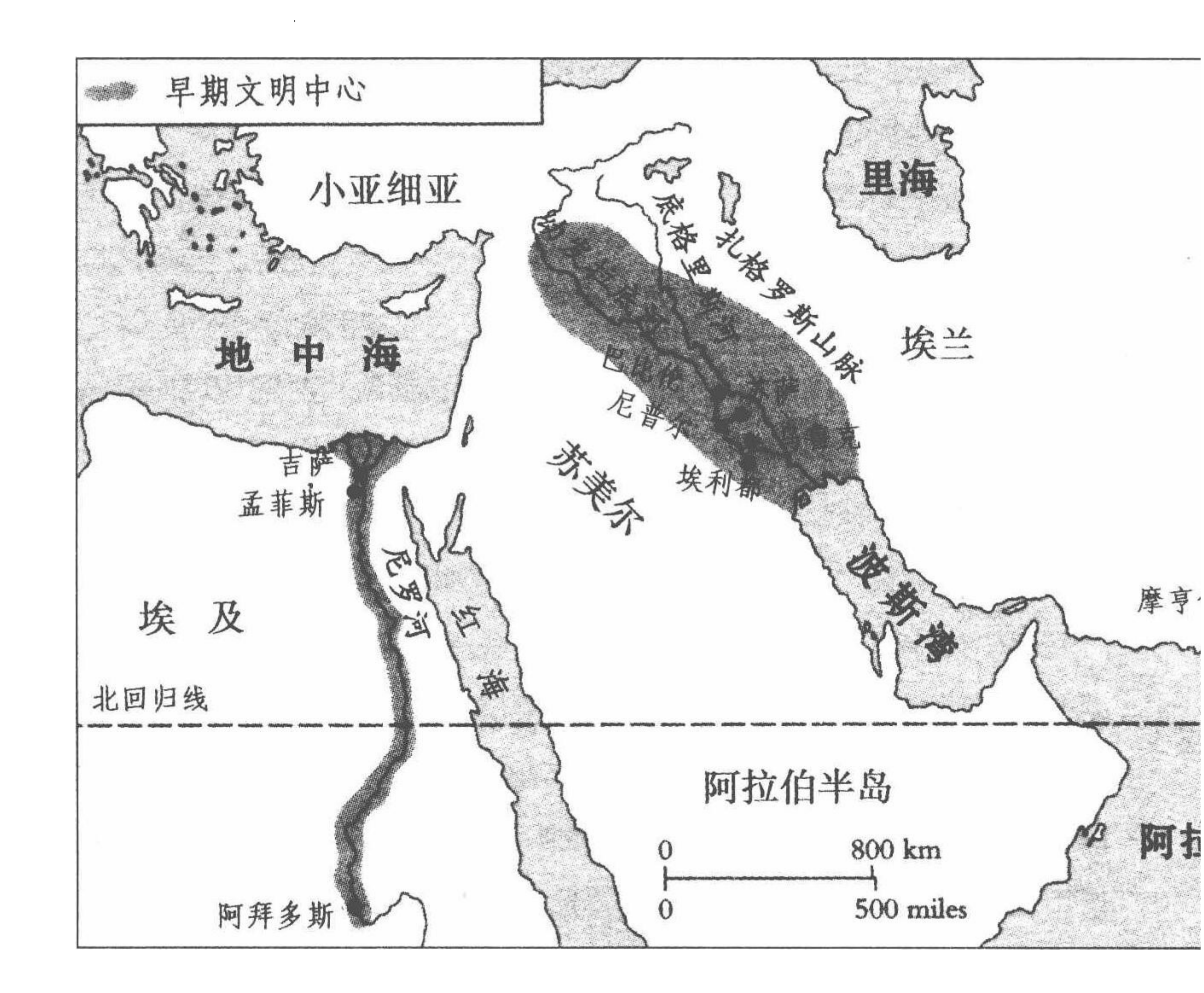
文明的第一要务无疑是食物。就像现在一样，如果没有供养人口的能力，那么，城市和庞大的人口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培育主要的谷物（如小麦和大麦）是迈入大规模定居社会的第一步。人类历史上实现这一步的首要功臣是农业的发展。在大约 10000 年到 12000 年之前，农业似乎就已经在山区呈带状发展：从“新月沃土”到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和叙利亚，再穿过土耳其东南部，跨越伊拉克北部，然后延伸至伊朗西部。在公元前 7000 多年，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就创造出了小型城市，如约旦河谷的杰里科（Jericho），这是大约 11 英亩的地区，为防御性石头建筑环绕。最著名的遗址是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在公元前 5000 多年，这个遗址覆盖的土地达 32 英亩，有差不多 1000 栋住宅和 5000 名居民，看上去就像今日库尔德山区由平顶住宅构成的小型城市。这个遗址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发掘。

我们对这些定居点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一无所知，不过，在它们兴起的过程中，宗教很可能已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加泰土丘，发掘者发现了一座神庙，其中有公牛崇拜和史前母亲女神崇拜的痕迹，这种母亲女神崇拜在古代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很普遍。近来，在土耳其境内靠近乌尔法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河谷的重大发现，或许是迄今为止所知

道的最早神庙。这座公元前7000多年建造的建筑有35平方英尺，由柱子支撑，地板是光滑的沙砾和石灰石。厨房、储藏室和工作间让人想起后来近东的神庙和清真寺，大厅有翼的半身人像非常类似后来近东宗教形象中的天使和神怪。另一项新发现是在约旦的艾因盖济勒（Ain Ghazal），它也会让人想起这一地区宗教仪式和礼拜模式的深层连续性。在这里发掘出了许多真人大小的人物形象，时间可以回溯到公元前7000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塑像。这些塑像表面涂着一层白色石膏，他们眼窝深陷，眼睛周围画有一道黑圈，直到希腊罗马时代甚至基督教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祭礼塑像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

就伊拉克而言，到公元前6000多年，农业社会就在北部山区建立起来了。到公元前5000多年，这里的人们用风干的泥砖围墙来保护他们的村庄。在这些古老遗址中，有些直到今天还有人居住。泰勒阿费尔（Tel Afar）是土库曼一座城市，从摩苏尔到叙利亚的古老商道由此穿过。人们在这里的城堡发掘出公元前4000多年的陶器，大扎卜河（Great Zab）附近的埃尔比勒（Irbil）土丘大致也可以回溯到相同时期。这两个地区都属于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毫无疑问，随着人口的缓慢增长，人类开始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斩荆披棘、焚烧荒野、砍伐树林、开垦灌木丛，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库尔德斯坦的光秃山脊。冬日的雨水携带被侵蚀的土壤冲入河流，正如杰尔莫（Jarmo）的挖掘者所说的，“巧克力色的洪流从山丘奔腾而下”。这就是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伊拉克南部绵延上百英里的冲积平原的来源。因此，在第一批城市于这块平原兴起之前，人类就已经永久性改变了自然的平衡。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如此。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人们开垦新土地，由此导致大批人口首次进入南部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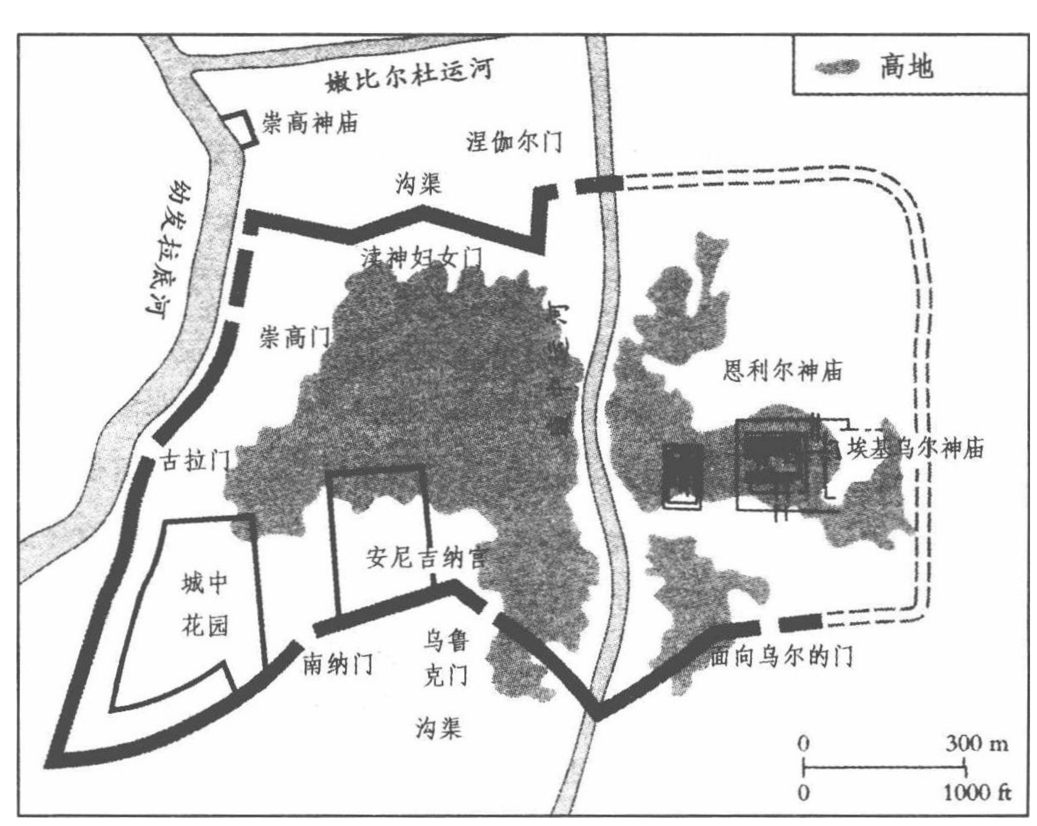
人类最早什么时候在这片平原定居下来？自史前时期以来，肯定



上图：早期文明。旧世界所有早期文明都兴起于河流两岸，气候相似，经纬大致相同。伊拉克与埃及、伊朗高原以及印度河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史前。中国似乎完全独自发展出自身的文明。

右图：尼普尔，苏美尔圣城。一幅大约公元前130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图，图中绘制了城墙、城门和其他有名称的城市组成部分。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西部土丘是城市的中心。

黄河
中国
长江
布拉马普特拉河
喜马拉雅山
恒河
印度
南中国海



有狩猎－采集民族由此横穿而过，就像现今游牧民族所做的那样。埃利都（Eridu）南部最古老的祭祀神庙附近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形单影只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此之外，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考古证据。不过，在瓦尔卡以北 10 英里，有一处神秘定居点提供了线索。这个定居点大概也源自公元前 5000 年。它只有 300 英尺见方，可能是 3 个家庭的住处。这些人制作陶器、用渔网捕鱼，并且烘制黏土计量器；他们有石器工具、石磨和手推磨；他们制作母亲女神泥像，类似稍后普遍使用的那种雕像。住宅的建材可能是泥土和芦苇。这种社会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千年，由他们富有特色的陶器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欧贝德文化（Ubaid），欧贝德是一个重要的早期遗址。这些人或许就是南部最早的永久性居民。他们不是苏美尔人，也就是说，他们不说苏美尔语，苏美尔地区的早期地名——乌尔、埃利都、乌鲁克以及尼普尔——都不是来自他们所说的语言。我们可以猜测，欧贝德人最早命名了南部地区，然后在大约公元前 4000 年，说苏美尔语的人来到这片平原，融入到这种已经存在的文化之中。苏美尔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现今依然是考古学之谜。他们的语言与所有其他语言（依然在使用的以及消亡了的）没有任何为人所知的密切联系。不过，有关埃兰语——古代波斯语言（见本书第 50—52 页）——的新发现，可能为解开苏美尔语的起源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与上述远古历史有关的联系，这有助于我们构想迈向文明的早期阶段。欧贝德人的永久性定居点，可能非常类似于 20 到 30 年前这片平原上依旧可见的传统泥砖村落。在苏美尔中部古代舒鲁帕克（Shurrupak）土丘附近，有一个村庄，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这里的运河干涸而被遗弃了。曾有大约 200 个人住在这里，他们的住房是泥土和芦苇搭建的。每个家庭都用风干的泥墙保护自己

的住宅，这里有睡觉用的平台、畜栏、粮仓和面包烤炉。在村子里，由一位老妇人担任传统宗教长老，她负责创作诗歌、下符咒和接生。他们的建筑、习俗和语言属于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回溯到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很久远的时代。现今，在平原南部腹地，沼泽阿拉伯人的定居点点缀着冲积平原，非常类似于欧贝德人和苏美尔人的定居点：住宅建造在淡水湖人造小岛上，他们在这里捕鱼、编织芦苇床垫，在湖滨沃土上种植庄稼。他们有精致的芦苇住宅（有些长达 100 英尺）和细长别致、涂有沥青的小船，他们使用的建造方式仍然是 5000 年前苏美尔艺术中所描绘的。因此，至少在海湾战争前后，人们依然可以进入到这个让人回想起早期神话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人造小岛构成，每个小岛芦苇丛生，那里有芦苇住房、谷仓、芦苇大厅、土窖、面包烤炉和油漆小船。这里的家庭与动物——母牛和水牛（公元前 2000 多年从印度引入）生活在一起。这些小岛是微型世界，生动表明了伊拉克南部人们几千年的不懈努力：在茫茫苍穹下，与江河海洋争地、向平原和沼泽讨生活，并且创造出灿烂文明。

即便在今日，在南部平原，旅游者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它们体现了城市时代开始之前众多史前社会的不同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定居的耕作者和放牧者的泥砖村落，也可以发现贝都因人纯粹的游牧生活，他们携带着黑色帐篷辗转平原各地，从夏季牧场迁移到冬季牧场。然后就是沼泽阿拉伯人，他们把这两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流动的世界，显然存在永久性定居的机会。用谷物和蔬菜与沼泽阿拉伯人或贝都因人交换，也表明富余产品的存在，从而有可能与更远地区交换贵金属和奢侈品。因此，除了城市化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类的抱负和渴望。苏美尔人强烈地渴求世俗的成功。

宗教肯定也起到了它自身的作用。苏美尔城市出现时，它们都是

围绕平原诸神神庙建立起来的。这些神灵包括风神、天空之神、酒神、谷物之神以及丰产之神。神庙有牧人的和渔民的两种。它们都建造在开阔地区。凯什（Kesh）的分娩女神位于“平原最高处”；尼普尔是风神恩利尔的城市，位于苏美尔北部边缘；淡水之神埃利都的恩基（Enki）位于沼泽底部；月神欣（Sin）的城市是海边的乌尔。渔民和牧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以便与农业定居者交换产品。即使在今天，旅行者也可以在茫茫沙海发现一些小型伊斯兰神殿，它们的砖墙涂有一层灰泥，四周堆满了形形色色的设备：自行车、犁、各种用具和半导体收音机。人们把东西寄存在这里，让游牧民代为看管。在古代，这种有利的聚会场所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储存金银财物的固定点，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交换贸易场所。由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基础或许就是神庙。

第一批城市

临近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地球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兴起。稍后，苏美尔文字把苏美尔地区第一座城市——也即最早的神殿，命名为埃利都。在湮没2000多年之后，英国驻巴士拉副领事约翰·泰勒在1853年发现了它。约翰·泰勒还率先在亚伯拉罕的城市乌尔开展考古挖掘工作。埃利都土丘位于离乌尔12英里开外的沙海之中，当地游牧民称之为“两轮新月之父”。这可能暗指人们在它的城墙上发现的图形（埃利都有一处“新月码头”），尽管这一发现也可能让人想起附近城市乌尔的古代祭祀——当地阿拉伯人把乌尔称为“月亮城”。

今日，埃利都已经被废弃，它屹立在沙漠之中，任由风吹日晒；

在两伊战争期间，它一度被用作防空炮火阵地。不过，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苏美尔人认为它是创世之处，是时光开始之际从原始海洋升起的第一块土地。他们认为王权（政治社会）首先在这里诞生。他们的神话也描述了埃利都早于其他城市发展出文明的艺术。埃利都最初位于阿卜苏河（the Apsu）岸边，这是一大片淡水区域，一直延伸到南部。很显然，"深渊（abyss）"一词就源自这条河流。这里的巨大神庙，苏美尔最古老的神殿，也被命名为阿卜苏。这是古代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基的栖息地，恩基的名字来自原始的淡水海洋，当时人们认为所有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都出自这种淡水。事实上，甚至在10世纪，南部沼泽和海滨依然有一些古老的部落崇拜湖泊和海洋，他们的神话和宇宙观融合了苏美尔的神话。这些神话也谈到一座围墙环绕的花园，里面有一棵神圣的生命树，"犹如发出淡淡光芒的青光石"，或许这就是《圣经》中伊甸园生命树的原型。

直到1949年，埃利都才得到充分挖掘。乌尔附近的国王们在公元前2000年建造了金字形神塔，这次挖掘一直深入到神塔平台底下的土丘。当考古学家进入土丘之后，他们发现金字形神塔下面还有19层，其中有大约公元前5000年建造的神庙。最底端是一小堆沙丘，周围是芦苇篱笆和一座微型礼拜堂，这些表明这里是神秘的创世土丘。如果《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有一个起源的话，那么无疑就是这里了。《圣经》中的天堂伊甸园，只不过是苏美尔语所说的伊丁(Edin)，也即南部无人居住的草地，城市人造景观之外的自然风貌。通过审视伊甸园的废墟，我们不难发现《圣经》故事的心理学真理：我们在进入文明状态时也经历了堕落，我们品尝生命树上致命的果实，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某些方式得以成为地球的主人，但是同时也获得了摧毁地球和我们自身的力量。

埃利都的神殿超越了早期欧贝德村庄粗朴、以泥土和芦苇搭建的神殿，当我们观察埃利都的社会阶层时，上述猜想变得适逢其时。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这座山丘发生了一场剧变。人们在这里建造了大量礼仪性建筑，其中有一座巨型神殿，其建筑风格令人难忘。精英阶层的宏大陵墓表明，当时已经存在阶级划分。黄金和金属制造技术以及奢侈品的输入，暗示精英阶层已经控制了埃利都的剩余财富。山丘周围居住着好几千人。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些线索中察觉到，正是这个时候“王权降临人间”、政治权力落入少数人之手。

埃利都的神话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进程：从平原南部有组织的社会的创造，到神庙、城市和王权的出现。总而言之，这些是文明的重要技艺，苏美尔神话认为它们起源于埃利都，然后神灵们把这些技艺从埃利都传播到地球上第一座真正的城市乌鲁克，由此再传承给后世。

今天，如果你从埃利都前往乌鲁克，就要穿过伊拉克南部，绕过乌尔和纳西里耶（Nasiriyah）。2003年的战争之后，人们对这些地名已经非常熟悉了。过了塞马沃（Samawa），再渡过幼发拉底河，然后一直向东南进入沙漠，你就进入新月地带，一片风沙肆虐的荒芜之地。巨大的土丘在沙尘中时隐时现，这里如同烤箱，夏天温度高达华氏135度[1]。最后你会来到一座城门前，在将近5000年之后，它依然清晰可见，入口处是一堆为沙尘覆盖的陶器和骨头。1849年，威廉·洛夫特斯就站在这里。

被腐蚀的城墙高达50英尺，曲折蜿蜒，一直延伸到天际。城市中心是一座有台阶的巨塔，在这座金字形神塔上，曾几何时，耸立着城市女神伊南娜（Inanna）——我们熟悉的是伊西塔（Ishtar）这个名字——的神殿。这座世上第一城最初很可能是宗教中心，或许是库拉巴地区（Kullaba）牧民们的神殿，供奉天空之神。女神神殿是后来才

出现的。从金字形神塔顶端，我们可以看到苏美尔富饶山河的遗迹。乌鲁克一度沃野千里、沟渠密布、绿树成荫，现在却成为烈日烘烤、风沙肆虐的沙漠。往东北方向，越过幼发拉底河一段干涸的河床，我们可以看到波斯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座巨大的锥形陵墓。整片沙漠到处留下人类居住的迹象：荒废的灌溉渠、破碎的陶片以及螺旋状的煤渣。此外就是古代城市的土丘，古人认为，其中一些城市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了。在地平线上落日的余晖下，我们还可以隐约辨认出拉尔萨（Larsa）的土丘。再往前走就是乌玛（Umma）和泰勒吉尔（Tel Jidr），前者是苏美尔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后者直到中世纪还存在。沙漠远处更北方向是舒鲁帕克，苏美尔诺亚的故乡。毫无疑问，这里有世界上最非凡的景观。

从女神神塔的顶端，我们可以俯瞰乌鲁克全貌，它的围墙长达 6 英里多。在公元前 4000 年之前，这里有两个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千年里，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城市。不过，现代考古学家指出，城墙是后来乌鲁克晚期展开一系列扩张时修建起来的。在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700 年短短几代人时间里，乌鲁克的城市规模就扩大了 4 倍。可以想象，无数农村人口涌入这座新兴城市。这种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巨大变化，后来也出现过。1100 年到 1250 年的中国，由于农业革命，南方一些城市——比如杭州——人口增加了 5 倍。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800 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人口增加了 4 倍多。同样，在 1100 年到 1300 年间，由于新土地的开垦和灌溉的发展，中世纪欧洲某些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10 倍。就欧洲而言，这似乎与结婚年龄下降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下降会提高出生率，同时缩小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距。

在牢记上述看法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早期，许多相似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改良的灌溉系统和新土地的

开垦创造出更多耕地；精细耕作生产出更多粮食；由更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定居点带来更大程度的安全感。更多的土地、更充足的粮食以及更大程度的安全感，鼓励人们离开乡村涌入城市，从山地迁移到南部平原。城市市场及其必需品和奢侈品散发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增添了城市的魅力，这是城市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因此，一旦强大的统治者——不管是国王、神职人员还是贵族家族——能够实施控制时，他们无疑会让贫穷的农民背上沉重的负担。对古代苏美尔的一些民众来说，“城市奇迹”很可能如同19世纪工业城市那样冷酷无情。我们依然无法解答其中的许多问题，更别提带来这一巨大历史变化的社会和权力结构了，我们尤其对王权的起源一无所知。不过，与他们19世纪的后继者一样，苏美尔人无疑也对自己的成就充满自豪感：

> “（第一块泥板）瞧那外壁吧，［铜］一般光亮；
> 瞧那内壁吧，任啥也比它不上。
> 登上乌鲁克城墙，步行向前，
> 察一察那基石，验一验那些砖，
> 那砖岂不是烈火所炼！
> 那基石岂不是七［贤］所奠！”
>
> （赵乐甡 译）

苏美尔另一部诗歌，即伊坦纳（Etana）[2]的故事，为我们勾勒了这些城市的概貌，也体现出城市对人们（他们生活在这最早的城市奇迹之中）的想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几英里开外远眺南部平原、远眺褐色沙漠和蓝色海洋，还有密集的住宅区以及“像忙碌的昆虫一样致力于这个国家商业”的人们，伊坦纳不禁自我陶醉，对人类重塑环

境的能力赞不绝口。

在公元前2000多年城市发展的鼎盛时期，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它们构成巴比伦平原——有40多个城市，它们基本上是独立的城邦，人口密集。像拉格什（Lagash）这种大城邦有36000个成年男性，乌鲁克差不多同样如此。这些城邦组织和控制都很严密。在稍后的尼普尔，周围有200多个附属村庄，聚集在5条主要运河以及60多条次要运河旁边，此外还有无数灌溉沟渠。这些村庄都接受统治和控制并承担义务，也经常成为诉讼的源头。

就城市物理构造而言，依据《吉尔伽美什》的记载，乌鲁克城三分之一是市区住宅、三分之一是花园、三分之一是神庙建筑。在乌尔和尼普尔发掘出来的城市，酷似我们今天在古城埃尔比勒、基尔库克（Kirkuk）、泰勒阿费尔或圣城纳杰夫（Najaf）看到的密集住宅区。在埃尔比勒，现在仍然有4000人居住在遭受腐蚀的城堡里。这座城堡分为3个区，每个区对应一座城门。每个区都有一座小圣殿、浴室、露天剧场，也有自己的抄写员和作家。这些结构安排恰好反映了古代乌尔和尼普尔的城市布局。古代城市住宅设计一直延续到空调时代之前：中央庭院、通风口、地下室（低于地面的房间），以此防备炎炎夏日的烘烤。街道布局也有利于通风并制造阴凉，直到最近30年，这种古老的伊拉克才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就像今天的清真寺，古代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它们的管理方式与现在一样。在公元前2000年的尼普尔，一代又一代乌尔梅梅（Ur-Meme）家族人员掌管着伊南娜神庙。在今天的埃尔比勒，阿尔穆拉（Al-Mulla）家族在过去600年一直管理主要清真寺，这个家族出现了杰出的诗人、天文学家和学者。在巴格达，盖拉尼（Gailani）家族自12世纪以来就管理这座城市最大的神殿，这座神殿在许多方

面类似于古代神庙：它在社会上扮演慈善角色，拥有一座图书馆，还有巨大的厨房和旅馆，此外它在迪亚拉（Diyala）平原拥有大片土地。因此，古代城市直接传承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城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传承到现代伊斯兰城市。

在另外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也类似于现代城市：它是土地和环境的寄生虫。乌鲁克周围的平原一度是生产小麦的沃土，谷物产量甚至可以媲美西欧中部和加拿大；今天，放眼望去，只见一片盐化了的不毛之地。为了养活一直增长的人口，开垦新土地和精耕细作是必要的，但最终也破坏了地貌。我们都知道，文明最后难免毁坏环境，不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找到充分证据来说明这一点：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各个伟大时期，在古代人之间，在希腊人和萨珊波斯人之间，在伊斯兰教徒和现代人之间，我们看不到使用土地的连续性。萨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改善了灌溉条件并提高了施肥水平，更好地利用休耕制，尤其是还开凿出巨大沟渠，这些措施使得一些地区再次成为沃土。不过，从根本上而言，每一个这样的伟大时代都会开垦适宜耕作的新土地，任由以前的土地（它们现在肥力耗尽、无法耕作）沙漠化。

“四通八达的乌鲁克”的沟渠遭受着风沙侵蚀，这里到处可见人类发展的痕迹，今天去那里走走是很有教益的经历。这里曾经有可以媲美今天大教堂的神庙，它们的正面装饰着光滑的蓝色瓦片，就像我们现在在伊斯兰清真寺所见。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继任者以传统拜占庭风格重建了巨大神殿，它们的平台现在清晰可见，当时的乌鲁克依然富庶繁华、人丁兴旺，或许依旧是主要的朝圣中心。那时，古代苏美尔城市仍然保留着它们自己的文明习俗和组织，依然以原来的风格建造起来，依然礼拜往日的神灵。晚至基督教时代，一些古老

的地方依旧保持原有的生活。在城市中心的东南角，有一座小型神殿，用来供奉地方神加勒乌斯（Gareus），由一个当地行会组织在110年11月修建。这个行会的人来自摩苏尔（Mosul）附近，他们说一口希腊语，可能在海湾甚至更远的巴林和印度河地区从事古老贸易。城墙背面是同样有着鱼尾的海洋女神，我们可以在古杰拉特（Gujerat）和坎贝湾的神殿中看到这种景象，伊拉克商人今天依旧在这些地区做生意。

随着某些生机勃勃的社会组织的兴衰，乌鲁克及其各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大约4世纪。城外一个小型定居点甚至延续到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事实上，在8世纪，当地基督教主教依旧称自己是“乌鲁克和卡斯卡（Kaskar）主教”。不过，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乌鲁克在那时已经废弃了。

创造之母

从人类历史上这片巨大废墟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它们反映了这批最早城市的建造者的才华。陶片随处可见：轮制的陶器，上面有美丽的绿色花纹和精致的黑色几何图案。我们最早在苏美尔发现了陶轮，以及我们今天依旧使用的许多其他伟大发明。这里有最早的天文学、文学、法律、学校以及世界地图。这里的人们率先以60的倍数来划分时空，今天，我们在看时间的时候，依然受到他们的恩惠。

在所有苏美尔的发明创造中，最伟大的当属文字。世界上的文字最早在乌鲁克被发现，或许该城一位不为我们所知的天才人物在临近公元前3000年之际创造了这种文字。伊拉克遗址发现的文字，绝大多数（超过95%）是经济文献：事实和数据、账单、账目、清单、对日子和大麦的计量、土地划分以及小到对每一根棍棒竹竿的记载。对

照最早的梵文（宗教文献）和中国甲骨文（萨满教的预言），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明从一开始就各具特色。在美索不达米亚，受世俗法律约束的经济人诞生了：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现代西方的基本观念。

不过，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持久的遗产是想像力丰富的文学，尤其是它的神话。伊拉克人擅长讲故事，这可以回溯到《一千零一夜》之前的远古时代，回溯到世界上以苏美尔语创作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回溯到史诗作品《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无疑是一位真实人物，或许就像后来神话所说的，他是乌鲁克国王，在大约公元前2700年建造了乌鲁克的城墙。苏美尔大洪水和巨型方舟的神话可能与他联系在一起，许多世纪之后，这些神话出现在《圣经》当中，并且在今天为全世界所知。吉尔伽美什最后一次冒险是对永生的徒劳追求，当时追随他左右的是挚友恩奇都（Enkidu），一位改变了“文明”城市人之利己主义的“野蛮人”。这是后来一切探究的典范：从《奥德赛》到《圣杯》再到印第安纳·琼斯。在近东地区，直到希腊统治时代，人们一直在解说和讲述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其中一些主题汇入到公元前8世纪爱琴海世界的《荷马史诗》当中。它们以各种形式与1世纪的犹太和希腊因素结合在一起。在伊斯兰时代，它们又结合穆斯林因素出现在《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丁（Aladdin）和辛巴达（Sindbad）神话之中，而布鲁奇雅（Buluqiya）对永生以及生命之树的追求[3]，无疑就是吉尔伽美什的翻版。8世纪，人们依然在南部中心地区的卡斯卡传诵吉尔伽美什，卡斯卡离废弃之城乌鲁克很近，吉尔伽美什很可能修建了乌鲁克的城墙。当时，卡斯卡一位聂斯托利派主教在一本宗教册子中，把吉尔伽美什视为大洪水之后实施统治的国王之一，“在吉尔伽美什统治时期，亚伯拉罕出生于迦勒底的乌尔”。这位主教

小时候肯定听他母亲讲过这个神话故事，相似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伊拉克流传。

吉尔伽美什的故事让我们见识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开始直到现在）的另一特征：悲观主义。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从古代到伊斯兰黄金时代，它的文学、预言和宗教文献都揭示了相同的悲观主义情感，这与埃及文明的乐观主义以及古典中国的道德自信完全不同。乌鲁克抄写大师辛里奇乌尼尼（Sinleqiuninni）修订过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从古巴比伦文学的这些著名句子中，我们可以发现那种悲观主义：

> 吉尔伽美什，你的探求终将一无所获。当上帝造人之际，人类就注定难免一死，无法永生。让欢乐充满你的每一天吧，疼爱牵着你的手的孩子吧，取悦你怀中的妻子吧，只有这些才是人类的关怀。

苏美尔的衰落

伊拉克南部的所有城邦都依赖幼发拉底河的灌溉系统，因此，尽管彼此存在差别，但是相互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不过，在公元前2000多年，在第一批城市的时代，经常爆发相互杀戮的战争。这与埃及形成强烈对比，埃及很早就统一起来，并且一直维持这种统一状态。城邦之间的争夺非常残酷，我们可以从乌玛和吉尔苏（Girsu）的世仇中看到这一点，这两座城市为了争夺对幼发拉底河支流的控制权而拼得你死我活（公元前2500—前2300）。阿卡德王朝后来成为平原北部霸主（公元前2300—前2150），但是，这一时期是另一个冲突时代。南部最后一个全盛期出现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

间，当时的领袖在乌尔城。一位名叫乌尔·努马（Ur Numma）的将军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它足以让人们想起苏美尔过去的辉煌。巨大的金字形神塔在苏美尔古老的祭祀神庙旧址上建立起来——包括乌鲁克、埃利都、乌尔、拉尔萨以及尼普尔。人们用金银珠宝装饰着这些神庙。乌尔·努马和他的族人大力赞助文学，他们自称吉尔伽美什的后代，鼓励作家模仿与古代苏美尔中心地区的英雄们以及乌鲁克国王们有关的文学作品，尤其模仿吉尔伽美什的故事。舒尔吉（Shulgi）在其48年的统治中，进行了重大的、代价昂贵的行政改革，恢复苏美尔19个城邦向尼普尔“国家”神殿纳贡的古老制度；每个月，大量动物和贡物被运送到一个中心仓库，以便用于神庙的祭祀活动。这种巨大的消耗很可能导致王国陷入经济困境。现在看来，平原的气候似乎一直受到长久干旱的诅咒。许多农业用地已经无法耕作，经济文献表明，统治者把目光从小麦转向更加抗盐化的大麦。更糟糕的是，外部游牧部落对平原常年的袭击变得更具威胁性。舒尔吉的继任者舒辛（Shu-sin）在西北方向修建了“马尔图（Martu）城墙”，并且派兵驻守，以此抗拒来自叙利亚的入侵者。在他的继任者伊比辛（Ibbi Sin）统治时期，城墙坍塌。现在有证据表明，很多土地因为盐化而被遗弃。人口无法得到供养：谷物价格飞涨60倍。苏美尔的原材料一直依赖进口，这时候贸易中断，政府的交流活动很快也宣告失败。当敌人逼近时，引起恐慌的信息在国王和臣僚之中不断流传。悲观的预言曾预告过这种困境，现在它果然成真。这是伊拉克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何维护没有自然边界、繁华富庶的平原，使之不遭受对其财富虎视眈眈的众多敌人的侵夺。在21世纪初，这种情形依旧在上演。

乌尔第三王朝的终结是苏美尔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的敌人——来自今日伊朗的埃兰人和来自沙

漠的游牧部落——联合起来蹂躏毁灭了这片土地。苏美尔的主要城市都遭到洗劫，它们的神庙被毁坏，财宝被抢劫一空，人们不是遭到杀戮和奴役，就是被迫逃亡。最终，乌尔城毁灭之后，还被付之一炬，伊比辛则被虏到伊拉姆（Elam）。这些可怕的事件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首幸存下来的哀歌描绘了苏美尔及其城邦的毁灭：

> 乌尔毁灭，悲伤欲绝。国家千疮百孔，热血浇注其中，犹如模具中滚烫的青铜。尸骨消散，堪比烈日下的油脂。神庙坍塌，我们被神灵遗弃，好比候鸟无家可归。黑烟笼罩城市，遍地凄凉。

在苏美尔南部，一直到希腊化时代，这种哀歌每年都在神庙的节日上吟唱。当一座神庙在战争或和平时期被毁坏并且重建时，也要吟诵这种哀歌，就好比永远让人们回想起文明的脆弱性。哀歌本身就是苏美尔文化的一种古老形式，城市哀歌只是数量庞大的作品（被称为ersemma或者balag）的一部分，这种作品通过神庙档案而保存下来，并且进一步证实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特有的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悲观主义看法。事实上，我们在后面会发现，人们很容易把这种情感与后来的什叶派文化联系起来。什叶派文化兴起于伊拉克南部同一块沃土。

从古代世界到伊斯兰教

在公元前2000年遭受破坏之后，伊拉克南部的城市文明又得到了恢复，人们重建了城市和神庙。事实上，这些破坏也证明了它特有的持久性和韧性。在公元前第二个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美索不达米

亚轮流受到巴比伦人、喀西特人（Kassites）、赫梯人、亚述人、尼布甲尼撒的新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的统治，随后就是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萨珊波斯人的统治。这些王朝大多数都是外族人建立起来的，不过文明依旧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习俗、组织和本地人的语言。当地人今日所说的阿拉伯语，源自基督教时代早期近东地区所说的阿拉姆语，后者又来自公元前2000年之前巴比伦地区所说的闪族阿卡德语（那个时候，苏美尔语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尽管希腊人统治时代，它仍然被用来创作文学和宗教作品）。到公元前3世纪，南部巨大神庙还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祭祀仪式和组织，这些神庙是通过当地的古老传统重新修建起来的。不过，世界在迅速改变。在亚历山大统治下，希腊人对近东的征服为这个地区接触各种新思潮打开了大门。伊拉克一直处于东西方交汇之处，作为当时世界主流的希腊文化开启了一个对文化、文明、历史和神进行大量反思的时代。在接下来几个世纪，新月沃土诞生了新的普适性宗教，它们都从希腊统治时代所激励的各种传统和联系中获取灵感，也受益于这一时代带来的波斯、阿拉伯、犹太和希腊宗教的融合。4世纪，基督教和摩尼教都雄心勃勃，想成为世界性宗教。事实证明，中东地区宗教融合最成功的产物是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吸收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元素，不过，它保留了自身激进、民主的教义，使用阿拉伯语。它改变了近东的古老文化。

7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军队横扫美索不达米亚，击溃了处于衰落中的萨珊波斯帝国的军队。与历史上绝大多数入侵者一样，和当地居民相比他们只是一小群人。在接下来400年，伊拉克大多数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不过，他们并没有遵循阿拉伯征服者的逊尼派传统。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南部（即苏美尔）之后，伊斯兰教呈现出鲜

明的地方色彩，与当地古代什叶派传统联系在一起。伊拉克大多数人是南部贫穷的农民，他们是伊斯兰教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之前说阿拉姆语的人的后代。这些人认为7世纪的侯赛因（Hussayn）和阿里（Ali）是先知精神权威的真正继承者，并将信仰着重于他们两人的殉难。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却从未放弃过古老的崇拜仪式。由此产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古老分裂，今天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问题。在卡尔巴拉（Kerbala）圣城，什叶派无比虔诚地遵循古代苏美尔的哀歌传统，这是其他信仰无法相比的。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什叶派的许多习俗可以回溯到伊拉克早期历史：他们的礼拜形式、洁身礼、婚约、神职人员的组织以及丧葬风俗等。什叶派的哀歌，尤其是女性形式的哀歌，也与古代世界联系紧密。这些引人注目的传统，或许是根深蒂固的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经验的延续。什叶派巨大清真寺的外形也酷似古代苏美尔建筑，比如卡尔巴拉的侯赛因和阿巴斯清真寺，以及纳杰夫的阿里清真寺。尽管伊朗赞助人以波斯风格对这些清真寺进行过重建，但是，正面精美的镶嵌工艺和几何图案，仍然是对乌鲁克、欧贝德和埃利都神殿装饰图案的复制。正如苏美尔圣歌所吟唱的："真正的神庙犹如明媚阳光中的彩虹绚烂多姿。"

早期伊斯兰世界

在穆斯林阿拉伯人统治的前几个世纪，伊拉克非常繁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两处文字对美索不达米亚作出的迷人记载，它们是10世纪的作品，其一是伊本·塞拉布（Ibn Serabh）大约于公元900年所作，另一处保存在一本982年撰写的波斯地理学著作中。两处文字都描写了伊拉克的富庶繁华和兴旺的城市生活："学者和商人的住宅……枕

着溪流和欣欣向荣的乡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圣城尼普尔是当时繁华的城市之一。伊斯兰征服此地后的多个世纪，一个混杂的社会在这里出现。与今天美国所有的大都市一样，它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这与西方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看法迥然有别。在错综迷人的泥砖街道上，有一处繁荣的犹太社区，它设立了自己的抄写学校。《塔木德》是关于希伯来习俗的伟大文集，它是公元第一个千年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如尼普尔）创作的，当时正值犹太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影响的大好时期。除了古清真寺（Friday mosque，又译作星期五清真寺——译注）以外，城里还有驻有主教的聂斯托利派教堂。在10世纪，基督徒可能依然是多数派。此外，还有曼底安派和摩尼教徒，他们的先知摩尼（Mani）出生于泰西封（Ctesiphon）附近，在沼泽地得到抚养，后来建立了一种世界性宗教，该宗教从伊拉克传播到远至中国的亚洲各地。

不管你属于哪个社会，你仍然依赖古代巴比伦关于日月星辰和神灵鬼怪的传说。即便在今天，在古城尼普尔西区的干涸河道中，大雨过后，人们还能发现一些巫术符咒碗，里面刻有希伯来语、叙利亚语、曼底安语以及摩尼教徒所使用的阿拉姆语。这促使我们去了解伊斯兰征服这里之前古巴比伦连续不断的巫术世界。这些碗和文字的功能很简单。如果你碰到难题，就去找自己所在城区的巫师，他会为你画一道符咒，并且以曲折的线条把咒语刻在碗底。符咒的目的可能是要请魔女莉莉丝（Lilith，古巴比伦神怪）“远离我们的生活、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我的畜群和我的田野”。巫师也会在碗底画上恶魔的图像。其中一些恶魔就像臭虫，手足被缚，这样就无法行走，另一些被神塔压顶，似乎被毁坏的神塔依然拥有无穷的神力。然后，你就可以把碗带回家，放在墙缝里面或者门槛下面，碗要倒扣，这样恶魔就

无法逃逸出来。这些碗表明古代巴比伦神灵的最终衰落，现在城市穷人需要的只是以符咒形式刻在碗底的恶灵。这些神灵包括天地之神贝勒（Bel）和冥神涅伽尔（Nergal），希腊神灵宙斯、赫尔墨斯和阿波罗，以及萨珊波斯人统治伊拉克时期的伊朗神灵。然后就是“宇宙伟大女神”伊南娜的悲惨谢幕，她以精灵南娜（jinn Nanna）的形象出现在碗底。神灵的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经历着改变。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其中一些信仰，尤其是巫术，依然受到伊拉克贫苦人们——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信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民间宗教专家依旧生活在南部乡村，他们是手捧魔法书的智者或“启蒙者”。

在 9 世纪的伊拉克南部，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生动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神秘主义运动和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宗教诗人：苏非派（the Sufis）。当时，巴格达和伊拉克的一些城市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库法（Kufa）和巴士拉这种工业和贸易城市成为思想和宗教纷争的温床，它们连接印度、中亚、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的贸易路线，一直是思想和人工制品的交流渠道。许多来自巴格达和巴士拉的早期苏非派就受到各种灵感的启发。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殉道者阿尔·哈拉智（al-Hallaj）熟知基督教和希腊灵知，游历过印度，或许还阅读过《奥义书》（*Upanishads*）和《薄迦梵歌》（*Bhagavad Gita*）。阿尔·尼法里（al-Niffari）是另一位伟大的苏非派教徒，他出生在古代圣城尼普尔，被誉为“博学之人”。与哈拉智一样，在 1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尼法里游历过包括埃及在内的许多地区。不过，他每次都会返回伊拉克南部，回到巴士拉、尼尔（Nil）和尼普尔，把他的新发现记录在笔记本上，“这些文字是上帝恩宠的礼物”。毫不奇怪，在这个具有远古传统的地方，在乌尔·努马被毁坏的神塔下，尼法里的见解似乎仍然以古代苏美尔挥之

不去的声音向我们诉说："我看到恐惧压制希望，财富化为尘土；我视贫乏为敌，人世只是虚幻，天堂不过欺骗，我目睹一切被造之物离我而去，独剩自己形单影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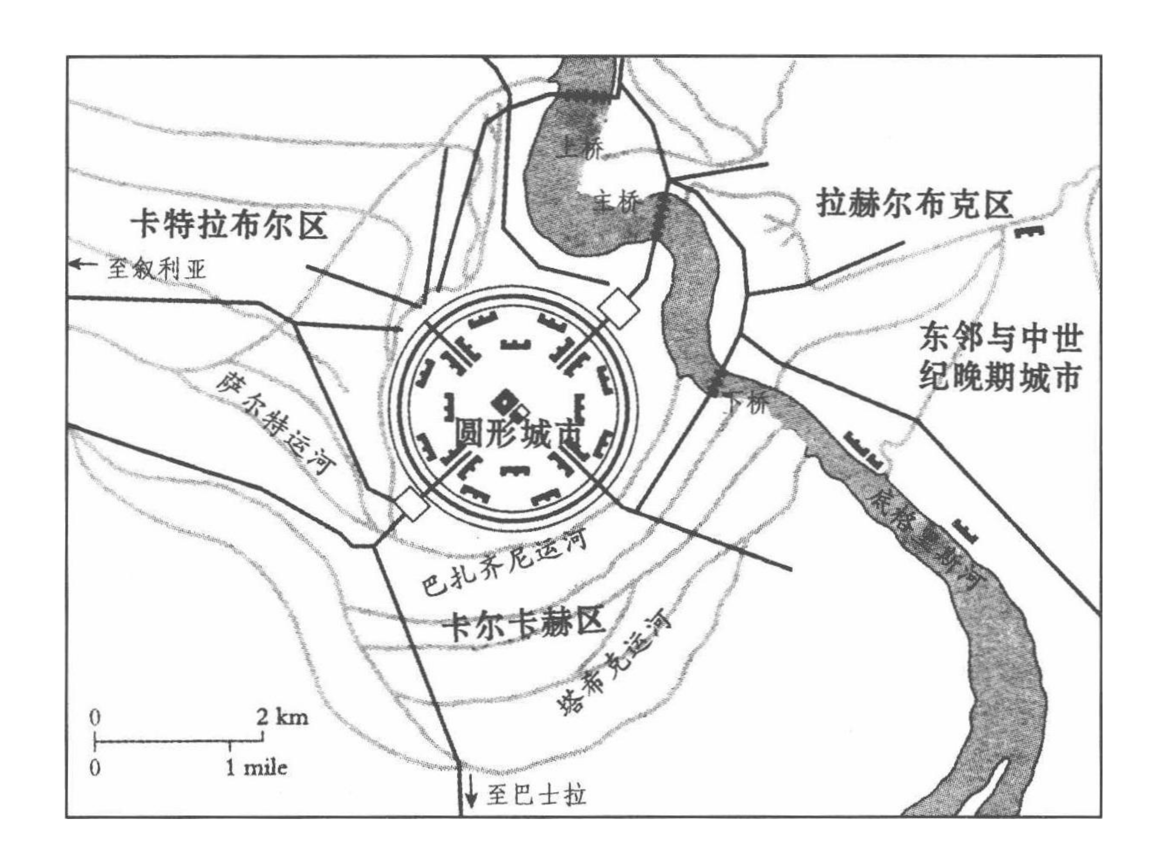
在伊斯兰教统治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许多居住区一直延续到现代。当尼普尔在14世纪最终被废弃时，曼底安派教徒迁徙到沼泽腹地、阿马拉（Amara）、苏克·什舒·于克（Suk-esh-Shuyukh）以及其他30个村庄，欧洲早期旅游者对此作了记载。曼底安派教徒在这些地区一直生活到20世纪，然后有很多人迁往巴格达，以便继续从事他们传统的黄金和金属制造业。他们现在还住在那里。曼底安派受到《古兰经》的保护，他们与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并称为"经书民族"。曼底安派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传统的残留物，这实在令人惊叹。他们也让我们接触到了基督教由之而来的洗礼文化。这些人的先祖来自巴勒斯坦，与耶稣一样，他们也自称施洗者约翰的追随者，即曼达耶派（mandayye）或纳索雷亚派（nasorayya）。难道拿撒勒人（Nazoraios）耶稣——《马太福音》对他的称呼——根本就不是拿撒勒人（Nazareth），只不过是一位"纳索雷亚派"（Nasorayan）、一位受过洗的"诺斯替教徒"或"遵奉者"吗？

在曼底安派结婚仪式中，新人需要全身浸泡在底格里斯河中。在仪式上，他们依旧称之为约旦河。仪式用曼底安语主持，这是阿拉姆语的一种方言，耶稣也使用过这种语言。其他习俗反映出他们在巴比伦居住了将近2000年。当主教授予新牧师职位时，后者必须在深蓝色（恶魔之眼的颜色）帐篷中接受考验：不能睡觉，在里面呆上七天七夜，如同吉尔伽美什在未能践行进入冥府的最初诺言之后所做的。曼底安派让人想起多元主义和宽容是如何成为文明的本质要素的，也让人们想到，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在经历历史上各种灾难之后，如何始

终顽强地保存着他们一些最古老的传统。正如曼底安派结婚仪式上所说的，“生命就是凯旋”，事实上，如果人们在获得整个世界时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

巴格达：“世界第一城”

8 世纪，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了巴格达城，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后一座伟大的、有规划的城市。这里曾经有巨大的斜棱形的巴比伦，正方形的博尔西帕（Borsippa），以及三角形的阿卡德。阿巴斯王朝统治下的巴格达，其核心是方圆两英里的圆形地带，贸易区、手工业区、工业区以及商店区从位于中央的皇家清真寺向外辐射。城郊运河纵横交错，就好像水上城市威尼斯。它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中心：982 年，一位波斯地理学家声称它是“学者和富商巨贾之城”，“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商人云集、人口众多”。遗憾的是，当时保存下来的东西很少。除了哈拉智的墓地和风吹日晒的纪念碑之外，巴格达所遭受的毁灭性的破坏事实上消除了所有痕迹。这座中世纪城墙环绕的城市，昔日屹立在底格里斯河东岸，我们仍然可以在此发现残垣断壁和中世纪的一些建筑：其中最主要的是该城守护者阿卜杜勒·盖拉尼（Abdal-Gailani）的清真寺[4]，它今天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朝圣中心。它的建造年代，正值学院和慈善机构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建立起来之际，这些比西方大学——比如牛津大学、索邦大学以及博洛尼亚大学都要早。这座清真寺是一所巨大的学院一神殿建筑，有厨房和其他辅助建筑，是以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体制的古老风格修建的。它的庭院散发出文明气息，让人回想起伟大学者在这里学习和授课，翻译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典，正如他们所说的，“如



巴格达（大约公元800年至1000年）。这座圆形城市由郊区的手工业和贸易区环绕：在萨尔特运河和巴扎齐尼运河之间的区域，有数百家书商汇集于此。

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真主的决定”。中世纪的巴格达正是以这种开放的探求著称。我们以阿尔·奈迪木（al-Nadim）为例。在10世纪，巴格达有800位人文主义书商，奈迪木是其中一位书商的儿子，他打算编写“一部阿拉伯民族和外族人以阿拉伯语创作的书籍（他们讨论各门学科）的目录，并且对各位作者进行一番说明”。当时历史学家阿尔·马苏迪（al-Masudi）为了撰写《编年史》，采访了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希腊人，甚至包括印度教徒。由于研究需要，他四处奔波，足迹遍及从土耳其到印度德干的广大地区。然后是伟大的医生阿尔·拉齐（Al-Razi），他为阿拉伯医学带来了一场革命，顺便提一下，他否定一切先知的真理。这里最优秀的教师阿卜杜勒·阿尔·拉蒂夫（Abd al-Latif）声称：“人文知识带来的氛围，就像一道明亮的光芒，洒落在后来者身上。”

走进盖拉尼清真寺，参观者马上又会回想起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崇拜仪式，这里装饰着闪烁的棱镜，礼拜大殿光彩夺目。富丽堂皇的景象让人们遥遥想起伊斯兰教统治之前的某种古老事物。圣人、诗人和神秘主义者盖拉尼创建了伟大的苏非派分支加迪利教派（the Qadiriya），在他的清真寺里沉思片刻，我们就会感觉到伊拉克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一股勃勃生机贯穿整个历史。1979年革命以来，霍梅尼（Khomeini）和伊朗的阿亚图拉们[5]支持的“原教旨主义”什叶派或许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信奉的传统伊斯兰教，更别提深有远见的大师伊本·阿拉比（Ibn Arabi）或苏拉瓦迪（Suhrawardi）了[6]。在21世纪开始之际，尽管富有而自满的西方不希望伊斯兰教强大起来，但是，它再次成为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力量，成为亚非一无所有的人们的灯塔。它是人们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理想。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战争在全球范围展开，在现代西方世俗价值

观念之外，伊斯兰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巴格达遭洗劫

从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Harun al Rashid，763—809）到 11 世纪，巴格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三座城市之一，其他两座分别是君士坦丁堡和中国西安。与它们一样，巴格达也是巨大的传输中心，古代的文化遗产从这里传承到中世纪和现代世界。8 世纪中期从中国传入的纸张，大大促进了这座中世纪城市的知识发展，大量书籍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印刷出版。这是一个通信、图书馆、书店以及书籍文化的世界。巴格达是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汇合的伟大中介，今天这种交汇依然结出累累硕果，而在过去，则创造出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西方世界经常忘记一点，即许多希腊科学和哲学遗产是通过阿拉伯学者传到西方的。这些知识在巴格达受到改造，因为它们不但接触到伊斯兰教，而且也接触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和数学遗产，甚至受到占星术和炼丹术这种诺斯替教派和巫术传统的影响。在这个非凡的大熔炉里，基督教、希腊以及伊朗的科学、医学和哲学观念，通过阿拉伯语言、文化和知识被重新塑造。古代的遗产发生的这种强劲有力、丰富多彩的改变，可以媲美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

不过，中世纪伊斯兰文化开始的这种多元主义大冒险和思想探究，并没有成功地改变中东的传统社会。由于内部争夺和社会动荡的破坏，12 世纪时，巴格达辉煌不再，伊拉克已经处于经济衰退期。然后发生了另一场大灾难，它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整个发展进程。这场灾难现在依旧被视为伊拉克最大的悲剧之一：1258 年，在蒙古人的蹂躏下，巴格达长期高度发达的文明终结了。当时，整座城市被摧

毁，灌溉系统被完全破坏。对现代世界而言，仅仅图书馆的破坏就是无法估量的损失。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奈迪木的巨著《群书类述》(the *Fihrist*) 的手稿只是部分保留下来，马苏迪的杰作《编年史》永远消失了。后来，一位幸存者在一本评注《古兰经》的留有水渍的卷角小册子（现在存放在盖拉尼图书馆）中，无比痛心地写道："希吉来历六百五十六年（1258 年)，我从底格里斯河捞起这本被蒙古人扔到水里的书。我，麦加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迪尔，谦卑地请求真主宽恕。"这不但证明了对真主的信仰，也证明了对文字创造文明之能力的信仰，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一开始就具备的主要信念之一。

听到"世界第一城"被毁的消息时，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 (Saadi of Shiraz) 正在阿巴丹 (Abadan)。他从住处遥望底格里斯河，在脑海中看见奔腾的河水夹带着鲜血。他写道："人们问及巴格达的洗劫，它是如此可怕，言词难以形容。我希望自己早就死去，这样就不用看到白痴如何对无价的知识犯下滔天罪行。我自认为理解这个世界，但是这场大浩劫怪诞至极，毫无意义，我一时之间目瞪口呆。在时代及其抉择带来的变革面前，理性和知识一败涂地。"

迈入现代世界

1258 年，蒙古人对巴格达以及它的运河灌溉体系的破坏，是中东历史上的转折点。一位波斯作家以先知的语气冷酷地说道："毫无疑问，即便未来一千年伊拉克不再遭受磨难，它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昔日的辉煌。"到 16 世纪末期，文明的摇篮伊拉克已经坠入谷底。南部古城不复存在，土地重新沦为沙漠，即便伊斯兰时期的新城，如库法和瓦西特 (Wasit)，也消失不见了。尽管依旧是活跃的贸易都市，巴

格达已经大不如前。如今，这座东临底格里斯河、被砖墙环绕的哈里发之城，不过是河西岸的一片废墟。就南部而言，只有港口城市巴士拉、大学和朝圣之地纳杰夫依旧繁盛。在奥斯曼帝国400年统治期间，这块土地遭到贪婪军队的掠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新大陆的发现，都与伊拉克无关。因此，尽管取得过巨大成就，但是伊拉克在进入现代之际，就像一个停滞的社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的古城看起来依然与公元前2000多年的城市没什么两样。当时英国从空中为伊拉克拍摄的图片，是古老的伊拉克的最后形象，对什叶派圣城萨迈拉（Samarra）、纳杰夫、卡尔巴拉（Kerbala）以及哈迪迈尼（Khadimain）而言，更是如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纳杰夫犹如穿越时空，在沙漠中熠熠生辉；它依旧为雄伟壮观的泥砖城墙环绕，城外是裸露的幼发拉底河平原以及沙漠西部的断崖。在城市中心，正如我们所想像的，阿里清真寺如同乌鲁克和埃利都的古老神庙。在神庙西北角，是多风的小巷、露天剧场、带有屋顶花园和凸窗的山墙住宅、晨曦依然未照射到的密集杂院。这个时候，纳杰夫依旧保持着中世纪世界的形态：这里有工匠行会、手稿抄写员、书店和旅馆、神职人员、教师以及朝圣者。

伊拉克古老世界的这种诱人景象一直延续到现代，在一些圣城中尤其如此。那里的人们无比虔敬地维护着中世纪什叶派丰富的哲学和法学传统。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书商和抄写员这种古老的职业在纳杰夫活跃如初。但是，最近40年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一切不复存在：复兴社会党政权（Batthist regime）冷酷无情的现代化改革、1980年到1988年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库尔德斯坦的战争以及2003年的入侵。

这些都源于这里发现了世界储量第二的石油，伊拉克的历史进程

由此被改变。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之后，伊拉克获得了有条件的独立，依赖于同更遥远强大的大国结盟，这些国家和历史上的入侵者一样不断挑起该地区各国和各族人民的纷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资源。伊拉克再度扬名世界舞台，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重新成为近东历史上的重大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伊拉克又一次向扎格罗斯山脉另一侧的波斯敌人开战，而两河流域也再次遭到外敌入侵。

苏美尔的毁灭：1991 年

1991 年，一场新的战争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第一批城市兴起的沙漠地带爆发，这是又一场争夺地球自然资源的战争，又一场文明反抗野蛮的战争。就像在古代哀歌中发现的一样，我们再次看到黑烟"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苏美尔。

1991 年战争之后，南部什叶派奋起反抗巴格达逊尼派统治者。自中世纪以来，他们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苏美尔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再次遭到洗劫，它们的神殿被毁坏，清真寺和礼拜堂被拆毁，教师不是被处死就是被监禁，图书馆被摧毁，手稿被付之一炬或洗劫一空。

1991 年起义之后，伊拉克南部沼泽，具有 5000 年古老文明的沼泽阿拉伯人的故乡，遭受蹂躏。有些地区干涸，定居点被破坏，当战火蔓延到沼泽腹地时，25 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巴格达政府镇压自己绝大多数人民的长期战争，燃烧到沼泽中心地带，库尔德斯坦的村庄一片荒芜，什叶派圣城再遭浩劫。伊拉克传统文化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文明首次提出了它的人文主义目标，以法律来制约赤裸的权力，正如古代人所说的："让正义主导

这片土地，强者不再压迫弱者”。古代巴比伦学者认为，历史并不是进步。他们更愿意把历史视为人类成就的无限循环，这种成就随时可能毁于不可预见的灾难。灾难之后，人类又得重新建设和重头再来：“曾几何时，苏美尔，伟大的、创造出神圣法律的土地，拥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你，苏美尔，为人类设定了文明的理想，崇高的理想，沉浸在光明之中。曾几何时……这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恐怖。”

伊拉克的遗产

伊拉克古代文明的基础在于：城市是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这种文明依赖国际贸易和多元化的经济，也依赖对环境的彻底控制。它使用文字和成文法来记载和规范牵涉到很多人的交易活动。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多种族社会。就格调而言，伊拉克古代文明是悲观主义文明，尽管什叶派经常称之为“自信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的根源在于严酷的环境，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常常毁于战争和自然，今天依然如此。

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文明与自然是分离的，他们创造了一种人为环境，这样就能使人类社会免遭原始自然的威胁（《吉尔伽美什》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文明与自然的对立）。一神论是近东文化的精神体现，它也这么看待自然，创世神外在于他的创造物，从外部为受造世界立法。因此，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所体现的，是与史前文化连续性的深刻分离。史前文化延续了漫长历史时期，正如我们所见的，它让人们想起印度、中国和美洲的古典文化。但只有近东在各个领域发生了跳跃，城市文明与史前文化分离：技术、大规模的贸易、灌溉体系、为经济服务的文字的使用、区域性城邦优先于传统部落和血统

的观念、分离神灵与自然的天文学革命。这种情况为何仅仅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之际的近东，依然是历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观念又传给后来的西方文明，它们在西方得到发展，并且在最近300年被西方尊奉为普世性经验：现在，它们与个人自由的理论一起，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但是，在东方以及美洲，人类心灵的这种分裂并没有发生。这里的城市和自然环境是一种完整的宇宙结构的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直到19世纪，她一直以这种宇宙观作为富有意义的统治基础。在西方，城市是人造文明，法律和制度把人与原始自然截然区分开。今日，在殖民和帝国主义时代，在纯粹必要性的压力下，世界其他地区竞相追逐着5000年之前发生的那场革命。

注释

[1] 约52℃。

[2] 苏美尔基什第一王朝国王。

[3] 根据R.F.Burton的译本，这个故事出自《一千零一夜》第5卷，*The Queen of Serpents, The Adventures of Buluqiya*。主角布鲁奇雅受命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并因此走遍世界。最终布鲁奇雅发现了生命之树与不老泉，却因被守卫打败空手而归。

[4] 即阿卜杜勒－卡德尔－盖拉尼清真寺。

[5] 阿亚图拉，什叶派次高级的宗教学者，霍梅尼为最高级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

[6] 两人皆为苏非派大学者，即前文所指的中世纪人文主义者。

第二章　印度：精神帝国

1856年，英国工程师约翰·布伦顿和威廉·布伦顿正忙着修建从卡拉奇到拉合尔的东印度公司铁路（今巴基斯坦境内）。约翰·布伦顿在考古史中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仅仅两年前，在修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野战医院时，他派遣一支军队挖掘西沙里克（Hisarlik）山丘：这是特洛伊遗址上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现在，大英帝国在更遥远的地方，在印度“兵变”前夕开展建造工作，不过，他有其他考虑。对铁路工程师而言，在印度河泛滥的平原修建铁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为铁轨铺设牢固的路基，到哪里寻找碎石。在南部的信德，他们想到了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从哈拉（Hala）附近一座巨大的、废弃的中世纪城市盗用大量窑砖。在北部的木尔坦和拉合尔之间，这条有规划的铁路线经过另一座荒芜之城的土丘，该土丘以今天依旧邻近其废墟的村庄哈拉帕而闻名。这座城堡由许多砌砖防御工事守护，位于拉维河昔日合流处的干涸河床上。今天，在5英里开外的地方，这条河流在布伦顿生活的时代依然是印度教徒重要的朝圣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印巴分治”。在这座城堡的最高处，有一块穆斯林墓地，一座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小型砖造清真寺，一座当地穆斯林圣徒的神殿，以及一座年代久远的印度教神殿。后者用来供奉湿婆（Shiva），还有摆放在约尼石座上的林迦[1]。如果布伦顿稍作思考，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暗示了这处遗址可能很

古老，穆斯林在8世纪就征服了这片土地！然而，约翰·布伦顿和威廉·布伦顿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冒险者所特有的精明务实精神，他们开始工作，拆掉城墙来铺设几百英里的铁路路基，今天，火车依然在上面飞驰而过。

在破坏与挖掘同步进行时，布伦顿请来的工人发现了许多古代文物，包括一些滑石图章，上面刻有不认识的文字、奇怪的人物形象、树木和动物（尤其是公牛）。一位前来视察的英国军官看到了这些图章，碰巧的是，这位军官后来成为1861年成立的印度考古勘测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首任局长。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坎宁安马上意识到，这些发现是当时史学家不熟悉的印度古代文物。当时，印度的历史只是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孔雀王朝，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继任者那个时代。坎宁安对哈拉帕感到迷惑不解，于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公开了一些图章。不过，直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些图章的神秘起源才得到解答。事实上，它们来自青铜时代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的主要遗址之一，这种文明又可以远远回溯到有史料记载之前。这座城市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就消亡了，自此之后，在这座山丘上居住和做礼拜的人们，世代口头传诵着它的古老名字。

印度史前史的再发现

20世纪20年代之前，印度史前史还是一片空白。与中国不一样，在伊斯兰教来临之前，印度不存在真正的史学编撰传统。因此，印度也没有书面文献以年代顺序详细记载早期王朝和重大事件，而这种记载对史学家来说非常有用。不过，印度有史诗作品，如《摩诃婆罗

多》和《罗摩衍那》，它们显然可以回溯到英雄传奇时代。还有宗教文献，印度教徒认为，它们是从远古时代口头相传下来的。这些“圣言”是人们在中世纪用梵语记录下来的，梵语被称为“神圣的语言”，它的通俗形式是目前印度北部绝大多数方言的先祖。一开始，婆罗门僧侣阶层独自默记和履行这些文献中的宗教仪式，他们不愿意非婆罗门阶层看到和复制这些文献的内容；对他们来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亵渎行为。（同样，根据尤里乌斯·恺撒的记载，英国德鲁伊教徒（Druids）认为“将他们的教义付诸文字违背了他们的原则”）这种禁忌在印度存在的时间尤其长久。即便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突出例子，比如，在贝拿勒斯（Benares），不会读写的婆罗门僧侣口述长篇大论的梵语宗教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依然不为其他人所知，也没有文字记载。就风格和语言而言，它们是中世纪的，甚至年代更早，是由特定的僧侣世代口头相传下来的。

1605年之后，罗伯托·德·诺比利斯（Roberto de Nobilis）在马杜赖（Madurai）开始着手一项迷人的工作，即把印度教的玄学和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予以综合，梵语从那时开始为西方世界所知。到了18世纪，当欧洲人深度介入印度进行商业和军事冒险时，一些启蒙学者开始对印度的神灵和宗教仪式产生兴趣，并且认为印度教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早于近东所有一神论信仰。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英国法官和博学者威廉·琼斯爵士于1786年向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宣布了他的著名发现，即梵语通过某种母语与拉丁语和希腊语联系在一起：

> 梵语虽古，但比希腊语完善、比拉丁语丰富，洗练优雅更胜一筹。三者多有相似，绝非偶然。由于联系紧密，语言学家在考察它们之时，必定认为它们同宗同源，尽管这种共同起源

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琼斯进行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比较，其中包括“父亲”一词在各种语言中的一致性：希腊语的 pater、拉丁语的 pater 以及梵语的 pitar 和日耳曼语的 fadar 以及现代英语的 father 显然是相关的。琼斯本人（他说威尔士语和波斯语）认为，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是“印欧语系”的另外分支。此后，人们又在更多偏僻的欧洲语言当中发现了显著的一致性，比如，梵语“马”一词是 asva，这与立陶宛语相应的 aszwa 一词非常接近。如果语言同宗同源，它们是否也起源于同一个地方呢？

自从琼斯生活的时代以来，印欧语系的“同宗同源”问题一直是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争论的焦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梵语不是印度本地语言，而是起源于一个位于俄罗斯南部或东欧的更广泛的印欧语系中心地带，然后在公元前 2000 多年，说梵语的民族移居印度西北部。事实上，这些人迁移的路线可以得到还原。公元前 14 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米坦尼王国，说印欧语的人建立了王权。一些神灵的名字记载在当时的泥板上面，其形式与梵语非常一致：密多罗（Mitra）、伐楼拿（Varuna）以及因陀罗（Indra）。他们的 chariotry 一词——古典印欧语中的“战争”——也与梵语中相应的词很匹配。与此同时，大约公元前 1400 年，在伊朗东北部，先知琐罗亚斯德正在奥克苏斯河畔宣扬他的伟大启示，这些记载在以古波斯语——与早期梵语有诸多相似之处——创作的《伽泰》（the *Gathas*）一书中。当时，印欧语系这三大分支才分离不久，不过，说梵语者已经在西北边境和兴都库什山脉定居下来。

因此，说梵语的印欧人从西北部来到印度，在整个公元前 2000 多年期间，他们大致在喀布尔河周围和旁遮普地区居住下来。事实

上，最古老的梵语文献《梨俱吠陀》为我们补充了这一场景。这部经典包括 1028 首赞美诗和颂歌，可能是在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900 年之间创作的，其中一些要更早。今天，《梨俱吠陀》依旧在印度教寺庙得到颂唱，这是所有年轻婆罗门成年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部梵语经典直到中世纪才付诸文字，却保存了青铜时代的语言形式，其精确程度令人震惊。《梨俱吠陀》的早期诗句记载了说梵语的人定居在印度西北部，但没有提及他们是否从他处迁过来，因此，这些人很可能已经在那里居住很长时间了。他们自称雅利安人，即“高贵的人”（这个印欧语词汇在伊朗和爱尔兰的人名中保存了下来），其土地沿着西北边境从喀布尔河一直延伸到奥克苏斯河。《梨俱吠陀》中稍晚时期的赞美诗表明，当时他们已经进入“七河地区”，即今天的旁遮普。在其中最晚期的诗歌中，雅利安人的活动场所才扩展到印度文明的中心地带，即恒河和朱木拿河河谷。因此，《梨俱吠陀》是经由许多世纪创作出来的，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群说梵语的贵族从奥克苏斯河向东南方向一直扩张到恒河地区的过程。不过，它也表明，在青铜时代晚期，雅利安人并不是印度西北部的唯一民族，因为他们经常轻蔑地谈到达萨人（Dasas）、达荼罗族人（Dasyus）和巴尼亚人（Panias），即“黑皮肤的人”或“奴隶”（这让人想起早期英格兰人称呼他们邻居威尔士人为 weallas，字面意思是“奴隶”）。很显然，达萨人是更早的原住民。他们“牛羊成群”，加工黄金，修建堡垒和城市，但是在语言、相貌和肤色上与雅利安人相去甚远。他们还是“男性生殖器崇拜者”，这一点尤其让雅利安人感到厌恶。《梨俱吠陀》也暗示雅利安人和达萨人之间长期相互影响，有时候和平相处，有时候兵戎相见，导致城市和堡垒遭到破坏。我们不禁要问，达萨人是什么人呢？

以上就是最早的梵语文献所记载的故事，是1921年以前人们对印度文明起源的全部认知。从这一年起，在信德和旁遮普——即《梨俱吠陀》中所说的“七河地区”——展开了首次科学考古挖掘工作。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印度古典文化、印度教起源于雅利安人：这种看法无疑深受西方理论——印欧人种族和文化优越论——的影响。直到那时为止，大家仍旧不相信印度还有比雅利安文明更早、与古代伊拉克和埃及同样古老的文明。然而，这恰恰是1921年到1922年间的考古挖掘所证明的，印度历史由此回溯了好几千年，从而成为众所周知、现今依然富有生机的最古老文明。

印度河流域消失的城市

1920年，在印度考古学家达亚·拉姆·萨尼（Daya Ram Sahni）指导下，顺着亚历山大·坎宁安留下的线索，挖掘工作在哈拉帕展开。尽管布伦顿的掠夺造成了很大破坏，不过，最初的顺藤摸瓜式挖掘还是发现了更多图章，它们与19世纪50年代找到的一样。遗址上面几层说明居住者生活在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下面几层显然是史前时期的，至于到底有多古老，大家对此争论不休。

1921年，班纳吉（R.D.Banerjee）在南部信德地区开始发掘一个巨大的遗址：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即“死亡之丘”。1世纪时，人们在摩亨佐－达罗修建了一座砖结构的佛塔，显而易见，这是一处佛教遗迹，正是班纳吉所期盼的。他很快发现一些史前文化遗迹，它们与1920年在哈拉帕出土的完全一样。城堡位于当地人所谓的“岛屿”上，方圆1平方英里，受到恒河大洪水的侵蚀，它与东郊之间已经被恒河水流洗刷出一条通道。

这座城堡长约450码，可能建有防御工事，城内有一系列宗教或政府建筑，包括一座大型的由圆柱支撑的大厅和一间巨大的谷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带有浴室的柱廊式水池，40英尺长、23英尺宽、8英尺深，这让人想起现在遍及印度、用于宗教仪式的浴池。与浴室相连的是一座很大的“学院”（挖掘者是这么称呼的）。神庙（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位于山顶佛塔下面，一直没有被移动过。近郊是宽阔的街道和宏伟的住宅，每个区都有水井和公共厕所，下水道很宽，人们可以在里面行走。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文化比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更先进。挖掘者还在摩亨佐－达罗发现伊拉克图章，这表明它的鼎盛期与苏美尔城市大放异彩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

人们对摩亨佐－达罗的某些方面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它统一的红砖样式。挖掘者指出：“任何人第一次从中穿过时，都可能误以为自己周围是兰卡郡某座正在施工的城市的废墟。”这里很少有外部装饰和人物雕像，街道整齐划一、规则有序。挖掘的总结报告称之为“十足的实用主义”，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不同于现代印度。不过，也有明显迹象表明它与稍后印度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图章上面刻有神圣的树木和动物，包括母牛和公牛，我们今天依旧可以看见公牛在印度集市穿行而过，不受侵犯。母亲女神的泥制模型与印度现在制作的那些很相似。玩具牛车则在如今的旁遮普地区的路边随处可见。最显著的是，图章描绘了一个圣人，他头戴鹿角冠，手臂上缠满手镯，以一种瑜伽姿势在鹿皮宝座上打座，周围有一大群野生动物。挖掘者还相信这个人物有三副面孔，并且男性特性明显，不过，由于图章很小，这些细节部分很难辨认。这些特征非常类似于中世纪和现代印度教的伟大神灵湿

婆，考虑到湿婆“万兽之主”的身份，人们更加相信这一点。最近，有人开始质疑两者之间的联系，不过，他们提出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圣像画不会历经几千年而丝毫没有变化，象征符号也不会始终表示同一个意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图章中那个形象是“原始湿婆”——或许是他化身为公牛神——这一点似乎不可否认。

因此，与伊拉克和埃及一样，印度也创造出一种伟大的青铜文明。这种文明同样发展出了文字。它与晚期历史的联系依然是一个难题。最大的谜团是文字本身，这也是鉴定印度河民族的关键所在。一些文字通过刻在许多图章上而保存下来。但是，这些雕刻只是一些字母而已，这使得破译工作变得相当困难。事实上，这些文字直到今天还没有被解码出来：这是考古学最大的谜题之一。

印度河文明

最近几十年，人们对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文明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知道了1000多个定居点：从阿富汗到德里，从喜马拉雅山山麓到孟买，这相当于整个西欧的面积，比早期伊拉克或埃及大很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片巨大的区域，似乎存在着文化、艺术、文字和技术（甚至是度量衡）的统一性。现在，人们认为，最大的城市摩亨佐－达罗的人口可能达到8万，如果存在国家的话，整个国家的人口有500万。与伊拉克和埃及一样，这里的文明也依赖河流灌溉系统。印度河每年泛滥，平原成为泽国。洪水过后，人们在冲积平原上种植小麦、大麦、水稻和棉花。在人类历史上，棉花的最早种植，似乎开始于信德地区（因而，它的希腊名是sindon）。

印度河文明也依靠远程贸易，棉花、硬木、象牙和贵金属被输送到乌尔这样的苏美尔城市。公元前2000多年，印度河地区的商人还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苏美尔发现的图章通常带有货物印章标志。而与波斯湾地区的贸易，则是印度文化最古老的国际联系之一。一本大约1世纪60年代的希腊商人手册中描述了檀香、乌木、棉花、香料和珍珠从古杰拉特（Gujerat）运送到波斯湾的情况。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统治期间，这些产品依旧是巴士拉与印度之间相互贸易的重头戏。印度与伊拉克之间的贸易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今天。

更久远的起源：俾路支省的新发掘

梅尔伽赫（Mehrgarh）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奎达（Quetta）附近，最近30年在这里开展的挖掘工作，改变了人们对印度河城市起源的认识。在这里，印度河地区连续定居生活的历史回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比哈拉帕繁盛时期早了4000年，与农业社会在近东——从巴勒斯坦到伊朗——的形成处于同一时期。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没有在印度发现早于公元前3000年的农业证据，这进一步说明梅尔伽赫挖掘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些发现不仅仅揭示出印度河河谷农业经济异常古老，也揭示了手工艺的专门化（包括滑石切割技术）和远程贸易（绿松石和青金石贸易）的存在。在公元前5000多年，梅尔伽赫的建造者就开始使用我们后来在印度河流域诸多城市看到的长条形平凹砖头，并开始种植棉花。在公元前3000多年，这座小城是一个更大的共同文化区域的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区一直延伸到伊朗。大约公元前2500年，因为一座更大的城市在5英里之外的瑙舍赫罗（Naushahro）兴起，它被废弃了。这座新城市拥有巨大的砖砌

防御工事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神庙。这个时候，正值哈拉帕时代。

这些新发现明确无误地表明，印度河文明是一种印度现象，源于印度本土的史前文化，而不是以前所认为的，受到来自伊拉克的文化观念的启发而产生。如果不是雅利安印欧人种的话，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又是谁呢？他们是《梨俱吠陀》所说的达萨人吗？有关于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全新的图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表明，伊朗前雅利安时代的古语，即埃兰语，与今天印度南部人们依旧在说的古老达罗毗荼语（其中最著名的是泰米尔语）属于同一语系。这些语言源自伊朗和印度西北部（像梅尔伽赫这种村庄）一种史前语言，事实上，在巴基斯坦西部靠近伊朗的一小部分地区，人们还在说一种相关的语言，即布拉灰语（Brahui）。人们猜测，最初的语言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农业出现之后）发生分裂，这一点从埃兰语和达罗毗荼语的共同词汇上可以看出来。大约公元前3000年，埃兰语还在伊朗早期城市得到使用，到了10世纪时，人们已经不再说这一语言。而在印度南部，今天依然有超过2亿人说达罗毗荼语。

上述现象对整个印度早期历史而言，显得意义非凡。它表明达罗毗荼语并不是印度南部的本地语，而是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之后，经由古杰拉特从俾路支省传播到南印度的。早期的达罗毗荼人发现，当地古老的部族仍然居住在一直绵延到安德拉和奥里萨的森林里，依然保留着更加古老的宗教形式和社会组织。在南部扎根之后，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达罗毗荼人才开始修建城市并重新发现文字。

在证明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后，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很显然，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时代，印度河河谷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在使用一种与现代泰米尔语相关的早期达罗毗荼

语。因此，就像学者们一直猜测的，图章上未解开的文字很可能是达罗毗荼语。其他一些迷人的证据也支持这种猜想，包括从今日古杰拉特发现的相似的达罗毗荼语词汇，到印度教保存下来的、源于达罗毗荼人的宗教习俗。我们可以以一个很小的细节为例：在印度南部城市马杜赖，该城女神米娜克什（Minakshi）以鱼的形象出现在印度教朝圣者的房间里，鱼身上还刻有星星。她的名字源自泰米尔语最古老的含义："min"是"鱼"和"星星"的意思，这两者又是神圣性的古老象征。这种结合还体现在哈拉帕的陶器和图章上面。信德的穆斯林香客房间也有这种形象，只不过鱼身上刻着穆斯林的信条——所有这些都不可思议地证明了历史上宗教象征符号的韧性。

在哈拉帕考古挖掘80年之后，所有的线索开始汇合在一起。印度河文明差不多是达罗毗荼语文明，它的文化与伊朗埃兰语世界联系紧密，并且与今日印度南部的文化遥遥联系在一起。大约公元前1700年，印度河文明衰落了，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降雨量突然减少以及远程贸易的中断。尽管一些小城镇一直持续到后来，大城市还是变得荒芜，与此同时，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在征服伊朗之后，又向奥克苏斯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山地扩张。在经过漫长历史时期之后，他们成为信德和旁遮普地区文化和语言的主导者，并且完全同化了说达罗毗荼语的当地人（《梨俱吠陀》中的梵语外来词证明了后者的存在）。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雅利安人扩张到恒河与朱木拿河河谷，他们焚烧森林、修建住宅区、耕种土地。这个时候，达罗毗荼人的语言和文化传播到印度南部，这里的文化可以一直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这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印度古典文明出现了。尽管这是一种试探性重建，不过基本轮廓无疑是正确的。

英雄时代

印度河文明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或许在长达一千年时间里，印度没有真正的城市生活。印度北部是农村社会，由诸多沿河谷定居的雅利安酋长统治，周围是大片森林，本地居民——原住民（Adivasis）——住在森林里，他们的部族后人直到今天还居住在那里。种姓制度很可能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种制度是社会分离的一种形式，建立在精细复杂的等级制之上：从最高等级婆罗门（僧侣阶层）到最低等级“贱民”（处理与死人相关的事情）。种姓（varna）的最初意义是“颜色”，或许种姓制度的初衷是区分白皮肤的雅利安人与黑皮肤的当地人。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的创作年代虽然晚了许多，但是它保存了这个时期的真实传统。该作品描述了恒河地区好战的雅利安人：他们彼此洗劫城堡，劫夺妇女、牛羊和珠宝，这种状况非常类似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的英雄时代。在某些情形下，现代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个基本神话。《摩诃婆罗多》中俱卢族人（Kaurava）的首都，正是恒河岸边的哈斯丁纳普尔（Hastinapur）。20 世纪 50 年代的挖掘表明，该城市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被洪水毁于一旦。此外，一本梵语宗教文献对此也作了记载，根据该文献的叙述，这件事发生在《摩诃婆罗多》描述的巨大战争之后第七个国王统治时期，而这场战争可能爆发于公元前 900 年前后。那个时期的一些传统非常富有生命力：《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战场——俱卢之野（Kurukshetra）——现在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朝圣地。

《摩诃婆罗多》也表明，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印度宗教地理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它的规范保留至今。事实上，印度这个概念，即由朝圣而统一起来的祖国，可能就来自这个时期。这部史诗有一张表

单，上面包含了270个圣地，它们遍布整个国家。表单最后一个圣地最为著名，它就是钵罗耶伽（Prayag），即今天恒河与朱木拿河交汇处的安拉阿巴德（Allahabad）。

安拉阿巴德每年都举行重大的宗教节庆，在每20年举行一次的大壶节期间，这里有世界上最盛大的宗教集会。1989年2月，在那个最吉祥的夜晚（指2月12日夜晚——译注），1500万人汇集于此，而在为期一个月的节日期间，来到这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644年，来自中国的佛教徒、朝圣者玄奘就亲眼目睹了50万朝圣者的集会，他还被告知，这种现象古已有之。一些迷人的新发现解释了为何钵罗耶伽尤为圣洁，可以成为“圣地之王”。就像埃利都、德尔斐或库斯科[2]，人们把钵罗耶伽视为地球的中心，神话中宇宙创世之地，泉水由之冒出的原始土丘（在大壶节的安拉阿巴德，在恒河洪水退却之后，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现象）。这里有一根古老的祭祀柱，立于天地首次分开的地方。与埃利都一样（或者与《圣经》中伊甸园一样），这里也有神圣的“生命树”。644年，玄奘亲眼见过这棵树，它一直活到17世纪，不过，现在只剩下树桩。在史诗年代，即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钵罗耶伽最主要的祭拜神庙位于一个岛屿上。尽管恒河在历史上改道多次，不过，该岛屿的轮廓现在依然清晰可见。岛屿北端是一座用来祭祀保护生命之树的原始灵蛇的神庙。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座神庙，就其功能而言，该神庙在印度绝无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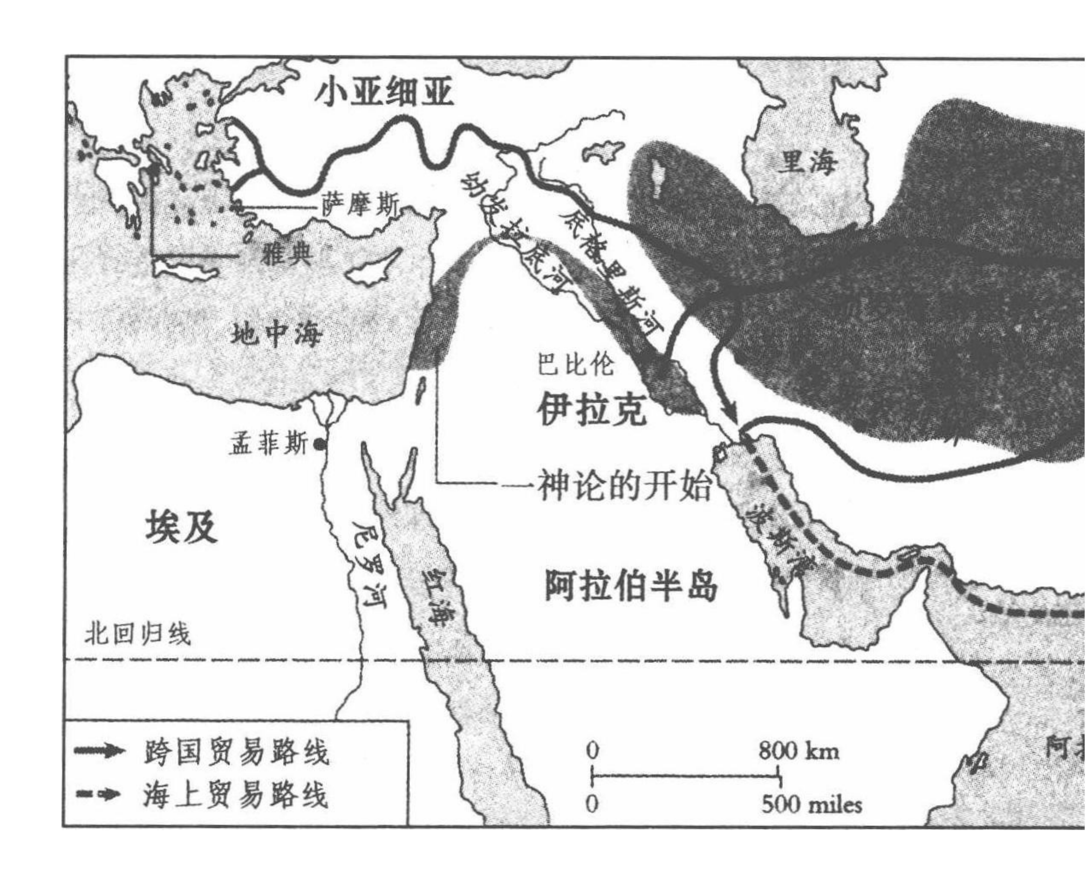
恒河文明

大约公元前600年，恒河河谷出现了许多定居王国，大城市再次在印度建立起来。其中一些城市修建了壕沟和城墙防御体系。安拉阿

巴德附近的憍赏弥城（Kausambi），有 5 英里长的城墙、11 道城门以及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城墙使用规格一致的窑砖，它们巨大的堑壕斜坡与哈拉帕的非常类似，尽管我们很难想像这种传统是如何直接传承下来的。这些城市是远程贸易的重要中心，公元前 6 世纪时这里出现了精神和思想上的繁盛景象。在这个辉煌而令人振奋的时代，有一个城市成为焦点，这就是贝拿勒斯（迦尸），又被称为“光之城”。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印度最伟大的知识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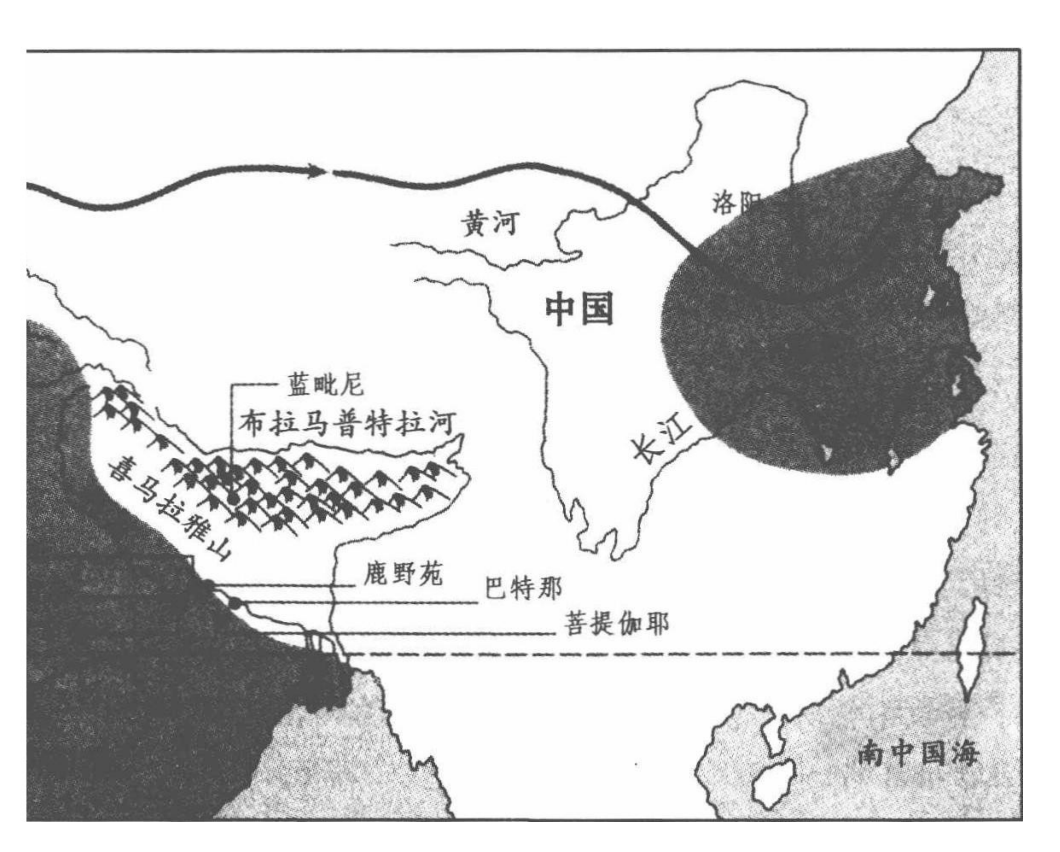
我们对贝拿勒斯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根据考古记载，这块高原上有一道公元前 8 世纪遗留下来、被大火烧毁的砖墙和壕沟，贝拿勒斯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1887 年，英国人在此修建他们的铁路桥。直到中世纪，它才顺着恒河向南发展成为今天宏伟壮观、绵延 3 英里的城市。到公元前 3 世纪，人们称贝拿勒斯为“印度第一城”，此时它也成为湿婆的城市。除了印度河河谷的一些证据之外，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湿婆的起源依然是一个谜团，或许我们应当从印度北部本地人的史前文化来寻求答案。最近，在安拉阿巴德南部发现的一座女神神庙，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11000 年，其建造风格与现在一些部落所采用的一样，它暗示印度传统宗教非常古老。在这座神庙里，中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描绘了一位翩翩起舞的萨满教僧人，他头顶鹿角冠、戴着镯子并且手拿三叉戟，这个形象非常类似于湿婆，这间接表明湿婆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

公元前 6 世纪，恒河地区的城市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思想和宗教成就。文字随着印度河城市一起消失很长时期之后，现在又重新得到使用。新的文字，即婆罗米文（Brahmi），经由波斯帝国的文字被创造出来，并且成为印度后来一切文字的先祖。大量学科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天文学、几何学、语法学、语音学、语源学，尤其是宗教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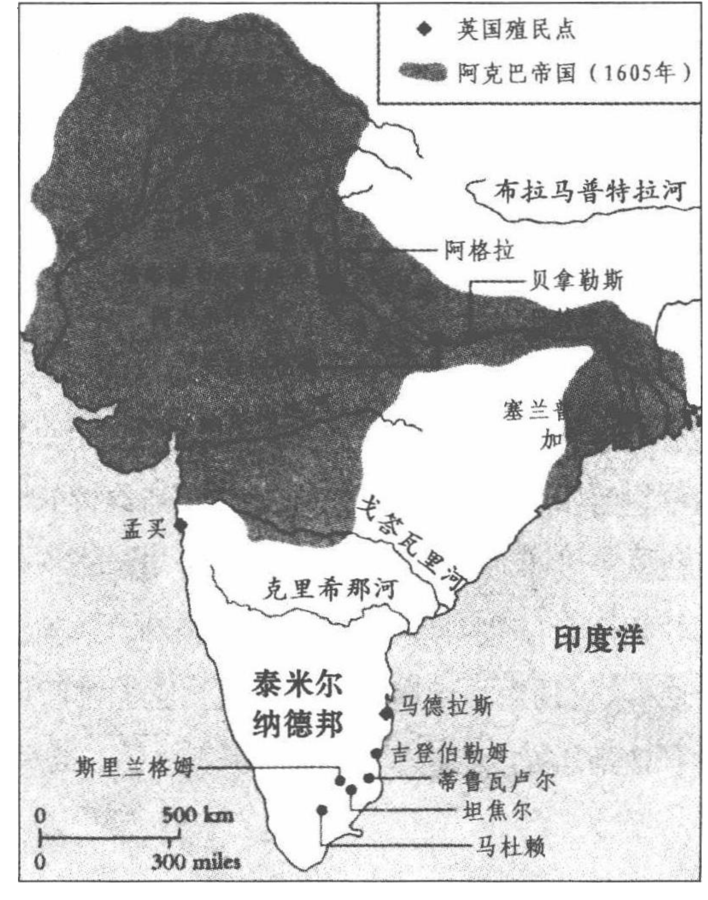


上图：轴心时代（大约公元前500年）。公元前500年前的几十年，佛陀和大雄生活在印度，孔子（或许还有老子）生活在中国，希伯来伟大先知生活在巴勒斯坦和巴比伦尼亚，同时代的还有希腊早期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及雅典民主制的奠基者：青铜时代的精神遗产正受到重新评价。

右图：中世纪印度，阿克巴统治下的莫卧儿帝国。南印度依旧依据自身的方式发展，正如朱罗王朝统治（大约900年到1300年）以及更早时期那样：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和语言划分。



黄河
洛阳
中国
蓝毗尼
布拉马普特拉河
喜马拉雅山
长江
鹿野苑
巴特那
菩提伽耶
南中国海



英国殖民点
阿克巴帝国（1605年）
布拉马普特拉河
阿格拉
贝拿勒斯
塞兰普
加
孟买
戈答瓦里河
克里希那河
印度洋
泰米尔
纳德邦
马德拉斯
吉登伯勒姆
斯里兰格姆
蒂鲁瓦卢尔
坦焦尔
马杜赖
0
500 km
0
300 miles

哲学。这是对创世进行大量思考的时代，《奥义书》代表着这种思考的顶峰，它是印度留给世界的著名遗产之一。印度文明源自雅利安人来临之前的古代泛灵论以及雅利安人的献祭宗教，并且发展为最精细的思考。时至今日，这种探究精神一直没有中断，这也是印度文明的鲜明特征。

各种不同的宗派兴起于明显而深刻的精神动荡之中，尤其兴起于城市新兴商人阶级，这些人对雅利安人的宗教毫无兴趣。他们拒绝雅利安人的多神祭祀，大多数人也反对种姓制度和宗教仪式。在这类思想家身上体现出对宇宙自然法则的认可，他们非常类似于同时期希腊爱奥尼亚（Ionian）自然哲学家。他们的领袖是无神论者、理性主义者、怀疑论者以及彻底的唯物论者，如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in），他断然拒绝一切来世观念。卡萨帕·卡卡亚纳（Kassapa Kaccayana）信奉原子论，声称一切变化皆虚幻，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希腊人，比如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所有这些思潮都存在于中世纪和现代印度教之中。不过，恒河文明最主要的两场宗教运动属于耆那教徒和佛教徒。

佛教与耆那教

大约公元前500年，在喧嚣繁华之地贝拿勒斯4英里之外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子正在讲授佛法，他所宣讲的一切将改变整个世界。这位王子名叫乔达摩，不过，与他的追随者一样，我们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他声称：“我已经领悟到，人类的苦难必须得到理解。”他为永恒的生命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并且完全是印度式的。他指出：“对感觉和物欲的迷恋，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

抛弃这些欲望，你就会找到救赎之路。”这种凄凉的、本质上而言无神论的学说，将会传播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它现在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

佛陀（公元前563—前483）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耆那教最后一位祖师大雄（Mahavira，死于大约公元前477年）是他的同时代人。与佛教一样，从根本上而言，耆那教也是一种无神论宗教，神的存在与信仰无关。对耆那教徒来说，宇宙万物都有灵魂。因此，他们奉行一种严格的非暴力和素食主义传统。不过，与佛教不一样，耆那教在印度形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在印度西部商人社会尤其如此。有些人推测，归根溯源，耆那教来自（不管多么间接）印度河商人社区。它生机勃勃，流传至今：大雄的学说在甘地的伦理主张中得到反复使用，甘地出生于古杰拉特班尼亚种姓[3]商人家庭，自小受到耆那教文化的熏陶。

佛教和耆那教都拒绝婆罗门文明及其种姓划分和献祭仪式（以及印欧人中男性神的等级制度）。它们代表了从《吠陀》的魔幻神秘思想向新的理性的过渡，这种理性体现在佛陀“四谛”和通往救赎的“八正道”学说上，这些拯救又基于个人的道德和行动。这两种宗教都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在佛陀看来，人生就是一系列无法忍受的苦难，要想摆脱它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弃绝世俗的欲望。这是印度对人类状况的显著看法，就好像希腊悲剧和哲学表达的人生观一样。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佛陀在他的鹿园菩提树下打坐时，这位“万兽之主”就好像印度河图章上神秘的“原始湿婆”，我们不禁想知道，这个断然拒绝物质世界的人物，可以回溯到印度多么遥远的过去。

佛陀在这个时刻降生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把佛陀生活的时代——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称为轴心时代，因

为世界历史上许多伟大思想家生活在这个时期：印度的佛陀和大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早期希腊哲学家；《旧约》的伟大先知，尤其是“第二以赛亚”；中国的孔子和老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碰过面，这种想法无疑非常美妙。这种生活年代的一致性表明，发源于伊拉克、埃及、中国和印度早期文明的古代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人们提出许多关于上帝的本质、尘世生命的意义，以及国王和国家权威的基础的根本问题。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今的政府，即便美国和西欧这种复杂精妙、以技术治国的社会也不例外。当宗教法令失去教导和威慑力量之后，更是如此。你如何说服你的同胞遵循道德？你如何说服他们仁爱有加、乐善好施？这些早期文明提供的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方法，还在影响着它们的后代，即今天的我们。近东走上一神论道路，这也将成为西方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核心。中国奉行儒家学说：个人、家庭和国家构成世上完美的道德秩序。印度的伟大传统宣称，迷恋世俗的物质生活终究只是虚幻，只有抛弃它才能真正觉悟。这恰好与西方思维相反。时至今日，这些伟大文明的社会和经济特征，依旧受到那个革命时代的影响。

孔雀王朝

公元前 4 世纪，孔雀王朝首次尝试在印度实现政治统一。也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人第一次对印度作出了描绘，这是希腊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功劳。孔雀王朝的首都位于恒河边上的巴特那（Patna），希腊人抵达这里之后，这座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让他们目瞪口呆。该城呈长方形，有 22 英里长，建有 570 座塔、64 道城

门，人口40万：比鼎盛时期的罗马更壮观。他们还惊奇地发现，与希腊不一样的是，印度并不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尽管组织严密的政府与今日巴特那舒适的无政府状态相去甚远。麦加斯梯尼拜访过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的宫廷，据说这位国王是一位耆那教徒，退位之后斋戒而亡，就像耆那教传统中伟大圣人所做的那样。他的孙子阿育王进一步扩张领土，印度大部分地区成为帝国版图。不过，阿育王35年的统治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并不是因为他的征服活动。我们可以根据阿育王自己的话来复原他的故事，他的言论刻在许多石柱碑文上，比如憍赏弥（Kausambi）的石柱碑文。憍赏弥今天依旧是来自朝鲜、日本和西藏佛教朝圣者朝拜的对象。根据阿育王自己的说法，在奥利萨（Orissa）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之后——在这场战争中，他消灭了10万人——他开始确信战争是错误的。于是，他转而信奉一种一直流传到圣雄甘地时代的观念：非暴力。他声称："从今往后，我只凭借正确的行为来征服"。

阿育王要求把他颁布的法令刻写下来，这种法令遍及印度各地——从开伯尔（Khyber）到南部的德干，并且通常刻写在古代印度教的宇宙柱上。这种柱子早就存在于古老圣洁的地方，如钵罗耶伽和鹿野苑（Sarnath），佛陀正是在鹿野苑开始弘扬佛法的生涯。事实上，这些古老象征被转变为道德柱，从而解释了正法（dharma）——"正确行为"——这一教义的真实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基于宗教权威的认可。它是一个世俗的理想，关乎人类的尊严和人文主义公民道德的可能性，它的基础是佛陀关于"正确思考"的八正道，以及耆那教的非暴力信仰。阿育王宣称："我尊敬各派信徒"，"不过，在我看来，'经由个人自由意志的方法'是最根本的。"立法柱上是一些

现代政客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文字：同情、宽容、温和以及真诚。非暴力的条文禁止吃肉，并且保护所有动物：从鹦鹉到白蚁，从恒河豚到犀牛。阿育王像先知预言般说道："我们不得盲目烧毁山林。"在我们看来，阿育王的生态观念和保护措施非常现代，不过，这无疑也是一种误导性看法。他广泛的社会和福利立法活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人们也会发现一种祸害现代的不祥事物，即国家的大量干预，以及一群群密探和思想监控者严格监视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当时的一些人肯定也有这种感受。阿育王是那个非凡时代——轴心时代——的产物，他远离宗教和巫术权威，以理性和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与希腊民主制度、美国《人权法案》以及《共产党宣言》一样，阿育王的"正法"概念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尽管他没有完美地践行这一理念。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行将结束时，期待这个理念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情有可原的。1948年，印度获得独立，鹿野苑阿育王石柱狮头被用作印度的国徽和象征。这再合适不过了。

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阿育王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延续下来，不过，他的帝国为印度打开了海上交通要道。在印度财富的吸引下，地中海地区的商人在季风中蜂拥而至。经由港口城市，如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科钦（Cochin），阿拉伯商人把印度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发明传播到西方，其中包括印度最卓越的发明，即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十进制。不过，香料才是贸易的真实动因。

许多世纪以来，外国商人在科钦贸易港购买马拉巴海滨出产的著

名香料，尤其是胡椒和生姜。事实上，这两个名词起源于印度南部的词汇。这种联系有助于形成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喀拉拉邦现在仍然属于这种社会。许多外国商人来这里定居，成为印度人，但仍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喀拉拉邦回水湾（backwaters）众多溪流的上游，随处可见他们居留的痕迹。据说犹太人在公元前6世纪从伊拉克来到喀拉拉，希伯来语《圣经》中的泰米尔语和梵语外来词汇，表明这个传说可能是真实的：犹太人无疑在罗马时代来到这里。科钦附近的伯鲁尔（Parur）有一座犹太教会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犹太教会堂之一。这座会堂现在由一个家族负责管理，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们格外慎重，并且尽其所能提供最好的服务。最近，当地女孩在皈依犹太教之后嫁入这个家族，由此可见，他们希望自己的传统能够延续下去。在伯鲁尔附近的岑德曼格拉姆（Chendamangalam），那里的犹太教会堂已经关闭。不过，旁边一座叙利亚基督教堂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些基督徒声称他们的教会是使徒多马亲自建立的。据说，在9世纪，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曾从遥远的、维京时期的英格兰赶来救济这片海岸的居民。7世纪，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人经由海路来到这里，不过，这次是和平光临，而不是通过武力和征服活动侵入。今天，在一座带有浴池、由木柱支撑的小型清真寺里，村里的穆斯林小孩在背诵学习《古兰经》中的经典阿拉伯文。因此，在今天的岑德曼格拉姆，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犹太教徒相邻而居。《薄迦梵歌》中黑天（Krishna）说道："所有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不管他们选择哪种崇拜形式来满足他们的渴望，归根结底，他们的宗教崇拜同宗同源。"

伊斯兰教的来临

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是印度本土宗教，正如我们所见，它们都吸收了印度更深厚的传统。它们（尤其是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各地。到9世纪，佛教事实上在印度已经消失了，很大原因在于，佛教的观念被一些改革家——其中包括来自喀拉拉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哲学家商羯罗（Adi Shankara）——重新吸收到主流印度教思想当中。此后，人们通常会发现佛陀出现在许多印度城市的礼拜堂，成为毗湿奴的化身之一。与此相反，耆那教能够在印度教传统中生存下来。伊斯兰教的来临是一次革命性事件，打断了印度与其本土宗教体系的古老联系。就人数和重要性而言，伊斯兰教将成为印度第二大宗教。

7世纪末，穆斯林商人顺着阿拉伯船员使用的古老航线来到印度河和喀拉拉，伊斯兰教也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印度。人们认为印度最古老的穆斯林社区位于喀拉拉，穆斯林信仰也很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在印度北部，伊斯兰教的影响完全不一样。穆斯林史学家阿尔·比鲁尼（Al Biruni）写道："印度遍地黄金，绝对美不胜收、令人愉悦，这里的人们大多数是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我们以真主之名征服他们无可厚非。"在这位预言者死后几十年，伊斯兰教向西扩张到西班牙，向东扩张到印度河河谷。711年，信德沦陷。此后，最年轻和最古老的信仰之间爆发了长期而残酷的战争。穆斯林的攻击最终粉碎了印度北部诸多古老的印度教王国。1194年，贝拿勒斯失守。此后几个世纪，该城许多著名印度教寺庙受到洗劫并被拆毁，在印度北部圣城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宽容时期结束，德里和德干的中世纪穆斯林苏丹统治者一轮又一轮的迫害接踵而至。这些悲剧事件导致印

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这两种信仰充实了印度，但是今天却又威胁着它的团结统一。等到苏非派传到信德，意味着印度伊斯兰教最丰富的一种思潮的开始。该教派对印度整个宗教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依然如此。印度伊斯兰教也适时“印度化”：在印度，穆罕默德的生平可以演变为印度教黑天的故事。在繁荣的什叶派社区——它们在勒克瑙（Lucknow）这种城市发展起来——卡尔巴拉的殉道者伊玛目·侯赛因被描绘成毗湿奴下凡。

在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穆斯林成为经济的中流砥柱。几千个拥有小商店和手织机的丝织工都是穆斯林。15 世纪，贫穷的织工伽比尔（Kabir）正是在这里宣讲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博爱精神。伽比尔生于贝拿勒斯一个穆斯林社区，他取的是穆斯林名字，但是，他一生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印度教毗湿奴信众以及他们的宗教虔诚运动。他们认为真主（伽比尔称之为“喃”，而不是安拉）就是爱：“阅读一本又一本书籍，整个世界已经消逝。从来没有人博学多才。谁能够哪怕仅仅解读‘爱’的一个音节，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博学家。”

与其他许多伟大的宗教思想家一样，伽比尔也拒绝一切外在的宗教仪式。就他自己而言，就是拒绝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外在仪式。他反对穆斯林的祷告仪式和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反对穆斯林的麦加朝圣和印度教的贝拿勒斯朝圣，反对穆斯林的割礼和婆罗门的圣线礼（将妇女排除在外的有趣场合）。他认为这些都妨碍了真正的宗教表达。在他看来，真正的宗教是个人体验问题。伽比尔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追随者。不过，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由于宗派主义的缘故，这种伟大人物的遗产通常变得固执己见。现代伽比尔派认为他们自己是印度教徒，尽管他们维持一神论信仰和彻底的道德礼仪，并且也反对种姓制度和偶像崇拜。伽比尔结束宗教分裂的努力，是中世

纪最彻底的草根尝试，这种努力以一种典型的印度方式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

于是，伊斯兰教成为印度多样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改变印度和印度教的同时，它自身也被改变。印度有1亿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分离出去之后仍然如此。这些重大事件现在依然产生影响。1950年的世俗宪法以欧洲为模板，旨在结束历史上古老的伤痛和憎恨，但是，不管好坏，宗教在印度依然是强大的力量。自独立以来，印度依旧没有摆脱教派纷争的困扰。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尘埃落定之际，不同教派（或社会阶级）争吵得越来越厉害。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暴乱，在贝拿勒斯古老的穆斯林街区，织工的商店遭到打砸。数以千计的织机被砸碎，多人死伤。印度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理想经历着新的考验，而现在的印度似乎正是从这种考验中走过来的。

莫卧儿帝国

16世纪，印度北部兴起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混合文化，催生了印度文明史上另一个辉煌成就：穆斯林的莫卧儿王朝。莫卧儿人来自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高原，他们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中央集权帝国，这个帝国为后来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以及现代印度奠定了基础。

莫卧儿帝国创造出的艺术和建筑，今天依旧决定着我们对印度的普遍印象：印度教特征、波斯风格以及穆斯林因素华丽地组合起来，尤其体现于泰姬陵和阿格拉（Agra）附近的古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后者由阿克巴大帝于1569年建造。身为皇帝和最高统帅的阿克巴大力赞助艺术和文学，委托一些人将《摩诃婆罗多》

以及其他许多精美插图手稿翻译成波斯文。像他之前和之后的印度统治者一样，阿克巴认识到，统治印度的唯一方式，或者说统治任何一种文明的唯一方式，在于宽容和多元主义。他逐渐被印度各种深厚的思想传统所吸引。

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最令人着迷的事情，莫过于他试图统一帝国境内的不同宗教。或许，这种做法只会发生在印度狂热的宗教氛围当中。这一事件之所以更加引人关注，原因在于，阿克巴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并且目不识丁，他的导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个糟糕的学生。宗教不宽容带来的可怕罪恶，给阿克巴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也是出于政治考虑，他把各派神职人员召集到一起，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甚至包括来自波斯的曼底安派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阿克巴希望通过他们的讨论来形成一种对神的简单信仰，一种“关于正确行为的学说”。令人惊奇的是，虽然阿克巴根本不了解阿育王，似乎对佛教也一无所知，这种学说却与阿育王的主张遥相呼应。阿克巴甚至准备承认素食主义的正确性，尽管作为一个喜好吃肉的莫卧儿人，他无法亲自践行这一主张。阿克巴希望，对神的这种信仰，能够为宗派林立的帝国精英提供一种简单明了的基本道德指南。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故事的所有线索在一件不同寻常的偶然事件当中汇集在一起，这件事直到晚近才被人们了解。1575 年 1 月，在著名的沐浴节期间，阿克巴与他一位关系密切的印度教顾问游历“圣城之城”钵罗耶伽。阿克巴已经开始发起一场新的“信仰真神”的运动，现在，他把钵罗耶伽重新命名为伊拉赫·阿巴斯（Ilah-abas），这是阿拉伯和印度教的组合词，意思为“神之领地”。阿克巴是不是故意选择印度教神话中原始创世之地作为新宗教中心呢？与阿育王的“正法”一样，新的正法

也会在宇宙中心（这里有宇宙轴心和生命树）得到宣布和保证吗？值得注意的是，阿克巴后来在安拉阿巴德（钵罗耶伽后来的名字）“阿育王”立法柱以及“生命树”周围修建了一座巨大城堡。他的房间建造在圣树上方，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由此可以眺望一个地方，“最令人惊奇的是，当木星落在水瓶座时，一座小山丘从恒河显现，持续1个月之久，人们就在这里祭拜”。

一位廷臣兼友人指出，阿克巴的一大品质使他的统治变得真正伟大，即“以嘉许的眼光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们”。他的宽容即便在今天也显得不同凡响，而在16世纪只能用令人震惊来形容。西欧在当时因宗教战争而四分五裂，各派以上帝的名义对人们犯下累累暴行，让人难以启齿。阿克巴真诚希望通过结合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来表达神。或许他的动议和努力注定会失败，但是，阿克巴对印度未来困境的洞悉，一直延续到尼赫鲁和甘地，甘地坚持认为“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胜利之门”，这位穆斯林王朝显赫一时的伟大人物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神秘碑文：“撒播和平的耶稣如是说：‘世界如桥，穿过而不得在其上修建房舍，世界只存在1小时，用来祈祷吧，其他一切都是不可见的’。”

由于缺乏水源，阿克巴的梦幻之城成为荒芜之地。今天，法塔赫布尔西格里静静伫立在阿格拉附近干燥的山冈上，俯瞰着一片被烈日烘烤的红色平原。他的帝国创造出统一国家，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享受同样的权利。一个依仗武功的帝国最终顺服于一个精神帝国。阿克巴声称：“让人感到羞耻的是，我们过去强迫印度教徒接受我们先辈的信仰。现在，我很清楚，在这个冲突不断、多灾多难的世界，宣扬只有一种信仰的独特真理才是唯一真理，并且要求其他宗教的信徒接受它，无疑是愚蠢的做法。明智之士以正义为指引，无门户之见，

博采众家之长。或许，只有这样，早就丢失了钥匙的大门才能被重新开启。”

达拉·舒科：遗失的梦

阿克巴去世50年之后，在印度中心地带，他的两个曾孙为争夺遗产而发动战争，这场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核心问题在于印度伊斯兰教应当采取何种发展道路。年长的达拉·舒科是激进的苏非派教徒，不但受到伊斯兰教最富争议的人物哈拉智的影响，也受到印度教《薄迦梵歌》的影响。年轻的奥朗则布接受的是教法主义者和正统苏非派的教育，他大大推进的这一改宗教派，促使克什米尔和孟加拉的一些印度教徒改变了信仰。

达拉比阿克巴走得更远。作为精通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典籍的学者，达拉认同《古兰经》的启示，即真主向所有民族派出了信使，并且为他们提供了经卷（就好像黑天在《薄迦梵歌》中所说的一样)。达拉坚持认为，向其他宗教学习是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古兰经》第56章“启示书”无非就是《奥义书》：一神论的最初核心。达拉还把《薄迦梵歌》和《奥义书》的一些篇章翻译成波斯文。1802年，他的译本在巴黎被翻译成拉丁文，成为印度神秘主义传入西方的组成部分，激发了布莱克和叔本华等人。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达拉宣称，他的翻译旨在阐明《古兰经》的启示，而不是贬抑它。他撰写了《穆斯林圣徒传》以及一篇论述比较宗教的论文，即《两大洋的汇合》。他在文中力图证明，苏非派与印度教神秘主义的专门词汇是对等的。

毋庸赘言，这种综合性知识难以与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说

并存。对正统派来说，《古兰经》的知识是完美的，无须增删，恰到好处。奥朗则布觉得哥哥达拉已经“成为背教者”，劝说法学家公布达拉这一罪名，因为他宣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孪生兄弟”，并且还有其他不敬言论。达拉在与奥朗则布的内争中败北，于1659年被谋害。作为统治者，奥朗则布很有天赋，但是，他的长期统治（他死于1707年）给印度教徒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奥朗则布毁坏了大量印度教神庙，包括贝拿勒斯最壮观的湿婆和毗湿奴神殿，这件事情现在被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死死抓住不放。

事实上，阿克巴和达拉·舒科的实验并非一无所成：一些印度苏非教派改变了对印度教的态度，允许富有成效的相互作用，就好像中世纪巴克蒂[4]颂歌诗人所做的那样。如果这些著名的莫卧儿人取得了成功，那么印度教更有可能会沿着它的一神论潜力发展下去（如同19世纪基督教影响下的那种发展）。印度伊斯兰教很有可能像佛教和耆那教那样被吸纳进去。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人们依然在作出巨大努力来达成宽容和理解。

南部

在遥远的印度南部，在神庙兴旺的一方土地上，泰米尔人古老的达罗毗荼文化避免了伊斯兰教的全面冲击。印度教和谐统一的观念在这里保存了下来。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深入热带地区，离北部克什米尔白雪皑皑的山峰将近2000英里，是盛产稻米之乡，它的富足建立在高韦里河三角洲巨大的灌溉工程之上。马可·波罗形容它是“世界上最灿烂的地区”，它的独特文化可以遥遥回溯到史前时期。泰米尔人在种族和语言上与北部印度人完全不同，他们体现了印度对

多样性中的统一性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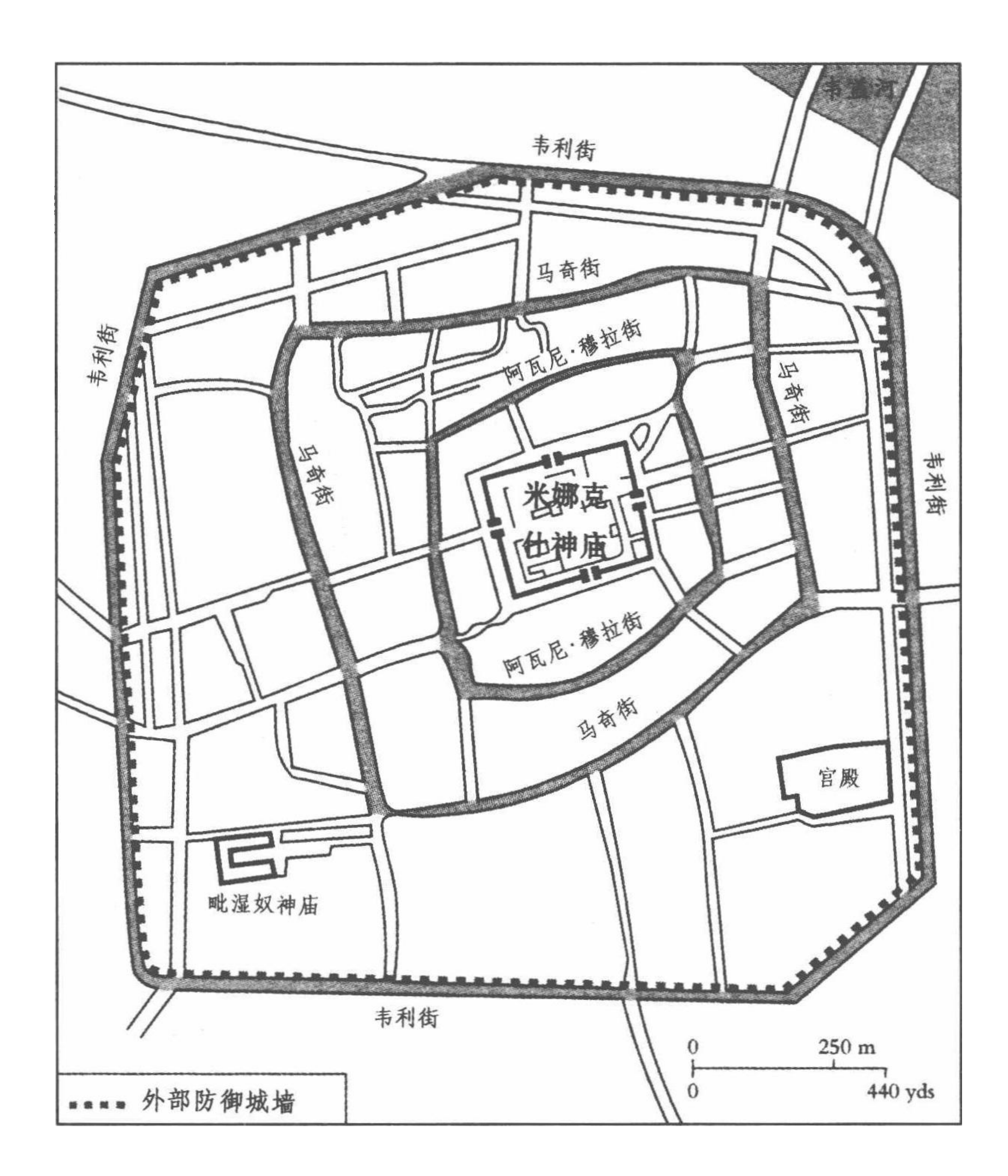
泰米尔人的海滨，即科罗曼德尔海岸，是希腊和罗马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一位泰米尔诗人说道："希腊人的船只精致庞大，装载黄金乘风破浪而来，满载香料而返。"稍后，泰米尔人将印度教文化输出到爪哇和柬埔寨，帝国精神得到了弘扬，成为东南亚主流文化：今天，巴厘岛等岛屿的居民依旧信仰印度教。

9 世纪，在朱罗王朝时期，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了，在诗歌、绘画和雕刻方面留下了璀璨的遗产。国王阿迪蒂亚（Aditya，871—907）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他"顺着高韦里河，从大象出没的萨西亚德里山脉（Sahya）到映月戏水的海洋，为湿婆修建了一排排巨大的石造神庙"。这些神庙可以列入印度最精美的建筑之林。一些神庙在 6 世纪就已经很有名，后来经过进一步扩建和装饰，成为印度（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大的神庙建筑群。今天，这些神庙依然是远近闻名的朝圣中心，像蒂鲁瓦卢尔（Tiruvarur）、斯里兰加姆（Srirangam）以及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是朱罗王朝王室祭拜舞神湿婆[5]的地方。吉登伯勒姆体现了印度以往各个时期的崇拜：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以及本地人的崇拜。圣树、圣池、老虎庙、原始林伽像、原始女神以及当地泰米尔人的舞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一席之地。它的核心区是一个 9 世纪建造的木结构礼堂，屋顶是琉璃瓦，周围有很多朱罗王朝时期的塔和建筑。它的储藏库里面有许多当时的青铜器，因为那个时代是印度青铜铸造工艺最辉煌的时期，而这种工艺又可以回溯到印度河城市文明时代。一群能工巧匠，或许来自一个家族，为高韦里河三角洲蒂鲁瓦卢尔的一座小寺庙铸造青铜作品。在历经岁月变迁和战火洗礼之后，差不多有 30 多件 11 世纪早期的青铜作品保存了下来。它们描述的是远古主题：作为舞神、伟大的瑜伽修行者或呈半女

相的湿婆，以及以恐怖和慈爱相出现的大女神[6]。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电影和电视上看到这些主题得到改编使用。在这些杰作中，人们会发现湿婆的一个古老角色，即万兽之主。不过，在这里，这位史前时期野生动物的神灵，被情感丰富的泰米尔人改造为头戴蛇饰头巾、注重感官享乐、满口谎言的牧牛者。1011 年，这一形象被铸造在一件青铜器物上，不过这道打蜡工艺已经失传。自古希腊人之后，还没有出现过类似作品。

自古希腊人时代以来，印度南部泰米尔人的文化中心就是马杜赖，正如一位诗人所吟唱的，那里有“雄伟壮观的寺庙与高塔”。在麦加斯梯尼生活的年代，希腊人就已经知道马杜赖是一座繁盛兴旺的城市，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一座寺庙之城。“城市公民早上起来不是为了玩乐，而是为了颂唱《吠陀经》。”

马杜赖的主神正是那位大女神。对她的祭拜早就为希腊人所知，1 世纪泰米尔文献记载了为她建造的一座早期寺庙。除了塔楼地基以及湿婆内殿的围墙，1314 年穆斯林洗劫之前的建筑物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城市布局仍旧符合 2000 年前论述城市规划的宗教文献所提出的要求：中心是神圣的四方形区域，然后是以此为同心圆规划整齐的街道（“呈莲花状”分布），再外面是后来被英国人拆毁的外围城墙。从远处眺望，巨大的城门塔楼高高耸立在平原之上，表明那里是一个宗教圣地。这是宇宙之城的一个生动案例，我们稍后会在中国和南美洲碰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深厚根基的、印度本地人的城市。在主要神殿中，这位神以母亲女神的传统姿势站立，体现了女性的生育能力。她的名字，即米娜克什[7]，以及这里的人们用来指代湿婆的名字，即松达纳（Sundarar）和科克坎那萨（Cokkanathar），来自古老的达罗毗荼语，很可能在哈拉帕时代就已经被用来称呼神灵。



马杜赖，泰米尔圣城。现在仍然是一个热闹的朝圣地，每天吸引1万名朝圣者。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已经知道马杜赖这座城市。神庙周围整齐有序的街道以泰米尔月份命名；外部城墙在19世纪40年代毁于英国人之手。

人们每年都会把女神雕像运到圣湖边，在此庆祝她与湿婆的婚姻，庆典每年一次。这种仪式与文明一样古老：公元前2000多年在古巴比伦就已经有了记载，这里的人们在希腊化时代依旧举行这项仪式。在湖边，她和湿婆被装扮成世俗君主形象，头戴花环，人们以泰米尔语吟唱令人难忘的赞美诗。泰米尔语是世界古典语言当中最古老的一种，或许源自印度河文明使用的语言。一首古印度赞美诗如此吟唱："伟大的女神，万物之因：她是和平，是万物的智慧，是各种信仰的智慧；她是意识本身；永远存在于万物之中，凌驾于所有造物之上。"马杜赖大女神的远古名字和形式，是印度生活当中古老的、无法压制的信仰和体验的组成部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我们时代的现代化和西化，都没有消除这种信仰和体验。以后是否会一如既往，只能由时间来决定。

最后的入侵：英国人的来临

泰米尔文化最后的伟大时期是17世纪。在北方，莫卧儿帝国开始显露出衰微迹象。这个时期，对印度最后、或许也是最致命的入侵开始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人就在觊觎印度的财富。18世纪，你争我夺的欧洲强权着手在印度建立殖民地。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在孟加拉和泰米尔纳德邦打响，这是它们全球冲突的组成部分。相互争夺的外国军队玷污了吉登伯勒姆和斯里兰加姆的圣地，把它们用作堡垒。印度很快就被描述为不受保护的黑人妇女，任由大英帝国攫取自己的财富。印度由此进入苦难深重的殖民时代，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无不受这个时代的影响。

英国人之所以大获全胜，原因在于印度内乱不断，同时，英国人

掌控了海洋。英国人在印度海岸线建立了重要据点，以此作为他们统治的基础：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被占领，“对印度形成包围”。在腐败和血腥的东印度公司支持下，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开始日渐增长。一开始，征服活动只是零星的，伺机而动并且没有长远目标。消除一个又一个地方威胁，并没有给英国纳税人造成太多负担。只是到了1857年，当印度北部爆发大规模起义即“印度兵变”后，存在258年之久的东印度公司宣告结束，英国政府开始直接控制印度。1858年11月1日，第一任总督坎宁勋爵在安拉阿巴德的阿卡巴城堡城墙上，在俯瞰圣河交汇的圣树和“立法柱”旁边，宣读了女王维多利亚的诏命，尽管他也没有忘记印度的传统。于是，在阿育王、旃陀罗笈多和阿卡巴之后，一种新的“正法”在同样的地方被宣布，印度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令人惊讶的是，在帝国全盛时期，英国人以区区5万人的军队和25万行政官员，统治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在电视和好莱坞电影中，英国统治时期变得让人怀念。不过，不管我们如何粉饰，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印度经济成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输出原料，进口成品。印度的自然资源遭到掠夺，2000年前阿育王所保护的树木和动物，正在被不计后果地消耗。如同从非洲到拉美的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一样，印度人，至今仍充满活力的古老文明的创造者，现在被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民族像儿童般对待。来自5000英里之外一个小岛的统治者，在虚假的礼仪中身着奇装异服自我庆祝和夸耀。在他们看来，印度是“他们王冠上的明珠”。他们的帝国，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帝国，就是以印度为奠基石。英国人很容易忘记在他们来临之前印度就已经存在。如今，印度依旧，而英国人一去不返。

我并没有否定英国留下的复杂而意义深远的遗产：英语、英国人

的代议制政府观念、城市规划、交通运输、教育以及世俗法律，所有这一切都为印度文明作出了贡献。这种发展也有助于印度政治统一：或许，正是英国人让印度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理想变得切实可行。在欧洲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即便印度教本身也会经历改革和复兴。不过，英国留下来的最具决定性的遗产，或许是印度向更广阔的世界开放：迫使印度人以西方新的、世俗的“法规”来重新界定他们源远流长的文明。

独立

我们的探究最终又回到安拉阿巴德，回到大壶节的城市，回到尼赫鲁家族的宅院。印度独立之后，这个家族三代都有人成为统治者。这里的图书馆藏有很多论述欧洲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书籍，20世纪30年代，印度民主派汇聚在此讨论印度未来之路。这些人的希望和恐惧在现代世界反复出现：诸多民族在寻求减轻西方的影响并且从中学习。就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西方的理性和科学等方面而言，印度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西方为模板呢？本土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作现代国家的基础呢？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出生于上层阶级，接受英式教育，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模式才是出路，认为应该与印度古老的传统彻底决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依然相信苏联共产主义实验的成功。相反，尼赫鲁的朋友圣雄甘地相信印度自己的道路，相信自我培育、地方经济和村社民主，相信阿育王的非暴力原则。尼赫鲁的宅院也保存着甘地简朴的卧室，里面有纺车和草席。对甘地来说，任何文明最伟大的遗产无非就是它本身。印度的伟大就在于印度性，而不在于大打折扣的西方式混合物，但是，世界潮流并没

有站在他那一边。甘地声称："我们文明的理想，即非暴力、平等、多元主义和宽容（内在的和外在的），只有通过明达的说服，而不是强制，才能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扬这种道德态度，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确实知道，我们忠实于它——在这方面，年轻人正在等着我们的帮助。"

只是在70年前，一些人才开始在安拉阿巴德的尼赫鲁家中构想和讨论现代印度的国家形态，不过，现代印度却建立在伟大传统之上，这种传统可以根据不断的自我呈现和不可思议的文化连续性回溯到几千年之前。由此可见，当印度追求自身命运，追求成为世界上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时，我们可以把佛陀、阿育王、伽比尔、阿卡巴以及达拉·舒科的信念，视为一系列生动鲜活、连续有效的思想观念。

现在，人们开始觉得，英国人300年统治只不过暂时中断了印度历史的连续性。当更深厚的历史，即欧洲人来临之前的印度重新得到宣扬时，英国人统治时代的记忆逐渐褪去。印度文明继承了那一历史的荣耀、失败和悲剧：印度有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种姓制度，分离主义的威胁和宗教狂热，对女性的剥削和对部落民族的压迫。一些地区存在顽固的封建主义，它像种姓制度一样，通常使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理想遭受挫折。这些失败，以及许多成功之处，都深深植根于印度的历史。

在人类努力的每一个领域，印度都表现出罕见的天赋和创造力。如果让我们选择一个富有特色的遗产——这也应该成为西方人的选择——那么，或许就是印度把精神探求作为生活中心这一点。其他文明在这方面都不如印度（尽管印度也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强烈的世俗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回溯到阿育王时期）。自古以来，印度人对文明的定义就与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人宣扬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理

性和阳刚之气，以此作为理想。印度的伟大传统坚持非暴力、克己、内在生活和阴柔之美，以此作为文明基石。不管印度的历史经历过多少胜利和灾难，她始终坚持这些理想。历史上充斥着穷兵黩武的帝国，唯独印度创造出一个精神帝国。

结语

在安拉阿巴德的尼赫鲁故居，床头放着一本少儿版《薄迦梵歌》。从孩提时代到老年，尼赫鲁总喜欢在床头放这么一本书。因此，即便在 21 世纪初，“我们希望由开头知晓结尾”可能依旧正确（对所有民族而言都是正确的）。尼赫鲁去世之后，根据其遗嘱，他的骨灰撒在安拉阿巴德恒河与朱木拿河神圣的汇合之处，此前圣雄甘地就是这么做的。后来，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和外孙拉吉夫被谋杀，他们的骨灰也撒在阿卡巴城堡（这里有生命树和阿育王的“立法柱”）下面的滔滔河水之中。在遗嘱中，尼赫鲁否定宗教对行为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没有宗教情感。自孩提时代开始，我就迷恋安拉阿巴德的恒河和朱木拿河，随着岁月增长，这种依恋之情越来越强烈。四季交替时，观察着她们变幻的情绪，我常常想起长久以来与她们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传统、神话、歌谣和故事，这些已经汇入到奔腾不息的流水之中。恒河尤其可以称为印度之河，它深受印度人民喜爱，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希望和恐惧。这里既有胜利的欢歌，也有失败的哀歌。它成为印度古老文化和文明的象征，尽管变化多端、奔腾不息，却依然如故。”

注释

[1] 林迦是湿婆的男性象征，具体化为男根形象，通常摆放在象征女性的约尼石座上。

[2] 埃利都位于今伊拉克，德尔斐位于今希腊，库斯科位于今秘鲁，分别在苏美尔神话、希腊神话和玛雅神话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3] 班尼亚是专门从事商业的第三种姓吠舍的一个分支。

[4] 印度南部的一种号召用爱与奉献作为信仰理念的宗教运动。

[5] 湿婆的舞神形象是印度最著名的象征之一，代表毁灭与重生。

[6] 无所不能的女性力量的体现，多数时被视为湿婆的妻子，有恐怖、慈爱等诸相化身。

[7] 米娜克什是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化身，雪山神女则是大女神的诸相之一。

第三章　中国：天命观

中国历史起源的发现，纯属偶然。1899 年，北京学者王懿荣得了疟疾，于是他找附近一家药店开了一副药。当时，他的学者朋友刘铁云（古典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正在他家做客。刘铁云看到了药方。其中一味药被中国医生使用了几百年，即老乌龟壳碎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龙骨。令人震惊的是，当他们观察这些骨头时，发现上面有一些古老奇怪的文字，其中一些与当时使用的汉字一样。尽管这味药被使用了几百年，却是第一次引起学者的关注。他们决定找到这些骨头的来源。于是，两人返回药店，老板给出了他们想要的答案：这些骨头是从黄河平原河南省一个名叫安阳的小村庄挖掘出来的。安阳后来成为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

中国是旧世界最后一个独立发展出伟大文明的国度，比伊拉克古代文明晚了 1000 多年。中国发展出了独特的生命观：尽可能充分揭示世界上的“他者性（otherness)”。正如西方重要评论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所说的：“只有当我们思考中国时，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同时也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哪些遗产真正适合于全人类，哪些反映的仅仅是印欧人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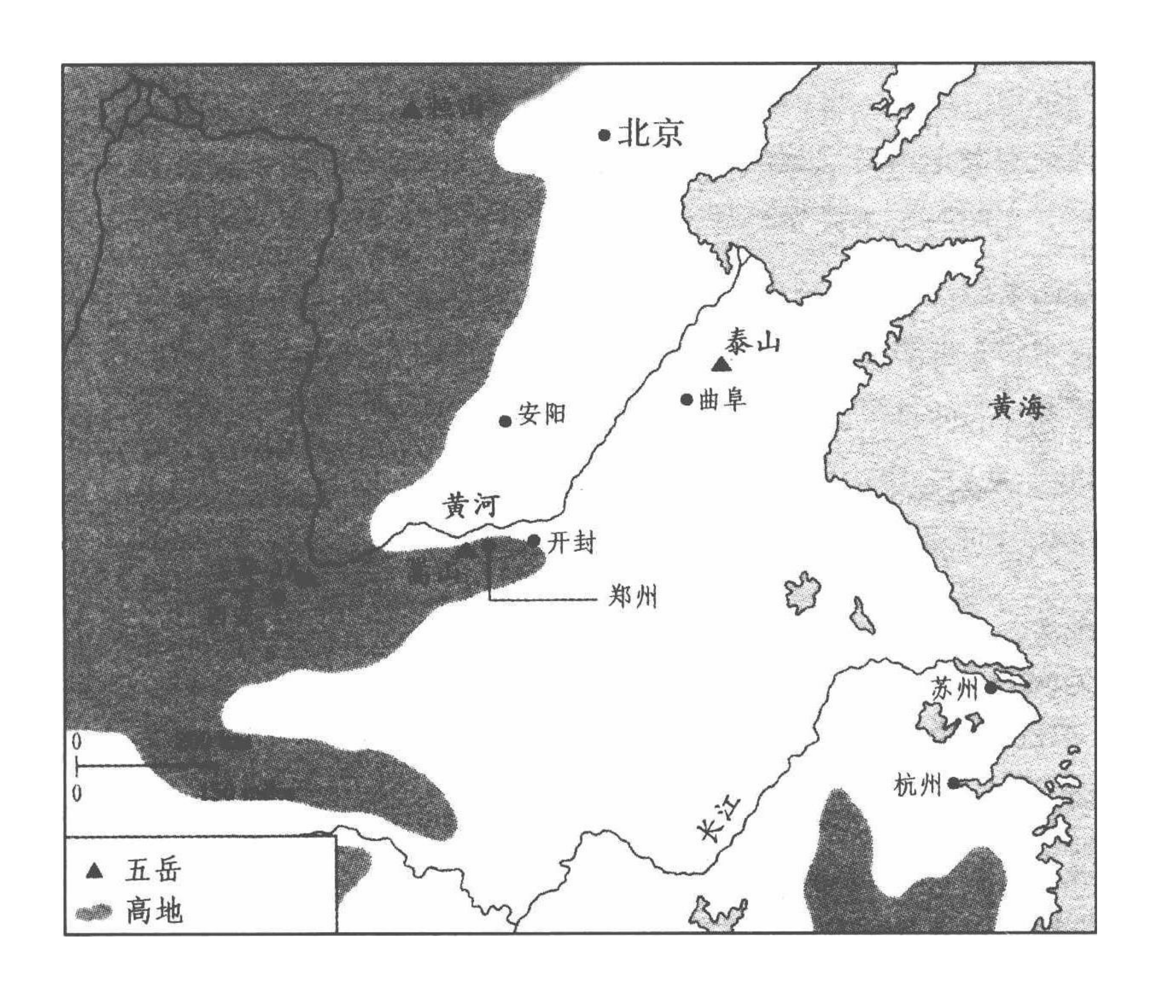
中国的文明概念与西方的完全不同，与印度的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城市开始于青铜时代，但不是人口和商业中心，而是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在这里，国王与其卦师成为天与地、人类与自然、生

与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居间调停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青铜时代的安阳到晚清时的北京，城市一直保持着这个特色。对中国传统的开创者而言，人类努力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由美德、礼仪和敬祖所支撑，他们的文明观尤其倚重这些品质和义务。这种文明观体现在和谐与对立统一观念之中：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阳刚与阴柔、光明与黑暗以及阴与阳的统一。这种基本的平衡是中国所有思想的基础，不管是科学、哲学、饮食还是医学。这些古老的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中国人而言，它们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即便我们时代的大变动，也无法抗拒各种塑造中国（自她从黄河岸边出现以来）几千年之久的深厚力量。

安阳：中国历史的开始

黄河携带着肥沃的黄色淤泥，自内蒙古浩浩荡荡奔腾向东注入黄海。不过，它也会毁坏城市，造成巨大伤亡，现在也是如此。它穿过郑州附近的大山，进入开阔、尘土飞扬的平原——一块夏日太阳炙烤之地。中国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城市就建造在这片土地上。那时，这块平原气候温和、土壤湿软，到处是亚热带动植物。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中国文明一开始也兴起于河流（黄河）两岸。不过，与古代近东文明不同，中国的政治权力不是来自对自然的控制，而是来自对过去的控制。在伊拉克和埃及的早期历史中，灌溉系统是早期国王和国家权威的关键要素。而在中国，王权建立在世系和神圣性之上，建立在与祖先的沟通能力之上。

今天，安阳并没有保留下太多古代遗迹。它是一座小型、令人愉悦的城市，有残留的明代城墙和一座鼓楼。在古老的街区，绿树成荫



中国，标示了文中提到的地点。“中部王国”（中国）——中国由此得名——以嵩山为中心，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嵩山就成为中国天文学家的子午线。

的狭长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刷成白色的住宅，一直通向两口大水井，人们晚上会在这里散步。这里还有一座中世纪佛塔，老人们仍旧会在塔门口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如果想去青铜时代的皇宫，也就是龙骨发现之地，就得穿过麦地走到离城几英里之外的小屯村。黄河在这里呈巨大带状蜿蜒流转，殷商皇宫就建造在这里，这是不幸的商朝的最后一座城市。

依据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1世纪的记载，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1000多年，商朝衰落时期的各种可怕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商朝历经许多代国王，有好有坏，其中商纣王最为邪恶，不过也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商纣王孔武有力、淫荡好色、凶狠残忍，常常纵酒狂欢，并且设计一些可怕的手段来惩罚那些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的官员。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无视神灵和先祖。最终，正义大臣离他而去，批评他"不懂天命"。"大大小小精通礼仪的官员"带着青铜器具和乐器投奔商纣王的一位诸侯，这个人美名远播、宽厚仁爱、"爱民如子"。这一弃暗投明的行为不但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邪恶的纣王由此丧失了与先祖沟通的方式。素有贤名的武王随后率兵围攻纣王。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甲子日"（按西方人的说法，这一年木星位于巨蟹狮子座的位置），纣王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各种传说表明，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尽管也有可能是其他年份。依据司马迁的说法，这个故事的关键（或许也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可以残暴无情，但是绝不能逆天而行。商纣王乖戾无常的凶残本性和邪恶让他丧失了天命眷顾。事实上，这表明政治中的道德秩序概念或许非常古老。

人们很快了解到，小屯村周围早就出土了许多甲骨。1922年，挖掘工作开始，这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20世纪

20年代，图坦卡蒙（Tutankhamun）陵墓、迦勒底的乌尔以及摩亨－佐达罗都得到挖掘。在小屯村挖掘出商朝末期国王和王室的陵墓，里面有精美的青铜陪葬品。这里还发现了人祭的证据。与巴比伦的乌尔、埃及的阿拜多斯以及中美洲一样，中国早期统治者也用他们的忠仆陪葬。这些陵墓还为龙骨之谜提供了答案。

一直以来，北京的药剂师都在研磨商朝国王用于宗教仪式的文档。这些甲骨被商朝王室巫师用来与先祖的灵魂沟通。它们有一部分是牛骨，不过大部分是龟壳，龟是中国文化中永生的古老象征。这些骨头在加热之后，又受到锐器敲打，卦师依据裂纹走向进行预言解说。后来，他们又对甲骨作出注解，以此解答许多问题，比如生死、生育、疾病、健康，甚至皇室军事活动的结果、狩猎和城市建设等。这些奇怪的符号预示着《易经》的出现，《易经》是中国伟大的智慧之书，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它。正如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早期史学以及天文历法 “与占卦和鬼神崇拜联系密切”。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基本线索来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特征，卦师正是通过文字的神奇力量来召唤先祖的神灵。事实上，中国古代用来指称这些符号的词，即“文”，后来被用于指称文明本身。在中国，一开始出现的不是城市，而是文字。

在安阳发现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青铜器。这些精美的礼仪器具被用于祭祀和典礼场合。它们由一道已经失传的打蜡工艺铸造，上面的图案和细部卓越不凡、设计精巧、光彩夺目，属于人人梦寐以求的艺术瑰宝。青铜器铭文讲述着家族世系和祖先崇拜，这也是今天中国人所关注的。公元前9世纪的一段铭文翻译后的大意是“蔡叔本人制造”，“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一直珍惜它、使用它”。举行正确的宗教仪式并独占青铜器和文字，所有这些为统治者提供了获取先辈智慧的手

段。这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拥有最重要的东西，即天命，只要他实施正义、爱惜人民，天命就会一直眷顾他。

挖掘工作在安阳继续展开。最后的一大发现，就是1976年发掘出的妇好墓，里面随葬品非常丰富。过去几年，中国考古学家复原了过去被认为只是传说的中国史前史。通过解读甲骨文，学者们证明，商朝国王——他们的名字通过传说为我们所知——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中一些王的都城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一些古都，比如，位于现在郑州的一处遗址（古代的亳都），我们还可以看到高出地面的巨大土墙。令人心急如焚的是，祭祀先祖的中心，即“大邑商”，依然没有被找到。各种迹象表明，它就埋藏在黄河故道近旁，埋藏在一个现在人们称为“殷墟”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一座新的商朝城市在郑州附近的偃师被发现。这一发现表明，皇家祭祀在巨大的禁地举行，正如后来的文献所记载的，这里是“四方之枢纽”，也是后来西安和北京修建的禁宫之先驱。城墙里面是宫城和寝殿。平民住房、青铜和骨器作坊以及陶窑，都分布在外面。商朝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皇室血统的不同宗族可能轮流做皇帝，每次都迁到新都。不过，商朝社会显然分为两个主要阶层：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贵族（以及他们手下专门负责宗教仪式的人）和农民。这种划分在以后几千年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晚近挖掘工作把整个故事回溯得更远。传说提到商朝出现之前的一个模糊朝代，即人们所说的夏朝。据说夏朝起源于神圣的嵩山附近，这里发掘出了一些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小型城防建筑。这里正好是中国的中心地带，即“中部王国”，这也是“中国”的来源。

中国在史前时期早就有人类存在，除此之外，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典文化完全是从非常古老的过去发展出来的，是本土

性的，也是连续不断的一种文化。与印度一样，中国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与史前时期具有深厚的连续性。同时，这反过来又可以解释贯穿中国历史的信仰和习俗的坚韧性。事实最终证明，神话具有历史内核。自从有记载开始，中国文化关注的主要是文字、占卦、礼仪、祖先崇拜以及历史和诗歌。中国古典文明的经典就反映了这种关怀：《礼记》（礼仪）、《尚书》（历史）、《易经》（占卦）以及《诗经》（诗歌）。直到20世纪初清王朝寿终正寝之际，这些经典一直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古典文明把这些古代信念转变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与印度一样，中华文明也植根于青铜时代的民族文化，这也使得它具有不可思议的适应性、长久性以及特性。类似于印度和希腊，这些主要的关怀和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得到整理，中国的发展之路也由此得以确定。整理者是孔子。

孔子：传统的塑造者

山东曲阜彩旗招展的孔林墓穴在现代再次遭到挖掘。孔林占地500多英亩，安葬着2500年前的孔氏先祖。“文革”时期，墓园惨遭破坏，许多尸骨被掘出来，以便驱散他们持久的影响力，尽管这是一种徒劳的努力。今天，孔林依旧是对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之人的纪念，也是对他的忠实信徒的纪念。

孔子把青铜时代的巫术改造为国家概念，这是一种以美德和礼仪为基础的道德秩序。他生活在令人惊讶的轴心时代，当时的伟人有佛陀、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以及犹太教先知。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只不过是中国历史、诗歌和礼仪传统的整理者。2000年以来，他的学

说一直是中国统治者的理想。与佛陀和耶稣一样，尽管他自己述而不作，不过流传至今的无疑是他个人的表达。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一个简单、原创性的思想。他并不关心鬼神天命。他声称对此一无所知。他关心的也正好是每个统治者所关心的：如何在此世建立一个正义而稳定的社会。他的回答是：仁，即德行，是维持社会凝聚力最根本的品质。“仁”是作为公民的我们所能追求的最有价值的目标。

孔子并不相信人性本善，因此，需要授之（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仁”。向统治者传授精神和智力上的“仁”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如果统治者像商纣王那样冷酷凶残，用严刑苛法压迫人民，人民就会对法律失去信心，不再自重，并且不知廉耻。如果以仁爱和自重教导人民，他们就会具备这些品质，并且自我约束。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相互敬重和相互信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尽管出身贵族，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他提出的是一种反权威主义思想。因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赖于学者，而不是皇帝，皇帝本人也得遵守这一黄金法则，否则就会丧失天命垂青。

康熙皇帝于1717年冬立下的遗诏，有一段话典型体现了中国那些最优秀统治者是如何严格遵守孔子上述思想的：

>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

孔子提出的个人美德这条黄金法则，以及他对礼仪的强调，今天

看起来似乎有点老套。不过，个人美德是文明的基础，即便现在也是如此。至于礼仪，它界定的是相互关系，体现的是尊重。礼仪还是联系祖先的形式，而所有人都寻求与祖先的联系。孔子说："夫礼……失之者死。"他后来认为，礼仪完全取决于"仁"：如果我们不仁爱，礼仪又有什么用？这里的难点在于："仁"是什么？仁爱之人又是什么样的？孔子的学生就是直接的答案。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现在，每逢孔子诞辰，曲阜都会举行盛大庆典，仪式还受到政府的支持和赞助。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又复兴了孔子的一些古老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仪式活动曾一度终止。事实上，这些活动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时就终结了。现在，人们在孔子故里为游客表演和举行仪式活动，他们大部分是海外华人，来自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到曲阜寻根。1949 年之后，这种活动似乎出现过短暂中断。我们时代的中国力图走出过去的阴影，他们认为新传统可以取而代之。但是，当我们认为已经把过去甩在身后之时，过去却又不可思议地重新要求我们的忠诚，它总是这样。孔子认为鉴古知今，只有这样才能学会仁德。

道家：道

早在孔子之前，古代中国人就认为，天地、自然和宇宙构成一个和谐的自然秩序，即道。道家学说对正确之道的追求，是中国第二大思潮。与孔子的务实主义常识相比，道家代表一种自然神秘主义。道家经典，如《道德经》和《尚书》，似乎反对儒家公民道德及其推崇的人为的、限制性的社会结构。不过，道家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取代方

案，而被当作必要的均衡生活的另一半。据说，完美的人白天（公共生活）是儒家弟子，晚上（个人生活）是道家弟子。

通往神圣的泰山之巅的朝圣之路，象征着对道的追求。五岳划定了中国（中部王国）的中心地区，泰山是最东边的一座。自史前时期以来，它就是一座圣山。几千年来，中国人不论贵贱，都可以攀登泰山。今天造访它的游客和香客更是络绎不绝。

登泰山所体现的，是伟大的东方文明对人类在自然世界之位置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东西方传统精神概念的分歧。一直以来，西方文化都是以控制和剥削利用的观念来看待自然。但是，对古代中国人来说，自然是和谐与平衡之源。他们认为人类有责任通过艺术、宗教和科学来理解这种和谐：不是滥用它，更不是改变它，而是顺应自然。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阴阳之道。

在登泰山时，随处可见祭祀传统地方神灵的寺庙。“文革”时期，这些寺庙受到破坏，不过现在已经得到重修，人们又来到这里烧香、祈福和献祭。泰山之巅的道观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文革”时变成了一片废墟。不过，现在这里又有人居住，他们不是演员，而是真正的道士和道姑。这些道人于 1985 年回到这里生活，将自己奉献给古老的道。1990 年，在政府帮助下，他们修葺了主殿。随着政府再次认可宗教自由，这种恢复和重建工作到处可见。至于结局如何，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道家圣哲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泰山之巅，风光无限：西眺黄河平原，东临黄海，四面悬崖郁郁葱葱，峭壁富有神话色彩，寺庙点缀其间。俯瞰羊肠小道，它们直通山脚壮观的太庙。像以往的伟人那样，朝圣者在山顶静候清晨第一缕曙光。在这里，毛主席曾发出“东方红”的感叹，不过，这是大跃进

之前的事情。两千年之前的秦始皇就在这里纵览自己的国家，在太阳初升之时高呼自己已经统一了天下。孔子则 “登泰山而小天下”。

中国的统一

在历经黄河流域各国混战几百年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秦始皇以法家治国，法家拒绝孔子的道德。在他们看来，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是一套对所有人适用的苛严的法律体系。这两种治国理念之间的张力依旧存在。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在西安北部开凿庞大的运河（现在还在），修筑最早的长城用以防御北方游牧部落。不过，两千年来，人们对他的统治依旧心有余悸。最受后人诟病的是焚书坑儒：这系统地限制了帝国图书馆的书本知识，只留下一些实用科目，如医药、卜筮和农林书籍。任何批判性或非正统书籍统统被付之一炬。秦始皇对历史也有切骨之恨。“敬畏过去就是质疑现在”，他活埋史学家，甚至作出鞭尸之举，史学作品则成为殉葬品。他妄想借此统一人们对过去的看法。

秦始皇晚年妄自尊大，寻求长生不老，登泰山之巅，饮承露盘甘露。在西安郊外，他修建庞大的陵墓，以真人大小的兵马俑护卫。秦皇陵兵马俑是 1974 年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整个陵墓就是一座石造迷宫，机关重重、死巷道道，里面弓弩密布，一旦触发机关，就会自动发射。主墓室的顶部镶嵌着珠宝，犹如繁星布满天空；地面是一幅石雕世界地图，水银在帝国数百条河流自动流淌。秦始皇的众多嫔妃一起殉葬，知道建造秘密的工匠也难免一死，成为陪葬品。秦始皇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我们不清楚当时秦始皇陵是否被打开洗劫

过，不过，它依旧隐藏着一些不解之谜。

秦始皇力图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不过并没有成功。公元前 1 世纪，伟大的司马迁准确地重建了秦朝之前的许多传统和年代，或许也由此开启了世界上最富成效和最具连贯性的史学传统。

与西方的早期接触

在中国西部边陲，贯穿戈壁滩的丝绸之路位于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自 2 世纪以来，许多思想观念、货物和人们穿过这片沙漠东来，由此也宣告中国第一个国际化时代的来临。中国从来就没有完全与西方隔绝，即便在史前时期也是如此。不过，沙漠、喜马拉雅山以及青藏高原形成一道巨大屏障，阻挡中国与西方建立频繁而密切的联系。因此，与旧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是在一种更加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非常独特，她既不缺乏、也不觊觎他国物产。不过，这时的中国已经与中亚、波斯，甚至罗马建立了联系，与印度的联系尤为密切。中国人所寻求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启蒙：佛的智慧。

今天，在整个中国西部，中印文明那场伟大交汇的证据随处可见，例如丝绸之路上废弃的佛教寺庙，尤其是敦煌数以千计的洞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顺着黄河往东，进入中国腹地，我们可以看见规模巨大的纪念性雕刻、精巧的洞窟以及寺庙，如古都洛阳的龙门石窟。人们不禁想知道，这种深深影响了中国人想像力的外国宗教，其魅力到底何在。作为脚踏实地、讲究实用的民族，中国人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得到详细阐释的神学，或许他们从来不需要这种神学。事实上，对中国人而言，西方人格化的上帝观念是完全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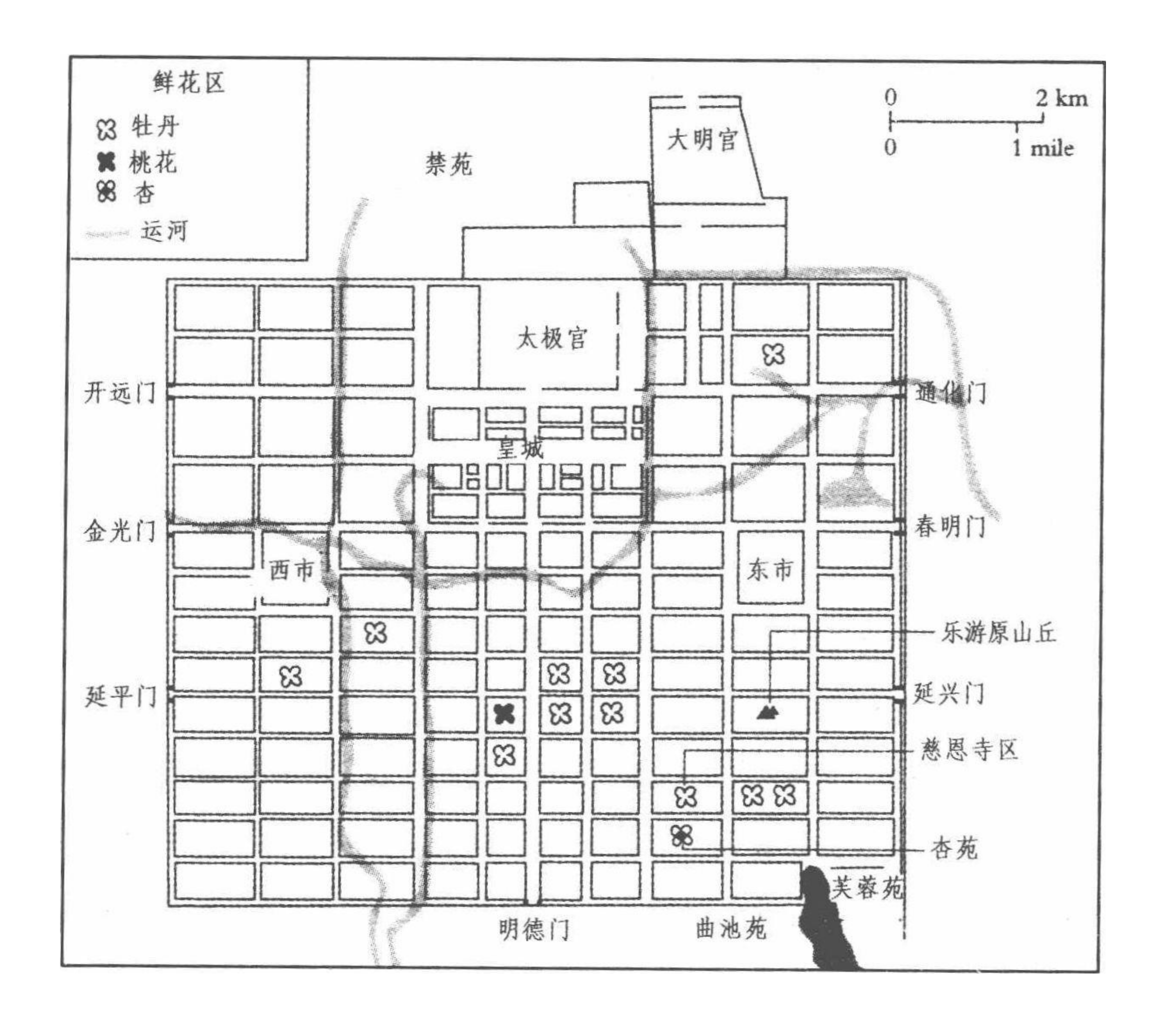
的。在各种扎根中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因其无神论、民主的内容，以及对礼仪的深切关怀，深受中国人喜爱。佛教是中国文明之流的第三大思潮，是儒家智慧和道家神秘主义之外的精神训练。后来的中国人相信，这三种哲学包含了文明的本质要素，缺少任何一种，生命都将失去平衡。不管一个社会多复杂，技术多先进，只有通过内心的启蒙和对永恒的沉思，它的人民才能够变得充实。这是文明面临的一个艰难选择。

唐朝时期（618—907），无畏的中国学者开始了伟大的印度之旅。他们肩负皇命，从西藏进入印度，以期取回真经、迎回舍利子。在西安郊外一处隐蔽山谷的一座小寺庙里，供奉着最著名的取经人士的骨灰，这个人叫玄奘。7世纪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一些佛教典籍，现在依然被保存着：这些经书写在棕榈叶上，由锡兰佛教学者使用的古老巴利语写成。这些手稿或许是玄奘从印度南部的伟大学术中心坎奇（Kanchi）带回来的：玄奘和助手带回650部佛经，以供翻译学习之用。在大雁塔的一块石碑上印有《玄奘负笈图》，他背负行笈，前悬灯盏，不畏艰难险阻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带回大唐。在历史上，一个伟大文明虚心学习外邦文化的例子并不多见。根据现代人撰写的玄奘以及其他奉诏取经之人的传记，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印度遭遇“他者”之际的兴奋狂喜之情。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非但不固步自封，而且思想相当开明，虚心好学。638年，一群景教徒[1]向皇帝请求在西安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建筑，唐太宗慨然应允：“详其教旨，元（玄）妙无为，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西安："世界的中心"

8世纪，亚洲条条大道通西安，即当时的长安。长安是当时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只有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可与之媲美。它的街道错落有致，被大诗人杜甫形容为"棋盘"：这座巨大的礼仪性城市，主要街道长4英里，宽度是今天直通钟楼街道的两倍。现在保留下来的7英里长的城墙，是明朝修建的。要想参观汉唐时期的土堤炮台和冷清的佛塔，就得去西安北郊农地。不过，黄昏时在商贩散去之际，你可以散步经过明朝鼓楼，迎着晚风走进中世纪穆斯林街区的街道（这些街道环绕着美丽的化觉巷清真大寺）。这时，你就会感受到唐代长安人的生活情境。唐朝时，众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他们受到政府监督，晚上不得到处走动，并且要远离权力中心。在唐朝长安城西区，即外国人居住区，你会发现一种勃勃生机和文化上的混杂融合，所有到过长安的游客无不对此印象深刻。这里居住着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也有来自伊朗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和摩尼教徒。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波斯魔法师、土耳其借贷者以及印度托钵僧。在食肆里面，人们可以欣赏中亚音乐、品尝亚洲食物，还有来自波斯和更远地方的歌女和舞女——据说其中一些人是金发碧眼——她们以歌舞娱乐宾客。因此，毫不奇怪，唐代诗人杜牧发出感叹："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在中国人眼中，诗歌在唐朝达到顶峰。这种艺术与书法密不可分，而书法的起源又可以回溯到青铜时代的巫术。事实上，中国人认为，诗歌创作是文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之一。如果让我们选择一个人物来象征这个中国文化最早的国际化时代，他无疑是李白（650—701）。李白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他出生于中亚，说一口突厥语。李



8世纪早期的西安，展现了一些美丽的场所：中国人的城市形象。城内有100多座佛教寺庙，4座琐罗亚斯德教堂，2座基督教堂以及1座清真寺。

白早年从军，并且四处流浪漂泊，在他所创作的伟大诗歌当中，有一首描写战争之无益："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接着，他在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长安觅得机会。尽管脾气有点急躁，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李白很有魅力：眸子炯然、声如洪钟，实属天赐英才。不过，他也嗜酒如命，据说他醉酒之后想打捞水中的月亮倒影，结果落水而亡。李白经常出入长安和其他城市的歌舞坊间、酒肆茶楼，不但关注古典诗歌，也聆听民间歌谣以及随中亚商队传入的通俗音乐。他坚决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喜欢我行我素。尽管仕途始终不畅，不过，他（与杜甫）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诗人，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

李白认为富贵、财富和权势不过是过眼云烟。与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一样，唐朝的大诗人们也懂得苦难的滋味，他们深切同情穷苦百姓，看穿了富人的虚情假意。他们也非常熟悉皇室生活方式，今天，唐朝皇家陵园依旧位于西安城外，由它们的精神方式以及为死者修建的礼仪大道卫护。当进入这些陵墓时，我们可以直接面对诗人们所说的那些大唐皇帝、皇子和公主。当唐朝深陷饥荒和混乱时，他们也失去了天命。墓室壁画中有一幅《马球图》，马球与名贵宝马通过丝绸之路从中亚输入中国，"（大唐皇族）傲慢自信，认为普天之下，一切都是他们的玩物，他们的权力会永世长存"。永泰公主墓里面有一幅《宫女图》，李白对这类宫女作过描述："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8 世纪中叶，大唐已经呈现衰微迹象，政府软弱无力，毫不称职，无法供养人民。诚如杜甫所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杜甫还说道，只要统治者仁爱以对，中国人就能够经受任何考验。

黄金时代的宋朝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其他朝代一样，唐朝最后也陷入了饥荒和内乱，在社会动荡和人民起义中宣告结束。不过，随之而来的朝代更伟大。从西安顺着黄河向东400英里，就到了开封。11世纪，开封是宋朝（960—1279）首都，而宋朝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顶峰。这是一个文化黄金时代，堪与世界历史上任何辉煌时期媲美。开封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新型城市：一个商业中心，城内有冶金、制陶以及纺织业（今天也是纺织业城市）等各种手工业。这里房屋规划有序，食肆随处可见，炊烟从煤炉烟囱袅袅升起。开封现在有点落后，不过，这座古城避免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城市经历过的全盘现代化。在狭窄的巷道里有许多清代修建的带有阳台的店铺，在拥挤热闹的街道，还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社区的迹象，许多外国人在宋朝时定居在这里，成为中国人。开封第一座基督教堂也修建于宋朝，它现在依旧是一座教堂城市。有一条巷道现在依然以“宣讲圣经者（犹太教徒）的巷道”著称。1个世纪之前，这里的犹太教会堂关闭了，这座教堂也是犹太教最遥远的前哨阵地。今天，还有一些犹太教家庭居住在开封，他们的门框有门柱圣卷，客厅摆放着七烛灯台。离巷道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美观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祷告大厅的木柱使用了上好木材。与犹太教徒一样，开封的穆斯林也是宋朝时期从近东过来的商人，不过，他们不太清楚自己的祖先到底来自波斯还是印度南部。现在，他们居住区的人口超过5万，这些人主要是一些贫穷的鞋匠和小商人：对中世纪开封这座伟大的世界都市而言，他们就是鲜活的见证。

宋朝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我们今天还在使用其中一些发明。当时冶铁技术非常先进，整座桥梁和佛塔可以通过焊接修建起来，有

一些保存到了现在。深井取盐和天然气也很常见。当时的开封还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机械钟，以此来精确纪年到秒，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印刷术是另一项伟大发明。印刷术来自中国古老的传统，即在纸张上面盖印章。第一本印刷书籍出现于 868 年。宋朝时期，辞典、科学著作、星象图、纸币，甚至还有报纸都出现了，而且方便携带。毫无疑问，此时中国社会的读写程度高于世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印刷术的出现使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大众趣味更强的读物，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规模由此扩大，并且也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宋朝出现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热切追求孔子提出的“君子”的理想：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画家以及哲学家。据说，其中一些人，比如政治家欧阳修（1007—1072）和哲学家朱熹（1130—1200）“可以媲美任何时代和地域的伟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相信人性本善，认为通过理性探究和生活经验，人类就可以为万物找到万世不易的法则。欧阳修还给后人留下了形象生动的个人笔记，这些文章体现了当时的精神气质。有一个故事叙述了他童年生活，那时他生活在一个落后小镇，有一次从邻居家废纸篓里捡到一本唐代旧书[2]。他把书带回家一读，发现该书“其言深厚而雄博”，尽管它的文体已经过时。欧阳修说道：“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3]。”就这样，他的未来之路开启了。他后来创作的《秋声赋》就像中国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片段。关于他退隐（事实上是被贬官——译注）的故事也非常有趣：欧阳修好酒，常与好友进滁州山区游玩，食山肴野蔌、饮酒下棋。“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宋朝另一位伟大人物是史学家司马光。1064 年到 1085 年间，他先居开封，后居洛阳，奉敕编撰史书《资治通鉴》，全书共 360 余卷。

其中增补的《考异》卷，明确说明了他选择和批判史料的标准。这是一种符合孔子道德传统的历史观："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今天，一些人依旧宣称只有西方才有真实的史学传统，这听起来多少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宋朝的成就覆盖了广泛的领域：从工业技术到山水画、文学、诗歌和史学。今天看来，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时代之一，与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和古典时代的雅典相比，也毫不逊色。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中国人把他们的理想传播到整个亚洲。宋朝思想家（如朱熹）重塑了儒家哲学的古老理想：内在修养、自我发展以及世俗的虔诚。他们把这些理想融入科举体制当中，以此确保最优秀者获取功名。他们还把这些理想作为国家文化的基础。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儒家哲学统治了东亚，成为日韩等国在现代获得显著成功的文化基础。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国家现在依然信奉宋明理学。

"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

1126年，开封落入北方入侵者手中。此后1个世纪，中国陷入分裂状态，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建都杭州。蒙古人在践踏伊拉克和伊朗之后，于1259年到1279年间征服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中国传统文明的活力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对蒙古人而言，定居的城市生活、中国的制度和儒家伦理完全是陌生的。与西方蛮族宫廷中的罗马学者一样，中国政治家必须让他们的新主人信服传统的价值，他们必须向蒙古人灌输宋朝价值观，使之延续下去。

这项任务促使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5）编撰长篇巨著《文献通考》。《通考》共348卷，旨在以非常现代的概念，即典章制度的历

史连续性，来阐述传统之本质。“正是这些——而不仅仅是事件，兴衰以及治乱的交替——决定了连续性，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史学家应当关注的。”人们不禁想知道，这种通盘考察在20世纪晚期是否可行。可以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在13世纪和14世纪，连续性在事实上得到了保障。事实证明，元朝（1279—1368）是中国另一个艺术和文化上的伟大时代。从经济上而言，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13世纪，欧洲人第一次大量进入中国，目之所及让他们瞠目结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大运河北上，经过苏州时，他确信中国就代表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他是如此记载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人民富足、物产丰饶，一片繁荣兴旺景象，除非亲眼所见，否则人们根本不会相信。如果中国人是好战民族，他们早就征服了整个世界。感谢上帝，他们并不好战。”

当时的农业和商业革命，使得中国南部人口激增，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中国能够自给自足，养活人们根本没问题。1344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沿着大运河旅行6天，经过的地方秩序井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是他旅行途中——从北美大西洋海岸到中国南海——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他认为，即便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

对所有文明而言，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衣、食、住以及不受暴力侵犯——得到满足之后，文明或许就发展到了一个重要时刻。它渴望自己高尚的理想在本民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一直以来，中国文明的重要观念就是寻求和谐，她的所有表现形式都体现了这一追求：从青铜铸造工匠和画家的作品，到陶匠和丝织工的设计，莫不如此。在培育这种艺术时，贵族就会意识到儒家智慧探求的普遍和谐。

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是文明的最高使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英观，不过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通往这种智慧的道路依旧开始于文字的魔力。文字最初是卜筮的工具，也是获取先祖智慧的途径。人们最早使用文字符号（被称为“文”）来表示甲骨上的文字。这种符号的意义逐渐变得更加丰富，直到“文”与“明”（光或明亮）结合在一起表示文明本身。它体现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星槎胜览

元朝时，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开始发生改变。中国南部的泉州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在一片淤泥充塞的海湾上方，有一座穆斯林圣殿和三位穆斯林传教士的墓碑，这三个人在17世纪晚期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圣殿中，有一块墓碑记载了明朝海军将官郑和的事迹：郑和是一位穆斯林，于15世纪七下西洋。一次起航前，他曾在圣殿祷告。这些远航很容易改变历史进程。

郑和庞大的宝船舰队令西方当时建造的所有船只相形见绌：宝船长500英尺、重1500吨，有防水船舱以及30英尺高的尾舵。他们用罗盘和航海图来导航。中国有很多伟大航海家，郑和是最后一位。他们自唐朝以来就在进行远航探险，绘制从越南到蒙古的子午线（meridian），以及从爪哇到南纬20°的星象图。郑和与稍后的西方海军将领不一样，他的航行并不以征服为目的，尽管他宣称中国是海外华人的宗主国。他的舰队到过印度南部的伟大港口科钦，长期以来，科钦一直是东西方交汇之处。郑和还到过锡兰北部，用三种语言在那里立了一块碑，以证明他的和平到访。他还敬奉三种宗教的神灵：真

主、佛陀和湿婆。在科钦，郑和很可能见到了元朝时期输入印度的中国渔网。印度南部商人早就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用胡椒和香料交换中国的瓷器和丝绸。郑和又从科钦出发探究东非沿岸，后来人们甚至在莫桑比克发现中国瓷器。他到过波斯湾，并且亲自去麦加朝圣，这些都记载在他的航海日志上。只要他有意向，他很可能发现“西方”。将近1个世纪之后，瓦斯科·达·伽马才从西方航行到科钦，不过，他不是和平使者，而是战争和征服的先兆。

尽管航海有巨大商业价值，但是明朝政府突然宣布海禁。船只被拆掉，航海图书被烧毁，我们只能在后来中国史学家的著作中获得一鳞半爪的知识。其中一位著有《星槎胜览》，对这些伟大的航海作了描述。在泉州湾海风吹拂的山脚，有一些石碑立在那里，它们是历史上未解之谜的线索：航海为何戛然而止？

西方思想家以一种简单的单向思维来理解郑和探险的终结。对他们来说，这就像第一次登月前夕，人类太空探险被叫停一样。直到今天，航海禁令还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中国人思想的顽固落后，无意探究新知识，官僚统治阶层传统刻板、鼠目寸光、固步自封。据说，这也证明西方是科学、技术和进步的源泉，只有西方人才具有冒险精神。不过，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人们对同一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看法。正如我们所见，毕竟中国人才是许多伟大科技的发明创造者。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重要发明成为后来西方霸权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得提出一个问题：不同文明如何看待我们对技术的应用？或许，当时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真实利益范围不出国界，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培育一种精神生活，追求中国文明一直引以为目标的和谐。而西方人一直有一种改变的冲动，一种无法抑制的、侵入其他民族空间（道德和地理空间）的渴望，这使西方人拒绝接受自身的边界。

18世纪以来，欧洲人总喜欢谈论一件事，即东方需要“追赶”西方。很显然，这只是在物质意义上而言。一场谈话需要双方参与。或许，西方也需要追赶东方。西方仍然需要从东方学习如何培育自己的精神空间，学习如何在一个愈益有限的世界接受对自己的欲念和空间的限制。在这场东西方现代对话开始之际，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指出，西方人的难题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心满意足地待在一间空房子里面”。

明朝海禁是中国文化深刻自省的组成部分。明朝修建新的长城来防范北方蛮族，并迁都北京，即“北方之城”，一座蒙古人在13世纪修建的城市。在整个15世纪，由于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北方草原民族不断威胁明朝北部边境，北京的明朝政府与他们无休止地进行着大伤元气的战争。就明朝政府内部而言，行政管理和文化越来越僵化：恪守教条、不知变通、大兴文字狱、厂卫密探无孔不入，刑罚也更加严苛残暴。与此同时，皇帝依旧在北京天坛举行青铜时代的仪式，相信世界一如既往、亘古不变。

受到质疑的“道”

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快速发生变化。16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开始到北京定居。他们传播关于世界、时间和宇宙的新观点，这在中国尚属首次。160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向朝廷敬献了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标示着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大陆。宋朝杰出的绘图成就被超越了。从这时起，中国漫长而丰富的思想传统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孤立主义。尽管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文化成就依旧辉煌灿烂、丰富多彩，不过，整个帝国大厦建立其上的官方学术，更像是与过去的对

话。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许多资料，既可以证明当时中国之伟大，也可以证明她逐渐走向衰微。清朝还着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图书工程，即编撰共计 79000 多卷的《四库全书》。这套丛书现在还存放在原来的架子上和盒子中，装帧精美大方，依照清朝春、夏、秋、冬（分别代表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体系，以绿、红、蓝、灰四种颜色区分。《四库全书》旨在证明一个观念：所有知识，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可以存放到一间房间里。17 世纪 40 年代，清朝取代明朝，并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组织了许多百科全书和辞典编撰方案，《四库全书》是其中最具雄心的一项。其中还有一项计划是编修《全唐诗》，共收录诗歌 5 万余首。这种工程证明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这是一种精致优雅的文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依旧灿烂辉煌。与此相应，行政管理一直也很有效力。不过，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和穷究批判精神时，这种文化显得反应迟钝，先辈遗留下来的庞大封建官僚系统使它陷入停滞状态。

清朝最成功的皇帝当属康熙，他也是中国最伟大和最长寿的皇帝。他为后人留下的遗诏，可以计入最令人动容的统治者传记之列（今朕年届七旬……天下安乐……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从各个方面而言，他在位的时期是又一个伟大时代。而乾隆皇帝同样长久的统治（1736—1796），也是一个伟大时代。不过，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探险者、传教士和雇佣兵把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扩及世界各地。在遥远的"蛮族人的"西方，培根、牛顿和笛卡尔所关心的，不再是如何完善过去，而是如何控制未来。一些中国学者也呼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知识，其中有一位出身寒微的史学家叫章学诚，他可以与以往任何

伟大史学家比肩，可以媲美伊本·赫勒敦或修昔底德。

章学诚生于1738年，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朝以来出现的最大动荡的前夜。这次大动荡是指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以及由此导致的变化。他打算重新评价自儒家传统出现以来，中国人看待过去的方式。他认为，历史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可以将中国文学经典统统纳入其中，并且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孔子或许是生活的真正导师，不过，他的学说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文献而已。他指出，以往学者依据刻板老套的课程，对史书进行精细的分析和编撰，不过，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应当充满生机活力、富含意义。有些人把章学诚视为革命的先驱、民主的先知和封建主义的敌人。毫无疑问，这有点夸张了。不过，章学诚于1799年（1801年去世）写了一封很有预见的信，谈及清朝当时不可避免的衰落，同时也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忧。他声称，时至今日，历史不应当仅仅关注过去，而应该利用过去革新现在，由此展望未来。他认为，史学家最伟大的才能，在于学、气、识的结合。史学家的“气”可以比之于《易经》，因为它也促使史家展望未来。章学诚去世之际，中国面临与另一种文化的正面冲突，这种文化的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完全不同。接受犹太教—基督教遗产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是有目的的，并且向一个特定目标发展——而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与西方的碰撞

如果任由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经济发展迟缓、贫困愈益普遍、社会不公正、封建等级制度僵化以及教育体系死板——她也很可能迈向现代世界，尽管会经历许多波折和苦难。但是，她别无选择。中国

人对西方人的最早记载显得毫不客气："这些蛮族人面容骇人，头发脏乱，臭气熏天。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礼仪。他们满嘴谎言，傲慢自大。他们以欺诈和武力征服各邦国，在压迫当地人民之前，行之以阿谀奉承之伎俩。他们只信奉暴力。"这是中国人对菲律宾的西班牙人的早期描述。他们后来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

18世纪，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随后还有美国人）频繁光顾中国南部沿海。他们装备着中国发明：火药、尾舵、罗盘以及航海图纸，但不是来销售产品的，而是要把他们的货物、思想观念、宗教以及意志强加给中国人。他们很快建立起殖民据点，所需费用来自一些非法贸易，如贩卖鸦片。西方人批判殖民恶行，但是他们对这件事知之甚少。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1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期间达到顶峰。

英国人认为，鸦片贸易只不过是向中国销售鸦片而已。事实上，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染上毒瘾。鸦片买卖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消费市场很小。因此，只能通过广东这个通商口岸以及近海的鼓浪屿非法销售。印度与中国的鸦片贸易密不可分。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大量种植鸦片。英国本身没有什么物产可以与中国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和棉花来换取英国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尤其是当时英国举国上下迷恋的中国茶叶。这样一来，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在英国、中国和印度之间建立起来，它类似于上一个世纪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之间建立的悲惨的三角贸易，即奴隶贸易。这是一宗大买卖。难以置信的是，19世纪早期，鸦片贸易是世界各地最大的一宗贸易。

1839年，中国政府力图全面禁止鸦片贸易，英国人则以武力应对，中国人对这次事件永久难忘。格莱斯顿（Gladstone）声称鸦片战

争“是英国发动的最声名狼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装备落后的旧式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人败在自己创造的技术之下，战败也让中国人幡然醒悟。在西方“蛮族人”，即他们眼中的文化低劣者开始瓜分中国之际，他们被迫审视自己的虚弱和不足。而这些蛮族人正是带着这种贪婪争夺非洲、肢解印度。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随后中国人反抗西方人侵长达两个多世纪。现在，“外国恶魔”已经与中国存亡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很快又遭到一系列重大打击：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战败、义和团运动。这也是思想大动荡时期，古老的自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改革者对西方在技术、能源和启蒙上取得的成功进行了仔细分析，尽管他们依旧藐视西方人。王韬在 1870 年写道：“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用尽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日本的成功对中国学者很有吸引力，日本通过学习西方，保护了自己国土免遭西方列强入侵。其他一些改革者，如很有个人魅力的康有为，主张结束帝制，提倡不同种族、性别和人种的自由与平等，实施之法在于复兴孔子之道。由于不能应对外部压力，清政府最终土崩瓦解。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共和运动曾经在 19 世纪兴起过，不过，清政府断然拒绝任何变革。1911 年，存在两千多年的帝国不再，一个新的共和国宣布建立，但是一切为时已晚。这些变化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农民一贫如洗、工业不发达，还有列强在一旁虎视眈眈。正如《易经》所说，“巨变时代”来临了。一位伟人呼之欲出，他就是毛泽东，中国人顶礼膜拜的领袖。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爆发残酷内战。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国共组建抗日统一阵线。在经过多年内战、饥荒和外族颐指气使之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于 1949 年取得政权，当时群情激昂、全国上下载歌载舞，所有人对新中国充满信心。

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造成农村大饥荒，也对环境和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破坏。“文化大革命”则对中国遗产造成了毁坏，也给后来几代人留下了创伤。“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只有在今天，当尘埃落定之后，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才可以察觉到，中国的传统面貌（精神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依旧存在。正如孔子所说的，没有了过去，我们又是谁呢？

中国的遗产

现在，中国人民迎来了大好时机。他们的国家变成了经济巨人。在过去20年，中国共产党抛弃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体制。未来又会怎么样？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著作中大胆预测，未来的世界文明是重建的中国文明。尽管梁漱溟欣赏西方某些价值，如个人自由和科学传统，并且也希望中国能够适时将这些价值纳入到她自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之中，不过，他谴责全盘西化，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在他看来，西方市场民主尤其不符合中国传统：中国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和综合，西方则求变，一种破坏自然、破坏精神的发展之路。他相信，西方迟早需要孔子的“仁”。不过，至少现在看来，这种希望落空了。

中国对人道主义的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的政治体制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带来了长久和平与稳定：这在今天也是一项重大成就。中国政府有时显得急于求成，不过，在一千多年前，他们就发展出一套精细的考试制度，以此选拔富有才能的官员。在近代之前，这种制度是世界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同样，在近代之前，中国人在科技方面也一直领先世界。他们或许还是各种工艺行业最出色的工匠，制作出精

美的青铜、丝绸、玉器和漆器。举世无双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人情感的另一种表达。而文学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在诗歌上尤其如此。中国史学传统也最古老、最久远。不过，在他们所有的遗产之中，最伟大或许也最富有特色的，是道家和谐与对立统一的理想，以及儒家的实用主义道德观。中国文明的根基是青铜时代的萨满教文化：对先祖、美德以及文字之魔力的敬重。这些概念根深蒂固，因此，不管中国历史如何兴衰变迁，中国文明总能够自我复兴，并维持文化连续性。在经历了20世纪巨大创痛之后，目前人们还不清楚，下一次复兴如何出现，中国是否会像以往一样，以过去为模板。

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在《易经》这本卜筮著作中，有一章标题为“革”。“革卦”是这么说的：“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正如孔子通常所说的，这就是天命的含义。

注释

[1] 聂斯托利派教徒在中国的称谓。

[2] 即《昌黎先生文集》。

[3]《记旧本韩文后》。

第四章　埃及：文明的积淀

在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出世界上最早、最伟大以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今天，我们非常熟悉埃及法老时代“伟大传统”的各种印象：金字塔、方尖塔、斯芬克斯像以及象形文字等等。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横亘在我们与它们之间的漫长时间，这种时间是埃及历史的组成部分，而这种历史与法老时代一样，也是丰富有趣的。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统治埃及近一千年之久，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也是 1300 年前的事情。与古代世界的“决裂”（如果我们暂时使用这个简单化术语的话）发生在很久以前。我打算从决裂时刻、从终结开始之际出发，来讲述我们的故事，首先叙述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以希腊语描写的埃及。

一种传统的终结

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这标志着埃及历史发生了一种真正影响深远的停顿。我们这么说当然是一种后知之明。此前也发生过这种决裂，比如，公元前 17 世纪希克索斯王朝 108 年的统治，后来还有亚述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不过，他们都没有打断制度和习俗的明显连续性。一位现代学者以令人难忘的术语称之为埃及的“凝固性”。但是，亚历山大的胜利，对这个古老国家构成的威胁

要大得多。埃及内省式的文化与希腊化时代活力十足的国际主义文化发生了碰撞，并接触到了其他诸多建构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新方法。在历经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埃及再也没有出现本土法老统治“两地（指上下埃及——译注）”的情况。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实上，这就是古老的埃及世界终结的开始。长久以来，这个世界曾经在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制度等方面体现出非凡的韧性和活力。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埃及长达千年之久，正是在这段时期，埃及本土文化发生转变，古老的国家结构、祭祀阶层、文字系统、语言、宗教礼仪和信仰以及神灵本身开始消失。尽管如此，历史上这种危机时代往往展示出新的方向和新的可能性，希腊化时代正是埃及遗产在古代世界传播的时期，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归化于这片“古代智慧之地”。

希腊人征服埃及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一种文化人类学著作，其作者主要是居住在埃及的希腊人，不过也包括一些旅行者。这种作品面向希腊读者群：自公元前 5 世纪希罗多德撰写的著名游记问世以来，希腊人就对埃及的所有事物着迷不已。希腊人认为，人类的宗教信仰起源于埃及，埃及是异常古老的地方，古老得令人难以置信。通过柏拉图借一位埃及祭司之口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他们是如何敬仰这种古老文化的：“唉，梭伦，你们希腊人只不过是孩子，你们当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希腊人还对埃及充满无限好奇，我们可以由希罗多德讲述的一个故事来了解这一点：一位埃及祭司造访德尔斐神庙，被一群希腊人团团围住，他们“向我询问各种问题。我们如何祭祀神灵？为何崇拜动物？我们不同的宗教礼仪意味着什么？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底下的迷宫又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他们对我们习俗的方方面面感兴趣。希腊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听人讲述埃及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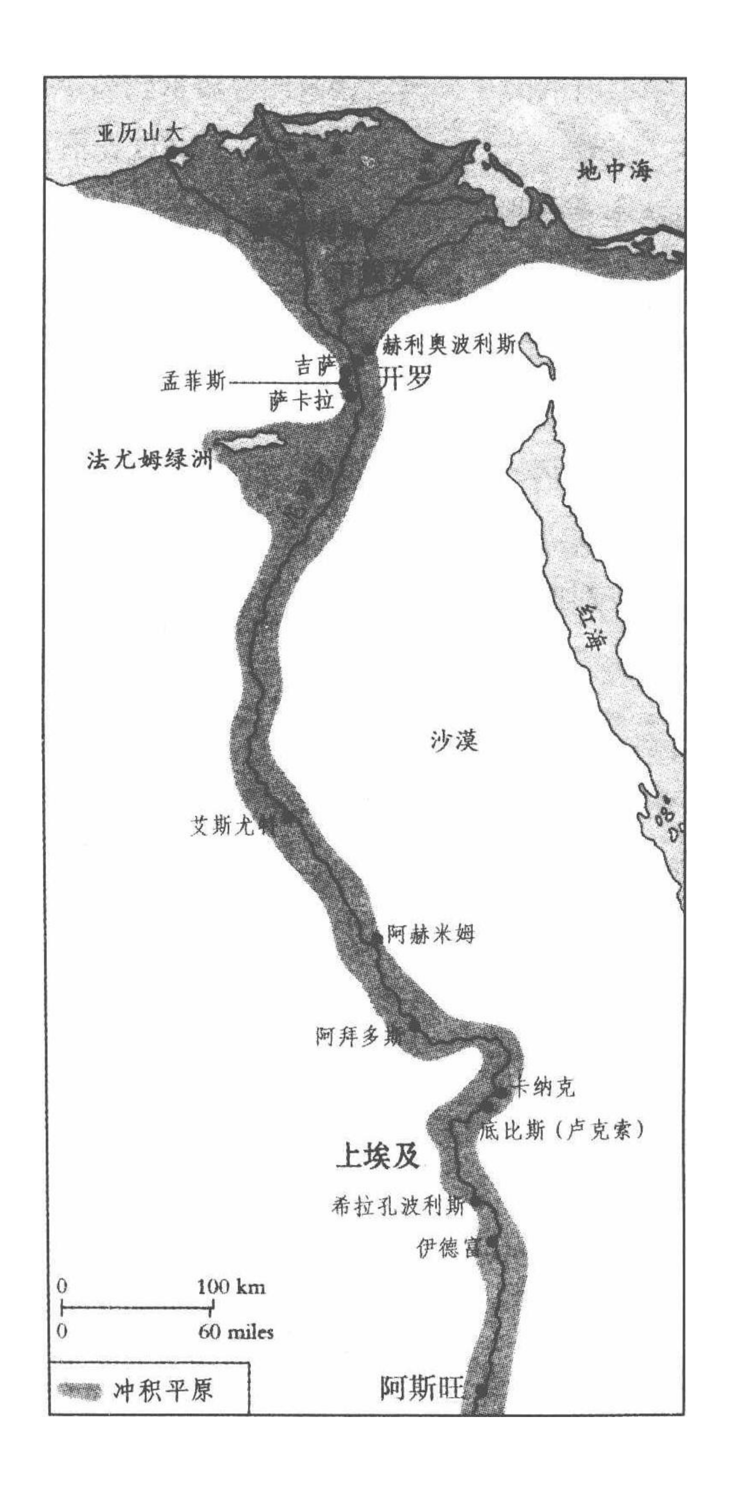
就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出现的这种新文学来说，许多作品开始

使用第一手材料，即埃及祭司的言辞：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与18世纪、19世纪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学者加以比较，他们在婆罗门的协助下，开始阐释印度教礼仪和梵语文献。希腊统治者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2—前246）统治时期，一项把埃及（以及犹太和巴比伦尼亚）著作翻译成希腊语的工程启动了。也是在这一时期，或许稍晚于公元前280年，埃及祭司曼涅托写了他的《埃及史》。后来证明，这部著作是现代人用来重建埃及古代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亚历山大在世的时候，曼涅托很可能已经出生了。他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塞本尼托斯（Sebennytus），这个地方现在是尼罗河支流达米埃塔河（the Damietta）旁边的一个小城镇，为棕榈林和棉田环绕。附近有一座供奉“仁爱之母”艾西斯（Isis）女神的巨大神庙，在曼涅托生活的年代，神庙被托勒密二世装饰得精美无比。它现在已经被毁坏，不过，许多妇女依旧造访它的神池，以祈求生育子女。如果我们想像自己回到曼涅托时代的埃及，得到的第一印象，无疑就是感觉到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度，生活在一片神圣的土地上。尼罗河三角洲上遍布古代城市，其中一些依然有人居住。塞本尼托斯西南20英里处，是祭拜阿蒙－拉的重要中心，那里现在被称为坦塔（Tanta）。直到今天，每年春分和夏至时节，当尼罗河水位上涨之际，仍有超过100万人前往尼罗河三角洲参加塞义德·达贝维节。托钵僧和耍蛇人表演自己拿手绝活，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乐师和诗人热情洋溢地讲述宗教和民间故事。再往东南一点是布巴斯提斯（Bubastis），在希腊化时代，这里举行过最盛大的宗教节日。依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时每年有超过70万人前往参加期间举行的狂欢节。从尼罗河三角洲直到上埃及的底比斯，甚至到更南部的地区，沿途可见许多相似的、年代久远的祭祀中心。在希腊人统治时期，很多神庙得到重建，因

为希腊人很容易把埃及神灵与他们自己的神灵等同起来，例如艾赫米姆（Akhmim）的神祇敏（Min，对应希腊潘神）、丹德拉（Denderah）的神祇哈托尔（Hathor，对应希腊爱神阿芙洛狄忒）以及伊德福（Edfu）的神祇荷鲁斯（Horus，对应希腊太阳神阿波罗）。这些是底比斯的著名神祇，希腊人赋予底比斯“迪奥斯波里斯”（Diospolis，字面意思为“神之城”）之名。神庙散布在从埃斯那（Esna）到考姆翁布（Kom Ombo）的尼罗河两岸，甚至延伸到第一瀑布和努比亚干燥的橙色峭壁上。或许，只有在印度的恒河或高韦里河流域，人们才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一块神圣的土地，旅途中每一天都会遇见巨大的神庙和朝圣地。

曼涅托成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一名祭司。赫利奥波利斯是下埃及最大的宗教中心，临近今天的开罗。我们知道，曼涅托不但撰写了许多著作论述埃及宗教，还描述主要的宗教节日，研究古代礼仪。此外还有一篇短文论述奇斐的制造（Kyphi，奇斐是一种古代调和物，被用于熏香和医学当中），以及一部考察人性理论的专论。曼涅托算不上伟大思想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很有意义，原因在于他用希腊语写作。曼涅托以外国人作为读者群来论述埃及，或许他是第一位这么做的埃及人。他从事著述绝非偶然。很显然，曼涅托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殖民地的好奇心或旅游需求。更准确而言，他力图让统治埃及的希腊人通过希腊语来了解埃及的思想意识、信仰和历史，同时想方设法让他们相信埃及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曼涅托批评希罗多德对埃及历史的“无知”，他认为希罗多德只是使用了一些游记材料而已。曼涅托可能也在有意识地鼓励自己的祭祀阶层融入到希腊化时代的双语世界：这种生存策略不但在《埃及史》其他地方出现过，也出现在穆斯林时代的印度、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中国



直到今天，埃及独特的地理塑造了埃及人民及其文明的特征。只有现代在阿斯旺修建的大坝有可能中断埃及生态和文化的连续性。

以及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的中美洲。埃及的“婆罗门”以抵制一切国外风俗习惯著称，当时，他们要么与时俱进，要么就此消亡。

曼涅托的这本著作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从他生活的时代向前回溯了将近三千年，回溯到第一位王朝创建者，这个人就是谜一般的美尼斯。美尼斯一词的意思可能是“集大成者”。人们认为，他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曼涅托甚至描述了美尼斯以及他的7位后继者（第一王朝的统治者）确切的统治年限。作为埃及的代言人和迷恋象形文字者，曼涅托能够接触到一些重要神庙（比如赫利奥波利斯）中的祭祀传统和教义。这些神庙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即“生命之家”。托勒密时代伊德富（Edfu）的一座神庙保存了下来，在其“生命之家”的墙上，刻着该神庙收藏的一系列圣典的目录。根据这些著作，曼涅托对埃及的宗教传统和礼仪作出了详细描述。其他一些材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编年史框架。一些幸存下来的残片——“都灵莎草书王表”（Turin Papyrus）和“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表明，当时，文字记载不仅仅来自美尼斯时代，甚至还来自埃及统一之前上下埃及独立王国时期。

曼涅托的《埃及史》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之所以对它有所了解，原因在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罗马史学家和教父大量引用它。它所提出的埃及史结构，影响到此后直到阿拉伯统治时期的埃及史学。正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埃及史》是通向未来世界——与古代人一脉相承的世界——的桥梁。与印度和中国不一样，埃及这种伟大传统并没有流传到现代世界，而是丧失了它的特性，湮没在巨大的变化之中。在希腊化时代和伊斯兰教兴盛期间，这种巨变席卷整个近东。希腊人是亲眼目睹这一伟大传统之原貌的最后一批人，曼涅托的作品是一个世界的挽歌。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曼涅托写

作的时期，这个世界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了。

开端

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道："就甘甜程度、长度以及用途而言，埃及尼罗河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河流。只有尼罗河两岸城镇和村庄绵延不绝，也只有尼罗河流域才能得到如此精耕细作。"与伊拉克、印度和中国文明一样，埃及文明的生命也源自一条河流。就像印度恒河，尼罗河本身也被当作一股神圣力量而受到崇拜，并被视为生命的赋予者。从公元前2000多年开始，人们就向这条河流献祭：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曾写下献给尼罗河的赞美诗。12世纪依然有来自叙利亚的祈祷者。科普特基督教徒的圣米迦勒节（St Michael）依然是尼罗河水位上涨的标志。该节日于每年6月17日，即"泪珠之夜"举行，依照传统说法，艾西斯的泪珠从天而降，尼罗河水位由此上涨。尽管这些古老的习惯正在瓦解，不过，一些传统穆斯林家庭仍然会进行相应祷告："愿真主以尼罗河水充分浇灌大地"。尼罗河独一无二，哺育的国家也独具一格。它绵延600英里，流淌在沙丘与峭壁之间，就像一条蓝色丝带，两岸绿色地带平均只有6英里宽。埃及的地理具有与埃及文明及其人民相同的特征。伊拉克的精神是悲观主义的，而埃及，正如古代埃及人所说的，每年尼罗河泛滥时，"田野开怀大笑，人间一派喜乐，诸神内心愉悦"。洪水过后，留下了让生命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壤，埃及人由此对人类、永恒以及事物的稳定性充满信心。这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形成鲜明对比，埃及文明始终是一种乐观主义文明。

优越的自然边界，每年洪水之后留下的丰富的农耕土壤，大量的

矿物资源和贵重金属——所有这些都与早期伊拉克形成强烈反差。这也创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自信，以及埃及历史上逾3000年之久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纯洁性。现代考古学已经把埃及史前史回溯得更远，并且表明，埃及后来有许多特征可以从尼罗河谷地的远古农耕中找到证据。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农业村庄就在冲积平原上出现了，人们在此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养绵羊和山羊。在接下来的2000年，我们发现一些小王国形成于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这两个地区现在依然体现了埃及历史、文化和地理的基本划分。公元前4000年之后，人口和居住区的规模发生显著增长，高超的工艺和技术被用来制造石器、青铜器和雕刻石板。到公元前3500年，一些泥砖墙环绕的小城镇开始出现，与此相随的，是地方王朝修建的富丽堂皇的陵墓。不过，我们没有掌握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证据。这一地区绝大多数早期遗址都深陷淤泥之中，因此，我们只能够依靠上埃及一系列遗址来推测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中期，上埃及似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分别以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即尼肯）、纳加达（Nagada）以及蒂斯（This）为中心。它们相互之间很可能是竞争对手。希拉孔波利斯是鹰神荷鲁斯的（Horus）祭拜中心，纳加达是沙漠之神赛特（Seth）的祭拜中心。在埃及宗教中，一个重要的神话主题就是荷鲁斯与赛特——他们都是冥王奥西里斯（Osiris）的儿子——之间的冲突。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神话模糊地反映了两个王国之间真实的冲突，这两个王国存在于“荷鲁斯诸王”征服尼罗河三角洲之前。

希拉孔波利斯：埃及历史的开端

1897年到1898年间在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进行的引人注目的考古挖掘，对上述所有问题包括埃及统一的故事而言，都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它已经成为卢克索上游50英里开外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名字叫做考姆艾哈迈尔（Kom el-Ahmar），即“红色山丘”。这里曾经是尼肯地区史前部落王国的中心，地方神祇鹰神荷鲁斯神庙的所在地。希拉孔波利斯的字面意思就是“鹰城”。1897年，两位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奎贝尔（James Quibell）和F. W.格林（F. W. Green）来这里探寻埃及的起源。当时，欧洲殖民帝国的考古学家四处考察古代帝国的起源。比如，他们前往迈锡尼、博加兹库伊（Boghaz Köy）、巴比伦、尼尼微（Nineveh）以及阿舒尔（Assur）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法老时代后期的埃及，希拉孔波利斯不再是重要地区，不过，一座新王国时期泥砖城墙环绕的城市在这里留下了些许遗迹。但是，奎贝尔和格林想在这里寻找更早时代的痕迹。埃及王室传说始终坚持认为，这里曾经是统一埃及诸王的祭拜中心。事实上，直到法老时代末期，它的名字依然受到王室尊崇。在村庄外面的一块田野里，他们有了令人振奋的发现。在这里的荷鲁斯神庙下面，他们发现了埃及早期国王的礼器储藏室，里面有大量用于宗教仪式的调色板[1]、象牙以及权杖标头，这些国王以图腾为名字：眼镜蛇王、鲶鱼王、蝎子王和鹰王等等。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法老时代完全不同的辉煌灿烂而粗俗野蛮的世界里。

在发掘物当中，一块2英尺长的黑色石板或许是当时埃及考古史上最重要的物件。石板上雕刻的画面，是为了纪念国王纳尔迈（Narmer）的丰功伟绩。调色板正中心的画面显然意味着一位上埃及

国王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征服；事实上，它描述的或许正是纳尔迈获得胜利的情景。他头戴上埃及王冠，把被俘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国王（他的象征是一束莎草）砸得脑浆四溅。被斩首的敌人一排排地躺在鹰神荷鲁斯的旗帜下前。在一枚石制权标上，纳尔迈国王正在接见一位来自北方的重要女性。这可能代表王室联姻，纳尔迈在三角洲的统治地位由此得以合法化。其他一些调色板描绘了全副武装的上埃及神祇（以狮子、蝎子和老鹰等图腾为象征）摧毁一些敌方城市的情形。在一枚重要的、描述礼仪的权标上，蝎子王正在用鹤嘴锄开凿一条沟渠，这是国王的基本活动之一。在他周围，神祇赛特和敏的旗帜与鹰神荷鲁斯的旗帜迎风招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考古学家发现了埃及一些早期国王（甚至有可能包括统一埃及的国王）的礼器库。不过，纳尔迈与形象模糊的美尼斯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一年之后，格林又回到埃及，在同一个地方取得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他发掘出一个呈圆形的大型白沙山丘，大约150英尺长、8英尺高，四周是倾斜的砂岩驳岸。有痕迹表明，这里有一条通道通向一个重要场所。格林认为，白沙丘形成于史前晚期，甚至有可能出现于埃及王朝早期国王之前。在他看来，沙丘象征性地体现了创世山丘本身。在时间开始之际，从混沌海洋中升起了这第一座岛屿，最早的生命，即鹰，就在这里着陆。格林认为，这里就是埃及创建者荷鲁斯诸王的宗教礼仪中心。

自格林生活的时代以来，人们陆续在世界各地发现了类似的原始人造祭拜中心，如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秘鲁的库斯科和伊拉克的埃利都。埃利都尤其典型，在苏美尔的宗教和神话中，它具有类似于希拉孔波利斯的象征地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恒河和朱木拿河交汇处的天然岛屿，是古代印度类似信仰的中心。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

是一个普世性神话。事实上，当美国考察队于1967年重新挖掘考姆艾哈迈尔遗址时，他们证实了格林发现的一切特征，并且补充了重要细节。沙丘中心是一座用芦苇和泥土建造的神庙，由芦苇篱笆环绕，这种结构在今天上埃及的乡村随处可见。神庙内部无疑是供人们祭拜的鹰神塑像和各种物件，其中一些可能就是1897年发现的礼仪调色板和权标。这里就是上下埃及统一之前荷鲁斯诸王的象征性中心。但是美尼斯神话一直未得到解答，至今依然如此。人们依旧不能确定纳尔迈调色板上的国王是否就是美尼斯。阿拜多斯发掘出来的瓶塞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人们一度认为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不过，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纳尔迈生活的年代很可能比美尼斯早一两代人时间。"巴勒莫石碑"上面刻写的前王朝时期的神秘名字——塞卡（Seka）、卡亚（Khaya）、内赫布（Neheb）、梅克（Mekh）等等，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今天我们对埃及早期城镇史前史有了更多了解，上面的些国王很可能是一些城镇统治者。希拉孔波利斯的居住区已经被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纳加达和阿拜多斯的也被回溯到公元前4000年（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纳加达成为一个重要城镇）。这表明，美尼斯于公元前3100年统一埃及之前的历史仍然有待恢复和重建。正如曼涅托所描述的，美尼斯的后继者，即第一王朝诸王的最终成功，很可能是来自阿拜多斯的一个家族的胜利。不过，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希拉孔波利斯模糊不清的先辈之恩情，直到金字塔时代，这些先辈修建的古老神庙依然得到完好保存。这个家族的胜利，就是一个地方性国王、宗族、世系以及地方神灵、祭祀和图腾，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故事。"伟大传统"正是出现于这种史前部落之间的斗争中：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家由此出现。事实证明，史前王权、它的象征和神话的意识形态基础源远流长，这种意识形态是埃及文明的核

心。神圣的荷鲁斯王权会像古埃及本身一样长久存在。

大约在美尼斯去世近3000年之后，在离考姆艾哈迈尔不远的伊德福巨大神庙中，同样的创世神话得到了详尽的说明。伊德富兴起于公元前237年，即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这座神庙是为希腊殖民统治者修建的，不过也模仿了埃及传统的圣像画和宗教建筑。由神庙墙壁可知，每一座神庙都是原始创世山丘的象征性体现，都有一座简单的芦苇神殿，中心是鹰神荷鲁斯停留的栖木。不管后来的神庙如何巨大，最神圣的还是那座简朴的芦苇神殿。在伊德富神庙内殿，精美的石造神殿保存了下来，在暗淡的光线下熠熠生辉。我们从它的内部墙壁可以看到，芦苇线条围绕着一个空间，上面有鹰的形象。整个社会理论与这个神话联系在一起。这座神庙不仅仅描述了第一块陆地，也描述了时间的开端。从那时起，一个由王权、法律、宗教和礼仪维持的稳定的社会模式传承到了人类手中。人们相信，只要举行正确的礼仪，这个模式就会永世长存。因此，宇宙以及文明社会被认为是静止的，进步、变化、新的问题和新的解答完全是多余的。3000年后，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这些改变真得再也不需要了。

因此，在前王朝时期，美尼斯时代之前，“好战的鹰神”蝎子王在希拉孔波利斯统治“荷鲁斯的追随者”[2]，我们可以由此发现埃及后来的许多主要发展：高效的农耕、金属制造、统一组织起来的灌溉、陶器、石器制作、礼仪和纪念性建筑、精致的丧葬以及远程贸易。最古老的神祇已经出现在希拉孔波利斯、阿拜多斯以及科普图斯（Coptos）的调色板和雕刻上面：鹰神荷鲁斯、艾赫米姆（Akhmim）和科普图斯的狼神敏、秃鹫女神[3]、胡狼头的死神阿努比斯、月神透特（Thoth）以及创造之神卜塔（Ptah）。此外，还有人们熟悉的崇拜形式、神圣王权、丧葬信仰和习俗，以及特色鲜明的艺术风格。这

些特征存在了3000多年，它们也延续到穆斯林时代的埃及，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保存到今天。比如，仪式性哀悼和奠酒、民间医学、葬礼、生育祷告、固定的节日，甚至对护卫灵（ka）或魂灵的信仰（《古兰经》禁止这种信仰）。

因此，对埃及人来说，神圣王权是一个稳定的宇宙的保障。从商代中国到阿兹特克人的墨西哥，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观念。在阿拜多斯，埃及这些早期国王葬在巨大的砖砌神庙中，神庙的砖墙正面装饰精美，酷似尘世宫殿。有一段时间，第一和第二王朝的国王们实行人祭，王后和妃子们成为陪葬品，就像迦勒底的乌尔、商朝安阳以及古典时代印度一样。在印度，殉节和皇室女眷殉葬的习俗一直延续到19世纪。由于与整个埃及的文化成就相抵触，人祭很快就被抛弃了。阿拜多斯的砖造陵墓呈巨大的长方形，里面是一座迷宫，房间众多，堆满为来世准备的金银珠宝和各种物品。1991年，阿拜多斯轰动一时的发现——至少5艘载满丧葬品的太阳船，比吉萨金字塔中的胡夫太阳船[4]早了300年，这也表明，为来世提供各种物品的想法很普遍。因此，埃及历史的重要主题就变得很明显了：中央权力、王室礼仪和对死者的崇拜相互交织，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意识形态。

金字塔时代

沿着尼罗河向北，狭窄的河谷最终与三角洲广阔的绿地交汇在一起。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即临近今日首都开罗的地方，美尼斯建造了自己的皇城孟菲斯。早期王朝的孟菲斯现在已经深陷尼罗河淤泥之下，不过，在冲积平原的砂岩断崖上，还可以看见孟菲斯王家墓地，这也是第三王朝最大的墓葬群。在沙卡拉，阿拜多斯的

泥砖建筑已经被石造建筑取代：这里有世界上第一座大规模石造建筑物。沙卡拉的墓地群绵延数英里，并在希腊人统治时代得到进一步装饰。大约公元前2700年为国王左塞尔（Zoser）建造的陵墓最富特色：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广场，用于接受臣僚觐见和举行周年庆典（目的在于强化这位国王的统治）。许多建立在两侧的小礼拜堂供奉来自希拉孔波利斯、纳加达以及上埃及其他城市的神祇。有一项创新在整个地区特别明显，即一座200英尺高的巨型阶梯式陵墓：这是第一座金字塔。左塞尔国王与他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Imhotep，后来被奉为神祇）的想法很快就风行起来。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许多才干超群的国王——胡尼（Huni）、色纳茹（Senefru）、胡夫以及海夫拉（Khafre）——建造的金字塔越来越大，他们似乎都想超越前辈，由此创造出了世界上规模空前、前所未有的丧葬纪念物。

关于金字塔的修建，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好莱坞史诗巨制展示了一群群奴隶在残暴主人的鞭子下劳动的画面。不过，尽管古代埃及存在奴隶制，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也就是说，修建金字塔的劳动大众并不是奴隶。金字塔是由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建造的。事实上，在长期统治中，政府完全有可能动员大规模的国家劳动力来建造这种纪念物，因为在尼罗河的雨季泛滥期，总有大量劳动力无事可做。

金字塔在埃及语中的意思是“上升之地”，或许，我们可以据此将它与其他文明的人造山丘做一番比较，比如巴比伦人、玛雅人、莫切人（Moche）和阿兹特克人所建造的。毫无疑问，所有文明都通过建造这种大型公共象征物来证明它们统治大众的合理性。还有什么能够让国王（他们可以下令建造金字塔这种纪念物）的真实权力受到更多敬畏呢？不过，金字塔不仅仅是威权主义建筑的早期表现。现在，学者们相信，在埃及金字塔之中，死去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化身。沙拉

卡的阶梯式金字塔是这种观念的过渡时期：通过这些梯子，国王的灵魂可以攀升到天堂，又可以回到陵墓之中。巴比伦西巴尔（Sippar）的金字形神塔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通向明亮的天堂之梯”。这座真实的金字塔完全是这种观念的延伸。它不仅表现了太阳神的光辉普照大地，也体现了灵魂借以攀登的升天斜坡：这是埃及人想像力的典型特征——以物质形式呈现不朽观念。在冬季的吉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阳光刺破云层，光辉呈金字塔形洒向大地：这是太阳的光芒形成的天堂之梯，“聪敏英明的国王可以由此升华为不朽的星辰”。

埃及历史图式

这部分内容并不打算对整个埃及历史进行概括。我们所关注的，是埃及文明的特征及其“伟大传统”，以及希腊人、基督徒、穆斯林时代腐蚀这种特征的诸多重大转变。在其古代历史上，埃及长期维持稳定性，构成“伟大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没有发生过根本变化。对现代人来说，这种特征尤其体现在埃及一成不变的艺术风格上。旧王国（大约公元前 2700 年到公元前 2100 年）的鼎盛时期是金字塔时代，王权极度膨胀，人口也有大幅增长，从前王朝时代大约 50 万增加到胡夫时代的 200 万或 300 万。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充分利用尼罗河每年泛滥之后留下来的沃土。大约公元前 2200 年到公元前 2100 年间，长期干旱致使尼罗河水量常年不足，造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饥荒。这种干旱也给伊拉克乌尔的第三王朝统治者带来了同样问题，它加速了衰微的旧秩序的瓦解。君主政体被颠覆，埃及一度回到千年之前上下埃及分立之势。不过，由于文明的规范和价值持久

存在并且根深蒂固，中央王权很快得到恢复，一个新的和平繁盛时代也随之到来。

这种动力又一次来自南部。在旧王国之后的中间期，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在上埃及城市底比斯兴起，它第一次进入埃及的历史。底比斯的门图霍特普（Mentuhotep）在公元前2130年重新统一埃及，当地神话往往把他视为足以与美尼斯媲美的人，是埃及第二位创始人。底比斯成为南部“首都”，并且延续至今：这也证明了存在于上埃及的根深蒂固的身份感。门图霍特普及其家族修建了许多陵墓和一座纪念性神庙，神庙中有他们的保护者太阳神阿蒙的形象。阿蒙神坐在船上参加每年一次的盛大游行，由此开始了至今依然举行的一个节日。历经中王国（公元前1991—前1786）和新王国（公元前1587—前1085），许多巨大的神庙点缀着底比斯这个曾经的小城市，在隔河相望的西部峭壁环绕的盆地，修建了一系列巨大无比的陵寝：古代世界最辉煌的纪念性建筑群，死者的大都市。希腊人称底比斯为“诸神之城”，它的声望流传到荷马生活的时代，荷马称之为“百门之都”。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人们并没有认真思考以其他政府形式取代神圣王权的统治，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反抗法老统治的叛乱（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统治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社会起义和叛乱在这些时期频频发生）。用现代术语来说，他们的政府是供给者，通过控制尼罗河的资源，为所有人民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统治者由此可以把大量剩余财富用来建造陵墓、神庙和宫殿。国家通过这些巨大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权力意识形态：神圣信仰和世俗统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需要一个稳定的宇宙的信念。对于文明开创之始而言，这种观念是根本的前提条件，即使在今天，基本上我们仍生活在多多少

少具有这种特征的民族国家之中。我们的思想仍然受到埃及的宗教和社会神话的巨大影响，与伟大统治者、国王和诸神相关的传说对我们的影响尤甚。

新王国时期，埃及似乎发展成为更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金字塔时代那种完全的等级制国家——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过，这种社会中依然存在庞大的国家机器、祭司阶层和官僚，他们的任务就是阐释从美尼斯时代流传下来的国家神话。不过，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足以适应新国王时期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政治性的。最近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表明，军队、文职、政府部门以及祭司阶层等专门机构的发展，最终使得国家日常生活被处理经济事务的人接管。国王依然是神圣首领，不过他掌握的实权大不如前。世界已经不再是胡夫时代至高无上的神权统一体：它转变为一种自主的政体，由传统的权利和义务维系在一起。这些权利和义务经历了长期演变，融合了不同的宗教、地方性传统以及古老的倾向。

法老时代的埃及，几乎不存在推翻现存秩序的企图，这一事实表明，总体而言，国家（它以农业为基础）在管理农业社会方面很成功。由于不存在地方货币体系，国家需要一种精细的、有时候可以称为狡黠的剩余产品再分配体制，以便维持庞大的精英群体和所有内政部门的开销。国家是家长制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威主义的。它有点类似于现在许多近东国家，尤其是那些地主阶级。不过，恣意妄为必须与责任匹配在一起。因此，责任也是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国王，已经同意引导这个民族。社会获得了一种保证：各种无法预测的自然力量会得到妥善处理，它们会带来繁荣与和平。三千年以来，基本上如此。埃及的世界观并不缺少伦理内涵，真理和正义是“神祇赖以为生的

根本”，是既定秩序的本质要素。正如伟大的埃及古物学家亨利·法兰克福所说的：“法老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暴君，他的臣民也不是奴隶。”

衰落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是埃及的繁荣时期，不过，从公元前 8 世纪亚述人的侵袭到公元前 525 年波斯人的征服，埃及也经历了长期的外族统治。公元前 7 世纪，埃及一度还是近东一流强国，不过，它很快沦为二流国家，为自身的独立和自主而苦苦挣扎。尽管在努力抗拒冷酷而强大的东方近邻，但是，埃及无法抗衡它们的军事力量。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埃及已经进入“绝对的衰落期”，并两度遭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埃及统治者逐渐对新的军事技术作出反应，开始使用希腊雇佣军和教官，采纳他们的行政制度，并且也开始缓慢地接受一种货币体系。不过，根本的变化依然不存在。我们对埃及的整体印象，一方面是古代实践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就是没有人想要对埃及各种制度进行根本重建。事实上，当时的艺术和建筑往往在回顾古王国的光辉岁月。就此而言，埃及非常类似 19 世纪早期的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成功、历史多么悠久，这些国家已经陷入历史泥淖不能自拔，而周围则是已经脱离政教合一体制的强邻。或许，最大的变化在于一种观念的出现，这种观念认为国王不再是神圣的，不再是正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或者说不再是神祇的同盟者。就整个近东而言，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显得残酷而动荡不宁，在公元前 4 世纪落入希腊人之手之前，埃及文明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可能已经被破坏了。

希腊时代的埃及：古老土地上的外来者

公元前 332 年，埃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文明由此偏离其古老根基，转向海洋和更广阔的世界。数千年以来——甚至可以回溯到埃及统一之前，埃及人与外界的联系，不出阿拉伯半岛、红海、努比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范围。现在，随着希腊人的征服以及亚历山大城的建立，埃及历史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在随后的几千年，埃及人发现自己成为了说希腊语的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埃及古老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终结：它逐渐被希腊化时代活力十足的国际主义文化所改变，这种文化扩及中亚，并且成为后来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基础之一。

亚历山大城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催化剂。公元前 1 世纪，一位罗马作家写道："亚历山大无疑是文明世界第一城，宏大、优雅、富足而奢华。"诗人赫罗达斯（Herodas）声称"那就是天堂"，"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金钱、表演、赛会、女人、美酒、孩童、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简而言之，一切尘世的欢乐。"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的纽约一样，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也充满机会，遍地黄金。各种移民蜂拥而至：银行家、职员、工程师、诗人，甚至还有宗教遁世者。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等地区发现的大量草纸文献，恢复了这些隐士的生活面貌。马其顿隐士托勒密（Ptolemaios）也被埃及宗教深深打动，于是决定定居埃及，过当地人生活，并把余生奉献给孟菲斯塞拉匹奥（Serapeion）神庙（在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一位西方人前往那里献身于黑天）当时还有一位希腊骑兵军官名叫德雷顿（Dryton），他与一位埃及女孩结婚，他们下一代人却开始丧失希腊特征。他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希腊人可以归化为埃及人，学习和吸收当地语言，

但是，埃及人却不很乐意放弃他们的习俗。在绝大部分时期，希腊人依旧是代表异国他乡的外来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没有融合。在亚历山大城的墓穴中，参观者还是可以进入到一个奇幻而精彩的世界，在那里，埃及、希腊、犹太以及东方宗教相互交织在一起。前往埃及的希腊人对当地神祇的态度非常开明。地中海地区的异教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把阿蒙神等同于宙斯，也很容易认为埃及人是以哈托尔之名崇拜爱神阿芙洛狄忒。

人们可以在考姆艾尔苏卡法陵墓（Kom el-Shukafa）中发现这种情形，该陵墓建造于 2 世纪，现在深埋于亚历山大城下面。乍一看，它是一座典型的埃及陵墓，正前方是莎草巨石柱[5]，柱身背面刻着有翼的太阳图案，正面是一排排眼镜蛇的头。不过，仔细一看，我们会发现，柱身上古埃及人的姿势与希腊—罗马人的面孔结合在一起。陵墓大门由埃及蛇神守护，不过，它们握着希腊赫尔墨斯（灵魂的引导者）的蛇形权杖。陵墓里面石棺的装饰，具有希腊传统的葬礼特色：一束葡萄藤、花环、牛头骨和面具，不过，它们上方却是古埃及诸神。艾西斯张开双翼保护神牛，智慧之神透特也在那里，鹰首的荷鲁斯照管死者的木乃伊。甚至还可以看见胡狼头人身的阿努比斯，即死者的守护神，不过身穿希腊—罗马甲胄。这是一种奇特的综合，出现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即普鲁萨的迪奥[6]说的世界的中心。

从古代世界到伊斯兰教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一个最棘手的历史问题：文明为何会有兴衰，是什么导致它们的世界观发生根本改变？我们如何解释埃及从法老时代向伊斯兰教时代的巨变呢？这可能是埃及历史上的关键问题。公元

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希腊文化圈扩大至印度，在其庞大的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刺激着各种宗教观念，并最终打破了这些文明的核心区域的古老秩序。轴心时代的革命性理想已经悄然褪去。在尼罗河谷地、新月沃土地区、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半岛，古老的神祇也暗淡无光。新的精神运动无处不在：一神论、多神论、神秘主义以及超验主义等等。记载在笨重物件上的古老神圣的语言（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被灵活通俗的希腊语和阿拉姆语的混合体所取代。对城市穷人来说，亚历山大和安条克（Antioch）这类国际大都市就是宗教沉思和大众信仰的中心。亚历山大甚至还有一个佛教群体，以及一些苦行禁欲派信徒，这些修行者半裸身体，在尼罗河洗澡，并且像印度教婆罗门那样过禁欲生活。一方面是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信仰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对“灵知”，即内在知识的追求，这种追求与过去以礼仪为基础的宗教形成鲜明对照。后来，诺斯替主义已经被视为一种普遍性宗教现象。它实际成为另一种世界宗教。

通过古姆兰会社（Qumran community）的《死海古卷》以及对早期基督教、伊拉克曼底安派和摩尼教（它在伊朗的诺斯替主义分支兴起于3世纪）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个人救赎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不过，埃及是宗教融合的温床。在希腊文化和希腊精神的冲击下，埃及古老的宗教体系土崩瓦解，由此滋生出许多不同宗教派别，它们竞相表达近东各派思想。在阿拜多斯附近的哈马迪村（Nag Hammadi）发现的“诺斯替古卷”，体现出对早期基督教完全不同的解读，对上帝之本质、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以及早期教会的基本问题“永罚”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各种信仰交织缠绕在一起，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古老的青铜时代的政体最终瓦解了。

正如卡尔·荣格在论述希特勒时代的先例时所说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察觉到了“精神变化”的征兆），人们感觉到，古老的“凌驾于此世之上的神话时代的权威”正在消逝：“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熊熊大火的第一丝味道”。这种心理冲突最显著的迹象之一，就是埃及传统文明中自信的世界观开始消失。在亚历山大和尼罗河谷地的诸多城市里，越来越受到排挤的城市居民转而信奉基督教，因此，埃及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情感，一种对物质世界的拒绝：禁欲主义。在罗马人统治晚期，埃及发生了一场足以与任何政治革命相比拟的声势浩大的动乱。近东文化的精神由此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自此之后也帮助塑造了西方人的心智：在整个尼罗河流域，千百万人开始过一种禁欲生活。这与我们生活的时代遥相呼应：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中也存在这种脱离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团体，以及一种广泛传播的看法，即文明本身已经失败了。埃及哲学家柏罗丁（Plotinus）声称：“更好的城市总有一天会出现。”“我们的孩子，尽管被认为生活在一个罪孽深重的年代，仍可能会建造出比父辈更好的城市。”异教文化的古老结构，以及埃及人长期信奉的稳定的宇宙，被基督教侵蚀。基督教诉求的，不是一位伟大的世俗统治者，而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上帝。爱比克泰德说道：“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认识到人类的状况是多么不安全。”

埃及传统宗教的终结

在尼罗河谷地的古老城镇，古代宗教一直幸存到基督教时代。事实上，从希腊人征服埃及开始算起，埃及传统宗教的瓦解花了近1000年时间：这也证明了它的韧性。到6世纪末，即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前

夕，埃及已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基督教徒。直到那一时期，传统宗教依然很有组织基础，有自己的祭拜神庙。而差不多在 2 个世纪之前，来自罗马的敕令就已主张禁止这一古老宗教。

在中世纪，艾赫米姆是埃及著名的纺织中心，现在依然如此。它的一些布料残片（来自罗马晚期）体现了一种丰富的混合文化：希腊、埃及以及基督教主题结合在一起。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旅行家希罗多德游历过艾赫米姆，后来他在著作中写到，该城居民认可希腊习俗。直到罗马帝国晚期，甚至直到伊斯兰教征服之际，他们一直如此。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传统宗教神庙，其中有一座用来祭祀希腊英雄珀尔修斯。不过，最著名的是祭拜古代神祇敏的神庙，希腊人把敏神等同于自己的潘神。直到 115 年，该神庙最终才在图拉真（Trajan）[7] 手上建造完工。中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称颂它是世界一大奇迹。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在 1183 年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神庙”，并极力赞美它精美的装饰：天花板上的绘画和雕刻、刻有字母的 40 根巨大圆柱（占地面积大约 8593 平方米）。从 14 世纪以来，这座神庙以及艾赫米姆的其他神庙开始遭到毁坏。2 世纪图拉真建造的一座罗马神庙是一个例外，它的遗址一直保存到 19 世纪。最近的挖掘工作使得敏神神庙的遗迹开始展现出来，它深埋在街道下面，正如伊本·朱拜尔所说的，位于“城东围墙之下”。1989 年，拉美西斯二世女儿的两尊巨大雕像被发掘出来，表明这座一直保存到伊斯兰教时代的神庙可能建造于第十八王朝。

5 世纪时，上埃及的名望主要来自说希腊语的文学人物，如底比斯的奥林匹奥多鲁斯（Olympiodorus）。他四处游历，到过埃塞俄比亚和黑海，随时带着自己那只忠实的鹦鹉，这只鹦鹉能够说阿提卡地区的希腊语，并且“能够叫出主人的名字”。艾赫米姆有一个传统

宗教诗人圈子，他们在东罗马帝国到处游历。其中有一个人叫诺诺斯（Nonnos），他用希腊语创作了大量史诗，达48卷之多，篇幅足以媲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在书中论述了古代晚期著名的传统宗教神祇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些人物有助于我们认识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埃及发生的思想和心理变化。晚近在上埃及发现的莎草文丛，即关于炼丹术、魔幻和占星术的文献，还有一些涉及神秘主义和异教哲学，就来自这种世界。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帕诺波利斯（Panopolis）的炼丹术士佐西默斯（Zosimus）把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犹太教和“东方智慧”糅合在一起。也是在这种环境下，5世纪晚期著名传统教徒霍拉博罗尼（Horapollon）依旧尝试写下一篇论述象形文字的专论。他的父亲阿斯克勒庇阿得斯（Asclepiades）撰写了一部文学史，论述3万多年以来埃及的早期传统。因此，在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反异教敕令发布很久之后，敏神神庙依然能够保存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5世纪，艾赫米姆周围富有的地主绝大多数依然是说希腊语的传统教徒。事实上，市政官员从基督教信仰回归到埃及传统宗教信仰的事情时有发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世纪早期，好斗的基督教修道院院长，即白修道院（White Monastery，至今还屹立在艾赫米姆的河畔）的谢努达（Shenuda），趁着夜色率领狂热的僧侣袭击了城外信奉异教的地主。最终，僧侣们攻击了敏神神庙本身，偷走了敏神雕像和一些经书。不过，当地的宗教祭司依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把谢努达告上法庭，控诉他破坏艺术的行为。在上埃及其他地方，希腊文化一直保存到6世纪。努比亚的菲莱（Philae）神庙直到查士丁尼（527—565）统治时期才被关闭，当时人们用它来举行基督教的一些仪式。那时，埃及祭司都目不识丁、穷困潦倒，象形文字长期被简化

为完全不可思议的胡言乱语（munbo-jumbo）。尽管一直到 2 世纪，一些城市，如艾赫米姆和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依旧雇用传统石匠来刻写纪念性象形文字，不过，2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此后，这种古老文字只为一小群精英所掌握。最后的铭文来自 4 世纪，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混乱的信息。霍拉博罗尼撰文论述象形文字的时间，差不多临近公元 500 年，不过，他已经无法知晓它们的意思。很快，他就皈依了基督教（他父亲主张“宗教和谐”）。这是那个时代的表征。

6 世纪，整个埃及的神庙在改造成教堂之前就遭到了破坏。在阿拜多斯，基督教狂热主义者蓄意破坏了一些宗教建筑，因为它们把古代人与古老的神祇联系在一起。在卢克索阿美诺菲斯三世神庙的内殿，修建了一座科普特教会的教堂（Coptic Church）。哈布城（Medinet Habu）城墙上的雕刻遭到破坏，艾西斯的脸和敏神的生殖器消失不见了。一场精神革命正在发生：这是一场从多神崇拜转向一神崇拜的运动。在这场危机当中，伊斯兰教来临了：亚伯拉罕的宗教[8]经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也发展成为最后一种伟大的世界宗教。借由先知穆罕默德宣扬的宗教，埃及与东方（红海另一端）的古老联系得以恢复。

伊斯兰教时代的埃及

641 年，在经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千年统治之后，埃及落入穆斯林阿拉伯人之手，这些人信仰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不过，制度上的这些变化，并没有对伊德富的生活产生明显影响。直到公元 700 年，官僚机构依旧在使用希腊语，正如千百年来它所做的那样。这种

转变只是慢慢才明显起来。长久以来面向地中海的埃及文化生活，再次将目光投向新月沃土地区。

正如整个地中海和近东世界一样，在伊德富，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成为古代埃及人的继承人。罗马人统治晚期发生的那场重大革命，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最后记载在莎草纸上的希腊语宗教文献之一（来自 7 世纪晚期的埃及），为那场革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文献以希腊语所做的记载是所有穆斯林信仰的核心："以仁爱慈悲的真主之名起誓，世界上有一个真主，而且只有一个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一切意图和目的都指向真主，艾西斯、哈托尔和阿芙洛狄忒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向伊斯兰教的过渡经历了许多世纪。一项大约公元 700 年的调查表明，农村地区——"1 万个村庄，500 万人口"——几乎全部是基督教徒。只是在经历一系列反抗和穆斯林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之后，民众才在 8 世纪逐渐信仰伊斯兰教。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反叛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繁重的税收，而不是宗教冲突。直到 10 世纪，伊斯兰教才成为多数人的宗教。今天，科普特基督教徒（the Christian Copts）的人数仍在增长，但是不足总人数的 10%。

时至今日，前基督教时代的传统宗教文化只是保存在民间习俗和乡村之中，尤其是在上埃及地区，这种深层的历史依旧清晰可见。每年三月中旬月圆之时，酷暑即将开始，人们会举行一个盛大节日，它显然保留了古埃及大众文化的一些痕迹。

节日期间，无数人从四面八方的乡村来到小镇卢克索，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当地的人们依旧在庆祝一些古老节日：春节、尼罗河水位上涨时的庆祝，尤其重视哀悼死者 40 天的活动，这些都是从法老时代流传下来的。事实上，在僻远乡村还可以看到一些地方

节日，它们继承了古代崇拜，比如，对圣人、古老的圣殿、树木、蛇以及女神的崇拜，不过现在这些节日已经伊斯兰教化和基督教化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最大的节日。这个节日纪念的是穆斯林圣徒阿布·哈加戈（Abul Haggag）。人们在一座清真寺举行纪念活动，不过，这座清真寺修建在一座巨大古埃及神庙内部。清真寺古老的地基正好位于公元前 14 世纪修建的圆柱中间，下方是 20 英尺高的古老遗迹。科普特基督教徒也参加这个节日，因为神庙里面曾经有他们的一座教堂。事实上，这位穆斯林圣徒的妻子是一位科普特基督教徒。按照传统，科普特女信徒一直在唱圣歌哀悼这位圣徒。

阿布·哈加戈死于 11 世纪，正值伊斯兰教成为上埃及主导性宗教之际。自那以后，他位于清真寺内的陵墓成为朝圣之地。在清真寺的台阶上，小贩在卖熏香、念珠、护符和纸符等纪念品。当你走到里面，就会看到墙上女信徒留下来的血手印，这是旧石器后期的习俗。正统学说所要求的，往往与人们所做的不是一回事，这是世界各地的常见现象。在崇拜教长和圣徒时，普通民众，即菲拉辛人（fellahin）的日常希望和恐惧，与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神建立了一种联系。人们围着陵墓唱圣歌和祷告，随后用上埃及传统音乐尽情庆祝。5000 年之前，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不过，漫长的统一年代并不能完全掩盖结合的裂缝。即使在今天，上下埃及依旧是两块土地，有各自的特征、习俗和传统，因此来自开罗或三角洲地区的人会在这个庆祝之夜感到很不自在。事实上，就今天而言，哈加戈节或许是最接近古代庆祝活动的节日，当时人们每年都会庆祝奥西里斯的复活带来的新生。

哈加戈节在第二天达到高潮。他的后代会抬着哈加戈及其子的象征性棺木，在神庙和清真寺周围举行盛大游行，他们后面跟着卢克索船夫和用于礼仪场合的船只。这些船只用车子装载，船夫们履行他们

的传统责任：数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是在古城卢克索的街道上抬着太阳神阿蒙的船只游行。这一天结束于豪饮、歌舞和性放纵，而非庄严肃穆：或许这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不过真实体现了先辈的精神。这让我们想到希罗多德的记载。他在公元前5世纪描述过人们为纪念女神巴斯泰特（Bastet）而举行的狂欢节。“埃及人前往参加这个节日时，他们通常男女同船，每条船上载有许多人。一些女人大声说话，一些男人一直吹一种管状乐器，其他人边唱边和，拍手庆祝。他们每经过一个城镇都会停留，一些妇女登岸，大声嚷嚷，取笑当地女子，其他妇女则提起裙角跳舞。每经过一个城市，他们都如此取乐，当到达目的地时，这些人就开怀畅饮，喝的酒超过这一年剩余时间的总量。当地人说，每年有70万男男女女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朝拜活动，这还不包括孩子。”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在河对岸，西部峭壁下面的绿地是死者安息之所。拉美西斯三世的巨大陵墓位于哈布城，现在依然与科普特基督教徒村庄的部分泥砖废墟混在一起。19世纪时，陵墓碎石庭院上的村庄废墟曾经得到过清理。这座陵墓还是一座神庙，大门外是一个装满水的小神池，没有孩子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妇女会悄悄来这里，通过居间的女巫来祈子求福，这种女巫现在还存在于民间宗教当中。这正是古代埃及人所做的。正如伟大的希腊现代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他生于埃及）所说：

我们砸碎他们的塑像，
我们把他们驱逐出神庙，
并不意味着这些神祇已经消亡。

开罗：伊斯兰教遗产

古代遗产也在开罗保存了下来。伊本·白图泰声称开罗是“众城之母”，“它不计其数的建筑物富丽堂皇、精美绝伦、无可比拟。它是旅行者汇集之地，强者的乐园、弱者的避难所。人们蜂拥云集，如大海之波浪，绵绵不绝”。开罗建于10世纪，临近古都孟菲斯以及吉萨和沙卡拉金字塔。到那时为止，美尼斯的都城，即“白围墙的孟菲斯”依然是一个神话传说，正如伊本·阿尔·法基（Ibn al-Fakih）当时所说的，“这座法老的城市有70扇城门，坚固犹如铜墙铁壁”，如今它的废墟上面是一个贫穷的基督教村庄。孟菲斯的名字很快就被遗忘了。在尼罗河对岸，开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之都。开罗和埃及躲过了1258年蒙古人的蹂躏，它们继续担任古典阿拉伯文明丰富遗产的捍卫者，直到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那时，阿拉伯世界或许不再是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这种声誉落到了波斯和土耳其头上，不过，埃及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并将会保持这种地位。

即便在今天的开罗，在它那些清真寺和大学里，我们仍旧可以发现与法老时代的鲜活联系。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开罗，文明具有保守性，像此前的埃及文明一样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因此不同于10世纪巴格达那种辉煌世俗模式的文化，也不像波斯那样尝试对东西方做出神秘主义综合，开罗的文化传统深厚而讲究实效，一直致力于维持和解释埃及的遗产。同时，最重要的是，阐释宗教经典《古兰经》、传统以及律法。艾资哈尔（Al Azhar）清真寺是主要的伊斯兰教育中心，比牛津和索邦神学院都古老。这里的教育主要是研究和学习圣典，像过去那样让埃及团结起来，并且设法在原教旨主义时期维持世俗与精神、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平衡。事实上，中世纪开罗的建筑也让

人想起法老时代的城市：巨大的皇家清真寺、拥有大量穹顶的伊斯兰风格的神庙、旧城区的死亡之城、抄写学校和宗教学府以及周边众多的祷告建筑无不如此。尼罗河西岸或许不再是死者的墓地，不过，像以往一样，这座规模巨大的神圣建筑依旧履行着相同的功能（事实上，这座神庙的地产，或者说宗教财产，占可耕土地的十二分之一，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由纳赛尔总统收归国有）。这种文明，不管其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巨大和明显的断裂，都能保存文明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继续以先辈的方式行事。或许，这两种密不可分的观念，是我们理解文明本质的一条线索。

伊本·赫勒敦论埃及历史

在 14 世纪的开罗，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考察了上面提到的连续性问题。他所关注的问题与我们关注的一样：文明的本质及其兴衰。他认为，文明的目标是定居合作的人类生活。与所有生命形式一样，文明也经历成长和衰亡周期。有时他认为，社会的过度消费是衰落的必然原因之一。不过，伊本·赫勒敦相信，在有利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再加上人们的优良品性、习俗和集体感，文化可以获得一种根基，他称之为“文明的积淀”。在所有历史上，埃及或许是这种积淀的典型。他指出，法老掌握权力达 3000 年之久，继之而来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然后这种遗产体现在伊斯兰教身上。“这种文明的积淀在此延续，它的深厚根基胜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这个观念或许可以解释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长期占据的文化领导地位的原因。13 世纪蒙古人的侵袭摧毁了伊拉克，不过，埃及未受影响，它一直是伊斯兰世界富有活力的中心，直到 16 世纪

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即使在今天，埃及依旧拥有一种丰富而多元的文化，这让人们想起希腊化时代。埃及早期的国家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做出了综合性尝试：满足人们生活在一个有序国家的需求，同时物质富足、生活幸福。到目前为止，它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注释

[1] 古埃及的仪式用石板是前王朝时代研磨眼影颜料的小石板发展来的，故称为调色板。

[2] 指以希拉孔波利斯为中心的北方王国和南方王国的前王朝国王。

[3] 即内克贝特。

[4] 太阳船被认为可以载着死去的法老追随太阳神，胡夫太阳船最具代表性。

[5] 埃及巨石柱的一种形式，柱头有莎草图案，柱身笔直。

[6] 古罗马时代的颂歌诗人、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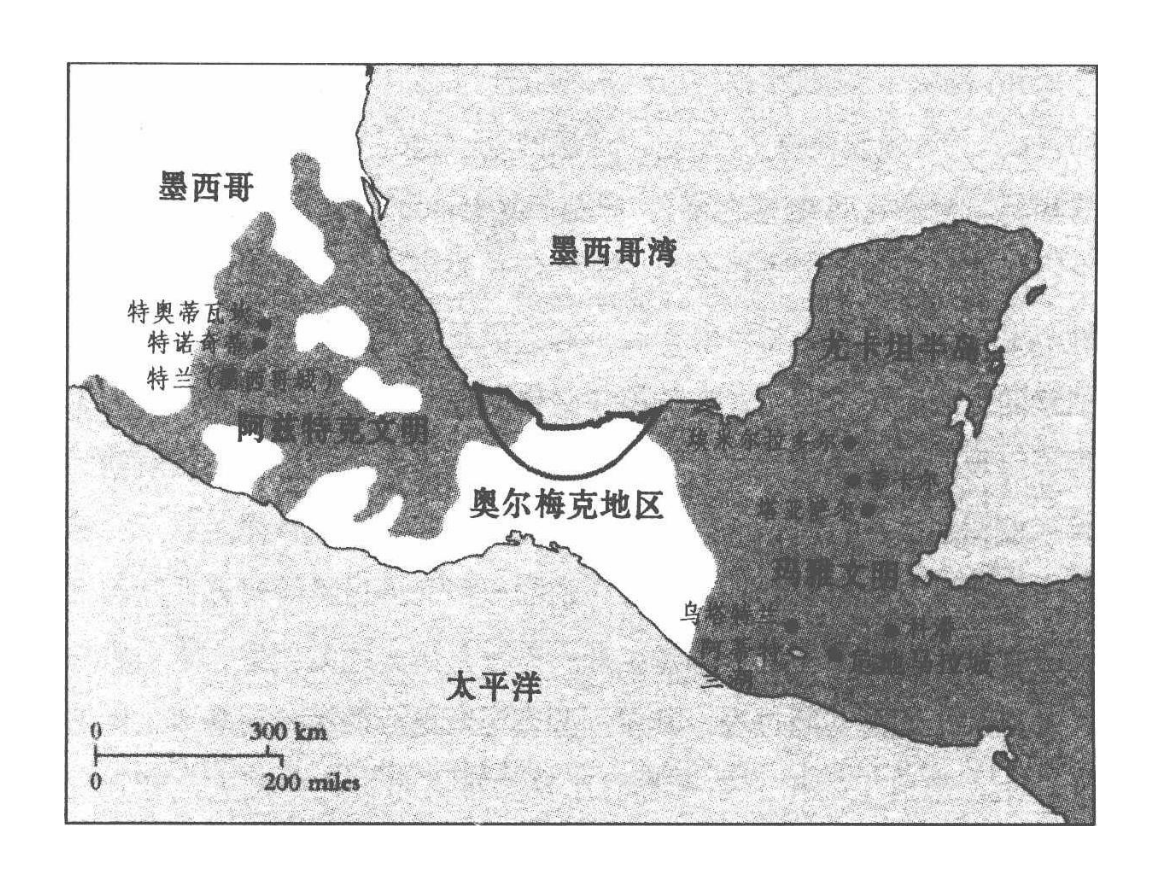
[7] 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

[8]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信奉亚伯拉罕为共同祖先。

第五章　中美洲：时间枷锁

160年前，欧洲探险者在中美洲密林深处，发现了一种已消失文明的遗迹。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在1839年写道："在庄严静穆的丛林中，这些纪念性建筑物犹如圣物和神器，哀悼着一个衰亡的民族。"在此之前，墨西哥、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的这些城市不为人知，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城市的建造者玛雅人在天文学、科学和数学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他们甚至独立创造出了文字。科潘（Copan）的发现者声称，这类城市遗址"就像一种新发现的历史，证明古代美洲人并不是野蛮人。恰恰相反，他们的建筑足以媲美古埃及最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他们掌握的艺术、建筑和雕刻方面的高超技艺，并非源自旧世界，而是起源于美洲本土。他们并没有借鉴和模仿他人，很显然，就像当地的植物和果实一样，这些技艺也是土生土长的"。

当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城市文明辉煌璀璨之时，美洲迎来了第一批欧洲人，这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al Diaz）声称，"我们无比惊讶"，"大家说，我们所看到的就像古代神话中的魔法。一些士兵甚至说，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幻象。面对这些壮观的景象，我们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如果我们今天碰到外星人，或许就能够体会到这些征服者当时所经历的震撼。



中美洲与文中提到的主要地点。墨西哥平原，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高原在历史上形成了明显的文明区。

美洲文明的成长和繁盛，与旧世界、近东、印度和中国文明没有任何联系。美洲发展出了成熟复杂的社会，建造了伟大的建筑。这里创造出精致的礼仪、文字、科学、数学，以及与埃及金字塔类似的建筑。欧洲人无法相信，这些土著民族竟然创造出如此复杂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毫不逊色于欧洲。一位16世纪的修道士承认，“这些印第安人道德高尚”，“他们非常熟悉机械技艺和人文学科，他们是完美的哲学家和占星家。就政策而言，他们领先于那些自称在政治舞台很伟大的民族”，他继续说道，“不过，可恶的是，他们的宗教是对基督学说的嘲讽，完全出自魔鬼之手”。它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在旧世界文明中，即便印度和中国这样最具原创性的文明，也彼此学习，因为它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是，美洲却出现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文明，神奇的是，它严格、坚持不懈地追求自身独具特色的人类命运观。如果说美洲文明与旧世界文明物质上的相似性很快就能一目了然，那么，它们在道德上的差异着实让人费解。

上述有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人的讨论，对那些欧洲人而言似乎完全是新奇的。不过，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线索，它们来自人类更加久远的共同过去，其中一些甚至对最早的学术观察家，即耶稣会士，造成了冲击。如果我们比较玛雅人与古代中国人，就会发现，他们拥有相似的信仰、实践活动以及象征。这些相似性表明，美洲诸民族起源于亚洲，它们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与这种史前起源的联系。即使在今天，人们依旧可以在危地马拉乡村发现对玉的崇拜，像中国人一样，当地人不但利用玉器祈求安康，也把它用于丧葬仪式。其他一些相似性还包括：乌龟和蝙蝠的象征意义、占卜、烧纸祈福以及生命树的各种呈现形式。此外，古典时期的玛雅艺术与中国艺术在某些方面也极为相似。这些要素无疑要回溯到语言出现之前，回溯到

亚洲人的共同根源——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亚洲人在中国心脏地带演化。玛雅人还与中国人持有同一个基本信仰：他们都认为文明和人类并非在自然之外，而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去理解这种自然秩序是人类的责任，同时也符合人类利益。与中国人一样，玛雅人也通过占卜、萨满教以及智力和道德控制来理解自然秩序。迷恋时间是玛雅人文明观的核心，他们以大循环（包含千百万年）来衡量时间。事实上，时间在宇宙存在之前就存在了。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探究宇宙，希腊人通过几何学，印度人通过形而上学，玛雅人则通过永恒的数学。

自 1492 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以来，两种不同的文明就一直在争夺美洲各民族的心灵：一种是外来的、晚近的西方文明，另一种是古老的、土生土长的当地文明。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斗争，也是最近 500 年来人类历史的主题。在美洲爆发的这种斗争，还伴随着明确的暴力和偏执。尽管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性改宗，不过，美洲人从来没有在精神上被征服过。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语言、信仰以及古老的宇宙和时间观，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一直忠于“古老的未来”。本章讲述的是一种文明的毁灭，以及它的一些理想如何在民间文化中顽强地保存下来，并且流传至今。

高地玛雅的遗迹

我们从危地马拉的奇奇卡斯特南戈（Chichicastenango）开始考察。“奇奇（Chichi）”是高地基切玛雅（Quiche Maya）的一个市镇。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这里是玛雅人的一个定居区。它的两座前哥伦布时代的主要神殿，今天依然在履行着神圣职责。这两座神殿已经成为天主教堂，较小的卡尔瓦里奥教堂（El Calvario）严格禁止欧洲

人入内。较大的圣托马斯教堂俯瞰市集，一排气派的台阶通向大门。台阶上有一座传统的生火祭坛，游客可以用自制的香炉在此焚香烧纸，祈求门口玛雅守护神的宽恕。在市场周围，人们可以通过商人上衣的图案识别他们来自何处。例如，西泊巴（Xibalba），即蝙蝠，是玛雅地府的古老象征，在卡克奇克尔玛雅（Cakchiquel Maya）末代王朝统治时期，人们都穿着绘有这种图案的衣服。今天，蝙蝠是阿蒂特兰湖（Lake Atitlan）附近城市索洛拉（Solola）的标志。女性上衣的设计（huipils）最精美，它们往往暗示宗族和世系。通过这种方式，玛雅古老宇宙模式的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

在奇奇，传统的文明礼仪由宗教协会（称为 *cofradias*）维持。协会可以回溯到前哥伦布时代，它们负责组织庆祝当地基督教以及玛雅宗教节日。1702 年，欧洲人正是经过奇奇的宗教协会的许可，翻阅和复制了玛雅人的创世纪——《波波尔·乌》（*Popol Vuh*）的手稿，这也是唯一一部为人所知的手稿。这部伟大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就是来自这些复制品。尽管玛雅萨满教僧人依然熟悉它的故事，仍然很可能存在其他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手稿。

教堂中部摆放着玛雅人的祭坛，人们在这里焚烧香烛和柯巴脂，祈求祖先、萨满教僧人以及助产士的帮助。正殿像谷仓一样宽敞，直通阳台上一端有一个巨大十字架的支柱。这不是普通十字架，而是玛雅神话中所说的具有神奇魔力的“言说十字架”。19 世纪反抗欧洲殖民者的一次大规模起义，就借用了它的名义。对美洲所有土著居民来说，宗教协会的祈祷人可能就相当于一部教材。他们也阐释了我们正在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一种更古老文化的残留物与它的替代者并存，甚至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们声称：“这些崇拜仪式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是从最初的神灵时代流传下来的，从来就没有失落过”，

尽管期间有过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耶稣我主，不要指望我们放弃这些习俗，对我们来说，发生改变的，只是名称和运气而已。”

玛雅人消失的创世纪手稿在奇奇的发现，证明玛雅文化遗迹另一个迷人的方面：书面证据的坚韧性。500 年前，欧洲人首次接触到新大陆文明，这 500 年见证了欧洲人的征服、奴役以及对大部分新大陆文明的毁灭。16 世纪，天主教会一致决定根除玛雅文献，正式烧毁所有书籍。今天我们都知道，保存在西方图书馆的玛雅典籍只有几本而已。不过，你只要走入危地马拉高地的村庄，就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也即玛雅人的后代，不可思议地坚守着他们一些最基本的信仰和传统。他们保存的一些书面材料，证明他们对祖先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尽管直到今天他们依旧不愿意让欧洲人看到这些材料）。在托托尼卡潘（Totonicapan）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当地一家农户是该地区最后一位玛雅领主的后代。如今他们已经变成农民，共住一间大房子，房间地板是压平的泥土地面，没有其他装饰。一面墙上设置了精美的神龛，前面有一道玻璃，中间供奉着家族神祇圣詹姆斯（St James），该神具备玛雅战神的特征。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这户人家还保存着一些 16 世纪的手稿，其中一部堪称伟大，记载了他们对世袭土地的合法权利。西班牙人征服活动之前，这个家族一直拥有这些土地。他们秘密保存着这些手稿，从来不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玛雅命途多舛之际，尤其在天主教会系统摧毁玛雅文献之时，谁又能责怪他们这种作法呢？这本家庭藏书的第一页，是一幅奇怪的地图。这幅地图标示了基切玛雅的末代都城，一个神圣而重要的地区。事实上，16 世纪早期，该家族一位先祖曾在那里的宫廷担任重要职务。地图上还有四座主要金字塔、一个巨大神圣的广场、一座祭祀大地神的圆形祭坛、一个球场以及一座皇宫。下端是地图绘制者的

一条按语，写于16世纪50年代中期的奇奇。按语声称："这些石造建筑歌颂伟大的奇奇。"引人注目的是，这部手稿的编辑年代与玛雅创世纪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同，这两部著作的附录都提到当时该地区一些重要的玛雅人。很显然，当西班牙人用暴力征服高地玛雅之后，欧洲人的统治地位日渐稳固，一些玛雅贵族觉得有必要展望未来。

1524年，西班牙征服者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摧毁了托托尼卡潘著作中描绘的城堡。今天，玛雅萨满教僧人、祭司以及术士依然造访乌塔特兰（Utatlan）废墟，在当地历法节日期间，他们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这是一个精神世界，500年以来，他们一直私下维持这个世界。废墟位于玛雅高地深处，四周环绕着密林和峡谷。这里是基切的心脏地带，今天，当地人仍在反抗欧洲人的统治。不过，乌塔特兰还隐藏着一个更惊人的秘密。在西班牙人摧毁的城堡正下方，有一个深入地下300英尺的洞穴。自城市毁灭之日开始，各种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而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神职人员在此向大地、祖先以及玛雅古代国王祷告颂扬"神圣废墟之城"和他们古老的种族（*Nuestra raze Maya-Quiché*）。他们焚烧油脂香烛、食糖和柯巴脂，并且浇上烈酒，以便黑暗中火焰升腾、浓烟翻滚。关于神圣大地——玛雅创世纪《波波尔·乌》（*Popol Vuh*）有记载——的措辞，来自基督教和玛雅符咒的奇特混合："神圣的大地，大地的心脏，生命的赋予者，赐予我们孩子，让他们不要偏离您的平安大道，让内在的连续性显现。"随后，神职人员们会在洞穴入口生一堆火，旨在"向天地表示谦卑的感谢"。黑烟沿着峭壁袅袅上升，拂过各种缠绕的藤蔓，最后与日光交融。玛雅人吸收了基督教许多教义，不过，基督教始终不认可他们的大地母亲。

在基切玛雅中心地带更纵深的地区，即莫莫斯特南戈（Momon-

stenango)，我们可以看到玛雅习俗坚韧性的最后一个例子。这座城市的山丘上有一座玛雅萨满教僧人安德列斯（Andres Xiloj）的住宅。安德列斯是连接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世界的鲜活纽带。他身为萨满教僧人长达50年，是一位家族领袖（lineage head），被称为“Chuchkahau”，字面意思是母亲—父亲。他也是日期保管者（daykeeper），玛雅历守护者，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地区，这种历法现在依旧得到保存。他也擅长传统符咒仪式及其咒语。“安德列斯先生能够解释《波波尔·乌》这类古代文献。在大病一场之后，他成为日期保管者，由此决定‘为大地服务’。”安德列斯不但扮演心理学家，也扮演通灵者，利用神圣的占卜来为人诊断，来“感觉”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以及解读自己内心感受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最终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以光明取代黑暗”。根据玛雅历的日期，他为病人排列光亮深红的珊瑚树种子和水晶。玛雅历以260天为一个周期，基切玛雅人认为，这个周期基于母体内婴儿的妊娠期而成。就玛雅人的年份计算而言，他们使用13个数字和20个符号，例如，六条蛇或八只猴子可能表示一天。日子有吉有凶。就像许多基切玛雅人一样，安德列斯熟记这种历法，能够在几秒钟内将它换算成西历。一种文化自身的时间的保存，或许象征着这种文化的生存意志。在安德列斯先生看来，有些观念比其他观念更能够体现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对玛雅人来说，大地是神圣的。这也解释了《波波尔·乌》的描述：人类“被赋予记忆来计算日子”，“敬重它的神圣性；维护连接人类、自然和天堂的礼仪”。没有这些，宇宙就失去了意义，正如安德列斯所说的，“如果我们与大地为敌，我们就是与自己为敌”。

中美洲文明的故事与旧世界的完全不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狂暴、蓄意和系统地毁灭一种文化，这是相当晚近时发生的。安德列斯

的占卜、奇奇的宗教协会（cofradias）、玛雅的天主教堂、消失的手稿以及乌塔特兰的礼仪，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一种集体抗争，一种维持整个宇宙的努力。自 500 年前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以来，这种努力就没有中断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种文明如何遭受另一种文明的征服和压迫，但是拒绝接受后者的价值。

考古学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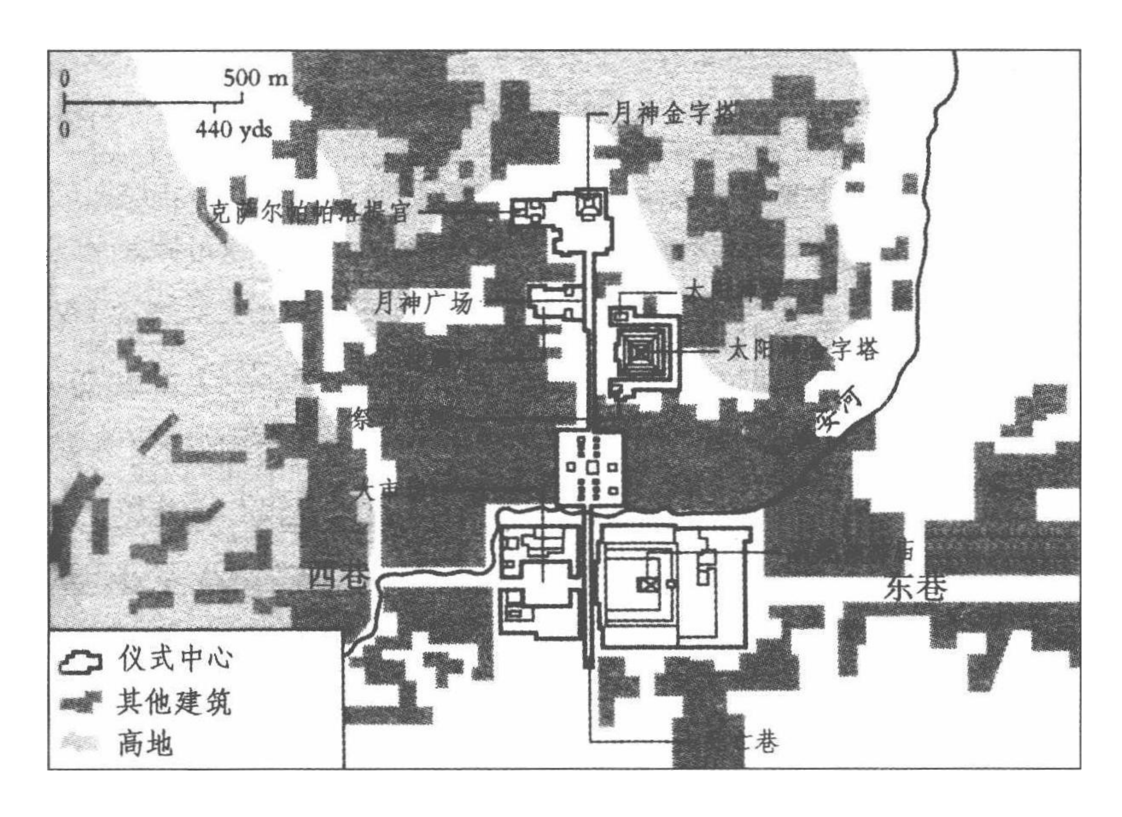
在这里考察一些背景可能很有帮助：人类大概是在最后一个冰川期，在 12000 年到 40000 年之前（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至少是在 20000 年之前），从西伯利亚穿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升高的海平面把美洲大陆隔离开，1492 年之前，它一直独自发展。我们会发现旧世界文明与新大陆文明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体现在农业、城市、冶金、占卜、文字以及象征符号等方面。到公元前 9000 年，拓荒者已经到达南美洲最南端。到公元前 7000 年，这里的人们已经培育出主要农作物，尤其是玉米。中美洲和南美洲已经出现农业村庄，公元前 3000 年，在安第斯山地区，包括亚马逊河流域在内出现了至今人们仍知之甚少的大规模定居区。这些地区的文化特征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公元前 1000 多年开始，中美洲奥尔梅克人（Olmecs）、秘鲁查文人（Chavin）分别对当地圣像画、宗教和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欧洲人征服之前乃至征服之后。美洲主要文明都受到这两个地区的启发，包括中美洲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玛雅、托尔特克（Toltec）以及阿兹特克文明；安第斯山区莫切（Moche）、纳斯卡（Nazca）、奇穆（Chimu）和印加文明。3000 年前奥尔梅克艺术具有一种非凡的内在力量，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觉到中美洲宇

宙观的沉重、坚韧和淡泊之情。

特奥蒂瓦坎

公元第一个千年，在墨西哥谷中美洲文明首次大放异彩，文明的中心是特奥蒂瓦坎，“凡人成仙之所”。早期墨西哥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巨大城市，它是覆盖整个中美洲地区的贸易帝国的中心。公元500年时，特奥蒂瓦坎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20万，这座大都市属于方格布局，神庙、宫殿和住房占地8平方英里。中美洲文明是独自发展出来的，这里建造的巨型金字塔足以与埃及和巴比伦的相媲美。这也说明，尽管在时空上与旧世界分离久远，不过，这里的人们依然创造出相似的象征物，也同样希望在天地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近，在太阳神金字塔正下方的重大发现表明，这座城市的布局基于一种精妙的宇宙象征主义而成。它建立在一个天然洞穴上方，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火山岩，从洞穴通向一间四通八达的洞室。洞室处于金字塔正下方，现在已经毫无生气。那里是最初的朝圣之地，也决定了上方金字塔的地址选择。后来玛雅人的创世神话（即《波波尔·乌》）也提到，早期祖先就是出现于此，它也是太阳和月亮的诞生之所，时间开始的地方。特奥蒂瓦坎成为一个重要的圣朝所。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居民区的祭坛，以及大量生产神像和陶器香炉的陶器作坊。

这是中美洲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不幸的是，我们对创造这座伟大、规划良好的大城市的统治者一无所知，因为并没有书面文献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不过，如果把该城市的起源与中国商朝早期城市的起源加以比较，那么，东方城市文明之起源以及人



特奥蒂瓦坎，墨西哥平原上的大都市，大约公元前500年。它的礼仪性轴线于群山和星辰呼应。比较马杜赖（第73页）或西安（第94页）。

们所说的“中国—玛雅连续性”的图景，通常就会浮现出来。这幅图景的核心是一种城市观念：城市是宇宙秩序的世俗模式，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是“四方之枢纽”。印加人称他们的帝国为塔万廷苏尤(Tawantinsuga)，即“四方之地”，也是同样道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概念可能也适用于印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早期城市。在特奥蒂瓦坎，这种观念更加引人注目。这里有醒目的礼仪性中轴线，呈十字形，与周围山脉和天上星辰和谐一致，金字塔正下方的原始洞穴代表地下世界，每年夏至时分，阳光会照耀到地下世界的最幽深处。这座城市是宗教礼仪之所在，人们在这里维持着宇宙秩序。直到西班牙人征服之际，中美洲城市一直保持这项功能。尽管有可能成为商业和贸易中心，当时，阿兹特克人的大城市依然以礼仪性建筑为主。由此可见，思想意识——宗教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只要你愿意，怎么称呼都行——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对于理解文明初期人类发生的那场至关重要的变化而言，思想意识也是关键所在。通过那场变化（本书所讨论的青铜时代的革命都体现了这种变化），少数开始统治多数，时至今日，世界上许多地区依然如此。

古典时期的玛雅

公元第一个千年，城市文明从墨西哥谷一直扩展到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雨林，贯穿整个中美洲地区。直至晚近时期，人们依然认为特奥蒂瓦坎是这场文明传播的媒介。尽管人们可以感觉到它在贸易、（或许还有）宗教甚至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现在大家很清楚的事实是，玛雅文化区城市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史前的本地现象。考古学家晚近在蒂卡尔（Tikal）以北米拉多尔（Mirador）的考古挖掘，发

现了一座城市，它无疑是危地马拉北部和墨西哥南部最大的城市，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间非常繁盛。米拉多尔是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的，不过，直到现在才得到勘测和考察。它覆盖6平方英里，有好几万人口，这里的蒂格雷（Tigre）金字塔是玛雅文明最大的金字塔，将近200英尺高。所有这些都早于玛雅古典时代的遗址，如蒂卡尔。于是，从5世纪开始，城邦在整个尤卡坦半岛（Yucatan）兴起。欧洲当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而蒂卡尔供养的人口达8万之多，拥有庞大的灌溉系统和数百个附属村庄，这些村庄由大道和辅路连接在一起。城市中心是围墙环绕的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里面有一打金字塔以及数百祭坛和神殿。这种布局完美体现了可以回溯两千年的中美洲宗教信仰活动。

就玛雅的城市而言，洪都拉斯的科潘最迷人。科潘在当时属于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有2万人口，5世纪到9世纪之间由一个很有能力的王朝统治。它的公共广场、金字塔和球场——这些是所有玛雅城市的特色——装饰着精美的雕刻。玛雅艺术家由此展示了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自由，有些时候，这些要素接近一种西方自然主义，即我们可能会在最优秀的哥特式或文艺复兴时期石雕作品中看到的自然主义（尽管玛雅艺术家的美学目标明显不一样）。近年来，对玛雅文字的解码，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着手几年前根本无法进行的工作：深入了解科潘统治者的生活甚至情感（不过，我们对普通人的生活依然一无所知）。最奇特的是一位国王的系列画像，通过他留下来的神秘符号，我们得知这位国王就是“十八兔王”。当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在19世纪40年代公布这些画像时，全世界为之兴奋不已。最早的肖像画刻画的是一个勇猛刚毅的男子，40多岁、年富力强，落款日期为721年10月11日。这位国王的形象又出现

在 731 年（即 10 年之后）的一块石碑上——难道这只是我们的想像，难道他的形象没有随着岁月流逝和经历增长而变得更加柔和吗？最后一幅画像的日期是 736 年 7 月底，这幅肖像有点粗糙，几乎是一幅漫画：画中人物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嘲讽表情，甚至焦躁不安。2 年后，“十八兔王”成为另一座城市基里瓜（Quirigia）统治者的阶下囚，并且在 738 年 5 月 3 日被处死，当时他应该 60 岁出头。有这么一句玛雅格言：“国王应当承担灾祸。”

文字

与旧世界一样，中美洲也独自创造出了文字：这再一次证明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共同模式。玛雅文学最伟大的纪念物，当属科潘的象形文字台阶。事实上，那是一座符号山丘，它的斜坡呈梯状，宽 50 英尺，高 108 英尺，上面刻有 1200 多个象形文字，它们叙述了 755 年之前——烟壳王（Smoke Shell）正是在那一年下令建造了这一纪念物——科潘神秘的王朝世系和年代学。这也是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篇幅最长的铭刻，它不仅是文字的纪念碑，也是时间的纪念碑。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学家在科潘展开迷人的考古挖掘工作，进一步证明玛雅古典时代晚期文字在城市中的作用。考古学家在拉斯塞普图拉斯（Las Sepulturas）郊外发现一个独立的、由四五十座建筑物构成的建筑群，这些建筑围绕在 11 个院子周围，包括住宅、神庙、圣殿、储藏室以及厨房。一座巨大的住宅俯视主广场，住宅的接待室有一条很宽大的石板凳，上面刻着优美的象形文字。门两侧有两尊雕像，手握贝壳做的“墨水壶”：他们是书吏。或许，当时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或一群人的领袖。这些人是世袭的书吏和精通礼

仪者，公元800年前后，他们也负责科潘国王的历法。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又与中国古代王室占卜家和礼仪家扮演的角色遥相呼应。

我们所知道的科潘最后一位国王是亚克斯潘（Yax Pac），他死于820年的冬天。一件未完成的雕刻作品上留下了一个最后日期：822年2月10日。就历史记载而言，这些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谜一般的神秘性和精确性的结合。随着科潘王朝的消失，城市再次变成丛林。在接下来三个世纪里，一些农户在科潘河令人愉悦的河谷耕种，但是，这片土地再也无法供养一座城市。大约在相同时间，蒂卡尔也变成荒芜之地。很快，古典时代玛雅的所有城市成为过眼云烟。玛雅的消失依然是一个巨大谜团。原因很可能是土地耗竭、环境恶化，或许也是因为这个文明完全丧失了它的活力。很可能就像克里特人、迈锡尼人、罗马人、甚至复杂的现代社会（比如前苏联）一样，文明的衰落是许多因素——环境的、政治的、社会的、气候的以及心理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就其中一种因素而言，它无法导致灾难，一旦它们结合起来，就足以破坏一种社会秩序的机能和连续性。最早消失的通常是巨大的礼仪和政府中心。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这些中心往往由于花费过于昂贵而无以为继；当精英不再的时候，它们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丛林很快重新占据城市，只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在这里生活。不过，这里的所有人都铭记这些遗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人们维持着崇拜仪式和习俗，说着玛雅语。当1848年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卡尔的废墟时，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依旧能够说出这座城市的古老名字：蒂卡尔，“历法得到保存的地方”，祖先背负时间枷锁之地。

阿兹特克人

随着古典玛雅的消沉，中美洲文明的中心又重新回到它古老的中心地带，即墨西哥谷。这里的群山环绕着一片辽阔平原和一个巨大湖泊——特斯科科湖（Texcoco），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湖岸土地肥沃。现在，墨西哥城完全覆盖了这片地区。14 世纪，一个好战的部落在此定居下来，他们自称“墨西卡人”（Mexica）。他们在这里修建了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城，该城是今天世界上最大城市墨西哥城的前身：它是一座石块建造的城市，位于一座岛上，人口达 20 万，多条堤道穿过大片开垦的沼泽地将城市与大陆连接在一起。

15 世纪阿兹特克帝国兴起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阿兹特克人现在依旧让我们着迷不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艺术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灵性，这种灵性与我们在西方文明中体会到的完全不一样。1790 年，人们在佐卡洛（Zocalo）中心广场发现了大地女神科亚特利库埃（Coatlicue）的著名雕像，不过，他们又匆忙将雕像掩埋起来，唯恐墨西哥年轻人看到她后受到那种邪恶而强劲的巫术力量的诱惑。19 世纪早期，雕像被挖出来，然后再次遭到掩埋，因为人们认为她那种令人畏惧的形象依然是无法承受的。后来，她在墨西哥大学找到栖身之地，被放在一道屏风后面。现在，科亚特利库埃的雕像被保存在墨西哥国家博物馆阿兹特克厅的中央位置。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说的，她变幻的命运——从女神到恶魔、从怪物到艺术杰作——体现出过去 400 年来人们的情感变化。直到现在，我们才敢正视她的面容，不过依然会感觉不舒服。

恢复“蛇裙女神”科亚特利库埃的地位，也是在复原阿兹特克的历史：人们更加渴望探究它的“他者性”（otherness），而不是简

单地将其视为“恶魔之作”。当前，墨西哥城以大教堂为中心的地区，就是过去阿兹特克城的礼仪中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这里展开的考古挖掘工作，已经发掘出了为阿兹特克战神胡特兹罗普特利（Huitzilopochtli）建造的巨型金字塔的地基。1521 年，西班牙人在科尔特斯（Cortés）率领下，洗劫了这座城市，不过，他们在这里目睹了恐怖惨烈的人祭景象。贝尔纳尔·迪亚斯声称，在城池陷落当天晚上，他那些被俘的伙伴被阿兹特克祭司拖上金字塔台阶，以便向战神做最后一次徒劳的祭祀活动。此后，西班牙人称这个晚上为“悲伤之夜”。新大陆的历史上从此留下著名的一段话：“从金字塔处传来战神阴郁的鼓声，号角齐鸣，令人毛骨悚然。我们望着高大的金字塔，看见我们的伙伴被拖上台阶用于祭祀。祭司在他们头上插上羽毛，强迫他们跳舞……随后，又迫使他们仰卧在狭长的石条上，用刀子剖开他们的胸膛，取出心脏献祭给偶像和神灵。”

与大多数文明一样，长久以来，血祭是中美洲文明的组成部分。不过，人祭——与洒点鲜血相反的仪式性杀戮，显然只是玛雅历史的晚期现象，并且是一种很局部的现象。阿兹特克人认为，战神在与黑暗势力斗争时，需要鲜血和人的心脏来滋养自己。他们相信，没有战神，太阳就不会再次升起。阿兹特克人以武力和恐怖手段迫使墨西哥平原其他民族接受自己帝国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上述思想意识也变得更加极端。到西班牙人征服时期，一次人祭仪式甚至可以杀掉好几千人。在阿兹特克大神庙（Templo Mayor）遗址四周，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虔诚性的冷酷证据：堆积起来的头盖骨（用来祭祀不断重建的神庙台基），盛放心脏的容器（chacmools），偶像和神灵（他们在“人造大山”的台阶上目视那些牺牲品），堆放头盖骨的石头架子（祭品的头颅在这里被砍下来），还有用来取出心脏的石刀。

尽管大神庙周围是墨西哥城充满欢快气氛的街区，不过，它依旧是世界上笼罩着恐怖联想的地方之一。像这样一种在艺术、雕刻、纺织和诗歌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文明，怎么会如此热衷于大量流血和人祭呢？正如西班牙人所说的，在为期 4 天的礼仪活动中，可能有 1 万人被拖上大神庙台阶，在那里，他们的心脏被挖出来，直到那个地方“血流成河、腥气熏天”。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也对我们时代欧洲发生的事件提出了同样疑问。当西班牙人看到这种景象时，他们认为这肯定是恶魔作祟，因为他们全然不知道还会发生这种事情。事实上，阿兹特克人的杀戮只不过规模大一些而已。每一种文明都使用人祭，在宗教方面尤其如此。在整个历史上，神学家和刽子手一直密切联系在一起。

阿兹特克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好几代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为何暴力和神圣性密不可分呢？为何死亡被视为新生的必需品呢？为何杀戮在现代人心灵中如此根深蒂固呢？难道超越了早期原始人类的现代人只不过是特殊的屠戮者吗？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凭空猜想。流血是延续生命必不可少的方式，这个观念很可能植根于史前几千年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人类心灵中。由于流血具有如此深厚的根源，因此，即便在现代欧洲文化中，流血依旧象征着最有效的献祭行为。这种象征所包含的冲动，仍然可能以一种返祖的力量和狂暴的形式迸发出来。科尔特斯和他的伙伴在此看到的狂热的杀戮景象，即他们被俘的朋友被拖上台阶处死，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阿兹特克人的虔诚。一些早期西班牙教会人士，比如，多名我会的拉斯·卡萨斯（Las Casas）就这么认为。与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相比较，阿兹特克人尤其强调与宇宙的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性凌驾于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一切事物之上。在这方面，他们体现出与伟

大的旧世界文明的最大差异。旧世界文明通过借鉴历史，通过经常性的相互学习，了解了理性的中庸力量、人类生命的价值，以及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法律、“仁”和宗教戒律）遏制人类社会中的暴力。在我们看来，阿兹特克人的宇宙似乎是非理性的、恐怖的、凶残好杀的，不过，它映射出我们忽视人性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样，西方文化也曾经以自己的理想和神灵的名义实施杀戮，即使到了20世纪依然如此。

特诺奇蒂特兰的陷落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叙述西班牙征服中美洲的所有事件。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故事就行，这个故事或许象征着一种历史和时间观对另一种历史和时间观的征服。非常凑巧的是，科尔特斯在阿兹特克人的“一苇年”（one reed）抵达中美洲。阿兹特克古老预言曾经说过，羽蛇神（Quetzalcoatl）会在这一年从东方流放地返回。与玛雅人一样，阿兹特克人也相信历史循环论和时间枷锁，西班牙人碰巧在这个时候来到美洲，这一巧合削弱了他们的反抗意志。如果当时西班牙史学家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阿兹特克人马上就认识到，这些神秘的外来力量将对这里的宇宙造成致命破坏。

在特诺奇蒂特兰陷落的最后一个恐怖夜晚，有一种征兆向阿兹特克人显现，对他们来说，这种征兆象征着他们神秘的宇宙秩序的崩溃。弗雷·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Fray Bernardino de Sahagan）在其杰作《新西班牙万物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中记载了这个故事，而故事又来自众多墨西哥受访者。“夜幕降临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更确切而言，不是雨，更像大雾。征兆突然出现，天空像着了火一样。火团呈巨大的螺旋状翻滚，就像

火花四溅的旋风。它发出巨大声响，犹如火堆中通红的金属发出的声音。火团在湖边城墙上方旋转，在科约卡兹科（Coyoncazco，湖西宽大堤道与大陆相连的一端）上空盘旋了一小会儿。然后它移动到湖中央，最后突然消失不见了。当征兆出现时，没有人大呼小叫。阿兹特克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静静注视着发生的一切。”

瓜达卢佩：依然富有生机的古老神灵

西班牙人在征服之后，就开始系统毁灭阿兹特克文化。不过，今天墨西哥的灿烂文化——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丰富多彩——事实上是对当地和欧洲的信仰与情感的综合。当地的、前哥伦布时代的世界观，依旧保存在墨西哥人心灵中。自 1821 年独立以来，这种观念在民主体制的氛围中得到滋养，这与玛雅人直到今天依然生活在暴政之下相成鲜明对照。我们能够从美洲最大的朝圣人群中看到连续性：墨西哥城外的瓜达卢佩圣女（Virgin of Guadalupe）——她的节日（每年 12 月举行）会吸引 200 万信徒前来朝拜——结合了基督教和前哥伦布时代的实践活动和各种传统。她的神殿位于阿兹特克母亲女神托南齐恩（Tonantzin）神殿的旧址之上，今天的朝拜者依然称呼圣母玛利亚为托南齐恩。

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基督教神秘派成为连接新旧两种信仰的桥梁。要想对此作出解释，或许并不难。基督本人的受难是基督教的主要形象：为了拯救世人，上帝献出自己的血肉甚至神圣的心脏。从 16 世纪耶稣会士的艺术到弗雷达·卡洛（Freda Kahlo）和超现实主义者，摘除的心脏成为墨西哥艺术中强有力的、持续存在的主题。阿兹特克人能够在基督教中发现他们自己宗教（被提升到了神秘主义高

度）的主要概念，这种统一性的体现就是十字架：中美洲生命树——“全世界的常青树”——的古老象征。

我们能够在南美印加文明中发现同样的模式。那里的神圣地区依然存在。对印加帝国而言，萨满教的祖先崇拜非常重要，整个安第斯山区都保留着这种崇拜。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一样，这里的古老神灵也会收到他们的传统祭品。在圣山崇拜（类似于中国现在的圣山崇拜）方面，尤其如此。库斯科（Cuzco）东部奥桑加特山（Ausangate）下面的冰川是一个圣地，每年都有数千信众前往参加 Qoyllur Rit，即“星雪节”。节日的名字取自冉冉升起的昴宿星，在基督教历的圣体节之前举行。这个时候，“熊人”或萨满教僧人汇聚一堂，接受新成员，从冰川圣地收集圣水：这些与旧石器时代中亚萨满教以及山神崇拜生动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库兰德罗（curanderos）在人数上远远超过现代医生和医疗保健人员。库兰德罗是传统的治疗者，他们在山巅以咒语与山神交流。在整个美洲，由于战争和征服、暴力、疾病以及迫害，曾经高度发达的文化转变为“民间文化”。尽管如此，它依然富有生机。

新秩序

在征服危地马拉之后，西班牙人在古老神圣的阿瓜（Agua）和富埃戈（Fuego）火山下修建了他们的新首都安提瓜（Antigua）。他们想通过安提瓜来展示欧洲文明的各种理想。不过，这种人文主义表象掩盖的，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根据现在的估计，在最初 100 年的征服活动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美洲土著居民（人数多达 5000 万）死于疾病或暴力。许多欧洲人亲眼目睹了令他们震惊的惨象，目

击者就包括何塞·德·阿科斯塔（Jose de Acosta）。阿科斯塔关于西班牙人对美洲土著犯下滔天罪行的报道，一直受到压制，直到晚近才允许公开出版。他写道："毫无疑问，西班牙人必须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负全责。""我们的所作所为背弃了我们的誓言。所有人都同意，沾染了欧洲文化的印第安人最堕落。我们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劫掠这些可怜的人们，欧洲人急于想做的事情，不是作出任何努力来保护印第安人的人权，而是决定谁才有掠夺他们的权利。我们通过强迫、欺骗和暴力手段，要求他们接受基督教和我们的真诚。历史上的所有入侵——希腊人或蛮族的入侵——都不曾出现如此残忍的行为。"

拉斯·卡萨斯：文明是什么？

在征服活动早期，罗马教皇敦促以基督的名义奴役美洲土著居民。不过，正是在天主教士身上，欧洲的良知增长起来：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些教士通常是美洲土著民的保护者，他们与后者一起反对那些压迫者。在这些早期解放派神学家中，最伟大的当属科班（Coban）主教巴尔托洛梅奥·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o de Las Casas）。拉斯·卡萨斯热情洋溢地为印第安人的权利辩护，为此招致一些人的憎恨，并且赢得"印第安人的保护人"这个正式名号。在韦拉帕斯（Vera Paz，意思为"真正的和平"）——为了纪念他而取的名字——人们依旧对他充满敬意。即便现在，人们在科班教堂仍以玛雅语而非西班牙语颂唱圣歌，这种情况在危地马拉的教堂实属罕见。即使在西班牙国王和女王面前，拉斯·卡萨斯也坚持自己的立场，极力主张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为印第安人进行的辩护，同样适用于来自非洲的黑奴，甚至全世界所有受压迫民族。

拉斯·卡萨斯的故事有一个精彩结局，这个结局像一道闪电，照亮了16世纪的历史，并且继续启迪今天的人们。1550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上演了一场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拉斯·卡萨斯和亚里士多德派主要哲学家塞普尔韦达（Sepulveda）之间。（事实上，两个人并没有当面争辩，不过，他们分别向一个皇家委员会提交了材料，这些丰富的资料全部保存了下来。）争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从根本上而言，第一世界有什么权利来控制、奴役或剥削第三世界？

拉斯·卡萨斯质问道："难道这些人不是理性的人吗，难道他们的心灵与我们不一样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吗？"拉斯·卡萨斯通过对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研究，进一步提出精彩论点，以便证明中美洲城市在许多方面符合希腊人对理想国家的看法：（理想的国家就是）合理的政治实体，具备尊敬、忍耐、说服和友善等美德。拉斯·卡萨斯无疑赢得了道德辩论，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那些强大无比和财大气粗的西方统治者始终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土著民族——从中美洲印第安人到非洲黑人——是"自然的奴隶"，这种观点也是古代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轻蔑看法。正如拉斯·卡萨斯指出的，与其他地区一样，欧洲的文明进程漫长而充满痛苦。

塔亚萨尔的失陷

西班牙的征服活动进行150年之后，中美洲最后一个独立王国陷落了。在危地马拉北部丛林深处，孤独地矗立着弗洛雷斯（Flores）——本地语指塔亚萨尔（Tayasal）——城堡遗址。最近生活在这个地区的玛雅人，是玛雅人和墨西哥人的混合，我们称之为尤

卡特克人（Yucatec）。尤卡坦玛雅文明的先知书曾经预言，灾难会以13个卡吞（katuns，约256年或257年）为周期重复降临。就当时而言，他们面临的下一个周期将开始于1697年。西班牙军队正是利用这一点，在1697年3月13日发动攻击。他们在佩腾湖（Lake Peten）中央摧毁了玛雅人的战船——独木舟。在西班牙人的甲胄和滑膛枪面前，玛雅人的石头箭矢毫无用处。守兵四散逃窜，西班牙征服者登上岛屿最高处，进入塔亚萨尔大神庙。在一天之内，他们摧毁了岛上12座神庙，砸碎了无数塑像。当天夜晚，西班牙人在岛屿最高点，即大神庙废墟上（现在的教堂所在地）狂欢庆祝。玛雅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失落了。当地人似乎接受了现实，认为这是命运使然，是他们时间循环观念的必然结果。自10世纪以来，256年或257年的时间循环已经带给他们3次灾祸。在玛雅人看来，这就是真实存在的时间枷锁。今天，这种古老的计算依然在延续。危地马拉现代史上的最大灾难，即在美国支持下推翻民主政治的1954年政变，正好发生在塔亚萨尔陷落257年之后。

现代玛雅人

就今日危地马拉人口而言，玛雅人属于多数派，他们的生活依旧受到一群欧洲精英的支配。20世纪80年代的游击战争，造成4万人死亡，百万人流离失所。当前，在新民主政体下，玛雅人希望他们的历史会有所改观。玛雅人的生存策略以集体方式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在盛大节日期间，他们为圣徒举行各种庆祝仪式，称颂圣徒为共同体的保卫者，而不是基督教的神灵。对他们来说，身份感依旧存在于祖先和共同体所体现的集体价值中。

长期统治中美洲的欧洲精英们，持一种不同的过去和未来观。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Estrada Cabrera）是危地马拉现代独裁者之一，他通过在全国建造混凝土结构的帕台农神庙——纪念殖民进程以及希腊人对“蛮族人”的胜利——来表达自己对欧洲文明价值的信仰。在首都危地马拉，当地文化被来自北部的伟大邻邦——山姆大叔的消费价值观所淹没，这也是整个中美洲面临的问题。在危地马拉城，印第安人湮没无闻，成为自己故土的陌生人，因内战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在阴暗的角落乞讨。不过，乡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古老的宇宙在那里依然富有活力。

在玛雅历法上，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是 Wahxakib Batz，即“八猴节”。这天清晨，无数普通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突然冒了出来，汇聚在莫莫斯特南戈，即“圣殿之所”。事实上，他们是在响应来自一个神秘世界的神灵的召唤。每年的这一天，他们都会修缮位于危地马拉城周围山丘上的 9 座祖先圣殿，而全国的日期保管者则聚集在一起，推选新的萨满教僧人：一些将继续背负时间枷锁的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500 年以来，这里的人们表面上生活在西方的时间和历史之中，实际上，他们始终非常耐心地保管着一个神秘的宇宙。有时候，他们固执地持守时间枷锁似乎导致了他们的衰败，不过，这种持守或许也是他们得到拯救的方式。他们以此维持自己的身份，希望带着这种身份迈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宽容和多元主义时代。那时，美洲土著居民或许又可以再次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和时间之中。

第六章　西方：蛮族之地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文明主要起源于亚洲。或者说，今天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居住其中的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亚洲。我们已经了解到，文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近东、中国和印度发展起来，时至今日，这些方式依旧塑造着它们各自的世界观。最古老、最伟大的印度和中国文明，在各自发源地依然生机勃勃；在近东，伊斯兰世界成为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今天，亚洲各民族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最后一章，有点像结语，我们将考察西方的兴起、西方与更古老文明的相互作用，以及西方学习和借鉴这些文明的方式。本章探究的内容是：大家一致信奉的西方意识形态，是否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是普遍真理，或者它只不过是欧洲地形、气候和历史的特有产物。

现在，人们频繁谈论“西方的胜利”，“西方”成了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不过，在本书中，我们打算把它当作西欧及其近邻的文化，还包括它在美洲和其他殖民地的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即欧洲的、基督教的、资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明，已经主导整个世界：这也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传播自身生活方式、价值和语言的文明。不过，与印度和中国相比，西方文明出现得较晚。在青铜和铁器时代，尽管西欧也存在相对复杂的社会，不过，文雅的城市文明是随着罗马人的到来而嫁接到西欧的花朵。当罗

马帝国瓦解时，城市文明在西欧某些地区逐渐消失。在黑暗世纪，在罗马废墟之上建国的蛮族人后代，即法兰克人、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又重新引入这种城市文明。因此，西欧中世纪文化是4世纪和5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在此之后，一些重要的思想意识才得到采纳，比如，罗马基督教和拉丁文化。与印度和中国不同，这些主要信条并非出自西欧本土，就漫长的文化史而言，这一点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移民传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强劲模式："攻城略地"根源于日耳曼人的英雄传奇，《旧约》中相似的创世神话致使西欧蛮族认为自己就是"新的以色列人"——英勇无畏的移居者，到处传播《圣经》记载的终极真理。正如我们所知的，对东方文明而言，终极真理这个观念是相当陌生的。

因此，与近东、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欧文化根基很浅，它的社会和宗教信念，并不像某些中世纪阿拉伯注释家所说的那样坚固牢靠。西欧也缺乏政治、文化和语言统一性，尽管说日耳曼方言的北欧各民族与地中海地区说罗曼语的民族之间存在古老的联系。结果可想而知，在西欧整个历史上，战争盛行，冲突不断。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经多个世纪的残酷战争（这些战争甚至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夺去了千百万条生命），西欧开始迈向统一。西方历史是不是尤其血腥暴力呢？对此不容易下定论。所有文明都受困于理想与历史现实之间发生的冲突，毕竟，没有哪个文明成功地抑制了暴力。这里无需重复西方的胜利。它的个人主义自由概念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这个概念很可能深深植根于它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诞生于它自身的土壤和气候之中。西方在艺术、文学和音乐领域的成就卓越无比。但是，在最近500年，正是西方为世界各个角落带去了死亡和毁灭。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考察构成西方文明传统的各种主要潮流。

希腊的遗产

就希腊传统在欧洲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而言，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把希腊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不过，10 世纪巴格达的穆斯林学者，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古典希腊文化的思想后嗣，而对于 10 世纪英格兰的抄写员来说，这种观念很可能从来没有在头脑中闪现。英格兰可能熟悉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也从希腊这个教父的遗产当中获益良多，不过，她很可能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希腊的后嗣。在她的想像中，以色列和罗马的形象要更加鲜明。西方把希腊树立为自己伟大的精神祖先，这个神话是后来才出现的，即 18 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当时，在现代世俗主义和科学面前，西方传统宗教的作用逐渐减小。因此，西方需要新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先祖，以便巩固欧洲日益确立的对更加古老、更加伟大的文明的霸权地位。在启蒙运动之前，希腊古典文化的传播媒介是罗马文化及其理性主义美学，以及罗马基督教及其家长式权威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人对希腊的看法得到清晰阐释，由此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18 世纪中期，西欧人才开始研究真实的希腊文化留存下来的各种要素——地形、建筑和习俗，尤其是希腊民族。尽管这个民族长期遭受土耳其人的残暴统治和掠夺，不过，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古老的整体自然观。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生命观的出现，西方和欧洲抛弃这种暗示了（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希腊古典成就的真实本质的自然观。

事实上，希腊一直是欧洲和亚洲的媒介。青铜时代，它率先接受近东宫殿文明。不过，这种文明没有深厚根基，当宫殿不再，文明也就消失了。同样，在公元前 6 世纪轴心时代，希腊率先吸收来自亚洲（伊拉克、伊朗和印度）的新科学哲学思想。在公元前 5 世纪早期，

希腊天才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由此塑造了世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希腊古典文化的全盛期很短，即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令人惊叹的利亚斯（Riace）青铜雕像、奥林匹亚运动会的雕像、品达[1]、埃斯库罗斯、厄琉西斯的神秘仪式（Eleusinian mysteries）、爱奥尼亚的新科学、雅典新生的民主体制以及希波战争中雅典的胜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界标，充分体现了一种精神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即从伯利克里时代到青年柏拉图时代，尽管雅典依旧灿烂辉煌，不过，它已经处于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的衰微期。由于大家非常熟悉这些界标性事件，往往就会忽略独特性：或许，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而只是一场特殊的改造和转化，对希腊产生了巨大影响。到公元前400年，希腊在帝国主义中分崩离析，民主制瓦解，伯罗奔尼撒战争惨烈而恐怖，与此相随的，是政治灾难和活力的丧失。柏拉图后来会以一种无法忘怀的怀旧之情回顾这些事件。公元前5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启了各种可能性，不过并没有带来一个黄金时代。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各个城邦相互征战的场所。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落入来自北方的、凶残而精力充沛的马其顿人之手。雅典由此永远丧失了它的文化卓越性，取而代之的，是希腊化时代亚洲和北非的伟大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印度的多民族帝国的能量中心。正是希腊化时代的那些理想，也即罗马人加以改造的那些理想，成为西方文明的最初塑造者。

希腊对亚洲的征服

亚里士多德声称："希腊人才智过人、享有自由，有能力统治全

人类。”在公元前4世纪，即亚里士多德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他们侵入近东，大肆蹂躏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亚洲的希腊时代，现在已经被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时代之一。

在一代人时间里，尼罗河河谷到处可见希腊殖民者的身影，当时的情景非常类似于淘金热。古老、神秘而具有异域风情的埃及文明，给希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埃及，肃然起敬的希腊旅行者在许多纪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们从莎草纸的天启式记载以及神谕可知，埃及本地人一如既往地强烈反抗这些新的外来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依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们原封不动地维护先辈的法律，避免一切外来的习俗”。）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有一条预言表明，埃及本地人期待着未来有一天“外来文明在我们中间播下的种子会消失殆尽，侵占埃及的这些外国人会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消逝。”另一些人则公开表达他们的敌意，一名埃及祭司愤愤地说道：“这些希腊人是窃贼和暴发户，迷恋暴力”，“想一想我们教给他们的一切吧”。今天，在卢克索古埃及神庙的内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上血腥暴力的金发男孩，即亚历山大本人的雕像，他像古代法老那样迈着步子。

希腊人向东进军，征服古巴比伦尼亚的文明，古城乌鲁克和巴比伦沦为希腊殖民地。依照巴比伦一道神谕的说法，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时代。不过，它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希腊人又翻越扎格罗斯山脉，跨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中亚，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城市，其中一些依然很繁荣，如撒马尔罕。他们从开伯尔山口来到印度，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这些地区长期存在的印度—希腊文化奠定了基础。

亚历山大的继任者继续向印度推进，古代历史对此鲜有记载。公元前2世纪，他们派遣的远征军推进到恒河，古老的宗教中心贝拿勒

斯和巴特那遭到洗劫。在憍赏弥，现代考古发掘出的绘图，证明了希腊人的破坏活动。这里挖掘出一座佛教寺庙，它被远离家乡的希腊雇佣军（他们深受朱木拿河地区闷热天气的困扰）付之一炬。（依据印度传说，希腊最高指挥官米兰德应当对此事负责，不过，不可思议的是，米兰德最后皈依佛门。）

印度人声称希腊人入侵时期"极其糟糕"。"邪恶而骁勇的希腊人蹂躏我们的土地，所到之处，火光冲天、饥荒遍地。他们屠杀妇女孩童，甚至连我们的奶牛也不放过。"当时的希腊人生活在一个革命性时代，就像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一样：骚动不宁、充斥着世界主义和自我意识，沉溺于性欲和暴力。正如最近3个世纪一样，那个时代的核心就是残酷剥削其他文化。印度的希腊人在墙上看到如下文字："希腊人的后继者身强体壮、桀骜不驯、残忍好杀，他们很快就会统治整个世界。"当欧洲人审视自己的历史时，这是西方首次走向世界。

一个世界的开端

不过，希腊人的征服活动也释放出巨大的历史能量。希腊化时代炫目的国际主义，为埃及和印度之间广大地区的共同文化和共同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这些共同点在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腊化时代还为旧世界文明的经济打开了大门。贯穿中亚、连接中国的丝绸之路也开通了。公元前2世纪的史学家波里比阿声称："在更早的时代，世界历史将只不过是一系列毫不相关的事件，从今往后，历史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欧洲和非洲事务与亚洲事务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事件相互关联，服务于同一个目的。"

公元前2世纪，中国派遣使节出使西亚，由此了解到波斯的帕提

亚帝国，并且听闻了更加遥远的希腊人的故事。这种发现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元前 1 世纪，希腊航海家发现了季候风的时节。希腊和罗马商人由此可以每年穿过印度洋来换取香料、珍珠和中国丝绸，罗马人还在台伯河畔建立仓库存放胡椒。由于大量收购胡椒，他们的国际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希腊人甚至在遥远的阿富汗建立殖民地。依据泰米尔诗歌记载，希腊商人也居住在印度南部，他们的组织方式类似于 17 世纪从事印度贸易的“工厂”。古代世界流传至今的最迷人的作品之一，是 1 世纪亚历山大一位商人的手稿，该著作描述了东非和印度的所有海港，列举了它们的物产：香料、珍珠、丝绸以及象牙。人们在泰米尔纳德邦发现大量属于该时期的罗马金币，因此罗马和印度王国之间在 1 世纪到 2 世纪时曾互派大使就毫不奇怪了。166 年，罗马还向中国派出使节。考古发掘发现了东西方海路贸易的补给站：印度南部本地治里（Pondicherry）附近的罗马人贸易中心，那里的仓库堆满了阿雷蒂内酒（Arretine wine）；湄公河三角洲著名城镇奥克—艾奥（Oc-eo），那里有一大批印度人，他们经营来自波斯和地中海地区的商品。通过这种联系，印度拉克什米（Lakshmi）女神的雕像于公元 79 年为庞贝城富家大户收藏，而波塞冬的雕像最终会出现在孟买南部的科尔哈普尔（Kolhapur）！陆路也有这种贸易。喀布尔附近的贝格拉姆发掘出令人震惊的库房，时间可以回溯到公元 100 年到公元 300 年间，储存的物品包括中国漆器、埃及斑岩器具、希腊玻璃，以及来自朱木拿河河谷的印度雕刻。很快，日本寺庙也开始用产自波斯和拜占庭的珠宝来装饰自己。

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以及公元纪年的前几个世纪，也是各种文化和思想在整个古代世界大交流时代。因此，普适性宗教，即 1 世纪的基督教、3 世纪的摩尼教以及 7 世纪的伊斯兰教，在这个时代出现

绝非偶然事件。到7世纪晚期，连同商品，这些宗教和奇风异俗一起经由印度洋海路或者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这时还出现了世界经济的第一缕曙光，这种经济的中心在亚洲。亚洲在10世纪到12世纪实现腾飞，但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这种发展，随后亚洲的经济地位被西欧这个新兴的商业和海洋帝国取代。

罗马的兴起

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为西方主导世界奠定了基础。罗马人首次统一地中海世界和西欧，后者依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的核心。与所有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建立在军事力量、奴隶制和残酷无情之上。通过组织有方的行政官员、杰出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以及军事策略家，罗马人征服了包括铁器时代高卢和不列颠在内的“文化落后”地区，希腊、埃及、叙利亚和北非的文雅市民也未能逃过被征服的命运。就这样，西欧第一次受到地中海地区、非洲以及亚洲文明的影响。在一些地区，罗马化的程度很轻，英国就是如此，当罗马人撤退之后，那里的城市被废弃，精英们又回归当地的组织传统。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

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幅员辽阔，西至英国哈德良长城，东到波斯湾地区，一个人无论生活在曼切斯特、雅典、卢克索，还是乌鲁克，即伊拉克南部太阳炙烤之地，他都可以称自己是罗马公民。不过，与印度和中国不一样，罗马帝国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把这些不同地区凝聚在一起的宗教或社会伦理。4世纪，帝国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尤其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当时，各种新的宗教派别相互竞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利用的是近东和波斯的古老传统：犹太教、诺斯替主

义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在这种精神动荡中，基督教徒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随后又得到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大力支持，于330年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自此之后，在西欧文化中，尘世帝国和天国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

基督教的胜利又一次证明，由朱迪亚地区（Judaea）、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组成的这片难以驾驭的土地，是思想的沃土；同时也证明西方持续从东方更加古老的文明获取灵感。基督教及其普世主义信念扎根的土地和文化，与该宗教诞生地的文化相去甚远、毫无干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前所未有。铁器时代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们以及青铜时代伊拉克的城市居民信奉的那套信仰、神话和戒律，被西欧统治者奉为历史的最后启示。即便罗马帝国本身于410年被北方蛮族攻陷，这种历史使命感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事实上，人们一直觉得，罗马从来就没有失落过。因为罗马的文化理想、罗马帝国主义以及罗马基督教，是西方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核心。西方历史上几次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力图重新树立这些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一欧洲的努力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此而论，所有欧洲人以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那种文化的后嗣。中国和印度历史久远，在世界观上也具有本质的连续性，与此不同，西方直到相当晚的时期才意识和捕捉到自我。现在，蛮族人摇身一变，成为罗马人，他们创造出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成为今日西方文化的基础：蛮族人的西方。

黑暗时代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日耳曼各蛮族部落在遭到严重破坏的罗马省份建造起自己的新家园。在不列颠的狂野海滨，通过源自近东的宗

教、埃及的修道院制度以及意大利的书面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打造他们的新秩序。与所有前往陌生海岸的移民一样，他们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在泰恩河畔的诺森比亚（Northumbria），探究上述历史需要穿越诸多历史事件，穿越建立在煤铁和轮船之上的晚期帝国废墟。贾罗（Jarrow）是西方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地方之一。在贾罗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出现了西方伟大的早期史学之一。这种史学清楚地表达了西方自身的命运观，它由一位蛮族人后代以拉丁文书写。这种史学的作者是一位僧侣，即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比德首次推广了以基督诞生为基础的公元纪年，这种纪年法现在通用全世界。比德在贾罗创作的著作，为研究他生活的世界提供了线索。比如，《圣经》英雄大卫是西方蛮族新王朝统治者的典范，被描绘成一位诗人和民族的导师。在同一部手稿中，大卫还以手执上帝之矛向一切不信仰上帝的人宣战的形象出现。把这两种观念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可以得到从十字军东征到 2003 年海湾战争期间理想化的西方统治者的形象。

就解释黑暗时代西方蛮族部落经由文明——基督教的、拉丁语的以及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改造自身这个问题而言，比德的史学是最令人瞩目也最成功的尝试。就此而论，比德是一位彻底的欧洲人。与同时代唐朝的中国人相比较，比德笔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欧洲人民是十足的蛮族人。他们的确就是那样，正如我们现在以傲慢的语气谈论大量贫穷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移民一样。不过，在 8 世纪诺森比亚海岸，已经存在现代西方文化得以破茧而出的重要因素：犹太—基督宗教和伦理、希腊和罗马人文主义和法学遗产、日耳曼部族的社会和语言。在比德这种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混合完全可以用来讲述一个伟大的故事：西方蛮族国王和民族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继承人，是

被选中的民族，注定引领我们迈入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从世人之城进入上帝之城。历史导向一个指定目的，这个观念会成为世界文化——从奥古斯丁到马克思、从贾罗到天安门——的主旋律之一。

现代西方的根源

11 世纪到 13 世纪，是蛮族人的成年期。他们创造出世界历史上艺术和建筑领域最伟大的时代之一：教堂时代。不过，即便那个时期，各股有效的社会力量最终也还是会削弱罗马教会对以前的蛮族人的控制。800 年前，在英格兰东部，我们可以察觉到普通人生活中的各种变化，这种变化与未来的联系至关重要。这不是伟大事件的历史，而是关于出生、婚姻以及生儿育女方面的历史。这种历史促使我们就西方的兴起提出最有趣的问题之一。这些小国家和经济体究竟是如何主导了整个世界？直到 1550 年，英格兰人口也才 250 万。而中国和印度幅员辽阔，经济相当发达，那里的人口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超过 1 亿。中国人和印度人创造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一切重要发明。西欧各国是如何超越它们的呢？西方具有别具一格的特征吗？或者这仅仅是历史的偶然？

在整个西北欧，尤其是在英格兰东部，关于出生、婚姻和死亡的记载表明，早在 12 世纪，一种鲜明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如晚婚、小型的流动性强的核心家庭以及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哲学的各种迹象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就像后来西方意识形态的种子。通过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这种意识形态成为西方主流哲学，直到今天依旧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在英格兰，这些观念尤其根深蒂固。原因不得而知，不过英国的岛国环境本来就有助于维持

铁器时代北方农民更加古老的平等主义传统。英国罗马化程度很轻，但是，英国的普通法显然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建立的“民主”制度（普通法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制定的）以及众多郡法庭的起源同样如此。10世纪，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地方政府的相似发展、强有力的货币流通以及与奴隶制相反的人身自由。许多奴隶以现金换取自由的事例表明，人们正在拒绝奴隶制，认为自由和货币是对社会更加有用的基础。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法律、通货、人身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的相互联系，或许在西方具有深厚的根基。

人们一直晚婚，这是经济增长和控制人口的关键因素之一。结婚越早，一个世纪内就会有越多的人。在贫穷国家，人们很早就结婚，家庭庞大无比：这是人口过度增长的真正促发因素，也是现在世界人口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在中世纪西欧某些地区，人们已经在实践“谨慎的”婚姻：在25岁之后结婚，组织小家庭，并且实行不可分割的财产继承制度。由此可见，那时西方人所做的，正是现在中国人在法律强制下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对控制人口和积累财富而言，这种做法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庭并不是生命安全、遗产继承以及财产所必需的。由此可见，西方正在成为一个流动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同时也在偏离大家庭以及长久居住一地的传统。这是现代西方与所有传统社会分道扬镳的价值革命的最初迹象。在北欧和其他地区，尤其德意志和荷兰，也出现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农业社会。他们持有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毫无疑问，与中国和印度一样，这种观点也深深扎根于气候、地形和土壤，这些影响因素塑造了历史上人们自我组织的方式。他们信奉的，是建立在财产和普通法之上的自由概念，即信奉普通人的权力：这个概念源自欧洲，而不是古代雅典。西方一项引以为荣的传统也由此产生，这就是

开放社会的观念。上述概念注重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权利，它是一种哲学，迟早会盛行全球。

伊斯兰文艺复兴与西方

8 世纪到 11 世纪，西亚伟大的文化中心依然是新月沃土地带。穆斯林继承了古人的遗产，中世纪的巴格达出现了连接东西方宗教和哲学的第一次尝试。通过这一地区的大学和图书馆，阿拉伯人文主义者把巴比伦天文学、印度数学以及中国科学传播到欧洲。那里的阿拉伯学者对波斯、希腊、犹太和穆斯林哲学和数学作出了卓越的综合。当时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多元文化时代之一。在 10 世纪的巴士拉，有一个著名学术团体，即“精诚兄弟会（Brethren of Purity)”，这些学者所表达的目标，即便现代人都难以想像。其中一位学者说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把阿拉伯信仰、犹太智慧与伊拉克教育、基督教行为规范、希腊知识、印度神秘主义以及苏非派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那么，他就是一位完美的人。”这种梦想依旧是一种国际化文明最伟大的信念之一。

西方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再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斯林对古代希腊遗产的传播，也要归功于来自亚洲的文明巨浪，西方精神和哲学生活因这些浪潮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代人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大学的兴起作出过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大学的组织和课程设置受到同时代伊斯兰大学的影响。15 世纪意大利的著名人文主义者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在阐释古希腊关于人之伟大的格言时，使用了一种富有特色的表达方式：“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比人本身更精彩，我从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点。”

在13世纪到14世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人文主义者选择的道路是400年前巴格达学者走过的老路：消化一种仍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宗教文化，接受一种神权政治的统治。这种政治的构成要素为古典知识、希腊文化、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以及更加古老的巫术和诺斯替主义传统。伊本·赫勒敦在1377年写道："我们后来听说，西欧哲学兴旺繁荣、作品富有生机、研究会议愈加频繁、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西方文化这种巨大的心理转向所产生的后果，我们今天依旧能够感受到。这种转向也对黑暗时代以来控制西方社会心灵的宗教世界观造成致命一击，（不管好坏）最终导向现在世俗文明的胜利。尽管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这种情况为何没有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依旧是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此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人文主义生命观与基督宗教的戒律及其决定主义历史观之间的矛盾，或许根本就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孕育了西方的自我认识，带来了西方最伟大的胜利，也造成了最有害的灾难。通过利用这种冲突，西方在艺术、音乐和戏剧方面达到了巅峰，足以比拟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成就。另一方面，西方成为其本身固有冲突的牺牲品，这一点或许比其他文明更加明显，西方心灵中长期存在的摩尼教徒式的斗争，在我们生活时代的欧洲达到最糟糕的程度。

他处的世界

13世纪以前，文明的古老中心地带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在经历13世纪蒙古人的破坏性侵袭之后，一系列伊斯兰帝国在16世纪兴起，土耳其人、波斯的萨法维人（Safavids）以及印度的莫卧儿人统治了从维也纳到恒河的广大地区。西欧各国土地狭窄、人口

有限、资源匮乏，它们不得不独辟蹊径，绕开亚洲古老的帝国。人们往往会询问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不过，在亚洲历史上，这纯粹是一个偶然时刻：蒙古人的影响力在15世纪末期烟消云散，西方则“发现了”新大陆。今天看来，这一事件显然是整个西方现代历史的基础，它开启了不可思议的精神视野，为欧洲带来难以想像的财富。或许，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新大陆的发现是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从墨西哥到安第斯山脉，欧洲人从新大陆盘剥几乎源源不断的资源，奴役那里的人民，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一种文明蓄意破坏和毁灭其他文明，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生。事实上，在秘鲁和中美洲6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当中，就有2种成为欧洲入侵者及其唯一真理的牺牲品。

从结果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对世界所有土著居民而言，1492年是一个界标。这一年标志着西方军队、宗教和意识形态开始向他们进行一场系统的战争。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些土著居民开始反抗西方文化势不可挡的影响力，以便维护自己的传统、信仰、习俗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500年过去了，这种反抗斗争还在继续。征服活动夺走了无数生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100年时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美洲土著居民因疾病和暴力而死于非命。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女王的信中写道：“我们欧洲文明会把光明带给黑暗中的土著居民，而我们则获得黄金。有了黄金，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且把灵魂送入天堂。”

启蒙运动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方的中心也发生转向，从原来的地中海地

区转移到西北欧沿海，新教和资本主义的荷兰和英格兰。我们得承认，各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北欧国家从来没有罗马化，或者罗马化的程度非常轻。这类国家与南部地中海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是欧洲历史上最古老的区分之一，这些差异体现在语言、食物、习俗、艺术、宗教以及许多其他事物上。现在看来，西北欧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必然会与罗马精神权威决裂，它们在宗教改革时期做到了这一点：英国清教徒、荷兰加尔文派以及德意志路德派，都开始走自己的路。尽管能够在剥削时代的新大陆以及其他地方复兴和扩展它的精神帝国，罗马最终还是丧失了在西方的文化领导地位。

在英格兰东部小港口莫尔登（Maldon），我们可以看到新教个人主义时代的一个象征，即完整保存下来的 17 世纪剑桥天文学教授托马斯·普卢姆（Thomas Plume）的图书馆。从中可以找到许多线索，来证明西方世界观在个人主义和科学影响下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普卢姆的 7000 本藏书，我们可以回到西方新生的世俗文明的思想世界，那时，西方正蒸蒸日上，开始迈向统治世界之路。图书馆收藏着关于希腊和阿拉伯科学的译著，我们可以发现伽利略的宇宙观、笛卡尔的人体解剖等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新知识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认识到了科学和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即用来剥削其他民族以及控制自然本身。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写道："培根在知识领域的活动，就像伟大帝国的政治领袖，他们在人类事务方面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会利用他们的丰富资源来反对自然本身。"现在看来，培根就像我们生活时代的先知，他所指明的道路，最终会导向世界大战、核弹以及环境危机。

培根本人也明白这种科学的致命后果。正如他所说的，"那么，在人类事务领域，具有实践价值的东西在理论上也是最正确的"，那

么，真理的界定标准是功用，而不是宗教和道德。因此，培根说道，“人类应当为自己立法，而不再依靠上帝”。这是现代西方科学文明的主要观念之一，这种文明会假新科学之名，到处剥削和奴役世界各民族。

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生命是一系列可以用科学加以解释的现象。地球不再神圣。它服从于西方人的时空定义，并且被绘制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础的地图上。当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这些所谓“蛮族人”的知识让他们震惊不已，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这种地图。利玛窦说道，“直到那时，在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还是整个世界”，但是，当看到世界如此之大，而中国只是世界一角之时，他们认识到，世界确实已经发生改变。

美国独立

这种新知识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表达，发生在美洲，而不是欧洲。美洲土地广阔，土著居民人数比较少，殖民者可以轻而易举撵走土著居民、霸占土地、建立新社会，非洲奴隶则满足了劳动力需求。根据统计，从 17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早期，从非洲运送到美洲的黑人奴隶超过 1100 万，他们被用来为欧洲制造商创造利润。这也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暴力移民运动。培根的功用主义观点已经结出硕果。尽管注意到奴隶制是不公正的，杰斐逊、富兰克林及其同仁们，还是以他们图书馆中培根、霍布斯以及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理论来证明自己对理性和有限政府的信念，证明以这种信念塑造未来、（正如他们所希望的）为所有人争取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正当性。对欧洲穷苦大众和下层人来说，这种前景相当具有诱惑力。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千百万欧洲人挣脱对他们的空间和自由的传统束缚，到美洲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土地上拓殖定居，从而完全改变了世界历史、人口以及环境的面貌和平衡。

在美国，当杰斐逊和 1776 年革命者为新共和国设计国徽时，他们把罗马帝国诗人维吉尔的一句格言[2]刻在上面，以此宣告一种新秩序在世界上的诞生。今天，这句格言依然印在每一张美钞上。不过，这种新秩序事实上建立在旧观念之上，建立在可以回溯到中世纪英格兰财产占有的个人主义之上。它也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白皮肤的、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具有优越性。在由有产者和金钱操纵的有限民主政府手中，这些观念会成为西方强权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

工业革命与世界商业

就我们考察过的历史时期而言，绝大多数伟大的技术发明来自亚洲。17 世纪，印度生产的钢铁、棉花和丝织品是最好的。在冶铁技术和许多其他大众产品生产方面，中国一直是世界的领导者。不过，在 18 世纪，西北欧沿海国家把强大的海军力量用作侵略手段，掌控了世界贸易，这一切都以国内的工业革命为后盾。一种新的全球文化诞生了，我们今天依旧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这种体系的支撑力量，是帝国以及对今天众所周知的第三世界的剥削。自此之后，从印度平原到中国黄河流域，工业城市在从世界各地蔓延开来。今天，人们还在评价人类、环境以及生态由此遭受的影响。19 世纪，新生欧洲史诗般的物质主义给外国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一位中国驻英国外交官赞叹道：“英国人真是天才民族”，“他们已经披上

文明外衣，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称他们为蛮族人呢？”一些旁观者甚至捍卫这种新社会的精神价值。胡适就为物质主义的西方辩护，因为它比中国更重视精神，而且它的理想“建立在追求人类幸福之上，通过提升物质福利，它也会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通过哲学、宗教和伦理进步，它就会推翻宗教迷信，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这是胡适20世纪20年代的言论，时值二战以及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毫无疑问，他的这种理想现在依旧是西方各地——从权力长廊到教室——所珍爱的。或许，时间会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退却

在21世纪早期，西方历史的位置何在呢？我们果真能够认为西方价值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吗？即便能够，这是一件好事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年以来，西方的首都，事实上也是全球的首都，已经位于新大陆的华盛顿特区。美国是黑暗中世纪西方蛮族的继承人，从语言、文化和宗教上来说，都是如此。华盛顿的纪念性建筑，如埃及方尖塔以及希腊和罗马风格的建筑[3]表明，美国不仅仅是欧洲遗产的继承者，也是各种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一个民族握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正如胡适所承认的，新秩序的理想高贵无比。我们只需要想一想林肯纪念堂就知道了，这座纪念性建筑受到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启发，被纪念的人，即林肯，经历过美国残酷的内战，一直执守欧洲启蒙运动以及法美革命的理想：所有人生而平等，拥有平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

不过，西方的胜利还有另一种解读。20世纪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战争，西方列强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在世界范围开战。1939年到1945

年间，欧洲文化的中心地带遭遇最严重的创伤，这里孕育出了西方最璀璨的音乐和哲学，但是，二战期间，这里也滋生出有系统地灭绝千百万人的暴行，这种暴行建立在扭曲的种族优越论之上。这一事件非常恐怖，一切信仰或者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对于历史上创造出伟大文明的人民而言，这种事件简直无法想像。自此之后，贫穷弱小的国家发现自己处于大国争夺的夹缝中，不但遭到长期野蛮的侵夺，也一直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兜售。不管好坏，从非洲（人类中心地区）到亚洲和美洲，由于西方的冲击，所有当地文化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过去 40 年，文明对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这个麻烦不断的时代对人们有什么教诲的话，那就是不要相信乌托邦。如果在 21 世纪谈论“一种新秩序”意有所指，那么，我们或许应当重新看待西方的历史：以他人的视角来审视它，质疑我们的集体神话和珍视的理想，甚至质疑我们的自由概念本身。在富足的西方，所有国家都出现一种日益增长的深深焦虑：因为污染、环境破坏以及对人类绝大多数的持续剥削，人们担心西方生活方式无法在道德或实践上延续下去。如果这种焦虑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显然如此），那么，下一代人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显而易见的。仅凭西方价值就能够保证地球的健康发展吗？正如我们所见，这些价值显然来自西方的历史：个人主义、竞争、攫取、始终向外拓展，正如帕斯卡所说的，（西方人）“从来不会满足于呆在一间空房间”。但是，这种生命观的承载者，即西方统治阶层，掌控着地球的未来。或许，在大获全胜之际，西方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同时也是所有文明的关键时刻，为了避免灾难，西方必须通过向其他文明学习来改变自己。我们所面临的地球和精神危机，是由一种文明引发的，那就是西方文

明。或许，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西方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化进行对话，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话。各种迹象表明，这种对话已经开始。如果对话以真正的平等精神展开，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的核心依旧是轴心时代孔子、佛陀及其同时代人所讨论的基本原则：自由和平等、个人和集体、理性和精神之间相互冲突的需求。

印度文明很早就告诫说，贪求财富只会毁灭我们，生命是神圣的，不仅仅人的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如此。很久以前，中国人就相信，生命的基础在于探寻人类与自然之间适当的和谐。我们必须在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作出平衡，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我们必须接受空间上的限制，遏制我们的欲望。尽管西方对伊斯兰文明充满怀疑，也绝少同情它，不过，在现代世界，它也可以在人文主义价值、多元主义以及精神性等方面让我们获益良多，让我们认识到传统的价值。在经历毁灭性的20世纪之后，这些伟大的、可供选择的文明在向我们表达自己，这种表达也显得愈益迫切。它们代表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如同雨林之于生命，这些文明就是“精神雨林”。

最伟大的史学家、阿拉伯的伊本·赫勒敦指出：“文明的目标是定居生活与享受奢华。但是，我们不能越过一个界限。当一个民族取得繁荣和奢华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消费和穷奢极欲。”他又补充道：“人类灵魂本身在世俗安乐和精神生活双重层面遭到破坏” 。

返回乌鲁克

在这次探究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次旅程。我们现在返回出发点，返回伊拉克南部，返回伊甸园，返回世界第一城乌鲁克。在这里，5000年之前发生了一场伟大革命，人们首次在城市居住，

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今天地球上无数人的生活。如今的乌鲁克已经变成新月荒野，曾经的沃土毁于生态灾难。自文明在伊拉克兴起以来，5000 年时光已经过去，不过，我们依旧对那些早期人民的经历着迷。我认为，这种迷恋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创造发明，也在于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悲观主义解读，更在于他们的抗争——努力抑制人类生活中的战争，探寻可行的道德法则和社会秩序，以及维护真理。现在，我们探究的是太空和心理活动，不过，与那时的人相比，我们并没有逃脱与大地母亲的古老联系，所有所谓的原始社会都认为，这种联系是理所当然的。5000 年前，当城市在伊拉克出现之时，人类的心灵出现根本分裂，宇宙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重新调整。这种变化进程由凌驾于各种古老行为方式之上的经济需求所掌控，最终的结果就是文明与自然的分离。在最近 100 年，这种概念经由西方在世界范围蔓延。5000 年以来，就整个世界而言，文明面临的问题一如既往：少数统治多数的古老政治制度，人口膨胀，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分配不均，富人挥霍资源，以及不合时宜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这种观念似乎很快就会被丢进历史垃圾箱。

150 代人以来，正如古代乌鲁克诗人、《吉尔伽美什》作者所梦想的，文明遗产正在解放我们的想像力，也潜在地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奔放。然而，物质上的成功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存在，事实上威胁着所有物种的存在。与受到吹捧的人权一样，这些物种的权利也开始要求得到维护。这就是我们在 21 世纪留给子孙后代的难题。

文明的最早创造者、古代苏美尔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明起源的精彩神话。他们声称，文明的诞生是与魔鬼达成的协议。文明为人类提供了高贵的理想，同时也带来了暴力、贪婪和毁灭。苏美尔智慧之神告诉乌鲁克的伊南娜（Inanna），这就是文明。伊南娜将把这种文明

带回她的城市，从而也将文明带给整个世界。智慧之神继续指出，如果你想得到文明的好处，那么也得无条件接受它的所有特性：

……强大的艺术，
虚伪的艺术，
正直的艺术，
抢劫城市，
带来悲哀，
心灵喜悦。

木匠技艺，
铜匠技艺，
书写技艺，
铁匠技艺，
芦苇编织技艺。

……仁爱技艺，
生火……
手臂疲惫，
饥肠辘辘，
组建家庭，
生儿育女……

……害怕、恐惧、沮丧，
战争的火焰，

心灵的抚慰……

圣洁的伊南娜，我将把所有这些交付给你，一旦你接收了它们，就得无条件这么做，并且也无法归还它们。

注释

[1] 古希腊抒情诗人。

[2] Novus Ordo Seclorum，意为“时代新秩序”，印在美国国徽的反面。

[3] 即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等。

参考文献

本书由纪录片文稿编写而成，为影片写作完全不同于为出版写作。因此，本书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激发读者进一步的阅读兴趣，尤其是阅读本书主要参考的一些著作：Simon Leys、Raymond Dawson 以及 Theodore de Bary 对中国的论述，Barry Kemp 对埃及的论述，以及 T. F. Madan 对印度的论述。下面主要列举一些我认为很有用也很有意思的作品。

关于伊拉克的著作：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优秀指南著作（原有的《蓝色导游》仍然是最好的），不过，有一本很不错的图集，即 M. Roaf 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地图》（*A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1991）。关于游记，可以参考 F. Stark 的《巴格达掠影》（Baghdad Sketches，1937）和《东方即西方》（*East is West*，1945）；E. S. Stevens 的《两河流域》（*By Tigris and Euphrates*，1922）；W. Thesiger 的《沼泽阿拉伯人》（*The Marsh Arabs*，1964）；G. Maxwell 的《风吹芦笛》（*A Reed Shaken by the Wind*，1957）；G. Yong 的《回到沼泽地》（*Return to the Marshes*，1977）。早期著作，可以看 W. Loftus 的《迦勒底与苏西阿那》（*Chaldaea and Susiana*，1857）。关于基本的历史：G. Roux 的《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Penguin 1980 ed.）。关于伊拉克考古罗曼史：Seton Lloyd 的《尘埃中的基础》（*Foundations in the Dust*，1980 ed.）。T. Jacobson 的《黑暗的珠

宝》(*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1976)对早期宗教作了出色的综合分析。S.N.Kramer 的《历史从苏美尔开始》(*History begins at Sumer*, 1981ed.)与《苏美尔人》(*The Sumerians*, 1963)是经典之作。关于乌鲁克、埃利都、乌尔以及尼普尔等地的考古挖掘,都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同时也可以参阅 S. Lloyd 的《美索不达米亚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1978)。苏美尔文学和诗歌:T. Jacobson 的《曾经的竖琴》(*The Harps that once*…, 1987), S. Dalley 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Myths from Mesopotamia*, 1989)。伊斯兰教时代的概述性著作:A. Hourani 的《阿拉伯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1989)是不错的入门书;关于中世纪的巴格达:G. Makdisi 的《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Colleges*, 1981)与 M.J. L. Yong 和 J.D.Lathan 编辑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宗教、知识和科学》(*Religion, Learning and Science-the Abbasid Period*, Cambridge 1990);关于巴格达和巴士拉苏非派的著作有:J. Baldick 的《神秘的伊斯兰教》(*Mystical Islam*, London 1989)与 A. Schimmel 的《伊斯兰教的神秘向度》(*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 1975)是优秀的导论性著作。M. Momen 的《什叶派伊斯兰教》(*Shi'i Islam*, 1985)对苏非派作了很好的介绍,也是最近出版的这方面众多作品之一,不过,关于苏非派宗教仪式,读者需要参考一些更早的作品,如 E. S.Stevens 的作品或 D.Donaldson 的《什叶派宗教》(*The Shiite Religion*, 1933)。关于曼底安派:E. S.Drower 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曼底安派》(*The Mandaeans of Iraq and Iran*, 1962), K. Rudolph 的《曼底安派》(*Mandaeism*, 1978)和《论灵知》(Gnosis, 1987),后者也对摩尼教作了很有价值的介绍。就整个这一时期而言,Peter Brown 的《古代晚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late Antiquity*, 1971)是优秀指南。J.M. Wagstaff

的《中东地形的发展》(*The Evolution of Middle Eastern Landscape*, 1985)对从史前到20世纪晚期的地形史做出了开拓性探究。

关于印度，A. T. Embree编辑了一本优秀的平装本集子：《印度传统资源》(*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 1988)。R. Thapar的《印度史》(*A History of India*, Penguin 1966)是一部出色的导论性作品。论述印度史前史的最好作品是B.Allchin和R. Allchin的《文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兴起》(*The Rising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1982); John Marshall爵士的《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1931)也是经典之作。关于印度艺术：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编撰的《人类印象》(*In the Image of Man*, 1982); C. Tadgell的《印度建筑史》(*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India*, London 1990); C. Sivaramurti的《南印度青铜器》(*South Indian Bronzes*, 1981 ed. Delli); S. Kramrisch的《印度艺术》(*The Art of India*, Phaidon 1954); P. Chandra的《印度雕刻：3000 BC—1300 AD》(*The Sculpture of India 3000 BC—1300 AD*, Harvard UP 1985); V. Dehejia的《朱罗王朝的艺术》(*Art of the Imperial Cholas*, 1990); C. Bayley编辑的《英国统治：1600—1947年间的印度与英国人》(*The Raj: India and the British 1600—1947*, 1990); P. Mitter的《群魔》(*Much Maligned Monsters*, 1977)考察了西方人对印度艺术的反应。

关于印度教的通俗读物很多，大家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一些平装本书籍，比如J. Brocklebank、R. Zaehner、M. Biardeau和K. Sen的著作；A. Danielou的《印度诸神》(*The Gods of India*, 1985ed.)或许是关于印度多神论最优秀的导论。T.F. Madan的《印度宗教》(*Religion in India*, 1991)对印度宗教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讨论。许多作品

对朝拜和圣地作了分析：D. Eck 的《贝拿勒斯：光明之城》（*Benares, City of Light*，1983）尤为突出，充满了深刻的见解；S. M. Bhardwaj 的《印度教朝圣地》（*Hindu Places of Pilgrimage*，1973）也是非常有用的概述。论述语言和雅利安人的著作：J. P. Mallory 的《寻找印欧人》（*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1991）；D. MacAlpin 在《美国语言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Society*，Vol 71，pt 3，1981）发表的文章论述了达罗毗荼语。M. Coulson 编写的《自学梵语》（*Teach Yourself Sanskrit*，1976）是一本非常好的梵语入门书。关于印度的最好指南书，还是由 John Murray 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系列；《孤独的星球》（*The Lonely Planet*）也很有帮助；Isobel Shaw 编写的《巴基斯坦便览》（*Pakistan Handbook*，1989）是关于印度河流域的最好手册。

关于中国，de. Bary 编辑的《中国传统资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1960）是非常不错的集子；Raymond Dawson 的《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1964）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该著作对中国作出了富有同情心的介绍；Simon Leys 的《燃烧的森林》（*The Burning Forest*，1988）是中国“伟大传统”现代命运必不可少的参考书。R. Dawson 编辑的《中国的遗产》（*The Legacy of China*，Oxford 1972）是关于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有用文集，它会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 W.G. Beasley 和 E.G. Pulleyblank 编辑的《日本和中国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1961 ed.）；D. Nivison 的《章学诚：生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 Cheng*，1966）；M. Sullivan 的《中国艺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1967）；W. Watson 的《中国古代青铜器》（*Ancient Chinese Bronzes*，1977ed.）以及 J. Needham 编辑的《中国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7vols，1954)。《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是导论，现在已经出版了一个缩略本。关于中国史前史的论述，最近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Li Chi 的《安阳》(*Anyang*，1977)；K. C. Chang 的《古代中国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986 ed.) 和《商朝文明》(*Shang Civilization*，1980)。Paul Unschuld 的《中国医学》(*Medicine in China*，1985) 对从商朝到 20 世纪的中国医学作出了精彩考察；关于饮食：K. C. Chang 的《中国饮食文化》(*Food in Chinese Culture*，1977) 不可不读；宋朝开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餐厅文化：世界上最古老的餐厅就是开封 Ma Yuxing 的大盘鸡店 (Bucket Chicken house)。这里不需要列举孔子和其他早期哲学家的个人著作，因为现在很容易找到这些书的平装本；关于唐代诗人，A. C. Graham 编辑的《晚唐诗人》(*Late Tang Poets*，Penguin 1965) 是不错的选择。宋朝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英文介绍，尽管 R. Egan 的《欧阳修文选》[(*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h* (1007—1072)，1984] 有助于填补这一巨大空白。关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Nigel Cameron 的《蛮族人与清朝官吏》(*Barbarians and Mandarins*，1989 ed.)；Jerome Chen 的《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West*，1979)。J. Spence 的《探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 对晚期中国历史作出了有趣的考察。与本书相关的论述中国城市起源的著作：Paul Wheatley 的《四方之枢纽》(*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1971)。图集有：C. Blunden 与 M. Elvin 编辑的《中国文化地图》(*A Cultural Atlas of China*)；N. Sivin、F. Wood、P. Brooke 和 C. Ronan 编辑的《当代中国地图》(*The Contemporary Atlas of China*，1988)，都非常不错。最后，关于中国伟大传统的精彩概述，参见 T. de. Bary (狄百瑞) 的《东亚文明》(*East Asian Civilizations*，1988)，其中最后一章论述了

郑和的航海（参见第105页），并且与我的观点相同。此外，现在还可参考F. Wood的《信步中国》(*Blue Guide to China*)。

关于埃及，有很多不错的概论性作品：T. G. H. James的《古埃及》(*Ancient Egypt*，1988)，J. Baines和J. Malek的《古埃及地图》(*The Atlas of Ancient Egypt*)。下面列举的著作主要是对早期和晚期的论述：M. Hoffman的《法老之前的埃及》(*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1980)；Walter Emery的《古代埃及》(*Archaic Egypt*，1961）是必读书目；Barry Kemp的《古埃及：一种文明的剖析》(*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1989）也是出色的概论。关于希腊化时代：Alan Bowman的《法老之后的埃及》(*Egypt after the Pharaohs*，1986)；G. Bowerstock的《古代晚期的希腊文化》(*Hellenism in Late Antiquity*，1990)。Garth Fowden的《埃及的赫尔墨斯》(*The Egyptian Hermes*，1986）对晚期埃及的异教作出了精彩分析：它没有论述这种观念在早期伊斯兰教时期的延续，不过，让人感兴趣的是，早期苏非派炼金术士和神秘家Dhu' n-Nun（大约公元859年）也来自艾赫米姆，这方面的论述参见Schimmel的《伊斯兰教的神秘向度》(*Mystic Dimensions of Islam*)。N. Lewis的《埃及托勒密时代的希腊人》(*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1986）和《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生活》(*Life in Egypt under Roman Rule*，1983）是令人振奋的研究。关于晚期艺术，可以参考布鲁克林美术馆（Brooklyn Museum）的《克里奥帕特拉的埃及》(*Cleopatra's Egypt*，1988)。关于古老习俗的幸存：E. W. Lane的《现代埃及人》(*The Modern Egyptians*，1836）以及R. David的《古代埃及人》(*The Ancient Egyptians*，1982)。Baedeker出版公司出版的旅游手册依旧是关于埃及的最好指南。

关于中美洲，人们可以找到许多深受欢迎的读物。N. Hammond

的《古代玛雅文明》(*Ancient Maya Civilization*, 1982) 以及 G. W. Conrad 和 A. A. Demarest 的《宗教与帝国》(*Religion and Empire*, 1984) 非常出色；M. Coe、D. Snow 和 E. Benson 的《古代美洲地图》(*Atlas of Ancient America*) 同样如此。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考察过去与现在的联系：K. Pearce 的《神庙之顶的风光》(*The View from the Top of the Temple*, 1984)；Barbara Tedlock 的《时间与高地玛雅》(*Time and the Highland Maya*, 1982) 以及 B. N. Colby 和 L. M. Colby 的《日期保管者》(*The Daykeeper*, 1981)。关于西班牙人的影响：I. Clendinnen 的《自相矛盾的征服》(*Ambivalent Conquests*, 1987)；N. M. Farriss 的《殖民统治之下的玛雅社会》(*Maya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1984)。关于晚近的状况：G. Black 的《守卫危地马拉》(*Garrison Guatemala*, 1984) 是这方面的众多作品之一。近来，Ronald Wright 写作了《玛雅人的时间》(*Time Among the Maya*, 1989)，这是关于贝利塞（Belize）、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旅行指南，对于那些想寻找玛雅世界的旅游者来说，不容错过！最后，Dennis Tedlock 在 Andres Xiloj 的帮助下，翻译了玛雅人的创世纪——《波波尔·乌》(*Popol Vuh*, 1985)，该作品绝对值得一看。

自本书出版以来，我又写了几部著作论述其中某些方面，它们或许对读者有用。关于希腊人在亚洲的征服：《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2004 ed.)；关于墨西哥和秘鲁文明以及欧洲人的影响：《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 2000)，该书列举了大量参考文献，它们论述了 16 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持续的遗产。关于第二章泰米尔文明，参见我的《穆卢干王的微笑：南印度之旅》(*Smile of Murugan: A South Indian Journey*, 2001 ed.)。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补充一个西方参考书目，不过，《世界历史地

图》（*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和《消逝的世界：考古地图》（*Past Worlds: The Times Atlas of Archaeology*，1955）无疑是思想源泉之一。最后，我引用章学诚的一句话作为结语，他在1797年写道："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也会老去。那么，让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吧。那时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图片使用说明

BBC丛书要感谢以下个人和组织提供图片或允许使用图片。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寻找和承认图片的权利所有者，如果存在任何错误和疏漏，我们表示歉意。

除了以下图片之外，其余全部由迈克尔·伍德提供：

彩图：

第1页（上）：Georg Gerster/Network Photographers

第2页（上）：akg-images/Erich Lessing

第3页：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

第5页（下）：The Trustees of 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Dublin

第8页（下）：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第9页（上）：akg-images/François Guenet

第9页（下）：akg-images/François Guenet

第10页（下）：British Museum

第11页（下）：akg-images/Erich Lessing

第12页（上）：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London

第16页：akg-images.

致 谢

这本书是过去几年旅行的产物，我很高兴借此机会感谢那些有助于此书写作和出版的人。先从伊拉克开始：我与 Kamil Alwan Shihab 相处了几周时间，感谢他与我分享他的知识和幽默；司机 Muklus、Mersin 和 Falah 也一直关心我；我与 Muhar Abu Gumar 在瓦尔卡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子；感谢摩苏尔（Mosul）的 Joseph Habbi 博士和埃尔比勒（Irbil）的 al-Mulla 一家。我也要感谢卡尔巴拉（Kerbala）的宗教机构，尤其是巴格达 Gailani 家族，允许我进入他们著名的神殿和图书馆。巴格达的曼底安宗教团体也非常友好，谢赫阿迪（Sheikh Adi）的雅兹迪派（Yezidis）也是如此，在这个曾经田园牧歌式的地方享用的丰盛晚餐，令我终生难忘。我对巴格达美国和英国学校的帮助表示谢意：尤其感谢 Tony Wilkinson、Erica Hunter、Jeremy Black 和 Georgina Hermann，也要感谢瓦尔卡的 R. Boehmer 教授。伊拉克的许多朋友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特别是 Lamia al-Gailani 博士。

在印度，首先是泰米尔纳德邦，我要感谢如下人士和机构：马杜赖和坦焦尔（Tanjore）博物馆的负责人；M. Nagaratinam 一家，他们一直很友好，陪同我参观了泰米尔许多圣地；R.N.Dikshithar 和吉登伯勒姆（Chidambaram）舞蹈之神（Nataraja）神庙的所有祭司；马杜赖米娜克什（Minakshi）神庙的组织机构，他们特别友好；Jambukesvara 和 Ramanathasvami 神庙委员会，他们允许一位非印度

教人士进入他们的神殿；蒂鲁瓦卢尔（Tiruvarur）Thyagaraja神庙的祭司；我对马杜赖的S.Kannan和Sushila Ravindranath一直心怀感激。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诸多帮助。我也要对Jyoti Maya Datta一家表示谢意。在贝拿勒斯，我首先要感谢Col. V. P. Singh，他带我们游览该城，并且与我们谈论他家族的传统；也要感谢Ganesh Pandy一家，他们家族在那里经商长达4个世纪之久。我想对安拉阿巴德的Rustom Gandhi和Shernaz Gandhi及其家庭成员的帮助表示谢意，我们住在Hotel Finaro（无疑是印度最好的宾馆），他们还去宾馆看过我们几次。我尤其要感谢巴基斯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ervice）和旅游局，我们在参观摩亨佐—达罗期间，他们提供了热心的帮助。

在中国，我要感谢曲阜的Guo先生，他非常熟悉孔子故乡以及它的古今历史。感谢西安的Lao Kung和Ms Suen；Lao Kung领着我们顺着黄河游览，时值炎热的6月，我们的司机Yu先生始终毫无怨言，并且很风趣；感谢西安大清真寺的教长，他非常友好，也很有智慧；也要感谢Xingjiose修道院院长；Sam Lieu和Peter Bryder带我去看了泉州（Quenzhou）附近的曹安庙（Cao’an temple），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座摩尼教堂，对此深表谢意；还要感谢安阳的Yang His-chang，泰安泰山宾馆的经营者和工作人员，尤其让我们的中国之旅如此难忘的He Yuxie。

在埃及，我特别感谢卢克索Hamdi Mohammed Mosa一家；Haggag el Sanousy和Mohammed Khalid abu Zed家庭；他们都非常友善。感谢卢克索法老宾馆的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们一直很好地招待我们；也感谢卢克索Abu’l Haggag清真寺管理人员，圣保罗修道院院长和僧侣，以及开罗Al Ahzar清真寺的宗教机构。

在中美洲，我们游历危地马拉时，Jim Conroy 一直与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的想像；莫莫斯特南戈 Barrio St Isable 的 Andres Xiloj 非常热情大方地向我这个外国佬介绍高地玛雅的古代遗迹和传统，我始终感激不尽。Dennis Tedlock 教授安排了我们的见面。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考古局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在墨西哥，我要感谢 Roberto Galliegos 教授，他花时间陪同我们参观特奥蒂瓦坎，并且允许我们进入到神圣洞穴，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在欧洲，我要对罗马的 Gianni Ponti 博士、雅典的 Hara Palamidi 和 Myron Papadakis 表示谢意，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导游。

BBC 的 Richard Creasey 是这项策划“唯一的生命赐予者”，Roger James 也以当今少见的耐心和友善见证了它的全过程，我对他们两人表示谢意。在大西洋另一边，马里兰公共电视台的 Leo Eaton 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在节目长期编辑制作过程中，他在百忙之中，一直问一些很有必要提出来的问题。我要再次对他（以及 Gerry）说声感谢。我也要感谢华盛顿公共电视台的 Jennifer Lawson，她一直对这项策划信心十足。拍摄《遗产》纪录片的成员主要有三位：Peter Harvey、Lynette Frewin 和 Mike Claydon。我们一起跋涉千山万水，从贾罗到巴格达，再到中国南部，我对他们的技术、毅力和幽默感表示由衷感谢。Sanjiv Talreja 和 Fredy George 录制了印度的情节，他们非常出色。来自 MPT 的 Ray Kawata、Bill Bealmear 和 Carole Everson 也非常优秀，他们录制了中美洲的内容。感谢 Hal Lindes 和 Ed Wynne 配制的音乐。这些记录片由 Mark Brown、Paul Brown、Stephen Griffiths 和 Annie Moore 剪辑，他们的责任和技术不输其他任何人。在长期的剪辑过程中，他们一直耐心、精神饱满地工作，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也要感谢本书的编辑 Julia Wigg，她对文稿提供的帮助是难以估价的。最

后，我想对两个人道一声感谢，过去四年，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跟他们一些筹备、录制和剪辑《遗产》系列。首先是 Peter Spry Leverton，他以精湛的专门知识和令人羡慕的平静心态监制这些记录片，即使在受到一位负责安全的官员的威胁时（声称要毁掉他的影片）也毫不动摇。如果不是他的坚持，《遗产》系列就不会出现在荧幕上。其次是 Chris Ledger 副导演和研究员，他一直热情地提供帮助，总能够为大家带来乐趣，而且，他也无私地奉献他的专门技术。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译后记

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1948—）是英国史学家、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也是著名广播员。他主持播出了一系列电视纪录片，制作了80多部电影纪录片，最著名的有：《伟大的铁路之旅》（*Great Railway Journeys*）、《追寻文明的起源》（*Legacy: A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Great*）、《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s*）、《追寻神话与英雄》（*In Search of Myths and Heroes*）以及《印度的故事》等。他也写了不少著作论述英国的历史，如《英格兰的故事》等。

在《追寻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迈克尔·伍德考察了世界上6种主要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分析了各种文明的特征及其遗产，同时探讨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人类的未来。迈克尔·伍德对西方文明作出了批评性考察，指出它在世界各地产生的消极影响，批评西方对其他地区的侵略和剥削，尤其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征服活动。在迈克尔·伍德看来，人类的未来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西方尤其需要从中国和印度古代文明吸取养料。毫无疑问，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世界联系更加紧密，而人类今天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无法解决。由此看来，迈克尔·伍德的上述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也值得重视。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如下人士的帮助：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北成先生、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 Toby Lincoln 博士，他们为译者解决了一些疑难句子；本书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叶敏女士、周红聪女士为译稿付出了大量劳动；重庆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生张蓉同学核查了一些人名和地名，并录入了索引文字。译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名词的翻译上，译者尽量依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世界地名录》等工具书，个别未收录的名词就只好音译。尽管译者尽了最大努力，由于水平有限，译文无疑还会存在不足和谬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耀辉

2011 年夏记于重庆师范大学

索 引

斜体页码对应插图

Abd al-Gailani，阿卜杜勒·盖拉尼，33

Abd al-Latif，阿卜杜勒·拉蒂夫，33

Abraham，亚伯拉罕，5，16，24，133，139

Abul Haggag，festival of，阿布·哈加戈节，135

Abydos，Egypt，阿拜多斯，埃及，84，119—121，129，133

Acosta，Jose de，何塞·德·阿科斯塔，161

Aditya，Chola king，阿迪蒂亚，朱罗王朝国王，71

Adivasis，原住民，46，53

Africa，非洲，2，75，105—106，161—162，170，172，181，184

Ain Ghazal，Jordan，艾因盖济勒，约旦，11

Akbar，Moghul emperor，阿克巴，莫卧儿帝国皇帝，56，66—70

Akhmim，Egypy，艾赫米姆，埃及，131—133，194

Akkad，阿卡德，21，25，28，33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22，43，74，109，120，127，169，195，201

Conquest of Egypt，征服埃及，109—110，120，131

Alexandria，亚历山大，28，109—111，120，127—130，169—171

Kom el-Shukafa tomb，考姆艾尔苏卡法陵墓，128

Alfred，King of Wessex，阿尔弗雷德，韦塞克斯国王，63

Allahabad，安拉阿巴德，54—55，68，75—78，198

Nehru's house at，尼赫鲁在安拉阿巴德的住宅，76—78

Prayag，钵罗耶伽，54，61

Alvarado，Pedro de，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146

Amenophis III，Egyptian king，阿美诺菲斯三世，埃及国王，133，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美国革命，176

Anglo-Saxon England，盎格鲁一撒克

逊人的英格兰，1
Antioch，安条克，129
Anubis，Egyptian god，阿努比斯，埃及神祇，120，128
Anyang，安阳，80—81，84—85，121，193，198
Arabic language，阿拉伯语，1，28，35
Arbic numerals，阿拉伯数字，62
Aramaic language，阿拉姆语，28，30，129
Aryan civilization，雅利安人的文明，46—47，51—53，55—58，71
Asclepiades，阿斯克勒庇阿得斯，132
Ashoka，阿育王，61—62，67，75—78
Asia，and Western civilization，亚洲，与西方文明，1，30，44，64，93，98，142，165，167—168，170，172，177，179，184，195
Athens，雅典，98，168，172，176，199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175
Aurangzeb，奥朗则布，69—70
Axis Age，轴心时代，56，59，62，86，129，167，185
Aztecs，阿兹特克人，121—122，140，151，155—159
and human sacrifice，阿兹特克人与人祭，156—158
and tenochtitlan，与特诺奇蒂特兰，155—159
Babylonia，see Iraq，巴比伦尼亚，参见伊拉克，5，56，111，169
Bacon，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180
Baghdad，巴格达，1，3，5，7—8，21，31—37，39，93，98，137，167，177—178，190，197，199
and Cairo，巴格达与开罗，142
and China，巴格达与中国，97，103
Gailani family，盖拉尼家族，22
Medieval city，中世纪城市，36，42
Persian and Arabic culture in，巴格达的波斯与阿拉伯文化，41
sack of，洗劫巴格达，41—43
Baluchistan，俾路支省，50—51
Banerjee，R.D.，R. D. 班纳吉，47
Basra，巴士拉，16，31，50，177，190
Brethren of Purity，“精诚兄弟会”，177
trade with India，巴士拉与印度的贸易，55
Bede，Venerable，可敬的比德，174
Bedouins，贝都因人，15
Beijing，北京，2，80—81，84—85，102—103
Benares（Kashi），贝拿勒斯（迦尸），44，55
Bhagavad Gita，《薄迦梵歌》，63，69，78
The Bible，《圣经》，17，24，54，63，166，174
Book of Genesis，《创世记》，6—7
and David，《圣经》与大卫，174

Garden of Eden story，伊甸园的故事，17，54，185
and India，《圣经》与印度，63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圣经》与西方文明，170
Biruni，Al，阿尔·比鲁尼，64
Blake，William，威廉·布莱克，69
boat burials in Egypt，埃及的船葬，121
Brahmi script，婆罗米文，55
Brahmins，婆罗门，44，46，53，59，65，111，114，129
and Sanskrit sacred texts，与梵文圣典，43，45，111
Brahui language，布拉灰语，51
British Empire，and India，大英帝国，与印度，42，74，105
Bronze Age civilization，青铜时代的文明，56
and Greece，青铜时代的文明与希腊，168
Brunton，John and William，约翰·布伦顿和威廉·布伦顿，42
the Buddha，佛陀，56，58—61，64，77，87，101，185
Buddhism，佛教，47，54，58—59，61，64，67，70，91—92，94，129，170
and Akbar，佛教与阿克巴，66
Buddhist pilgrims，佛教朝圣者，61
in China，中国的佛教，54
in Egypt，埃及的佛教，129
and Greece，佛教与希腊，170
in India，印度的佛教，58—60，64
Byzantium，拜占庭，22，109，171

Cabrera，Estrada，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164
Cairo，开罗，1，112，121，135，137—138，198
calligraphy，书法，93，108，
Cambodia，柬埔寨，4，71
Canning，Lord，坎宁勋爵，75
Catal Hüyük，Anatolia，加泰土丘，安纳托利亚，10—11，169
Catherwood，Frederick，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152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堂，143，148
Mayan churches，玛雅的天主教堂，148
and native Americans，天主教堂与美洲土著人，161—162
Cavafy，Constantine，康斯坦丁·卡瓦菲，136
Central America，中美洲，2，4，84，114，140—141，147—149，151—153，155—156，158，160，162，164，194，199
conquistadors in，西班牙征服者，140，146，163，195，201
and Egypt，中美洲与埃及，112，140，141

fall of Tayasal，塔亚萨尔的失陷，162—163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in，中美洲文明的起源，148
as a self-contained civilization，中美洲的独立文明，142
see also Aztecs; Maya; native Americans，也参见阿兹特克人；玛雅；美洲土著人
Chandragupta Maurya，旃陀罗笈多·孔雀，61
Chang Hs.uh Cheng，Chinese historian，章学诚，中国史学家，103—104，192，196
Chendamangalam，Christian church at，岑德曼格拉姆的基督教堂，63
Chichicastenango，奇奇卡斯特南戈，143
Ch' ien-lung，Chinese emperor，乾隆，中国皇帝，103
Chin Shi Huangdi，Chinese emperor，秦始皇，中国皇帝，90—91
China，中国，1—4，12，19，24—25，30，36，40—41，43，54，56，59—60，72，80—108，112，114—115，121，126，142—143，149，151，154，160，165—166，170—177，181—183，185，189，192—194，198—199，201
Anyang，安阳，80—81，84—85，121，193，198
bronzes，青铜器，71—72，83—84，116，191—192
oracle bones，甲骨文，24，85
tombs，陵墓，18—19，84，90，95，116，121—124，128，135—136
Beijing，北京，2，80—81，84—85，102—103
Buddhism，佛教，47，58—59，61，64，67，70，91—92，94，131，170
Chin emperor，秦始皇，90—91
Chinese conception of civilization，中国人的文明观，80—81，107—108
Ching dynasty，清朝，2，103—104，193
Christianity in，中国的基督教，93—96
Communist revolution，共产主义革命，88，105—107
Confucianism，儒家学说，60
craftsmen，工匠，38，90，99，107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107
and Egypt，中国与埃及，81，114，121
encyclopaedic projects and dictionaries，百科全书工程与词典，103
Great Wall，长城，90，102，172
Hsai dynasty，汉朝，85
and the Inca civilization，中国与印加

文明，160
and India，中国与印度，84，89，90，111
legacy of，中国的遗产，107，192
and the Mayan civilization，中国与玛雅文明，142—143，149—151
and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40
Ming dynasty，明朝，1，93，100—103
Mongol，蒙古人，36—37，98，102，112，137—138，172，178—179
Opium War，鸦片战争，105—106
poetry，诗歌，15，20，46，71，86，93，95，103，108，157，171，190
population growth，人口增长，11，19，123
printing，印刷术，3，97—98
and Rome，中国与罗马，173
Shang dynasty，商朝，83—85，121，149，193
ships and sea voyages，船只与航海，1—2，100—101
Songshan，嵩山，82，85
Sung dynasty，宋朝，1，96—98，102，193
Tang dynasty，唐朝，92—93，95—96，100，174
Taoism，道家学说、道教，88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s，技术与发明，96—98，100—101，108，182
unification of，中国的统一，90
and the West，中国与西方，91，104，193
clashes between，中国与西方的冲突，104—107
different concepts of civilization，不同的文明观，81，107—108
first contacts，最初的接触，95—97，175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中国与技术革新，101
Xian，西安，36，85，90，92—96，150，198
Yuan dynasty，元朝，99—101
Chòu，Shang dynasty king，商纣王，83，87
Christianity，基督教，5，11，22—23，28，31—32，35—36，63，67—68，70，74，76，94，96，104，115，129—137，139，144，146，159，161，163，165—167，171，173—174，177，182
in Central America，中美洲的基督教，159—161
Mayan Catholic churches，玛雅的天主教堂，148
in China，中国的基督教，93—95，96
and civilization，基督教与文明，165

in the Dark Ages，黑暗时代的基督教，172—173
in Egypt，埃及的基督教，129，131—133
in India，印度的基督教，63，67—68
in Iraq，伊拉克的基督教，5—6，29—33，33—35，173
and Islam，基督教与伊斯兰教，29
and Old World civilizations，基督教与旧世界文明，172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基督教与西方文明，165—166，177—178
see also Coptic Christians; Nestorian Christians，也参见科普特基督教徒；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景教徒），92
Chu Hsi，Chinese philosopher，朱熹，中国哲学家，97—98
civilization，defining the term，对文明的界定，3—4
Coatlicue，Aztec goddess，科亚特利库埃，阿兹特克女神，155
Columbus，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64，179，183
Confucius/Confucianism，孔子 / 儒家学说，56，60，86—88，90，97—98，104，106—108，185，193，198
Constantine，Emperor，君士坦丁，皇帝，36，93，173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36，93
Copan，科潘，140，152—154
Coptic Christians，科普特基督教徒，115，134—136
feast of St Michael，圣米迦勒节，115
and the festival of Abul Haggag，科普特基督教徒与阿布·哈加戈节，135—136
Coromandel coast，科罗曼德尔海岸，71
Cortés，Hernando，埃尔南多·科尔特斯，156—158
Crete，克里特，4，154
Crimean War，克里米亚战争，42
Cunningham，Alexander，亚历山大·坎宁安，43，47
Cuzco，Peru，库斯科，秘鲁，54，79，118，160
Dara Shukoh，达拉·舒科，69—70，77
Dark Ages，黑暗时代，173—174，178
Dasas，达萨人，46，51
David，biblical hero，大卫，圣经中的英雄，174
Descartes，René，勒内·笛卡儿，103，180
dharma，正法，61—62，67，75
Diaz，Bernal，贝尔纳尔·迪亚斯，140，156
Dravidian languages，达罗毗荼语，51—52，72，192
Tamil，泰米尔语，4，51—52，63，74
Dravidians，达罗毗荼人，51—52，71

Dryton, Greek cavalry officer，德雷顿，希腊骑兵军官，127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42，75
economics，经济，15，23，24，26，36，40—41，50，60，65，75—76，99，104，107，125，170，172，170—172，186
 and Old World civilizations，旧世界文明与经济，170—172
 and Sumerian writing，苏美尔文字与经济，23
Eden，Garden of，伊甸园，6，17，54，185
Egypt，埃及，2，4，12，25，31，47—49，60，81，84，109，140，142，149，151，169—172，174，183，189，194，198
 Abydos，阿拜多斯，84，119—121，129，133
 agriculture，农业，8，10—11，16，19，26，50—51，99，116，125，148，176
 Akhmim，艾赫米姆，112，120，131，132，133，194
 Alexandria，亚历山大，22，28，43，47，74，109—111，120，127，128—130，169，171，195，201
 Assyrian attacks on，亚述对埃及的攻击，109，126
 Byzantine rule in，拜占庭对埃及的统治，109
 Cario，开罗，1，112，121，135，137—138，198
 and China，埃及与中国，81，114
 and classical Arab civilization，埃及与阿拉伯古典文明，137
 dynasties，王朝，1，25—26，28，33，41，43，47，56，60，66—68，71，86，98，109，114，116—121，123，131，139，144，152—154，174，190—191
 Edfu，伊德富，114，120，133—134
 end of paganism in，埃及传统宗教的终结，130—133
 geography of，埃及的地理，115
 Greek rule in，希腊对埃及的统治，109—114，120，124—125，127—128，131，138，169
 Heliopolis，赫利奥波利斯，112，114
 Hierakonpolis excavations，希拉孔波利斯的挖掘，117—121
 Horus kings，荷鲁斯诸王，116，118—119
 Ibn Khaldun on Egyptian history，伊本·赫勒敦论埃及历史，138
 and India，埃及与印度，49，111，114
 and Iraq，埃及与伊拉克，25
 Islam in，埃及的伊斯兰教，109，115，121，125，129—130

Luxor，卢克索，117，133，134—136，169，172，198
Medinet Habu，哈布城，133，136
Memphis，孟菲斯，121，127，137
Middle Kingdom，中王国，124
New Kingdom，新王国，117，124—125
Old Kingdom，旧王国，123—124
optimistic civilization in，埃及的乐观主义文明，115
Ottoman conquest of，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征服，137—138
Persian conquest of，波斯对埃及的征服，109，126
Pharaonic，法老时代的埃及，125
pre-Dynastic period，前王朝时期，119—120
Pyramid Age，金字塔时代，119，121，123，125
Roman rule in，罗马在埃及的统治，109—110，125，128，130—131，138
unification of，埃及的统一，114
Eighteen Rabbit，Mayan king，“十八兔王”，玛雅国王，152—153
Elamite (ancient language of Persia)，埃兰语（古波斯语），14，51—52
England，英格兰，1，46，63，167，175，180，182，201
Anglo-Saxon，盎格鲁一撒克逊，1，176
Dark Ages，黑暗时代，173，174，178
Maldon，莫尔登，180
population growth，人口增长，11，19，123
English language，in India，印度英语，77
Enki，Sumerian god，恩基，苏美尔神祇，16—17
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38，167—168，179，181，183
and Greek civilization，启蒙运动与希腊文明，167—168
and Hinduism，启蒙运动与印度教，44
Epic of Gilgamesh，《吉尔伽美什》，21，24，40，186
Epictetus，爱比克泰德，130
Eridu，埃利都，9，14，16—18，26，29，38，54，79，118，190
Etana，story of (Sumerian poem)，伊坦纳的故事（苏美尔诗歌），20
Euphrates，river，幼发拉底河，5，7—10，18—19，25，38
family size，in Western Europe，西欧的家庭规模，175—176
Fatehpur Sikri，法塔赫布尔西格里，66，68
Frankfort，Henri，亨利·法兰克福，126
Frank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181

Fraser, J. Baillie, J. 贝利·弗雷泽, 6
Galileo, 伽利略, 180
Gama, Vasco da, 瓦斯科·达·伽马, 2, 101
Gandhi, Mahatma, 圣雄甘地, 61, 76, 78
Ganges civillization, 恒河文明, 54, 58
Ganges, river, 恒河, 46—47, 52—55, 58, 60, 62, 68, 78, 112, 115, 118, 169, 178
Genesis, Book of, and Iraq, 《创世记》与伊拉克, 6—7
Gilgamesh, King of Uruk, 吉尔伽美什, 乌鲁克国王, 21, 24—26, 32, 40, 186
Girsu, 吉尔苏, 25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2, 201
Gnostic Gospels, 诺斯替古卷, 129
Gnosticism, 诺斯替主义, 129, 132, 178
Gobi Desert, 戈壁滩, 91
Greek civilization, 希腊文明
  Athens, 雅典, 98, 168, 172, 176, 199
  and Central America, 希腊文明与中美洲, 162, 164
  and China, 希腊文明与中国, 86
  and Egypt, 希腊文明与埃及, 109—114, 120, 124—125, 127—128, 131, 138, 169
Greek conquest of Asia, 希腊对亚洲的征服, 168
  and India, 希腊文明与印度, 56, 58—60, 62, 168, 170
  and trade, 希腊文明与贸易, 171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与西方文明, 171—173, 179, 182, 188
  see also Hellenism, 也参见希腊文化
Green, F. W., F. W. 格林, 117—119, 181
Greenwich meridian, 格林威治子午线, 181
Guadalupa, Virgin of, 瓜达卢佩圣女, 159
Guatemala, 危地马拉, 3, 140—143, 145, 151—152, 160—164, 195, 199
  Highland Maya in, 危地马拉的高地玛雅, 143—148
  Momostenango, 莫莫斯特南戈, 3, 146, 164, 199
  Tayasal, 塔亚萨尔, 162—163
Gujerat, 古杰拉特, 23, 50—52, 59
Gulf Wars, 海湾战争, 3, 15, 38, 174
Hallaj, 哈拉智, 31,33, 69
Harappa, 哈拉帕, 42—43, 47, 49—52, 55, 72
Harun al Rashid, 哈伦·拉世德, 36
Heliodorus, 希罗多德, 110
Hellenism, 希腊文化, 28, 129, 132,

167, 169, 178, 194
in Egypt，埃及的希腊文化，109—114，127—133，138
Hellenistic Age，希腊化时代，27，74，110—112，114，127，139，168，170，194
and Iraq，希腊文化与伊拉克，28
Heraclitus of Ephesus，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58
Herodas，Greek poet，赫罗达斯，希腊诗人，127
Herodotus，Greek traveller，希罗多德，希腊旅行家，110—112，131，136，169
Hinduism，印度教，2，4，35，42，44，46—48，52，58，61，63—71，76，111，129，191，192
and Akbar，印度教与阿克巴，66—69
ancient cosmic pillars，古老的宇宙柱，61
and Aurangzeb，印度教与奥朗则布，69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印度教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75
and Dara Shukoh，与达拉·舒科 69—70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35，66，70，138
and Islam，印度教与伊斯兰教，68，70，137
and Mohenjo—Daro，印度教与摩亨佐－达罗，47—49
pilgrim stalls，礼拜堂，17，39，64，122
and Sanskrit sacred texts，印度教与梵文经典，44，45—47
in Tamil Nadu，泰米尔纳德邦的印度教，70
Hisarlik (site of Troy)，西沙里克（特洛伊遗址），42
Hobbes，Thomas，托马斯·霍布斯，181
Homer，*Iliad*，荷马，《伊利亚特》，53，124
Honduras，洪都拉斯，140，151—152，199
Horapollon，霍拉博罗尼，132—133
Horus，Egyptian hawk god，荷鲁斯，埃及鹰神，112，116—120，128
Hsuan Tsang，Buddhist missionary，玄奘，佛教弘扬者，54，92
Hu Shih，胡适，183
Huitzilopochtli，Aztec war god，胡特兹罗普特利，阿兹特克战神，156
human sacrifice，人祭 ，84，121，156—157
Aztecs，阿兹特克人，121—122，140，151，155—159
in Bronze Age China，中国青铜时代的人祭，84
in Egypt，埃及的人祭，126

and the Maya，人祭与玛雅文明，156
humanism，人文主义，177—178
Hussayn，Imam，伊玛目·侯赛因，65
I Ching，《易经》，84，86，104，106，108
Ibbi Sin of Ur，乌尔的伊比辛，26
Ibn al-Fakih，伊本·阿尔—法基，137
Ibn Battuta，Arab traveller，伊本·白图泰，阿拉伯旅行家，99，115，137
Ibn Jubayr，Arab traveller，伊本·朱拜尔，阿拉伯旅行家，131
Ibn Khaldun, Islamic historian，伊本·赫勒敦，伊斯兰史学家，104，138，178，185
Ibn Sserabh，伊本·塞拉布，29
Imhotef，Egyptian architect，伊姆霍特普，埃及建筑师，122
Inanna (Ishtar)，goddess，伊南娜（伊西塔）女神，18，21，31，187，188
Incas，印加，2，140，148，151，160
India，印度，1—4，8，10，12，15，23，31，35，40—42，56，58—72，74—80，86，91—93，96，100—101，105—106，111—112，114—115，118，121，127，129，142—143，151，165—173，175—178，182，185，189，191—192，197—199，201
agriculture，农业，8，10—11，16，19，26，50—51，99，116，125，148，176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印度的考古发掘，43
Axis Age，轴心时代，56，59，62，86，129，167，185
Benares (Kashi)，贝拿勒斯（迦尸），44，55，58，64—66，70，192，198
British rule in，英国在印度的统治，74—76
Buddhism，佛教，47，54，58—59，61，64，67，70，91—92，94，129，170，
caste system，种姓制度，53，58，65，77
and China，印度与中国，100
crafts，手工业，34，96
and Egypt，印度与埃及，49，111，115，118，121，129
failures of，印度的失败，77
Fatehpur Sikri，法塔赫布尔西格里，66，68
Ganges civilization，恒河文明，54，58
and the goals of civilization，印度与文明的目的，82
and Greece，印度与希腊，56，58—60，63，72，166，169
Harappa，哈拉帕，42—43，47，49—52，55，72
Independence，独立，2，4，21，39，62，66，76，80，114，124，126，140，142，153，

159，162—163，179，181，186
Indian ‘Mutiny’，印度“兵变”，42
Indus civilization，印度河文明，49—53，74，191
and Iraq，印度与伊拉克，45
Judaism in，印度的犹太教，67—68
Kerala，喀拉拉，62—64
lost cities of Indus，印度河消失的城市，47—49
and the *Mahabharata*，印度与《摩诃婆罗多》43，53—54
Mauryan Empire，孔雀王朝，47，60—62
and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40
Moghul Empire，莫卧儿帝国，42，56，66，74
Mohenho-Daro，摩亨佐一达罗，47—49，51，191
Patna，巴特那，60—61，170
population growth，人口增长，11，19，123
rediscovery of the prehistory of，印度史前史的再发现，43
and Rome，印度与罗马，172—173
secular constitution (1950)，世俗宪法（1950），66
South India，南印度，1，51，56，191，195
technology，技术，182—183
trade with Iraq，印度与伊拉克的贸易，49—50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印度与西方文明，165—166，177，185
see also Hinduism; Tamils，也参见印度教；泰米尔人
Indian Ocean，印度洋，1，171—172
individualism，and Western civilization，个人主义与西方文明，167，177，180—181
Indo-European languages，印欧语系，45，52
Indo-Europeans，印欧人，45，47，51，59，80，192
Indus civilization，印度河文明，49—53，74，191
Indus，river，印度河，8，10，12，23，42，47，49—52，53，55，59，64，71，74，191，192
Iran，伊朗，2，10，12，26，29，31，35—36，45—46，50—52，93，98，129，167，190
and Greece，伊朗与希腊，169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伊朗与印度河文明，50—51
Revolution，伊朗革命，2
Iraq，伊拉克，2，4，5—41
agriculture，农业，8，10—11，16，19，26，50—51，99，116，125，148，176
Basra，巴士拉，16，31，38，50，177，190

Brethren of Purity，“精诚兄弟会”，177—178
Batthist regime，复兴社会党政权，38
and China，伊拉克与中国，84，93
decline of medieval，中世纪伊拉克的衰落，38
and Egypt，伊拉克与埃及，7
Eridu，埃利都，9，14，16—18，26，29，38，54，79，118，190
and Greece，伊拉克与希腊，169
house design in ancient cities，古代城市中的住宅设计，22
and India，伊拉克与印度，47—49
irrigation systems，灌溉系统，8，19，25，37，49，81，152
landscape and climate，地形与气候，7—16
legac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古代文明的遗产，40—41
literature，文学，23—25
Marsh Arabs of southern Iraq，伊拉克南部沼泽阿拉伯人，2
as a pessimistic civilization，伊拉克悲观主义文明，25—27，40，186
Shiite holy cities，什叶派圣城，38，39
southern，南部，2—11，14—15，17—18，20，24—25，27—31，37—39，45，47，51—52，55，61—63，70，72，79，92，96，99—101，105，111，124，152，171，172，180，185，199
Sumerian writing，苏美尔文字，16
Warka，瓦尔卡，6—7，14，197
see also Baghdad; Sumer，也参见巴格达；苏美尔
Isis，Egyptian goddess，艾西斯，埃及女神，111，115，128，133—134
Islam，伊斯兰教
and Arab scholars，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学者，177—178
in China，中国的伊斯兰教，93—95，96，100
in Egypt，埃及的伊斯兰教，109，115，121，124，128—136
in India，印度的伊斯兰教，42—43，52，64—70
in Iraq，伊拉克的伊斯兰教，5，24，29—37
Islamic empires，伊斯兰帝国，178
and monotheism，伊斯兰教与一神论，60
and the Near East，伊斯兰教与近东，165
and Old World civilizations，伊斯兰教与旧世界文明，171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186
Jainism，耆那教，58—59，61，64，67，70

Japan，日本，1，4，59，61，106，171，192
and China，日本与中国，106
Jarrow，monastery of SS Peter and Paul，贾罗，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174—175，199
Jaspers，Karl，卡尔·雅斯贝斯，59
Java，爪哇，71，100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181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32，87
John the Baptist，施洗者约翰，32
Jones，Sir William，威廉·琼斯爵士，44
Judaism，犹太教，5，28，31—32，35，63，67，86，93，96，104，132—133，139，172
and Akbar，犹太教与阿克巴，67
and China，犹太教与中国，87，93，96
in Egypt，埃及的犹太教，131
in India，印度的犹太教，62—63
in Iraq，伊拉克的犹太教，5，29—33，35
and the Romans，犹太教与罗马人，173
Julius Caesar，尤利乌斯·恺撒，44
Jumna river，朱木拿河，46，52，54，78，118，170—171
Jung，Carl，卡尔·荣格，130
Kabir，伽比尔，65，77
Kaccayana，Kassapa，卡萨帕·卡卡亚纳，58
Kahlo，Freda，弗雷达·卡洛，159
Kaifeng，开封，3，96—98，193
Kang Yu Wei，康有为，106
K' ang-hsi，Chinese emperor，康熙，中国皇帝，87，103，
Kausambi，憍赏弥，55，61，170
Kerbala，卡尔巴拉，29，38—39，65，197
Kesakambalin，Ajit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38
Khadimain，哈迪迈尼，38
Khomeini，Ayatollah，霍梅尼，大阿亚图拉，35，41
Khufu，Egyptian king，胡夫，埃及国王，121—123，125，139
Kom el-Ahmar excavations，考姆艾哈迈尔的考古挖掘，112—115
Korea，朝鲜，59，61 Kufa，库法，31，37
Kurdistan，库尔德斯坦，11，38—39
Kurds，库尔德人，8
Lagash，拉格什，21
Lakshmi，Indian goddess，拉克什米，印度女神，171
Lao Tzu，老子，56，60，89
Larsa，拉尔萨，19，26
Las Casas，Bartolomeo de，巴尔托洛梅奥·德·拉斯·卡萨斯，161
Leys，Simon，西蒙·利斯，80

Li Po, Chinese poet, 李白, 中国诗人, 93, 95
Liang Shu-ming, 梁漱溟, 107
Lilith, demoness, 莉莉丝, 女魔, 30
literature, 文学
  in China, 中国的文学, 86
  Mayan, 玛雅的文学, 147
  Mesopotamian,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 25—27
  Sanskrit scared texts, 梵文经典, 43—47, 53—54
Liu T'ieh—yun, 刘铁云, 80
Loftus, William, 威廉·洛夫特斯, 5, 18
Luxor, 卢克索, 117, 133, 134—136, 169, 172, 198
Ma Tuanlin, 马端临, 98
Madurai, 马杜赖, 44, 52, 72—74, 150, 197, 198
Mahabharata, 《摩诃婆罗多》, 53, 66
Mahavira, Jain guru, 大雄, 耆那教领袖, 56, 59—60
Maldon, 莫尔登, 180
Mandaeans, 曼底安派, 5, 30, 32—33, 67, 129, 190
Manetho, Egyptian priest, 曼涅托, 埃及祭司, 109, 111—112, 114, 119
Mani, prophet, 摩尼, 先知, 28, 30, 93, 129, 171, 178, 190, 198
Manichaeism, 摩尼教, 28, 30, 93, 129, 172, 178, 190, 198
Mao Tse-Tung, 毛泽东, 106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70, 99
marriage, and population control, 婚姻与人口控制, 176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75
Masudi, *Annals*, 马苏迪, 《编年史》, 35, 37
Mauryan Empire, 孔雀王朝, 43, 47, 61
Maya, 玛雅, 2—3, 79, 122, 140, 142—149, 151—156, 158—159, 161—164, 195, 199
  book of Totonicapan, 托托卡尼潘手稿, 145—146
  calendar, 日历, 147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与天主教堂, 143—145, 148, 163
  and the Chinese, 玛雅与中国人, 142—143, 158
  classic, 古典时期的玛雅, 142, 151
  and Copan, 玛雅与科潘, 140, 151—154
  and the cycle of time, 玛雅与时间的循环, 143, 158, 163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衰落, 154
  and 'Eight Monkey' day, 玛雅与"八猴节", 164
  and human sacrifice, 玛雅与人祭, 156
  modern, 现代玛雅, 163

and Teotihuacan，玛雅与特奥蒂瓦坎，118，149—151
and Tikal，玛雅与蒂卡尔，151—154
and Utatlan，乌塔特兰，146，148
Yucatan，尤卡坦半岛，141，152
medieval Europe，中世纪欧洲，19
Medinet Habu，Egypt，哈布城，埃及，133，136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地中海文明，166，171，174，180
Megasthenes，麦加斯梯尼，56—57
Mehrgarh，excavations at，梅尔伽赫的发掘，50
Menander，Greek officer，米南德，希腊军官，174
Menes，Egyptian king，美尼斯，埃及国王，114，118—121，124—125，135，137
Mentuhotep，Egyptian king，门图霍特普，埃及国王，124
Mesopotamia see Iraq，美索不达米亚，参见伊拉克，7，8，11，16，17，22，24—25，27—30，32—33，35—37，39，40，45，48，115，151，189—190
Mexico，墨西哥，2，118，121，140，141，149—152，155—160，162，179，195，199
culture and art，文化与艺术，159—160
Tenochtitlan，特诺奇蒂特兰，155，158
Teotihuacan，特奥蒂瓦坎，118，148—151，199
and the Virigin of Guadalupe，瓜达卢佩圣女，159
see also Aztecs，也参见阿兹特克人
Mexico City，墨西哥城，155—157，159
Min，Egyptian phallic god，敏，埃及神祇，112，118，120，123，131—133，202
Minakshi，great goddess of Madurai，米娜克什，马杜赖的主要女神，52，72，79，197
Mirador，and classic Maya civilization，米拉多尔，与玛雅古典文明，151—152
Mitanni，米坦尼，45
modernism，现代主义，2，4
Moghul Empire，莫卧儿帝国，42，56，66，74
Mohammed，Prophet，穆罕默德，先知，37，65，133—134
Mohenho-Dara，摩亨佐一达罗，47—49，51，191
seals from Iraq at，来自伊拉克的图章，47—49
Momostenango，莫莫斯特南戈，3，146，164，199
monasticism in Egypt，埃及的禁欲主义，130

Mongol China，蒙古人统治的中国，98—100
Mongol invasions，蒙古人的入侵，172
Nadim，*Fihrist*，奈迪木，《群书类述》，35，37
Najif，纳杰夫，21，29，38，39
Narmer，Egyptian king，纳尔迈，埃及国王，117—119
Nesser，G.，G. 纳赛尔，138
native Americans，美洲土著人
and the Catholic church，与天主教堂，161—162
death of after the Conquest，西班牙人征服之后的死亡，162，179
Incas，印加，2，140，148，151，160
spiritual beliefs，精神信念，143
see also Aztecs; Maya，也参见阿兹特克人；玛雅
Near East civilization，近东文明，81
and Greece，近东文明与希腊，168
and Iraq，近东文明与伊拉克，41
and religion，近东文明与宗教，60
see also Iraq，也参见伊拉克
Nehru，Jawarharlal，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76
Nestorian Christians，聂斯托利派，5，24，30，108
in China，中国的景教徒，92
in Iraq，伊拉克的聂斯托利派，5，28
Newton，Sir Isaac，艾萨克 · 牛顿爵士，103
Niebuhr，Karsten，卡斯腾 · 尼布尔，6
Niffari，Sufi，尼法里，苏非派，32
Nile，river，尼罗河，10，109，111—112，115—116，118，121—124，129—131，135，137—138，169
Nippur，尼普尔，9，12，14，16，21，26，30，32，*190*
Inanna temple，伊南娜神庙，22
magic incantation bowls，符咒碗，30
Nobilis，Roberto de，罗伯托 · 德 · 诺比利斯，44
Nonnos，Greek poet，诺诺斯，希腊诗人，132
northern Europe，北欧，166，175—176，180，*182*
Old World civilizations，旧世界文明，142，148，158，170
Olmecs，奥尔梅克人，148
Olympiodorus of Thebes，底比斯的奥林匹奥多鲁斯，132
opium trade，鸦片贸易，105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38—39，50，137，139
and Egypt，奥斯曼帝国与埃及，137—138
and Iraq，奥斯曼帝国与伊拉克，5，38—39
and trade with India，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贸易，49—50

Ou-yang Hsiu，Chinese statesman，欧阳修，中国政治家，97，193
Oxus river，奥克苏斯河，45—46，52，169
Paganism，Egyptian，埃及的传统宗教信仰，130—133
Pakistan，East Indian railway line，巴基斯坦，东印度铁路，42，50—51，66，191—192，198
Palermo Stone，巴勒莫石碑，114，119
Pali language，巴利语，92
Parur，synagogue at，伯鲁尔的犹太教会堂，63
Pascal，Blaise，布莱兹·帕斯卡，102，185
Patna，巴特那，65，174
Paz，Octavio，奥克塔维奥·帕斯，155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168
Persia，波斯，1，2，7—8，14，19，22，28—29，31，33，36—37，39，45，50，58，67，69，70，91，93，96，101，109，126，137，171—173，177，179
　see also Iraq，也参见伊拉克
Peru，秘鲁，2，4，54，118，148，179，195
　Cuzco，库斯科，54，118，160
　Incas，印加，2，140，148，151，160
Pico della Mirandola，皮科·德·米兰多拉，177
Plato，柏拉图，110，132，168，178
Plotinus，Egypt philosopher，柏罗丁，埃及哲学家，130
Plume，Thomas，托马斯·普卢姆，180
poetry，in China，中国诗歌，85—86，93—98
Polybius，Greek historian，波里比阿，希腊史学家，170
popol vuh（Mayan literature），《波波尔·乌》（玛雅文学），144—147，149，153，195
population control，人口控制，175—177
population growth，人口增长，5，14—15
Prayag (Allahabad)，钵罗耶伽（安拉阿巴德），54，61，68
printing，in China，中国的印刷术，97
Protestant Reformation，新教改革，180
Ptolemaois，Macedonian recluse，托勒密，马其顿修士，73，109—110，114，124，127—128，130，134，139，154，165，167—168，171—173
Ptolemy Ⅱ，King of Egypt，托勒密二世，埃及国王，111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60，86
'Qoyllur Rit'（'star snow festival'），（节日）（“星雪节”）160

Quetzalcoatl, Azatec god, 羽蛇神, 阿兹特克神祇, 156
Quibell, James, 詹姆斯·奎贝尔, 117
Ramayana,《罗摩衍那》, 44
Rameses Ⅲ, Egyptian king, 拉美西斯三世, 埃及国王, 136
Ravi, river, 拉维河, 42
Razi, Al-, 阿尔·拉齐, 35
religion, 宗教, 1, 2, 5, 10—11, 15—16, 19—20, 25, 28—32, 35—36, 44, 48, 51—55, 58—60, 62—70, 74, 78—80, 84—86, 89, 91—92, 101, 105, 110—112, 114, 116—118, 120, 125, 127—129, 131—136, 138, 142, 144, 146, 148, 151—152, 157—159, 167, 170, 172—175, 177—181, 183, 190—191, 195, 197—198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37—38, 152, 165, 167, 173, 177
Ricci, Matteo, 利玛窦, 102, 181
Rig Veda,《梨俱吠陀》, 46—47, 51, 57
Romans, 罗马人, 73, 109—110, 124, 128, 130, 133—134, 138, 154, 165, 167—168, 171—174
  and Central American civilizations, 罗马人与中美洲文明, 160
  in Egypt, 埃及的罗马人, 109—110, 126, 128, 130—133
  in India, 印度的罗马人, 170
  and the Indian Ocean trade, 罗马人与印度洋贸易, 170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罗马人与西方文明, 166, 167, 171—173
Saadi of Shiraz, 设拉子的萨阿迪, 37
Sahagan, Bernardino de, 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 158
Sahni, Daya Ram, 达亚·拉姆·萨尼, 47
Samarra, 萨迈拉, 38
Sanskrit, 梵语, 44—47, 52, 53, 63, 111, 192
  language, 语言, 1, 14—15, 28, 32, 36, 44—46, 51—52, 56, 70, 74, 77, 100, 110, 127—129, 142—143, 165—166, 174, 180, 183, 192
sacred texts, 经典, 46, 63, 86, 88, 104, 137
Saqqara, 沙卡拉, 121, 137
  necropolis, 墓地, 33, 42, 121—122, 138
step pyramid, 阶梯金字塔, 121—123
Schopenhauer, A., A. 叔本华, 70
scienc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科学与西方文明, 180
Sepulveda, Aristotelian philosopher, 塞普尔韦达, 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 162
Seth, Egyptian god, 赛特, 埃及神祇,

116，118
Shenuda of the White Monastery，白修道院的谢努达，132
Shia Islam，什叶派，5，27—29，35，38—41，65，67，190
and Akbar，什叶派与阿克巴，66
in Iraq，伊拉克的什叶派，5，27—33，35
Shiva，Hindu god，湿婆，印度神祇，42，49，55，59，70—72，74，79，101
Shu-sin of Ur，乌尔的舒辛，26
Shulgi of Ur，乌尔的舒尔吉，26—27
Shurrupak，舒鲁帕克，14，19
Silk Route，丝绸之路，91，93，95，170，172
Sinleqiuninni，Uruk master scribe，辛里奇乌尼尼，乌鲁克抄写大师，25
Sippar，Babylonia，ziggurat at，巴比伦尼亚的西巴尔金字形神塔，128
slavery，奴隶制，61，122，172，176，181
Smith，Adam，亚当·斯密，1，179
South America，Inca civilization，南美洲，印加文明，72，148
spice trade，香料贸易，62，171
Ssu-Ku-Ch'uan-shu (Chinese encyclopaedia)，《四库全书》(中国百科全书)，103
Ssu-ma Kunag，Chinese historian，司马迁，中国史学家，83—84，91
Stephens，John，约翰·斯蒂芬斯，140
Sufism，苏非派，31，35，41，65，69，177，190，194
Sumerian civilization，苏美尔文明
cities，城市，16—23，25，30，37
and India，苏美尔文明与印度，47
destruction of (1991)，苏美尔文明的毁灭（1991），39—40
fall of，苏美尔文明的衰落，25—27
myth of the origins of，苏美尔文明起源的神话，187—188
Sunni Islam，逊尼派，28—29，35，39，67
and Akbar，逊尼派与阿克巴，66
in Iraq，伊拉克的逊尼派，28
Taishan，Taoist sacred mountain，泰山，道教圣地，89—90，198
the Talmud，《塔木德》，30
Tamil language，泰米尔语，4，51—52，63，74
Tamils，泰米尔人，1，70—71
Chidambaram，吉登伯勒姆，3，71，74
Chola dynasty，朱罗王朝，1，56，71，191
Madurai，马杜赖，44，52，72—74，150，197，198
Srirangam，斯里兰加姆，71，74
Taoism，道教学说，道教，64，92—94，96，114
Tayasal，塔亚萨尔，162—163

Taylor, John, 约翰·泰勒, 16
Tel Afar, 泰勒阿费尔, 11, 21
Tel Jidr, 泰勒吉尔, 19
Tenochtitlan, 特诺奇蒂特兰, 158
Teotihuacan, 特奥蒂瓦坎, 118, 148—151, 199
  as a pilgrimage centre, 朝圣中心特奥蒂瓦坎, 149
  Pyramid of the Sun and the primordial cave, 太阳神金字塔和原始洞穴, 149
Texcoco, Lake, 特斯科科湖, 155
Thebes, 底比斯, 111—112, 124, 131
Theodosius, Roman Emperor, 狄奥多西, 罗马皇帝, 132
Thoth, Egyptian God of Wisdom, 透特, 埃及智慧之神, 120, 128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一千零一夜》, 24, 41
Tibet, 西藏, 61, 92
Tigris, river, 底格里斯河, 7, 9—10, 32—33, 37—38
Tikal, 蒂卡尔, 151—152, 154
Tonantzin, Aztec goddess, 托南齐恩, 阿兹特克女神, 159
Totonicapan, book of, 托托尼卡潘手稿, 145—146
trade, 贸易
  India and Arab traders, 印度与阿拉伯商人, 62—63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贸易与工业革命, 182
  Iraq and India, 伊拉克与印度, 49—51
  and Old World civilizations, 贸易与旧世界文明, 170—172
Trajan, Roman emperor, 图拉真, 罗马皇帝, 131
Tu Fu, Chinese poet, 杜甫, 中国诗人, 93, 95
Tu Mu, Chinese poet, 杜牧, 中国诗人, 93
Turin Papyrus, 都灵莎草书, 114
Tutankhamun, 图坦卡蒙, 84
Umma, 乌玛, 19, 25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美国与西方文明, 180—181
Upanishads, 《奥义书》, 31, 58, 69
Ur, 乌尔, 9, 10, 14, 16—18, 21, 24, 26—27, 50, 84, 121, 123, 190
  and China, 乌尔与中国, 84
  and Egypt, 乌尔与埃及, 123
  Third Dynasty of, 乌尔第三王朝, 26
  trade with India, 乌尔与印度的贸易, 50
Uruk, 乌鲁克, 7, 14, 18—26, 29, 38, 169, 172, 185—187, 190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乌鲁克与西方文明, 185—188
Utatlan, 乌塔特兰, 146, 148
Vico, Italian philosopher, 维柯, 意

大利哲学家，180
Victoria, Queen，维多利亚女王，75
Virgil, Roman poet，维吉尔，罗马诗人，182
Virgin of Guadalupe，瓜达卢佩圣女，159
Vishnu, Hindu god，毗湿奴，印度教神祇，64—65，70
Wang Ta'o，王韬，106
Wang Yi Jung，王懿荣，80
warfa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战争与西方文明，106，183
Warka，瓦尔卡，6—7，14，197
West Africa，西非，4
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41，143，155，165—166，168，185，201
  Dark Ages，黑暗时代，173—174，178
  and the Enlightenment，西方文明与启蒙运动，179—181
  and Greece，西方文明与希腊，107—110
  medieval，中世纪的西方文明，25，179—181
  and the New World，西方文明与新大陆，178—179
  Renaissance，文艺复兴，36，38，152，165，167，173，177
  and the Romans，西方文明与罗马人，172—173，183
  trad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贸易与工业革命，182
  trade with Old World civilizations，西方文明与旧世界文明的贸易，170—171
  and the United States，西方文明与美国，181—182
  and Uruk，西方文明与乌鲁克，185—188
  and warfare，西方文明与战争，166，183
  and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西方文明与西欧文化，165—188
women，妇女，53，65，74，111，129，136，170
  Chinese imperial concubines，中国皇帝的嫔妃，95
  Coptic Christians，科普特基督教徒，115，134—136
writing，文字，3—4，7，16，23，29—31，37，40—41，43—44，46，49，51—52，55，62，80，84，86，90，100，102，108—110，114，129，132—133，140，142，144，148，152—153，170，202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文字与中国文明，84—86，108
  Chinese oracle bones，中国甲骨文，24
  hieroglyphic，象形文字，109，114，129，132—133，153

India，印度的文字，55，58
Mayan，玛雅的文字，140，144，153—154
and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文字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7，23，40
Sanskrit texts，梵语经典，46
Sumerian，苏美尔的文字，23
Wu Wang，武王，83
Xian，西安，36，85，90，92—96，150，198
Xiloj，Andres，Mayan shaman，安德烈斯，玛雅萨满教僧人，147
Yax Pac，king of Copan，亚克斯潘，科潘国王，154
Yellow River，黄河，1，10，80—81，83，85，89—91，96，182，198
Yongtai，Chinese princess，永泰，中国公主，95
Yucatan Maya，尤卡坦玛雅文明，163
Zagros mountains，扎格罗斯山脉，8，39，169
Zheng He，Chinese admiral，郑和，中国海军将领，100—101，194
Zheng Zhou，郑州，81，85
Zoroaster，prophet，琐罗亚斯德，先知，28，35，45，67，93—94，173
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28，35，67，93—94，173
Zoser，Egyptian king，左塞尔，埃及国王，122
Zosimusof Panopolis，帕诺波利斯的佐西默斯，13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追寻文明的起源

作者:（英）伍德著

页数:225

出版社:杭州市：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1

简介:《追寻文明的起源》最早在1992年播出。本书是其配套图书，原书名为：Legacy：A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在书中，作者追寻了五个文明的足迹：伊拉克、印度、中国、埃及、中美洲，试图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文明？各地的文明是否相同，又对后世乃至今天的每个人有什么影响？西方文明是普世的吗？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伊拉克：文明的摇篮
第二章　印度：精神帝国
第三章　中国：天命观
第四章　埃及：文明的积淀
第五章　中美洲：时间枷锁
第六章　西方：蛮族之地
参考文献
图片使用说明
致谢
译后记
索引